

三联
耳关

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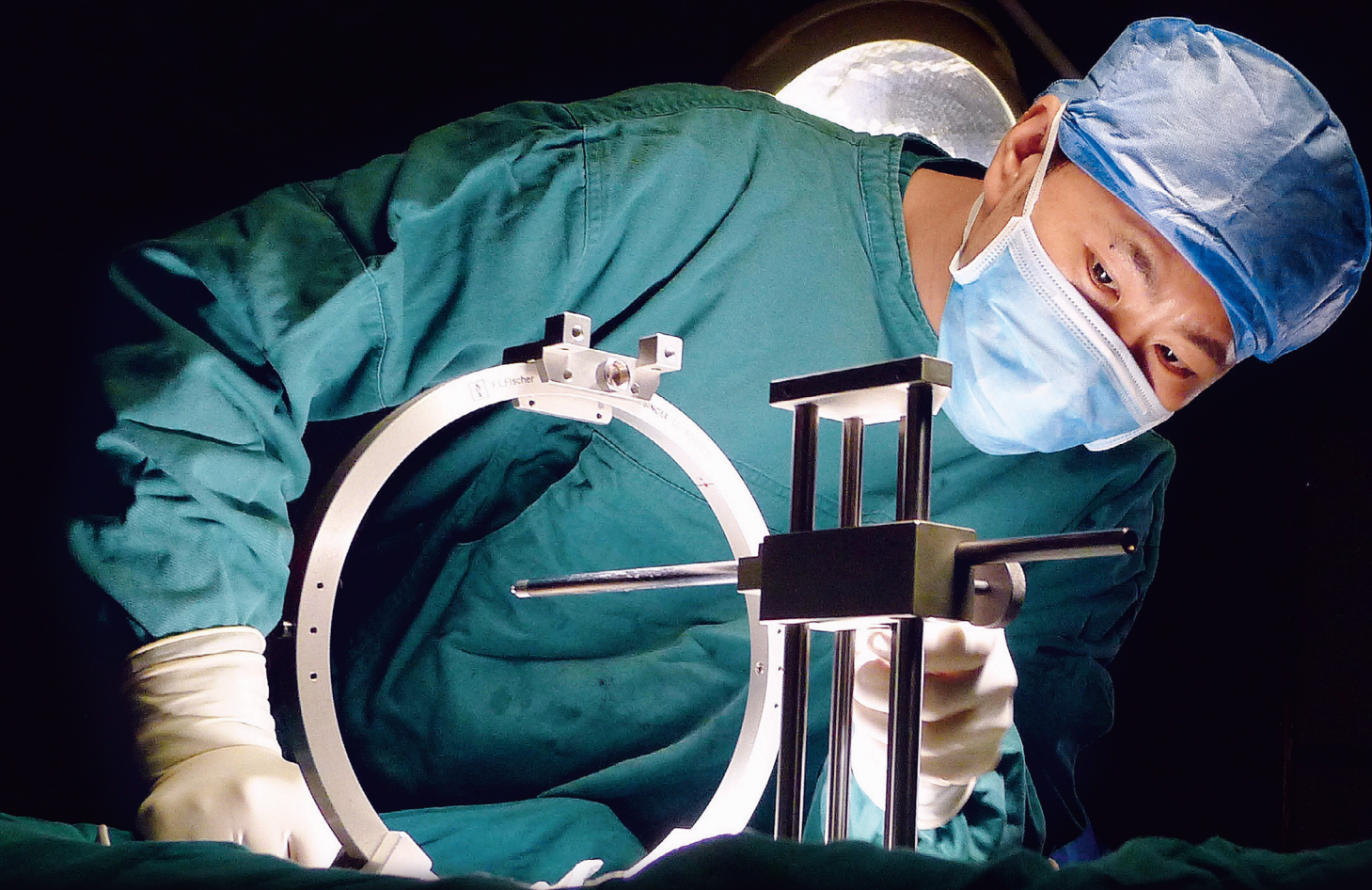
®

2016.3.28
2016年第13期
www.lifeweek.com.cn

周刊

重新认识疾病、医疗与生死

医生的角色



879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 元



《时代》2016.3.28

蒂姆·库克与 FBI 的拉锯战

日前，苹果公司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是否解锁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犯 iPhone 的问题上争执不下。美国司法部指责苹果开发 iOS 8 和 iOS 9 加密功能是为了拒绝配合政府获取数据的要求。苹果 CEO 蒂姆·库克的立场也非常坚定，他表示苹果有责任维护公民自由权和隐私权，并拒绝开发被称为“政府系统”的软件，这是一个没有安全控制功能的新操作系统。



1 / 《纽约客》2016.3.21

桑德斯的影响

就当下选情来看，希拉里比桑德斯更有望在 7 月底赢得党内提名。但希拉里与华尔街的密切联系，和她在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问题上摇摆的立场也让人们对她的可信度产生疑虑。桑德斯广受美国“千禧一代”欢迎，他的经济平民主义立场和推动政治改革的构想触及了民主党内的深层问题，一种破除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所走的中间路线的意愿已在蔓延。桑德斯的存在迫使希拉里不得不调整她在经济、贸易和刑事司法改革等议题上的态度倾向。

3 / 《经济学人》2016.3.19

空洞的超级大国

本周，俄罗斯从叙利亚撤军，普京以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归国飞行员，声称军事行动已取得成功。俄罗斯先后出兵乌克兰、叙利亚，普京试图通过这些举动，让焦虑的国人重拾对俄罗斯这个“超级大国”的信心。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普京政府的成果空泛多过实质。而另一边，奥巴马即将访问古巴，重新开启美国与古巴冰冻 54 年的外交关系。但以目前总统竞选仇外的气氛来看，美古两国关系前景并不清晰。

三联生活周刊



2 / 《新闻周刊》2016.3.25

如果特朗普赢了？

一旦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胜出，就将成为继艾森豪威尔之后第一位没有任何政府工作背景的美国总统。他的支持者们相信他扬言的美墨边境隔离墙、提高贸易关税等举措，认为特朗普就是可以带领美国重整旗鼓的那个人。就连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特朗普身上具备一些突出的特质：对政治形势的适应性以及出色的谈判技巧和语言煽动力。然而，特朗普的政治独断、打击宗教、诽谤墨西哥人等行为都不断影响着他在人们心中的保鲜期。

4 / 《旁观者》2016.3.19

谁杀死了杀人犯？

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英国的谋杀率开始攀升，进入 90 年代急速飙升，直到 2002 年达到顶峰，而去年官方统计的谋杀率降至 2002 年的一半，警方对于侦破谋杀犯罪的预算也已降至 25 年来最低。大数据的运用和街头电子警察的增加无疑有助于谋杀率降低。另一个有效策略是所谓的“破窗”做法，即警方在防止更严重犯罪的同时，严厉打击低级别犯罪。还有一些专家认为，这种谋杀犯罪率的下降是由于更广泛的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加剧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P32

封面故事

重新认识疾病、医疗与生死

医生的角色

- 36 通过医生的视角，理解生命
- 50 医生的修炼，医术之上的人学
- 60 刘端祺：医者的角色与艺术
- 70 医与患关系断代史：权力、壁垒与困境
- 82 镜头背后的医学故事



P112 手 艺：贡 斌：复原真纸体系

社会

时事：远景复照：叙利亚撤军与普京的战略 90
收缩
时事：吴廷觉，缅甸新总统 98
热点：中国渔船被击沉：冲突背后的渔业现状 102
调查：天价学区房，“超级学校”的投入产出 106
手 艺：贡 斌：复原真纸体系 112
科学：基因的力量：一次北欧生命科学考察 118
科学：暗物质卫星“悟空”：漫漫取经路 124

经济

市场分析：银行债转股试水 88
商业：百年宝马升级“第一战略” 128

文化

艺术：安东尼·葛姆雷：把身体看作一种场所 132
逝者：贺友直：“我就是画连环画的” 140
音乐：吉亚奇诺的疯狂城与美好世界 142
电视：另一层色彩的《太阳的后裔》 146
时尚：选择科技，或是眷恋 148

体育：奥原希望：小个子，大能量 152
思想：心灵、意义和现实 160
书评：唯利是图又肩负使命的出版人 162
书与人：帕慕克和他“脑袋里的怪东西” 164

专栏

邢海洋：战兴板与创业板 18
薛巍：摩天大楼如何防风？ 156
张斌：又是一年三月狂 158
宋晓军：从叙利亚到朝鲜半岛 159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66

(本期封面摄影：孙宁东)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3
读者来信	10	生活圆桌	24
天下	12	好东西	28
理财与消费	20	个人问题	168
好消息·坏消息	22		

2016年第13期，总第879期，2016年3月28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名誉主编 Honorary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王星 Wang Xing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蒲实 Pu Shi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翔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程磊 Cheng Lei 李东然 Li Dongran 石鸣 Shi Ming

丘谦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皓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龚融 Gong Rong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赵潇 Zhao Xiao 苗千 Miao Qian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图片总监 Photo Director

商园 Shang Yuan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徐睿洽 Xu Ruihan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杨雪梅 Yang Xuemei

品牌经理 Brand Manager

肖丽媛 Xiao Liyuan

渠道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Marketing Channel

于硕 Yu Shuo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李卫红 Li Weihong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王霄 Wang Xiao

发行物流 Issue Logistics

王荻 Wang d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总监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内容编辑 Editor

薛凡 Xue Peng 刘彭媛 Liu Pengyuan

美术设计 Artistic Design

张莉 Zhang Li

技术支持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手机产品 MB Product

辛军 Xin Jun

平板产品 Tablet Product

连子君 Lian Zijun

活动事业部 Ev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庄山 Zhuang Shan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视频事业部 Video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吴冰川 Wu Bingchuan

创新产品中心 Innovative Products Center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松果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阿润 A Run 邢宇 Xing Yu 孟佳 Meng Jia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尤帆 You Fan

节气刊事业部 Solar Term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韩雅丽 Han Yali 吴泓林 Wu Honglin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广州办事处地址：

广州市海联路6-8号银珠商务中心405室

邮编：510230

电话/传真：(020) 34283562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江苏凤凰台文化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934765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沧海书店 (0791) 8592810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017749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纵横文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1 · 楼兰

3 · 腾讯

5 · 法国航空

7 · 吉林敖东

19 · 农夫山泉

35 · 一汽大众

59 · 智联招聘

69 · 前程无忧

97 · 野生救援

130~131 · WWF

145 · 周刊征订

155 · 周刊20年

157 · 三联新知广告

167 · 书店广告

封三 · 力度形象

封底 · 猎聘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鼠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五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Vtpower
VITALPOWER MEDIA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人机大战

7岁会玩各种棋后，就想攀登棋类最高峰——围棋，然棋力增长过缓，文学兴趣滋生。一日作文课上，炮制科幻小文一篇，幻想自己突然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兜里揣着神器，它通过眼镜给我发信号，指点我每一步落子。这神器大概对应今天的AlphaGo。可这一天真来时，我有点吓坏了，李世石还敢迎接挑战，我却只在电脑前忙活，想找到人工智能的命门，确认它无法掌控人类。这期杂志一口气读了，脑洞有点开，哲学家的话受用。微信上发现袁越《阿法狗有什么可怕的？》一文，诸多疑虑有了清晰的理性分析，有些释然。

北京 蒋文杰

名校迁址

我区实验小学地处市区中心，办校已有近70年历史，可称得上是全区的名校。我家就住在校区内。从我的父亲，到我和我的儿子、侄孙，一家四代人都在这所小学念过书。我对这所小学有特殊的感情，这所历史悠久的小学早已与周边社区构成了独特的社区文化。2014年9月，侄孙小明告诉我，他所在的实验小学要迁址了，迁到7里外的城西技工学校内，技工学校几年前已迁到海边港区，而市区另一所小学迁到实验小学校区，名为区第一小学。

学校迁址，对于居住在原学区内的学生和家长来说，是个不好的消息。本来校区内的学生离校仅有半里到3里多路，五、六年级的学生可以走读，不需家长接送。可学校迁址后，路途就远了，孩子们上学要跑7里多路，有的甚至要跑10里多路，骑车上学不安全，风里来雨里去，家长也不放心。迁址前，该校也曾征求过家长意见，要求孩子留在原校区读书的也可以办理转校手续。只有少数家长不同意孩子随校迁，仍留在原校区读书。侄孙小明仍留在原校区，由于老师、同学变了，他对新班级不适应，上课开小差，还在想念原班级的老师和同学，学习成绩有所波动。

名校迁走了，原学区的二到六年级学生大都到新校区上学，只有一年级新生在新校区招生，将逐年取代原校区学生。名校为何迁址？据说这是区政府研究决定的，是为了拉动城西房地产经济。名校迁址也能拉动房地产经济？如果能，为何不多办几所名

校？10多年前，该县级城市规划是向西发展，房地产开发商抓住机遇，纷纷在西区开发商品房。后来，因形势发展需要，政府新领导班子又研究决定，市区改为向东、向港区发展，结果西区好多商品房无人购买。所以，区政府决定将这所名校迁到西区，因为实验小学教学质量好，知名度高，加上迁址后，实验小学紧靠区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为了方便孩子在名校就读，这样购买学区商品房的人就会增多，以此拉动西区商品房销售。其实，这样做并没有多大效果，名校迁址了，新学区的商品房价格仍在涨，但售房形势却仍然没有好转。

我认为，即便政府想通过拉动商品房销售带动城西的发展，也不能以牺牲原学区孩子的利益为代价去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求，何况，这里还有一个历史名校与学区文化如何续存的隐性问题。如果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保有文化价值而不是名校效应看得更重一些，这件事完全可以换个思路——名校不迁址，在城西办所分校，配备优质师资，提供一流教学，同样可以吸引市民购买学区商品房。

江苏大丰 一读者

何不让人多读书？

每次到图书馆去借书，管理员刷借书卡时都要问一声：“你是余毛毛么？”我说是。我没听过他们问别人，一直纳闷为什么要问我。同事中也有办借书卡的，有天中午，他得知我要去还书，叫我把他的书也代还了，并说他这阵子没时间看书，不再借了。

我听了灵机一动，说把你的借书卡给我，我多借两本。

到图书馆，选好了书办手续时，被告知不能代别人借书，我这时才恍然明白为什么每次借书时他们都怀疑地问我的名字，大概是因为我的名字会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是女孩子，怕我用了别人的证来借书。这让我很感慨，说真的，到图书馆借书虽然是免费的，但借阅者还是要花一定的成本。我的家在城市的西边，我的单位在城市的北边，而图书馆在城市的东边，无论我是从家里还是从单位里到图书馆，都要倒两次车；遇上刮风下雨，有时也还打个车；更重要的是时间成本，我每次借书都是匆匆忙忙，很少在书架前从容地寻寻觅觅，所以有时候借回来的书很不对头。我们这个城市的图书馆规定读者一次只能借两本，借期15天，超过时间就罚款。如果读雨果《悲惨世界》那样的大部头书，15天两本是够了，但读薄一些小书，比如一些散文随笔集，15天两本就嫌少，往往是不到一星期，我就得来还书借书，这样也就加大了金钱和时间的成本。

如果说怕读者用别人的借书卡借书会带来管理上的漏洞和麻烦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怕一个读者多占用图书资源就很没有必要，我认为完全可以允许读者再多借一到两本书。图书资源不够？再追加就是。打造书香

社会是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每年追加一点购书经费，对于一个有近600万人口的地级市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图书馆是一个城市的精神蓄水池，它的功能首先是吸引更广泛的人来汲取精神的养分，我认为它该担忧的是读者少看书，而不是多看书。对一些读书欲望较为强烈的人应该有一定的扩张空间，借阅图书的数量适当放宽一点，没空读的自然少借或不借，因为毕竟书到期不还时还有个罚款措施来调节，这会让人在借书时适可而止的。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如何衡量，我认为图书馆对读者的服务最可以说明问题，它越开放越便利，文明程度就越高。

安徽安庆 余毛毛

没过完年的人

大年初五，我从好友微博上意外得知邻居小熙于前一天突然病逝，我实在是不愿意相信。我往家里打了几个电话，问了小熙的事。他年富力强，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初中上完，在家养过几年长毛兔，收入微薄。其间还试着养过狼狗，但在上世纪90年代偏远的乡村，这似乎“超前”了点，不过这也表现出他的市场意识。后来他去了北京，做了一段奶茶生意，不久就回来了。接着，在大家都还用小型手扶拖拉机收割小麦的时候，他却花近万元买了一台小型

收割机。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措，看上去也很有前途，却不料跨省作业的大型收割机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浩浩荡荡接踵而至。他应该也想过拥有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但成本高昂。他的小型收割机再无用武之地，甚至只能当零件、废铁卖掉，赔了几千块钱。不过这并没有让他灰心丧气，但他也发现在家里没多少机会改善自己的境遇。他去了广州，跟一个亲戚在建筑队干了几年活，也买了几台机器在地铁包了一点工程，据说每年收入十几万元，也有说是二三十万元的。像他这样的收入在村里没几个，方圆十里八里也不多见，也算很有成就的人了。村里每年外出的人有一半多，大部分一年能落五六万块钱就算很不错了。

“成功”的代价竟是如此惨重，小熙早两年就查出有心血管方面的毛病。在我的想象中，他人高马大身强力壮，即使40多岁，应该也像年轻时一样壮实。会不会就是这一点，让他对自己的身体过于自信而不在意“小毛病”？四五十岁的人在乡村本来是最壮的劳动力，很多人这个时候有病也不在乎，能扛就扛。很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很多农村人四五十岁就患上了重病。他是一个很朴实很大方的人，有时还很豪爽，这次

回来过年，初四中午陪客人喝了几杯酒，晚上突然发病，等家人意识到有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即使及时发觉送到十里外的乡镇卫生院，恐怕结果也不会乐观，何况村里路也不好，救护车进不来，自家开车出去也得折腾一阵子，而村里的医生并不能帮上多大忙。

人们都很为他惋惜，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正在上大学，最小的刚刚读小学。他的父亲三年前已经离去，母亲也年近古稀。这个家庭的主要收入就靠他一个人在外打拼，如今，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以后这一家人会面临怎样的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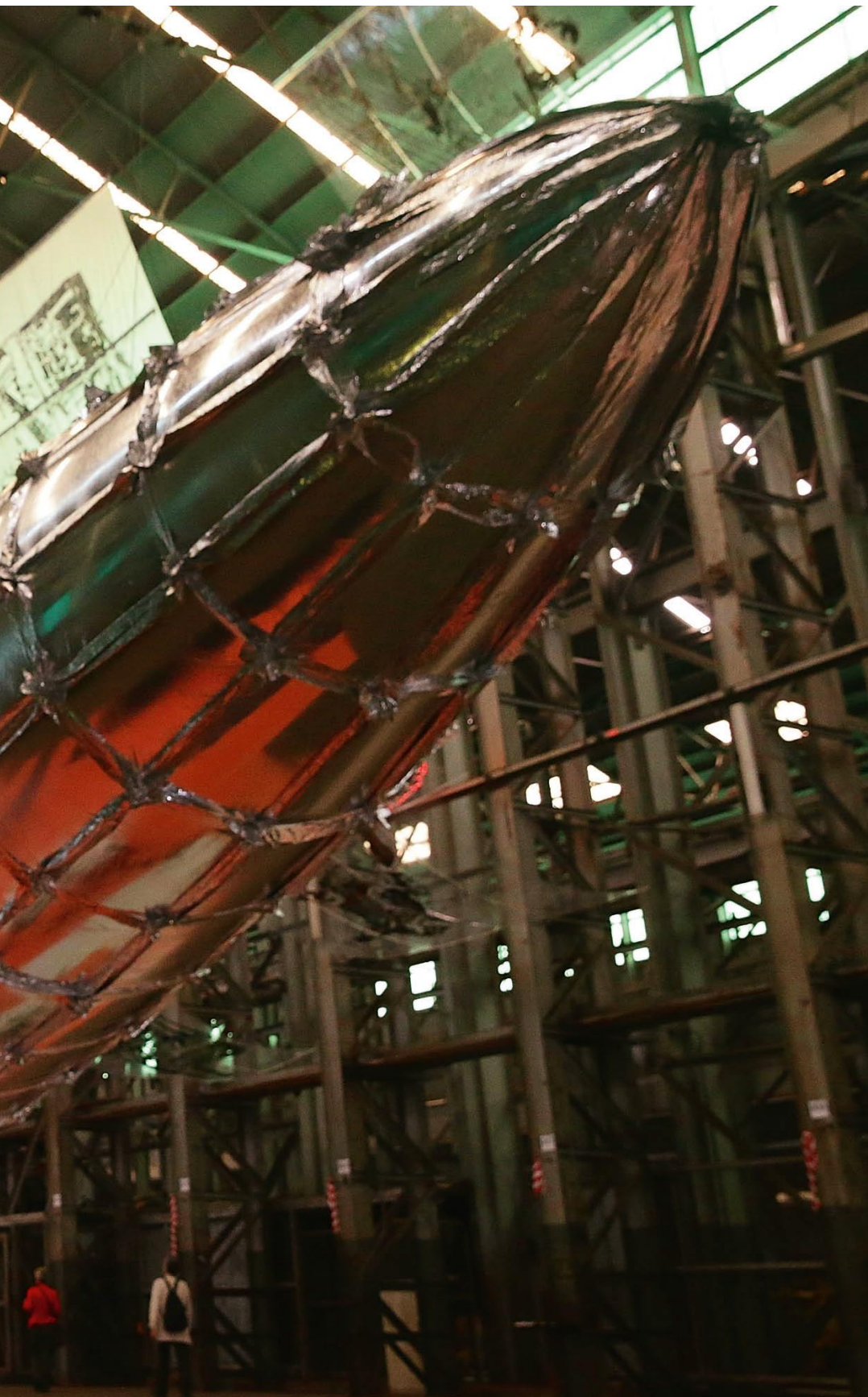
村里还有不少这次没有回家过年，他们是否知道了这件叫人伤心的事？跟一个多年在外打工的邻居谈起这事，他说听到这消息就落泪了。他已经十来年没回家过年，漂泊在外，总是希望能多挣点，让一家人过上安稳的日子，但这种希望说不上渺茫，却很艰难，除了过年，没有星期天，没有假日，有种没完没了的疲惫感。他还提到，他的一个表哥前两年在建筑工地发生意外，也是撇下了一家人，想起来心里就很痛。我也很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能记下这个故事，让我的心离家乡近一点。

河南唐河 马长军



澳大利亚 | 双年展

3月15日，第20届悉尼双年展艺术总监斯蒂芬妮·罗森塔尔女士在悉尼当代艺术博物馆出席媒体预展。正式展览从3月18日开始，6月5日闭展。这次双年展的主题为“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分布不均”。





英国 | 音乐

(右图) 3月14日, 英国歌手利亚尼·拉哈瓦斯 (Lianne La Havas) 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演唱会。



美国 | 圣帕特里克节

(左页上图) 3月17日, 第255届圣帕特里克节游行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举行, 吸引数万人观看。该节日起源于爱尔兰, 是为了纪念爱尔兰的守护神圣帕特里克, 美国的爱尔兰裔喜欢在这一天佩戴三叶草, 用爱尔兰国旗的黄绿两色装饰房间, 身穿绿色服装, 并向宾客赠送三叶草饰物。

古巴 | “何塞·马蒂”勋章

(左页下图) 3月18日,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古巴被授予该国最高荣誉勋章“何塞·马蒂”勋章, 以表彰“他在反美斗争中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图为马杜罗出席受勋仪式后离开古巴国务院。

哈萨克斯坦 | 宇宙探索

(右图) 3月19日，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俄罗斯“联盟号”TMA-20M航天飞船搭载着俄罗斯航天员阿列克谢·奥夫奇宁(Alexey Ovchinin)和奥列格·斯克里波奇卡(Oleg Skripochka)，以及美国航天员杰夫·威廉姆斯(Jeff Williams)出发前往国际空间站。

南非 | 板球

(下图) 3月12日，一名男孩在南非韦斯托纳里亚的一处RDP住宅区附近打板球。RDP住宅是南非政府为底层穷人修建的免费住宅，等待审批的时间通常长达数年。





战兴板与创业板

文 / 邢海洋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板”被删除。与此同时，创业板单周上涨 12.56%，创下有史以来最大周涨幅。作为金融改革重中之重的资本市场改革，预期又一次大逆转，政策市行情再度上演。

创业板的爆发不难理解。战兴板定位于服务规模稍大、已越过成长期、相对成熟的战略新兴产业企业，也就是说这将是一个创业板的升级版，既与创业板有一定的衔接，同时也有一定的适度交叉。以此条件，IPO 大门前拥挤着 700 余家排队上市的公司，相当部分恐怕都符合战兴板上市的要求。更何况战兴板似乎专门为中概股回归量身定做，有了分众传媒和巨人网络的海归赚钱效应，30 余家中概股摩拳擦掌，私有化如火如荼。创业板里那些在行业里处于二流的企业岂是纳斯达克里中概股的对手？

私有化且拆除了 VIE 构架的中概股如今进退两难。回归的目的是为了更高的估值，而高估值不可能在随便就能上市的新三板出现，也不是维持私有化状态就能得到的，它们只有进入 A 股一条路。排在 700 家待上市企业的后面，两三年都难轮上；如分众传媒一样借壳，A 股中的壳资源已经水涨船高。中概股私有化再拆除 VIE 架构不仅耗时耗力，还面临着诸多市场风险，尤其当美股和 A 股价格形成巨大反差，渴望回归的企业只好利益均沾，高价完成回归过程的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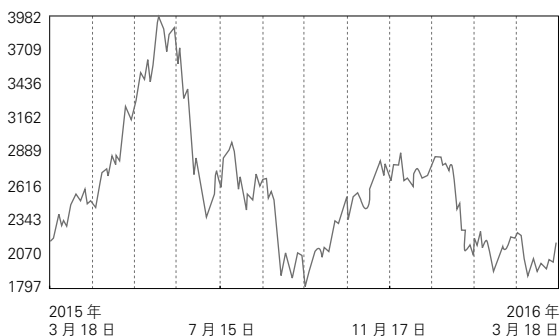
个动作。去年底，奇虎 360 的全现金私有化交易估值大约 93 亿美元，成为中概股史上最大规模私有化计划。故而，中概股基本围绕战兴板进行财务构建，如今战兴板停摆，借壳将是不得不走的路径。一大波中概股回归，意味着壳资源更加奇货可居了。被分众传媒借壳的七喜控股三年最高涨了 20 倍，被巨人网络借壳的世纪游轮涨幅更高，曾连续 20 个涨停。

既然是政策左右市场，政策又很难普惠，政策市下永远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这本无可厚非。可战兴板的设立本来就显得鸡肋，该板开宗明义，针对的是新兴产业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但问题是，A 股中已经有了创业板、中小板和主板，既有偏重大型国企的沪市，又有中小企业和民营为主的深市，上市资源形成了大致的分层次的资本框架。无论 2004 年创设的中小板还是 2010 年的创业板，针对的都是具有行业前景的朝阳企业，一个“新兴产业”的名头横空出世，和创业板立足于新兴产业的创设主旨如出一辙，无非是众多上市资源中又另起了一套炉灶。而以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冠名，本身有悖于企业发展的普遍规律，设若 10 年 20 年后，当新兴产业发展到夕阳阶段，难道上市公司就得集体转板？

金融改革路阻且长，于是避重就轻，倾向于增量上下工夫，用增量倒逼存量改进，新兴板概念的提出恐怕就是这一思路的产物。问题在于，无论创业板还是新兴板都没有绕开发审制的门槛，企业上市都免不了“跑会”，都受到证监会额度控制的调控，在需求端对投资者可谓毫无改进之处，供给端则不过是上交所分享到了深圳多年来独揽“中小创”的红利。尤其是，刚刚结束的“两会”中，政府工作报告未提注册制，“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其政策含义更与年初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注册制改革授权时大有不同，管理层对发行体制的改革似乎又有了新的态度，此前“人大”授权的注册制改革两年授权期限恐生变。措辞变化的背后，管理层呵护市场、呵护指数的意味溢于言表。

政策预期逆转，“两会”后股市活跃起来。但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的长期目标却被指数调控的短期目标掩盖了。市场虽狂欢，却非投资者的长久福利。■

创业板指数



农夫山泉[®]
NONGFU SPRING

“
我的工作就是
确保水的安全
给消费者一个放心
”

肖帅

农夫山泉武陵山工厂水源检测师，
每周一百二十里山路去源头取水。

农夫山泉贵州武陵山水源地实景

每一个员工的坚守
成就了农夫山泉二十年的品质
成立于1996年



全国服务热线
95077





栏目插图 | 范薇

VR 爆发前夜

2014 年 3 月，在访问斯坦福实验室几周后，扎克伯格斥资 20 亿美元收购了领先的虚拟现实（VR）开发商之一 Oculus Rift，不久这家公司推出售价 599 美元的游戏与视频套件产品。但 VR 两大主流产品 HTC Vive 和 Oculus Rift 不仅售价昂贵，且都需要近 1000 美元的电脑主机来运行，VR 离普及还有一段距离。不过科技巨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三星和索尼都向 VR 领域投入了巨资，而微软正在全力研发把显示内容叠加在真实景象上的“增强现实”（AR）产品 HoloLens。虚拟现实的市场即将爆发。

房地产“营改增”

5 月 1 日起，我国将全面实施“营改增”，具体到房地产业，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购买厂房、商铺、写字楼今后可以抵扣进项税了，有利于房企去库存化。对个人，现行政策规定，出售购买不足 2 年的住房需全额征收营业税，未来增值税也很可能只限于这部分住房。营业税税率 5.5%，增值税税率 11%，后者虽涨一倍，通常情况下，两年内住房很少能大涨一倍，意味着“营改增”后买卖二手房税负变轻。

人民币趋稳

2 月，银行结售汇逆差 2217 亿元人民币，较 1 月减少了 1351 亿元，跨境资金流动趋于稳定。在经历 20 年来最糟糕的开年之后，人民币自 1 月 7 日以来升值了 1.6%。据彭博报道，自去年 8 月以来，至少 5.62 亿美元押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跌破 1 美元兑 6.6 元人民币，另外，还有 8.07 亿美元期权将在 3 个月内失效。做空者不得不承受损失，也不得不承认，作为对手，中国政府比许多交易员预期的要更加强大。人民币贬值预期因此被扭转。





“疯投” 航天业 //

2015 年，风投界向大大小小的商用航天创业公司累计投资超过 18 亿美元，比该行业之前 15 年间获得的所有风投资金还要多近一倍。航天业一向被认为风险过高、收益过慢，如今却成了风投界眼中的热土。这其中 SpaceX 的成功发射与回收功不可没。投资者开始将航天领域当成类似传统的科技领域，他们认为航天领域也能像传统科技领域一样，可以迅速将产品投入市场，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产生收益。

暗示加息两次

3 月 16 日，美联储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联储官员们预计 2016 年底时联邦基金利率中值为 0.875%，意味着年内有两次加息，较去年 12 月时的四次加息大幅减少。美联储称海外经济疲软和金融市场剧动，给经济前景带来一定风险。美国经济活动以温和速度扩张，家庭支出增加，但企业投资和净出口疲软。今年，日本央行实施负利率，3 月会议上欧洲央行推出了超预期的宽松措施。美联储重申加息，虽过程将比较缓慢，仍与海外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新三板原始股

新三板原始股的发财梦在线下疯狂演绎着，数倍的投资回报、远超银行利率的补偿、安全的退出渠道等等“豪言”撩拨着投资者神经。但实际上，交投清淡已经是新三板的一大软肋，超过 6000 家新三板挂牌公司中，有超过一半的股票自挂牌以来就没有发生过交易。而自然人投资原始股有一定门槛，私募基金投资人的出资额必须在 100 万元以上，只有高净值客户才有资格认购这些基金。小额入股不可能进入公司的股东名册，也就不能自主处理股份。

一线楼市的泡沫 //

被问及一线楼市是否有泡沫，李嘉诚表示，虽深圳一两个楼盘有一定泡沫迹象，但一线楼市价格涨幅基本合理。无独有偶，华泰证券的数量模型也显示，截至 2015 年底，深圳房价“泡沫”为 34.16%，“北上广”则没有“泡沫”，广州泡沫率 -1.07%，北京和上海泡沫率 -5.65%。以租售比衡量，2015 年初四个一线城市租售比增速还都在 -7.5% 左右，到了年底北京和上海还只是 0.95%，广州 4.03%，而深圳已经上涨 38.76%。也就是说深圳房价里 38.76% 的涨幅是不能用基本面来解释的，要么是信贷，要么就是泡沫。





知之如不知

商业化基因测试的一大卖点，便是期待人们在知晓自己可能有患上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的风险后，能够行动起来，改变生活方式，从而拥抱更健康的未来。然而，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一美好愿望成了真。研究者对此前 18 项相关研究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知道并不等于能做到，尤其是在戒烟和锻炼这两种对健康影响最大的行为上。DNA 检测的最大用处，似乎就只是促使那些高风险人群更主动地寻求疾病筛查、手术和药物治疗而已。

好消息

钙与睡眠

以东京大学医学院为首的研究小组针对小鼠进行的实验显示，钙离子对于调节睡眠长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把小鼠体内与钙调节相关的基因剔除后，三分之一的小鼠睡眠时长发生显著变化，而钙离子流入神经元则是小鼠能够入睡的必要条件。



进化之妙

现代人生儿育女的年龄一再推迟，但我们大可不必担心这会导致人类遗传基因的退化。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发现，虽然年纪大的父亲生下的后代存在基因变异的概率较高，但他们的孙辈数量也更少，两相冲抵，人类的前途依然光明。



坏消息

鸟为食留

从上世纪 80 年代，鸟类学家便观察到，欧洲鹳鸟开始放弃冬季迁徙到非洲，而是终年停留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指出，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鹳鸟发现了在填埋场中寻找垃圾食物过冬的捷径，从而宁愿与垃圾为邻。



长寿与长受罪

一项针对美国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最新综合分析显示，虽然女性预期寿命平均比男性高出 5 年，但老年女性的总体健康状况和改善幅度却远远不如男性。一个 85 岁的男性平均仍可享受 4 年多相对健康、活动如常的老年时光，而女性的对应数字仅为两年半。



人不同于宇宙间任何别的有机体或无机物，他要超出自身的工作范围之外去发展，顺着自己的观念的阶梯向上攀登，并在自己的成就前面露出头角来。可怕的是人自身不肯为了一种观念而受苦和牺牲的时候，因为这种勇于牺牲的特性就是人类自身的基础。

——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

艺术家具有外向的眼光和内省的眼光，以及表达出它们的能力。他们提供一种没有他们创造性眼光的帮助，读者就无法得到的观点或理解。这就是莫奈用倒映出杨树的粼粼波光带给我们的，艾尔·格列柯用托莱多雷鸣电闪的天空带给我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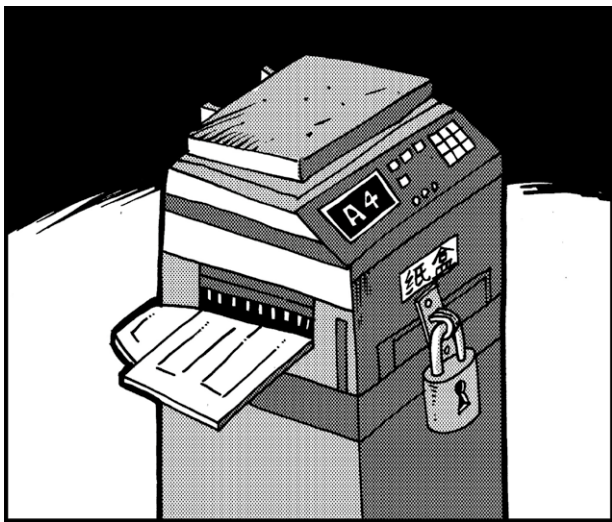
——芭芭拉·塔奇曼，《历史的技艺》

审慎的人很少使用“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这两个词语。这个世界显然是另一个世界的前厅，这里没有幸福的人。人类的真正区分，是“光明的人”和“黑暗的人”。

——雨果，《悲惨世界》

真实的生活无法归于口头表达或书面写出的言语，谁都做不到，从来做不到。真实的生活开始于我们独处之时，独自思考、独自感受、沉溺于回忆之中，有如梦境中清醒着，经历着那些极其琐屑的细微时刻。

——唐·德里罗，《欧米伽点》



悲伤的情绪是一张向两面观望着的脸，一面朝着恐怖，一面朝着怜悯，而这两者都不过是它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詹姆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

数字

157
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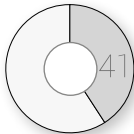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和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共同发布了第四份《世界幸福度报告》，今年排名前10的国家为：丹麦、瑞士、冰岛、挪威、芬兰、加拿大、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瑞典。在157个国家中，中国排在第83位，美国排在第13位，日本排在第53位。



41
%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首席技术专家洛丽·克拉诺说，被要求经常更改密码的用户

最初会设置一个简单的密码，每次改密码时，要么重新使用以前的密码，要么就是把字母换个位置。若是黑客本身就知道以前的密码，那么他们就有41%的概率在3秒内破解新密码。



7.36
亿美元

3月16日，英国政府宣布将对含糖饮料征税。这项新税将在两年内开征，预计在开征的第一年将收获税款7.36亿美元。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说，基于政府的财政收入目标，新税将给每升含糖饮料分摊18便士（约合25美分）或24便士（34美分）税款。新税种征收的税款将用于支持学校开展更多体育运动。

表哥们的爱情

文 / 南瓜邮递员

图 / 谢驭飞



金庸小说里，有四位著名的表哥，他们是慕容复、汪啸风、卫璧、张无忌。这几个人出身好，颜值高，皆得一个如花似玉的表妹倾心。他们和自己的表妹不是青梅竹马便是郎才女貌，但最终都没能“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慕容复抛弃了王语嫣，汪啸风给了水笙两个巴掌以示情绝，卫璧常约朱九真出来私会，结果九真表妹被路过的殷离杀了，至于殷离错爱的表哥张无忌先生，心上人则是赵敏和周芷若女士。

有人怀疑金庸小说中的表哥们，闪动着他那浪漫表哥徐志摩的影子。但金庸之外，世间还有众多表哥和他们无可奈何花落去般的爱情。

李寻欢也是表哥，表妹林诗音是他两小无猜的恋人和没过门的老婆。不过小李太讲义气，将漂亮的表妹连带着不菲的房产都送了恩人，自个儿跑到塞外，冻得整天咳嗽。

林黛玉同样咳嗽，同样不幸喜欢上了表哥，但木石前盟不及金玉良缘，跟表哥贾宝玉结婚的人是表姐薛宝钗，林小姐只能遗憾道：“宝玉，宝玉，你好……”

表哥多是铁心汉，一遇表哥误终身。琼瑶笔下的婉君表妹，沉伏在三个表哥的爱恋漩涡里左右为难。刘德华在《旺角卡门》中是个阿飞，抛下张曼玉这个情窦初开的乡下表妹去为自己的跟班小弟出头。《东成西就》中梁朝伟扮演的欧阳锋，更是将一度你依我依的表妹打倒在地，弃之不顾。

不过有时候，错的也不全是表哥，亦有痴情表哥像张学友饰演的洪七那样，因为对表妹表白无果，急得要跳崖。还有《蝴蝶梦》中那西方的表哥，为了故去的表妹，不惜想方设法报复其丈夫。

但不管怎样，陪伴这些表哥走过一生的，都不是他们的表妹。这样的故事凄美感人，一不小心还暗合了我们的婚姻法。这些表哥和表妹们，可能不少都是三代以内的血亲，他们的爱情夭折了，但彼此的后代却会因此变得更健康。而现今独生子女的儿女们，却连成为别人三代以内血缘关系的表哥表妹的机会都提前缺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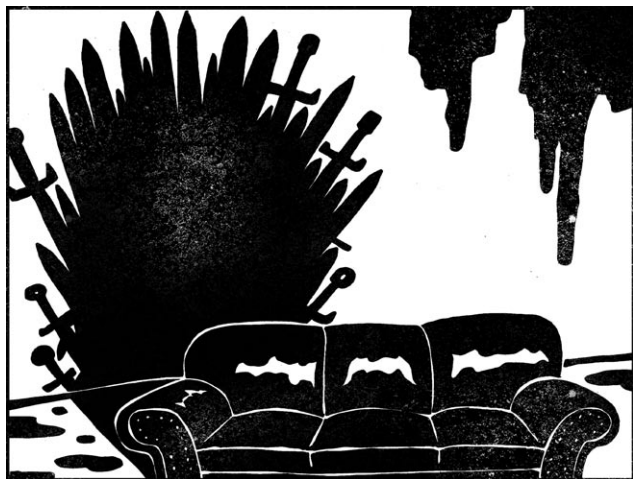
当然，以林妹妹为首的表妹们多为传统女子，觉得和表哥成婚古来如此，不会想得太远。她们一般都待字闺中，大门不出，能见到的年轻男子不多，表哥们实在是近水楼台。就像其他的妙龄女子，常跟走得近的姐夫和师兄有瓜葛，由是传言大诗人李商隐写了不少难解的无题情爱诗，张无忌义父的师父成昆则因为失去师妹，愤而搞起了破坏武林和平的大阴谋。

无论如何，人们乐于编织表哥表妹劳燕分飞的悲伤故事，于是陆游同相爱的表妹被分手，纳兰容若和进了皇宫的表妹彼此相思却不得相聚。而那些锣鼓齐鸣式的百年好合，似乎因此少了些。现在仅能想起的，是《新白娘子传奇》中金榜题名的许仕林娶了表妹李碧莲。☑

皮沙发和铁王位

文 / 肖遥

图 / 谢驭飞



午餐后，和小F同办公室的小咪会抓紧时间出去逛街，办公室那条唯一的长条沙发就姓F了，倘若F先生有朝一日离职了，公司里唯一令他眷恋的就是这条沙发，可不是吗？上司训斥得他抬不起头来不要紧，追杀令般的公务邮件们也可以放在一边，只要中午能躺在沙发上打个盹儿，一切都OK了。偶尔被外派公干，中午没能赶回来，看到小F像被施了催眠咒似的，难受得东倒西歪。小咪不知是该同情还是该感到可笑，不过很快这个选择题就有了答案。

一般来说，单位里人多的地方，比如餐桌、饭局、会议间隙、办公室闲聊，总会少不了一个有“料”的话题。有一次聊天，话题不知怎的被引到小咪身上：“小咪你今天脸色这么好，你老公昨晚肯定表现不错。”小F跟着起哄：“咪姐，难怪你今早上来晚了……”中午，当小F回到办公室，正准备卧倒沙发梦南柯，只见小咪正稳稳地坐在上面擦皮鞋，平时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但小咪擦完就起身走了，可这天小咪一直没走……小F只好一边哈欠连天，一边后悔自己嘴欠。

以后的中午，争夺沙发的优先使用权成了小F的要紧事，就像《权力的游戏》里国王保护他的铁王位。可是很快，小F发现即便自己夺取了沙发的使用权也没用，挡不住小咪不开心就赖在办公室，擦完鞋，小咪又掏出手机，插上耳机看电视剧，还咯咯笑，装作浑然不觉。她搅碎了小

F的美梦，谁叫小F今天在工作上又推三阻四得罪了小咪？

沙发要是知道自己存在感这么高，被当宝贝样抢来抢去，或被当作制衡对方的武器，是不是要笑出声来？尤其是作为一条曾经被嫌弃被淘汰的物件儿。半年前，新晋部长老Z取代了前任部长，从前她经常双腿并拢斜坐着坐在这条沙发上，汇报工作、挨批评、仰视大班椅上的上司，所以，如今这条沙发被找了个理由贬到了小咪他们的办公室。想来令Z部长恼羞并迁怒的，不是别人的沙发，其实是从前那个低眉敛容的自己。

话说回小F，从入职以来，小F就像一种惰性原子，自己的状态不踊跃，对其他原子的活跃度也漠不关心，在任何温度或压力下都懒得与其他元素发生反应。可自从有了争夺沙发这个目标，小F不惜改变惰性状态，可见小F天性不是那么现实，跟小咪一样，小F偶尔也会畅想，从明天开始，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也许只有在了一走了之的时候，自己才真的是自己。

但是，生活总会重占上风，当清晨被手机闹铃吵醒，小咪赖床上构思请假的借口时，一想到还要去单位收快递，小咪还是挣扎着起床去上班了，当然，“收快递”三个字也可以换成“免费午餐”、“Wi-Fi”、“年终奖金”。估计小F起床的动机也大同小异：他的借口是“还得去抢沙发呢！”

夜食无罪，且有灵而美

文 / 南城织子

图 / 谢驭飞



如果说一日三餐的作用是予食人以动力，那么三餐之外的四餐、五餐的享用就不是食人基于维持日常功能运转而进行的标准化作业了。在标准下作业，意味着你不必过多地思考，只要你乐意，标准化的三餐可以陪伴你漫长的一生。肉包子豆浆也好，牛奶面包也罢，都像是愿与你结发的另一半，你与它相识于微时，它安心地为你看着城门。哪天你发现它不在城门口，你的肚子便会“咕咕”作响，前来禀报，这时你会想起当年它曾俟已于城隅。但时光这把杀猪刀总吝啬于留情，待你重新寻回它，警报解除之后，它或许又会在刀光之下蜷缩成那颗从嘴角掉落的白米粒，而你，终会在慈悲的月光之下或者大雪纷飞的夜里遇到那么一颗朱砂痣。至于相遇的起因是自身有排闷而出、游街巡巷之欲，还是公务繁忙，不得不日夜风雨兼程，又或者是友朋相聚需举杯邀月、开怀畅饮，那都是不必细究的了。

与其相识以后，你的味觉系统会告诉你它与白米粒的诸多不同。比如，白米粒习惯将个性鲜明的韭菜与细腻柔嫩的鸡蛋结成一对儿，可朱砂痣会独立韭菜之精神，野蛮韭菜之体魄，使其排列成一支队伍，置其于火架之上，配以花椒、干辣椒、孜然、老抽等等香料调料，待其经受与油火数个来回的搏斗之后，朱砂痣也就将韭菜之性格淬炼得能与诸袭人嗅觉的香调之色和平共处，

并且鹤立其间了。白米粒这一派是娃娃亲，执掌财政大权，行的成婚之礼，承的媒妁之言；朱砂痣这一系是相见恨晚的异性知己，是能与君同袍的异姓兄弟，但它如闲云野鹤，远离庙堂。所以前者是白日里的标配，后者适合夜里偶尔地谈天说地。

现代人提倡晚餐应少食、忌宵夜有益健康，而对身材有着严格要求的女性更是视宵夜如洪水猛兽，即使惦念得辗转反侧，也要与其割袍断义，拉黑于朋友圈。可世间女子若都惧怕游泳圈，男性若都害怕啤酒肚，那么一天之中最浓墨重彩的夜市也就只能偃旗息鼓，夜色也如同被拔了数根羽毛的鸟儿，依然能飞行，但光彩已失一半。

好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夜场，场中有眼泪纵横，有笑声震天，情绪如此释放，自然少不了助兴食粮。爱食猪肉的苏东坡一句“龙津观夜市，灯火亦煌煌”更是道出了夜市的美妙。拜把子兄弟就着啤酒、烤串，在炎炎夏夜于露天大排档半醒半醉地弹落男儿泪，交了心的姑娘在雨加小雪的冬夜里钻进甜点店，手握暖饮，口含提拉米苏，畅叙心中的那些事儿……一切性情都在夜中食物的陪伴中被磨成了粉末、制成了标本、化作了云烟、炼成了精华。至于那些食物带来的些许脂肪，自是不值得介怀的了。■

谎言

文 / 徐凰
图 / 谢驭飞



我是一个喜欢谎言的人。这缘于我14岁的经历。那年我读初一，刚开春，天好得很，冬麦长势很好，油菜花开始结苞，就连路上都长着一簇簇的青草，春天把世界点缀得很美。

放学路上，快乐不言而喻。我们村上一个顽皮的孩子，走在我后面。他顽皮得出名，我是斯文的孩子。这就决定了，我们从来不一起上学放学。但那天，他撵上了我，他掌握了一个秘密，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这秘密，他如果不跟我说，整个人都会爆炸的。

“你爸爸得了癌症了。”

我说：“你撒谎！”我盯着他，他衣服的纽扣扣得错落，领子一高一低，还拖着长长的鼻涕，样子滑稽死了，很不靠谱。可我的眼泪莫名其妙地流了下来，因为，我的父亲确实到城里看病了。

上学放学，都要路过一条沟，沟很宽，女生们都得绕远。男孩子看见这条沟，远远地就开始加速、加速、再加速，然后一跃而起，飞过去。现在，我看见那个顽皮的孩子在加速了，天地开春，衣服已经不再是束缚，他很轻松地飞了过去。我也开始加速，开春的泥土酥软，脚底发飘，关节也根本不听使唤，无形的绳子束缚了我的手脚，关键时刻，我狼狈地摔到了这条沟里。现在，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难堪，要是在平时，我会非常害羞，老实说，没有这个谎言，这条沟再宽一尺，

我也能轻松地飞过去。可那天，我陷在了这条沟里。陷进去了。

谎言，一个谎言，让我狼狈不堪。我父亲才37岁，怎么可能会得癌症。但我身体的反应，分明把这个谎言当成了现实。这个顽皮的孩子，他告诉我，我爸最多活一年。说我爸爸在城里动手术的时候，医生把他的肚子划开，看了看，摇摇头，就缝了起来。

生活中，一个顽皮的孩子，会给一个谎言制造那么多细节吗？14虚岁，我已经懂得了事情的基本逻辑。我的童年，就葬送在了这条沟里。我一点都不恨这个顽皮的孩子，他用干的泥块给我擦污垢，我用油菜地里的青草打理自己的头发。泪眼朦胧中，颤抖的远山正在侵吞那个模糊的落日，我童年天真的大幕从此落下。

父亲得的是胃癌，晚期。我和弟弟照顾了他一年，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七年八月十七日，落日时分，他万分歉疚地把我们扔在半路，离开了人世。

可时隔近30年，我依然觉得，那个顽皮的孩子制造了一个天大的谎言。■



拍打式吸尘器

三星新推出的名为 Dual Beater 的手持拍打式家用床品吸尘器，外观设计融合传统韩服领口线条的流动感，使用时轻巧灵活告别传统吸尘器的厚重，并可以体验拍打节奏感带来的愉悦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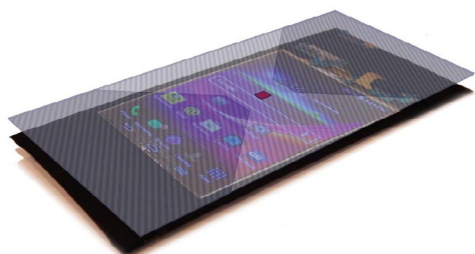
听风的歌

设计师约瑟夫·金（Joseph Kim）让骑行变成了一件趣事，他所发明的自行车风笛，由两个独立的风笛组成，可以分别固定在自行车的车把两侧。当自行车行驶时，由于风力作用，风笛就会响起。而骑车人则可以通过两只手来分别控制风笛的音调，演奏出悠扬的乐曲。

发烧播放器

高保真厂牌 HIFIMAN 推出了一款编号为 HM802s 的发烧级音乐播放器，它支持 3 秒急速开关机，流畅支持各种 24bit 无损格式。在外形上，它采用了航空铝 CNC 外壳，增加散热效果，且能有效屏蔽静电及电磁干扰。此外，研发者通过精简和声音无关的模拟线路设计来提升音质和使用可靠性。





柔性显示屏手机

来自加拿大皇后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款名为 ReFlex 的无线可掰弯屏智能手机的原型产品。通过这块 720p 分辨率的 LG 可弯曲 OLED 触屏板，用户可以进行页面导航，同时依靠触动制动器提供的触觉反馈，可与手机进行智能互动。



智能止鼾器

这款名为“Silent Partner”的止鼾鼻贴从鼾声声源入手，通过“隔音屏障”发射反向声波来阻挡并且抵消鼾声。其材质柔软贴合，采用医疗黏合剂安全有效地告别鼾声噪音困扰。

简约风扬声器

来自设计师杰奎琳·裴 (Jacqueline Bae) 的这款喇叭形扬声器可直接通过调节圆锥口大小来调节音量。简洁实用性的美学理念使其设计新颖独特，成为家具时尚新理念的典范。



可健身的洗衣机

大连大学的一群学生发明了一款洗衣机，由自行车提供动力，并将其命名为“BWM” (Bicycle Washing Machine)。这一设计延续了斯洛伐克工业设计师巴博拉·托波洛娃 (Barbora Tobolova) 发明的自行车洗衣机概念，将传统家务活动和流行健身理念相结合。使用时的踏板运动不光能为洗衣机滚筒的转动提供动力，还能使产生的多余电能支撑显示屏功能或者存起来日后使用。



分子模式

首饰设计师亚历山大·戴维斯拥有生物化学学位，他受分子的分支模式启发，设计出这一玫瑰金半环戒指，暗粉色碧玺、白钻以及香槟色钻石等镶嵌其中。

蛇形腕表

铰接式手镯腕表在宝格丽已经延续了几十年，新款 Tubogas 腕表的特殊之处在于把玫瑰金和钢交叉混合在螺旋形表带上，深红色扭索纹表盘凸显出线条的美感。



智能电动车

宝马智能电动自行车 Cruise E 提供环保、运动、旅游、速度等不同模式，依靠传感器支持曲柄达到每小时 25 公里的速度，通过可移除的车载电脑显示相应信息。



硅藻椅

Moroso 品牌“硅藻”可堆叠椅，形状取自硅藻这一原始单细胞生物，生产时采用了汽车领域开发的一种技术，以压铸铝合金板同时减少重量和生产成本。



银杏行李箱

Ito “银杏”系列聚碳酸酯硬壳铝框行李箱，清晰的线条结合温暖的色调，专利设计的圆锁可以像收音机旋钮一般，在转动中打开和闭合箱子。

无限挂钟

阿比·爱丽丝设计的“无限”挂钟，蓝色时针和分针位于无数字钟面的中心。几何造型以连续的规律曲线产生无限的运动，代表时间的无情流逝。



扁平眼镜

奥地利 Seeoo 品牌的老花阅读眼镜以简约紧凑取胜，钯涂层不锈钢镜架被设计得极其扁平，折叠起来只有 4 毫米的厚度。



重新认识疾病、医疗与生死

医生的角色



主任医师孙宁东拍摄的手术室工作照《变化万千的外科世界》——2014年4月17日，解放军第四五八医院骨科李裕标主任在手术室做一台股骨头置换手术

文 / 徐菁菁

人类社会大概没有一种关系的特殊性能超越医生和病人。在疾病的威胁下，人们寻求帮助，将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交托于陌生人之手。今天，人类医学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然而，医生与病人，这对同一战壕中的伙伴却被有史以来最为紧张的关系所羁绊。在中国，医患矛盾已经成为最尖锐的社会话题。大洋彼岸也面临类似的困境。研究显示，在最近30年中，美国患者对医生的满意度以及对医疗质量认可度急速下降。

作为医疗行业的医学处在一张极为复杂的关系网中，医院、政府、制药企业、法律等角色都在对我们所能获得的医疗施加影响。体制性因素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但它并不能够完全解释病人眼中医生的“不近人情”，和医生眼中病人的“不可理喻”。

在人类历史上，疾病、医生和患者三者的关系一直处在不断的调整中。直到100多年以前，临床医学的治疗手段还十分缺乏，面对疾病，医生与病人处于近乎平等的弱势。从根本上来说，人只能凭自己的力量承受身体的痛苦。医药是可以尝试的另一个工具，与治疗仪式、家庭疗法相比并非更为有效。这决定了病人掌握着对抗疾病的主动权，他们并不对医生抱以过高希望。

现代临床医学在20世纪初的突飞猛进使医患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公众的眼里，医生所能完成的种种不可能似乎已经接近于上帝，而医学界则陷入

前所未有的自信，一切疾病都将被征服。医生们在向疾病的冲锋中享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整个20世纪，医学作为国家治理中备受重视的领域，和社会经济运行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迅速扩张。医学不断为人类的“缺陷”贴上新的疾病标签。医学接管了人们的外貌、精神，同时浸入到生命每一个进程。我们在医院里出生，在医院里死亡。医学甚至雄心勃勃地宣布要征服衰老和死亡。

但是这个时候，病人们却发现医生们越来越难以信任。

上世纪60到70年代，一系列医学伦理事件的发生促进了病人权利的运动。在处理医学决定时，医生家长式作风受到批判，以“共享决定权”为原则的新的医患关系产生了。

然而，完完全全的平等并不是拯救现代医患关系的良药。现代医学的专业性意味着医患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巨大知识壁垒，平等也就无从谈起。病人对治疗效果的预期往往远远高于医生，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和医学风险认识又远远低于医生。缺位和无效的沟通既给临床治疗制造了巨大成本，又使医患的情感遭到巨大打击。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人们是无能为力的吗？医学人文主义者重新审视了医学的价值。从17世纪病理解剖学的确定开始，西方医学不断地沿着一条还原论的逻辑发展演进。生理学家则把人体这架机器拆开，研究每个部件的功能，从500年前用肉眼细致观察器官和组织，到300年前用显微镜观察细胞和细菌，到50年前用电子显微镜直接拍摄蛋白质分子和病毒的形态。在临床医学，各种生理指标、数据取代了人，医生绕过人，直奔疾病而去。“治病不治人”成为现代临床医学的常态，它以根除疾病而不是帮助人为目的，忽略了病人身心的痛苦和诉求。

幸运的是，一些医生已经对现代临床医学的痼疾做出了反思和回应，以重新理解治疗、重新定义医生的角色为出发点，将医学重新拉回关注人的轨道。我们的记者拜访了北京协和医院的老年病科、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和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们，记录了他们的反思、努力和困惑。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势必建立在医患之间更深层次的理解之上。毕竟，“若不能触动对方，他们（医与患）就无法运用医学的力量救助患者；若不能找到理解彼此想法的方法，他们注定要失败”。☑



从进入临床到独当一面，一个外科大夫的成熟需要十余年的锤炼

封面图片：孙宁东摄影作品《慧眼》——脑外科医生术中调试脑定位仪

春风送礼 畅游无阻

高尔夫金融购车季 “贷”你自在出行

3年0利率 首付最低3万 二手车置换1万



高尔夫金融购车季，纵享一路春光

1. 即日起置换高尔夫，即享现金补贴5000-16000元，贴心服务升级您的爱车梦想；
 2. 低首付3年0利率：首付20%起，最长可享3年0利率(不含1.6L车型)，等额月供，购车更轻松；
 3. 半台车0月供：首付50%，一年后结清50%尾款，全程享0月供0利息，只需一半，梦想提前实现；
 4. 信用卡分期购车：首付20%起，享12-36期0利息0费率，48-60期0利息低费率，手续简单、方便快捷；
 5. 低月供灵活还款：首付50%起，期限36个月，尾款不高于30%，享20元起低月供；
- 即日起至6月30日，以上金融产品优惠仅限选其一。更多详情，敬请垂询一汽-大众当地特许经营商。

车之道，为大众

GOLF 高尔夫



Volkswagen



上图：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每周五上午大查房后的讨论会 下图：倾听病人的经历、了解病人的感受，有助于医患双方的深入沟通



通过医生的视角，理解生命

文 / 吴琪 摄影 / 黄宇

医学是一种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只有当医生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患者的经历，医疗照护才能在谦卑、信任和尊重中进行。而当医生们警醒于技术的边界时，他们反而看到了更多可以作为的地方。

我以为我要讲述的是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疼痛、挣扎、起伏的希望，与最终的绝望。未曾料到，故事自身的韵律，比我想象的要和缓与平静得多。

为了了解医生这个群体，我走进了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和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在我的理解里，老年医学科与肿瘤科必须赤裸裸地与老年病和绝症交战，总有很多不甘的人生，不得不在这里落幕。在医院科室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疾病带给人类的痛苦、人类迫切的求生欲望、医疗技术的极致与边界、临终者跨越生死的感受、照护陪伴者的心理创伤，局促中让人无处躲闪。

而医生的职业使然，使他们成为连接所有纽带的承受者。他们被寄予治愈病痛期望，试图将逐渐衰弱的躯体从死亡线上往回拉，却也在很多时候不得不成为职业摆渡人，将病痛之躯摆渡到另一个我们并不熟知的世界里。有时候，医生会告诉你，他们是生活在多数病人群体中的少数健康人，这使他们有一种孤独感。而这点，同时也是他们的使命感所在。

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原主任刘端祺告诉我，学医之人往往会经历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当他们在医学院头两三年学外科时，会有一种无所不能的胜利感，“身体哪里出问题了，把病痛切掉就好了”。待到接下来学内科时，突然发现除了极少数疾病能治愈外，大多数疾病都是无法治愈的，“医学的‘黑洞’一个接着一个，虽然科技进步很快，但在衰老以及癌症带来的疾病前，医生能做的仍旧很有限”。

患者发现他们从一个专家、一个治疗程序转到另一个专家、另一个治疗程序，他们也许在技术上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在面对疾病的后果和恐惧时却感觉到被抛弃。如果只依靠科学性，医学无法帮助患者在与疾病斗争时，找到疾病和死亡的意义。

肿瘤科或老年医学科一个月内离世的病人，可能比其他科室一年离世的病人都多。在这里，医生们最深刻地碰触了技术的局限，却也最强烈地感受到：面对疾病与死亡，治疗技术无法负担全部的意义。疾病在揭示秘密，展现人们求生与濒死的冲突和矛盾，它们也展现着患者的真诚与勇敢，提炼着患者的自我身份。

疾病无法治愈，但并不意味着无法治疗。虽然看到了病人们同样的终点，但是如何让病人与疾病共同生存，如何让每一个生命晚期的人都有他的独特价值，成为医生们努力的新方向。生命之钟在每个人的耳边敲响，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病房里看到，医生们努力让生命末期病人少些疼痛、少些不必要的治疗，在身体油尽灯枯之时顺应自然，平静地走向终点。一个人不应该在插着各种仪器的抢救室里死亡，而应该在亲人相伴的温暖中离世。我这才明白，我感受到的温和与克制、平静与安宁，是在医学以及医学的执行者们经过探索和反思之后，达到一种蕴含情感与抚慰的新的平衡。

在病痛与死亡边缘的平静，多么高贵。

“屋子里的大象”

今年2月15日，71岁的张书年（化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的老年医学科时，家人告诉他：“您可是住进了历史里。”

老年病房在协和医院的老楼里，这群建于95年前的宫殿式建筑，飞檐拱顶、绿瓦灰墙、五彩雕梁，它们位于北京最繁华的东单地区，隐而不彰。民国时期，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捐助了4800万美元，在北平建立了这所最好的医院。中国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和中国消化内科奠基人张孝骞的铜像位于一楼，在张孝骞铜像背后，记载着孙中山、冯玉祥、蒋介石、溥仪等在这里住过院的历史。从外面看来，老楼是十几栋独立的古典建筑，但内部走廊与庭院走廊把整个建筑群连了起来，这也让刚刚进来的人感觉像在穿越迷宫，很容易迷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似乎也与此老楼的过道一样，幽深而曲折。

张书年的心情非常复杂，他本舍不得为自己花钱，

不要说到北京来治病，单是来北京的路费，就让他这个江西农民心疼。但是2014年底在当地一个小医院做完阑尾切除手术后，他的病情眼看着越来越重。张书年对当地医院有了怨怼，再加上20岁出头的外孙女及其男友正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上学，抱着要到最好的医院治好病的期望，张老头终于下定决心，有了人生第一次北京之行。

一见到主治医生曲璇，张书年就明确地说：“我是家里做主的人，我这病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就可以了。”张书年虽然是农民，可他读过初中，在他这个年纪也算半个文化人了。他告诉医生，自己和家人出来一趟很不容易，特意凑了一些钱才能来看病。虽然年纪大了，可他仍是家里9口人中的两个壮劳力之一。

从医生曲璇的角度来看，张书年是一个对生活有安排的人。她从张书年的表述里，看到了明确的期望与衡量：他要负担一大家子的生活，来不来北京治病，对张书年既关系到健康，也是在经济层面需要衡量“投入产出比”的事情。如果病能够治好，他还能够回家挣钱，那这次的花费很可能就是值得的。老农民对家人的奉献精神以及精细的经济考量，使曲璇很尊重这位“看上去也是很知书达理的人”。

不过对张书年的外孙女以及外孙女的男朋友童宁（化名）来说，故事有着不一样的表述。张书年2014年接受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阑尾手术。医生在手术过程中，意外发现张书年患有结肠癌，肿瘤切除得并不干净。手术后，一家人都知道张书年患了结肠癌，唯独老头自己完全不知情。2015年当地医生发现张书年的肿瘤出现了腹腔的转移。

家人不敢将消息告诉这个脾气硬朗的老头。在来北京治病时，张书年蒙在鼓里：自己的病也不重，怎么当地医院的水平这么差，越治越麻烦呢？

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宁晓红是缓和医疗的倡导者，她40岁出头，快言快语，表达意见时毫不含糊，走起路来一阵风似的往前冲。她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果断，这种敢于担当的劲头也容易让人托付信任。除了接诊患者，宁晓红同时在协和医学院授课，给学生们讲授医学伦理课、医患关系与医患沟通课，也教授缓和医疗的理念与操作方法。

缓和医疗也叫姑息治疗，是对于不能治愈的严重疾病和终末期慢病患者，密切关注他们的情绪、精神、灵性需要，减轻病人的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帮助病人和家属达成心愿。2012年11月下旬，宁晓红和大陆的10位医生、护士曾到台湾深入了解缓和医疗，

他们看到了晚期病人如何在医护温暖的照顾下，心境平和安详地离世，很受触动。一位年纪较大的医生感慨地说：“将来我要到台湾来死。”宁晓红脱口而出：“别这样呀，回去之后我们好好努力，以后我们那儿也可以有尊严地离世。”

为了“不让心中的小火苗熄灭”，宁晓红回到协和就开始推广缓和医疗，当时她是协和医院肿瘤内科的医生。2014年她被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刘晓红拉到这个成立才7年的科室，共同在实践老年病医学的过程中，推广缓和医疗的理念。

主治医师曲璇给张书年进行了一系列检查，又邀请其他科室来会诊，这才发现张书年的病情比想象中还严重：他的肿瘤已经转移到腹腔、盆腔，并且肠细胞淋巴结多发转移。对于医生们来说，老人家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癌症根治性治疗的机会，缓和医疗对他更有意义。

但是当曲璇需要与病人和家属确定方案时，事情卡了壳。家属们不愿意让张书年知道病情，可是对于治疗又都做不了主。曲璇面临的悖论是：每个家属都说这件事情自己做不了主，但又不让能做主的张书年知情。

正如医生们所知晓的，愿意住院的病人，基本上都是治疗态度积极的人。病人深切的期望，成了医生和家属们背负着的残酷压力。病房外，北京的初春开始招人喜爱，天安门和故宫就在两三公里之外，它们寄托着多少外地人对于北京的想象。但是癌症转移造成的肠梗阻让张书年感到极为不舒适，不要说出门行走，哪怕是没有疼痛地生活一天，都成了奢望。住院快一个月了，他不但没有好起来，反而越来越虚弱。在病房里，一切变得微妙起来，语言不再透明，话语或沉默，都有着额外的意义。

协和医院老楼的天花板特别高，阳光透过大扇的绿色木格窗照射进来，光束中跳跃的细小灰尘，展现着最无忧无虑的活力。病房的格局仍然是民国时期的样子，一道道黄色隔墙，每两扇中间拉着一块白色门帘。病床上的张书年逐渐衰弱，除了肉体上的疼痛，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深层意义发生了变化了。现在他的生活中有了限制、焦虑、被迫分离，虽然家人没有告知他病情，可是他们又觉得他一定猜出来了，他或许正在做生命终结时的打算。每个患者都希望做生病之前的自己，可他们却被迫要接受健康的陌生人给予的医疗照顾。

3月11日是个星期五，按照惯例，老年医学科



缓和医疗也叫姑息治疗，是对于不能治愈的严重疾病和终末期慢病患者，密切关注他们的情绪、精神、实际需要，减轻病人的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帮助病人和家属达成心愿。



的医生们进行了每周一次的大查房。他们要花整个上午的时间，在医生办公室里讨论困难的病案，而不是直接走到病人床前去进行讨论。一方面，医生们需要保护病人的隐私；另一方面，每个病人和家属都有着特殊的心理状况，太多事情不能明说。我就是在旁听这次查房时，知道了张书年的情况。

曲璇汇报了自己遇到的困难，能与她沟通的家属都做不了主。老年科主任刘晓红是个温和娇小的女性，她显得年轻的面容隐藏了自己30多年的行医经历，但表达观点时，她丰富的经验立即显现出来。“这个病案最大的难题就是，病人的住院目标和治疗目标都不明确。”她再次向医生们说，“我们收治病人时就应该明确，他们平均在这里住院的时间是两周，他们一来我们就要进行评估，然后共同达成治疗方案，看我们在这两周的时间里，能够完成什么样的治疗目标。如果目标不明确，大家就会陷入迷茫。”

可是由于晚期病人不知道病情而难以达成治疗方案的事情，在中国医院里太常见了。另一个主治医师汇报了他遇到的难题。他上周末收治的一位老先生，因为感染性休克而住院。肿瘤造成了穿孔，病人一直在发烧，外科医生看过之后，认为老人已经失去了做手术的机会，只能接受改善症状的治疗。主治医师说，之前老人家属对于治疗一直很积极，所有的创伤性治疗都愿意做，但是现在明白老人已经确实时间不多了，非常纠结。医生认为老先生是位明白人，他应该能理性对待自己的病情，做好临终的准备，但是他的老伴就是不让医生说出实情。

主治医生把病人老伴拉出病房，问道：“如果是您呢，您希望知道自己的病情吗？”老伴说：“我当然希望知道。”但是马上又坚决地嘱咐医生：“他与我不同，他比我脆弱，他不能知道。”

听了主治医生的讲述，主任刘晓红感慨说：“屋子里有头大象，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每个人都看到了，但就是不说出来！”

坏消息的告知者

在接触缓和医疗的理念后，宁晓红觉得自己对于如何与病人和家属沟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宁晓红在查房讨论时说，实际上很多病人都猜到了病情，但是不愿意捅破这层纸。“我如果问病人哪里不舒服，他们会主诉：我疼，我发烧。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问我：大夫，都这么久了，我为什么还疼？我为什么还发烧？

他们不问，很可能是根本就不愿意面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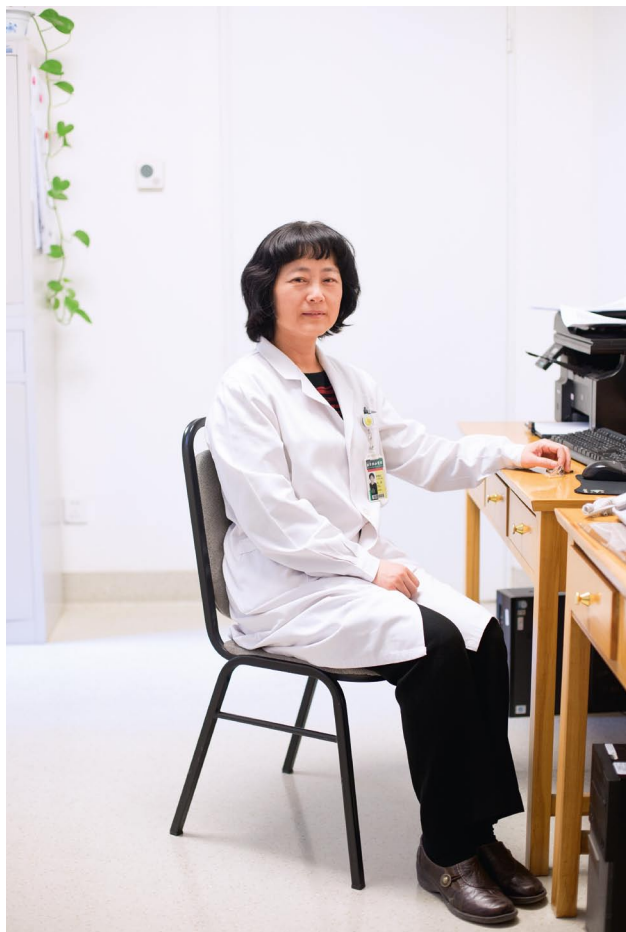
这种隐藏的事实，会让治疗陷入僵局。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主任张大庆告诉我，在中国人忌讳谈论死亡的文化中，医生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坏消息的告知者。病人和家属在文化认知上对死亡缺乏准备时，人们难以突然去承认，死亡是生命过程中的应有之义。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丽塔·卡伦看来，患者对死亡有自己的概念，每个人与死亡接触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有人目睹的死亡在军队，有的在医院，有的经受过家人逝去的打击，有人经历了政治暴力或自然灾害带来的死亡。因为这些不同的经历，有人把死亡当作个人的敌人，有人则认为它是一个遥远抽象的概念。她提出了“叙事医学”的概念，希望叙事医学可以回答针对医学实践和训练的很多指责——没有人情味、碎片化、冷漠、唯医学利益至上、缺乏社会责任感等等。

在丽塔·卡伦看来，患者和医疗照护者是以整体进入病痛和治疗过程的——他们的身体、生活、家庭、信仰、价值观、经历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全部进入这个过程。恢复健康、帮助他人好转的努力不能从生活的最深处剥离。

对于病人来说，生病过程中充斥着羞耻、责备和恐惧等负面情绪，这些心理活动更加增添了疾病带来的痛苦。虽然周围人试图安慰病人，但是健康人无法真正感受病人的痛苦，就好比人在不害怕的时候，无法想象恐惧一样。病人有患病的痛苦，家属需要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医生有时候也会感受到深切、痛苦的情感，但是这些痛苦并不能完全合而为一。在这些诊室里，上演着患者和健康人之间的差别，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就是病人会意识到“疾病是生命的黑夜，是一种更沉重的身份”。

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医生王莉告诉我，她特别能理解，为什么病人总想回避病情。很多人在得了重病之后，不愿告诉他人。因为这些病人觉得，他们变成了没有未来的人。“他们有些人担心自己会受人歧视，有些人担心合作伙伴不会再找自己了，有些人则担心久病床前无孝子。”病人觉得，重病将他们生与过往的社会联系切断了，“连骚扰电话也没有了，连卖假发票的都不给我打电话了”。有些病人在经过艰难的努力之后，终于接受了自己患病的现实，可是亲戚朋友和同事来看望时，出于关心，会不断提及病情，“对病人来说，往往是一种伤疤不断被人揭开的感受”。



左图：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刘晓红



右图：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主任张大庆

虽然会有极为负面的心理感受，可是如果不能开诚布公地向病人告知并讨论这些情感，不去面对病人的痛苦，病人实际上被隔离于自己所处的环境。病人拥有知情权，并受到法律保护。美国等一些国家已经立法保护病人的知情权，但是中国离这一步还有不小的距离。宁晓红希望病人获得知情权，但是她会非常小心地试探病人。

在与病人讨论病情时，宁晓红会表现出和平时很不一样的风格，她像对待年幼的孩子，语调舒缓，情感拿捏得极为细致。她告诉我说，重病会让人觉得非常无助，这使病人变得像孩子一样。她会侧着头，轻轻地问病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这段一直不舒服？”她也会问：“你觉得好的一天是什么样的？你希望我能为你做什么？”

有的病人会截住她的话：“大夫，这些医学的东西

我听不懂，你跟我儿子说去吧。”有时候家属会急迫地打断她：“宁大夫，我爸他觉得挺好的。”有时候病人沉默不语，她会问道：“你还有什么要问我的吗？”虽然病人应该对疾病有知情权，但宁晓红更清楚，要不要捅破这层窗户纸，也得尊重病人自己和家属的意愿。

张宁博士告诉我说，协和老年医学团队在北京朝阳区对 1000 多位老人做过调查。有超过 78% 的老人希望得病后知道实情，有 56% 多的老人希望能在自己的治疗方案做决定。只有 8.9% 的老人愿意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接受创伤性抢救。“对于认知功能健全的老人来说，他们完全有能力独立地做医疗决策。家人应该把这种权利交还给病人。”

张宁两个月前刚刚送走的一位 90 岁老人，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肺癌多发转移。两个女儿非常孝顺，要求医生积极治疗，但是不能把病情告诉老人。家里人

一直骗老人说，他是良性的脑膜瘤，再加上有点肺炎。有一天老人当着张宁的面，突然表现出愤怒，怎么一个简单的病就治不好呢？张宁问老人：“您想知道全部的情况吗？”老人回答说愿意知道，但是一旁的家属连忙拉走了张宁。待到老人离世后，有一天，老人的女儿在微信上告诉张宁，现在她们有些后悔当时的决定，如果爸爸知道自己快走了，应该有自己的心愿。

对于张书年的情况，宁晓红建议主治大夫曲璇往前推进一步。宁晓红问道：“他家里人有没有明确地告诉你，一定不能让老爷子知道病情？”曲璇说：“也没有说一定不能，他们觉得老爷子应该已经猜出来了。”宁晓红建议，这个时候医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把事情往前推进一步。有些病人不希望捅破病情，但是像张书年这样习惯了做主的人，知晓情况对他更有利。

3月11日这天上午的查房讨论过后，曲璇认为她找到了告知坏消息的好时机。她也赞同宁晓红的判断，张书年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他对全家人的生活有着自己的安排，如果 he 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应该有一些心愿要去完成。头一天他出现了严重的腹痛，曲璇给予了镇痛治疗，随着疼痛的明显缓解，张书年皱巴的心情也舒展了一些。曲璇把童宁叫到了病房外，说服童宁和她一起向张书年坦率地说出实情。

张书年显得非常平静，确实如大家所猜测的，他早已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当曲璇问他有什么打算时，他说：想回家。

虽然说出实情里的内容让很多人觉得“残酷”，但是这背后的关怀和善意，实际上让屋子里的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童宁后来告诉我说，老人家让他买了回家的火车票，决定回当地做些支持性的治疗。他觉得既然协和的医生都觉得他的病治不了，“到头了”，没必要为了看病再去折腾了。回家接受一些治疗，平静地接受生命的终点，或许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3月21日，童宁发短信告诉我，老人家已经在当地医院就诊，准备做些常规化疗，看身体的耐受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治疗。“他虽然情绪比较低沉，但总体还是个看得开的人。”

那令人窒息的三分钟

如何告知病人坏消息，是大多数医生面临的现实问题。对一般人来说，去医院是让人沮丧的经历：拥挤的人潮、医学上专业而晦涩的词语、医生有限的耐

心与显得稀薄的同情心。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主任张大庆告诉我说，病人去医院的核心意义是疾病获得治疗，这也是医生关注的重点。如果病治好了，医院作为机构显示出的冷漠是让人可以忍受的。但是如果病治不好，医院一切不够人性化的地方，医护人员的冷淡和漠视，就变得让人难以接受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总是出现‘神医’的形象，人们提到治病喜欢用的词语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北京军区总医院的肿瘤专家刘端祺提到，这种神化医生角色的观念，容易让人们们对医生寄予特别高的期望。“西方人教育孩子，常常说‘最好别生病，生病了连医生也帮不了你’，这种说法更接近实际。”

病人表现出“药到病除”的期望，与实际医疗过程的艰辛漫长，往往形成强烈反差。张大庆说，这与疾病谱的改变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时段里，医学主要救治传染病、急性病，这些病的治疗确实容易体现出“药到病除”的特点。随着19世纪医学技术的快速进步，特别是外科的迅猛发展，解决了外科在消毒防腐、麻醉镇痛、输血上的三大难题。到了20世纪，外科手术“三个腔都敢打开了”，医生们能做开颅、开胸和腹部手术。人们的寿命被显著延长，医生处理病痛的能力大大提升了，以至于医生在接下来的很长时期内，获得了家长般的权威。疾病谱也从以传染病、急性病为主，变得以慢性病、退行性病为主。这些慢性病、退行性病是与生活方式甚至是和生命缠绕在一起的，但是多数人的观念仍停留在治急性病的理念上，缺乏抵抗慢性病的心理准备。一旦医生表示出无能为力之处，与病人的期望形成落差，病人最容易有的埋怨就是：“你当时都没有听我好好说，你不关心我，所以你没把病治好。”

张建伟是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的一位医生，他说当他告知病人，某个疾病很难治时，病人经常不认同：“真的吗？是你们医院不行吧？是你不了解情况吧？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医学这么先进了，还有治不好的病？我要去××医院再看看！”

张建伟告诉我说，这让他想起了《众病之王》里边描述的状况。上世纪40年代医学进步很快，经济也在战后获得了稳定发展，医学上各种抗生素层出不穷，很多过去束手无策的疾病得到了治疗。在这种背景下，一旦医生告知病人他得了不治之症，病人的反应往往是：“真的吗？现在不是每天都发明出新药吗，还有治不了的病吗？”

在经济发达、科学“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往

往忘了：医学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疾病与死亡就是生命的一部分。而治疗的不确定性、医学的风险与它的边界，一直是医生必须面对的问题。

当病人面临着疾病远比预期中残酷的事实时，医学中不够人性化的设置，使病人感受到更为强烈的痛苦。张大庆认为，医学的科学性没有观照到病人的个体性，科学追求的是普遍性，不重视个案，而病人对疾病的感受是非常个人化的。叙事医学的提出者丽塔·卡伦说：“我们很难去描述医学中缺失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弥补这些缺失的东西。有人指责说，医生与生俱来的共情能力、对他人痛苦的尊重以及伦理识别能力，在医学培养的过程中被人为削弱了。在对医生的教育过程中，他们目睹的痛苦多了，心肠变硬了。”

在这样的深层冲突中，医生告知的坏消息，可能成为压垮病人和家属的最后一根稻草，当然需要医生自己鼓足勇气。

陈颖茜是协和医院的实习医生。她在2015年经历了一个印象深刻的病人，感受到了深切的无助，也看了医学可以努力的空间。2015年初，陈颖茜在泌尿外科实习，每个月要经手几十位病人，她本来以为自己并不会记住其中任何一位患者的名字。

让她印象深刻的这位病人，是一家大型国际律师事务所的中年律师，因为尿频、尿急半个多月入院时，外院诊断为“急性膀胱炎”，病人和家属坐飞机来了北京，很快住进了特需病房。他们本想重复做个膀胱镜，稍加治疗，一两周就可以回家了。

可是泌尿科的医生们看了他从外院带来的就诊资料时，无不吓了一跳：“这是哪门子的急性膀胱炎！”膀胱里一大片水草和水泡样的物体，腹部CT上还可可见膀胱前壁上有有个不大不小的肿物。显然当地医院也注意到了这点，尝试对肿物进行了穿刺活检，可是病理也仅提示为膀胱壁慢性炎。

患者日益衰弱，不到一周，尿频显著加重，出现了尿失禁的症状，身体虚弱得无法下地走路，吃不下多少东西，肚子日益胀大，体重却蹭蹭地掉。在给他做了一系列检查后，医生明白，患者肿瘤是逃不过的了，但肿瘤究竟是什么来源？又该如何治疗？泌尿科医生一边给患者支持治疗，一边迅速地联系了相关内科科室的会诊。但大家都表示，在取得病理证实之前，哪个科都无法定出积极治疗的方案。

医生显得十分为难，病人已经在地方医院做过膀胱穿刺，病理会诊也没有新的发现，由于肿物在膀胱外，再穿刺一遍的危险性很大。在与家属充分交代

过后，医生为患者做了腹部穿刺，穿出来腹水送检了瘤细胞，病理结果显示为癌症，陈颖茜形容说：“满视野都是癌细胞。”对于医生来说，什么也做不了了，他们建议患者回家度过最后的时光。

病人的家属和朋友赶来了一大拨，都要求医生积极治疗。泌尿科的主治医生、副教授、教授、主任轮番上阵与家属谈论病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建议将病人接回家。但是患者的亲属依旧是每日提出同样的要求：1. 不要告知患者；2. 积极查找病因，积极治疗。

患者则以惊人的速度一天天衰弱下去。陈颖茜说，面对终末期患者本来就不是泌尿外科医生擅长的事情，虽然每个人都是尽心尽力，不惜加班，但每天一到病房的门口，大家的眉头就深深地皱了起来。

这时陈颖茜想到了宁晓红，她提倡的缓和医疗也许对这位病人有用。宁晓红在病房外首先见到了病人的妻子和弟弟，他们一再要求不能告诉患者病情。

宁晓红先是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与患者的家属详细介绍了病人的实际情况：恶性肿瘤腹腔转移、肾功能衰竭，家属明白了情况之后，同意让宁晓红见一见患者，宁晓红邀请他们一起走到病人床边。她弯下身子，靠近病人，让病人感受到她的关注和善意。温和地对病人说：“您现在怎么不舒服呢？”“我肚子疼，肚子胀，不想吃东西，睡不着觉，现在小便都没有了……”“您怎么看待自己的病情呢？”

病人表现出一幅不爱搭理人的样子，回答说：“他们说不就是急性膀胱炎嘛，做做膀胱镜、吃吃药就出院了。”

宁晓红对病人的冷漠没有任何不愉快，她说：“我知道您正经受着痛苦，您有肚子疼，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小便次数多。”然后问道：“您觉得需要我们为您这些不舒服做些什么吗？”这时患者首次将头转了过来，倾诉了一些他的症状，说：“如果能让腹胀、尿频这些没那么严重就好了。”

宁晓红表示可以减轻病人的不适，她又柔声问道：“那您对自己的病情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问我们的么？”她仍旧保持着开始时的姿势，用温婉的目光，看着眼角渐渐闪现泪光的患者。

陈颖茜回忆说，患者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那三分钟，似乎是我度过的最漫长的三分钟，家属和患者及宁老师都沉默不语，屋里安静得都能听到挂钟的声音。我只觉得屋内的空气越来越凝重，越来越让人喘不过气，让我有一种想逃离的感觉。”

宁晓红后来告诉我说，这种沉默的时刻，需要医



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专家李红英（中）说，多学科综合团队使得肿瘤治疗更加全面

生的勇气和耐心。有时候病人沉默十秒钟，医生就开腔打破沉默，或者逃离了，实际上大家都需要更大的勇气来面对这样的告知时刻。那位病人眼里闪烁着复杂的思绪，他多次欲言又止，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问。“没有了，谢谢。”

陈颖茜形容那个难忘的场面：“我们终于退了出去。”

宁晓红说，她虽然很希望帮助告知病人实情，但是尊重病人意愿是第一位的。那三分钟的沉默，看上去没有任何语言上的信息，但是实际上含义深厚。她要做的是，不给病人任何的压迫感，所以她问的问题都很大，让病人有足够的选择空间。“我们永远不要说，你这病必须化疗，或者必须手术。如果病人不愿意呢？所以我永远给病人两种以上的方案，我会告诉他们，不治也是一种方案，你们永远有选择。”

在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宁晓红和病人家属做了深入的沟通。“病人这么年轻，又这么有知识，如果就让他稀里糊涂离去了，我觉得不应该。他一定有自

己的心愿，不如问问他自己有什么样的愿望。一旦在这里做透析，病人插上了管子，想回家就不可能了。”宁晓红说，医生不只是治病，眼里不能只看到器官，而应该注重病人的整体感受。家属也一样，在医术无力回天之时，不要只是想着治疗再治疗，帮助病人实现心愿非常重要。医生的职责，并不仅仅是医疗技术的操作者，医生需要具备用多种方法回应病人痛苦的能力。

家属虽然悲痛，还是很快接受了宁晓红的建议。宁晓红陪着他们签署了拒绝手术同意书，还讨论了转运事宜。她又针对患者的症状开具了止疼药及可缓解患者消化道症状和泌尿系药物。家属当时表示只要有一丝希望，仍然不想离开协和。

但是第二天一早，家属告诉医生们，他们晚上开了个家庭会议，把病情告诉了患者。患者很平静，表示希望回家接受支持治疗，于是他们决定当天夜里就启程回家。

陈颖茜后来在她的文章中写道：当天晚上下班后，

我又去特需病房找了他的妻子，对她说了些安慰的话，以及无力的祝福。那个一直很坚强、始终表现为家中主心骨的女人，第一次在我面前抑制不住，簌簌地掉下泪来。她说：“用了那些药物，他感觉好受多了，他不受罪就好，我们晚上就走了，谢谢你们的照顾。”那天夜里，他们静悄悄地走了，尽管手续繁琐且家属众多，却几乎没有怎么打扰医生、护士。屋里如同没人住过一样。

细心的陈颖茜在几个月之后，还打了一次电话，想知道一下这位病人后来怎样了。她打了病人的手机，已经停机。她又给病人妻子打电话，他妻子说，病人回到当地之后吃了些中药，透析了几次，不到一个月就很平静地走了。她说，病人没能接受有效的治疗很是遗憾，但还是感谢医生们那次会诊对他们病情的交代和良好的沟通。陈颖茜感慨说：“病人正当壮年，两个月就失去了生命，换了谁也难以接受。他妻子能够尊重他的意愿，没有让病人受不必要的治疗痛苦，我很佩服她。她对我们的评价，我作为医生已经很满足了。”

这次经历，让陈颖茜想到了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这或许就是医学的实质——“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被切成片段的疾病，以及它的载体

宁晓红接触到的缓和医疗，是医学上最新的，也是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对于西方医学来说，急速推进的技术带给了人们强烈的压迫感，人们越信仰技术，对于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就越不堪一击。

医生诊室里发生的事情非常复杂，但身处其中的双方并没有为这些临床相遇做什么准备。患者感觉医生对他们的痛苦不以为然，在描述症状时医生也不相信他们，他们被冷淡的医疗物化了。医生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的世界里：在学术理想、科学上的竞争压力、职业的优越感和表现自我技能的雄心中，往往遮蔽了医学的主要目标——服务。患者不得不在医生的关心与能力之间、同理心与科学之间做出选择。医学治疗不能逆转不健康的行为方式、糟糕的选择、偶然性和坏运气带来的后果。但是医生生活的“科学世界”，与患者的“生活世界”之间的沟壑，越来越需要有效的填充物。

医学现有的专科模式、“见病不见人”的状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的专家李

红英对我回忆说，过去肿瘤病人做完外科手术后，往往不知道接下来去哪里治疗。除了少数肿瘤专科医院外，肿瘤病人在综合医院感到无助。外科医生切除肿瘤后，很多病人都面临着短期内复发、癌细胞转移、生存期短的问题，但是到了每个科室，这个科室的医生只是按照自己的思路给病人治上一段，“到了外科就是做手术，到了放射科就是照片子，疾病被切成了一个片段去对应现有的科室。什么样的治疗对这个病人综合来说是最好的，变得没有人关心”。20世纪90年代，国家要求三甲综合医院建立肿瘤科，也正是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在肿瘤科，每个病人的病情有了历史感和全局感，医生们从病人身体的综合角度去考虑，不同阶段应该实施哪些针对性的治疗。

刘晓红曾是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教授，从事消化内科的临床工作近30年。她说，医院各个科室过去基本是治疗“单病”的思路。病人胃出问题了，去消化科；心脏出问题了，去心内科；肝脏不好了，再去消化科。专科医生只考虑一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往往忽视了病人的综合状况。她说曾经有一位医学老教授，她的老伴出现急性心梗，被送进医院抢救。老教授嘱咐医生，老伴的肾功能有问题，用不了抗血小板药物。可是医生依据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诊疗指南，规范使用了抗血小板药物，病人消化道大出血，没有救治过来。刘晓红记得那位老教授的悲痛：“如果我的老伴死于心脏病，我无话可说。可是他死于消化道出血，我接受不了。”刘晓红说，那时起，她感觉到了专科诊治的缺陷，但是对于个人来说，还难以上升到制度层面提出特别有效的改善措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兴起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及生命伦理学、医师职业精神等，拓宽了医生只关注生物性疾病的狭窄视野，鼓励他们理解患者的情感、心理、社会和家庭需求。过去二三十年来，医学院、住院医师培训、医学专业学会对医学人性化的呼声做出了回应。除了用精湛的医学知识和技术来装备医生和医学生之外，医学教育还致力于促进医学实践中的共情、信任及对个体患者的关注。

待到2010年刘晓红突然受命担任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后，她接触到了最前沿的医学理念。北京协和医院的老年示范病房在2006年筹备时，就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合作，尝试将西方现代老年医学理念引入中国。巧合的是，90多年前洛克菲勒在筹建北京协和医院时，正是按照当时最先进的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模式复制出了协和。



对于西方医学来说，急速推进的技术带给了人们强烈的压迫感，人们越信仰技术，对于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就越不堪一击。



为老年病人专门筹建一个科室，体现了与其他专科科室不一样的理念。困扰老年人的基本上不是“单病”，而是好几种慢性病的混合体。针对美国老人的调查数据表明，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90%患有一种慢病，50%以上的人同时患有三种及以上的慢病。老年医学的目标不是为了单纯延长寿命，而是延长有生活质量的健康寿命，以老人能够独立在社区生活为目标。在这样的思路下，老年医学体现出一种“全人管理”的理念，把老年病人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医生在综合各种考量后，选择对病人最有利的方案。医学技术只是帮助达到这种目标的手段之一。

老年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朱鸣雷向我举例说，以前医生的治病思路，往往是把一个疾病处理到极致。比如对于肺癌又出现多脏器转移的病人，就进行全身化疗，还可能进行后续化疗。一旦上了化疗，就让病人一定要把这个疗程做完。现在他更偏向于考虑病人的感受，病人的身体对治疗是否耐受，如果副反应太严重，是不是可以歇一歇？在延长生命与保证生活质量之间，做一个权衡。

刘晓红说，非癌死亡的老人占的比例更多，如心、肺、肾、肝等重要脏器功能衰竭，痴呆、帕金森病晚期等。一般估测癌症病人的预期寿命相对容易，预期生存期短于6个月，就可以考虑进入宁养照护项目了。而非癌病人，每次抢救过来都可能再活很长时间，所以更重要的是按照老人的需求来决定是否进入。

刘晓红说，当疾病已经不可治愈的时候，没有哪一种方式是更好的。这种情况下，病人的意愿是第一位的。要看医生能为病人和家属做些什么，尽力帮助达成他们的愿望，而不是只去做医疗技术上可以做的事情。

“疾病是身体的防御系统与外部应激之间失去了平衡，对于衰弱老人来说，身体就像纸糊的船、泥塑的花盆，经不起打击，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追着一个个疾病去诊治，医生根本跑不过那些疾病。所以我们的关注点不在于疾病，关键是要维护老人的功能，改善生活质量。”

我在宁晓红出门诊的时候，充分感受到了老年医学的这种思路。3月16日上午，宁晓红的一位老病人来看病。76岁的老太太卵巢癌晚期，手术后又发现了转移，如今已经癌症转移一年半了。老人和家属都接受了不再做抗癌治疗的事实，她偶尔来看协和老年病的门诊，获得一些支持性的治疗。

这天上午，穿着鲜亮的橙色羽绒服的老太太坐在

轮椅上被推进诊室，她的儿子高声对宁晓红说道：“你看我们老太太多坚强，自己来看病了。”宁晓红像和孩子说话一样，温和地问老人家哪里不舒服，伏下身摸老人家的腹部，又蹲下来摸她的腿和脚。宁晓红关注老人家眼下最在意的问题，看病人自己最在意什么。老太太已经显得非常迟钝，对她的问话没有太大反应。她老伴说，如果能解决大便失禁、睡眠不安稳的问题，就很好了。“大便失禁很可能是肿瘤压迫神经引起的。”宁晓红对家属说，“不给老太太做CT了，就算查出来瘤子又怎样了，没必要再让老人忍受检查的痛苦了。”她给老人开了一些药物，嘱咐家人勤护理，别让老人压出褥疮。这次诊疗就结束了。她告诉我说，让病人感受好些，就是她这个阶段能为老人家做的。

另一对求诊的母女，是为家里88岁的老太太来看病的。老人因怀疑老年痴呆在别的医院住院，但住院已经有三个月了，最近半个月不仅低烧不退，腹部积水越来越多。母女俩来问宁晓红，该怎么办。宁晓红说，腹部积水的原因可能是炎症，也可能是恶性肿瘤引起的。消炎这么久还没用，估计恶性肿瘤的可能性大。“但是老人家已经88岁了，就算查出是恶性肿瘤，你们觉得还希望做手术或是做化疗吗？如果这些都不做，那咱们就没有必要检查她是不是得了恶性肿瘤了，检查本身也会给老人带来痛苦。”

母女俩有些呆住，问：“那要不要抽腹水呢？”

宁晓红说，如果腹水目前还没有让她很难受，就别抽。“住院三个月太久了，你们有没有想过让老人回家呢？医院并不是什么好地方，很多老人越住越衰弱，院内感染也是个麻烦。”

母女俩又问，怎么判断老人家能不能出院呢？

宁晓红说：“如果不是离开医院就过不下去，你们就可以考虑出院了。老人家体温若稳定在37~38℃，没有特别难受，在家就能够护理了。不过，你们也要做好老人家时日不多的心理准备了。”

身体：病人自我的避难所

在通知病人住院时，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护士长郭欣颖会特意告诉家属：让病人带一点自己熟悉的物品来。听力不好的病人别忘了助听器，睡眠不好的病人可以带上自己的枕头，如果愿意带上家人的照片来住院，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她们希望病人住院的第一夜，家人可以来陪伴，以帮助病人消除陌生环境中的恐惧感。但是让她感到困惑的是：“现在不是我们

不让家属陪护，而是空巢家庭太多，差不多一半的老人得不到家人多少陪护。”

主任刘晓红对病房有着明确的要求，她们在显眼的地方挂上日历，让病人注意到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她要求夜晚病房里要熄灯，“病房里白天要亮，夜晚要黑”。因为如果诊室里永远亮着明晃晃的大灯，让病人感觉不到昼夜循环，感到隔离与害怕，容易出现谵妄。

当医者把病人的意愿放在第一位时，她们关注的问题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病人除了躯体，还有重要的社会角色。刘晓红说：“一个人如果插管了，他只能被限制在床上，即使是在家里，他无法上桌吃饭，在家里的实际地位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她非常注意不要让病房限制病人的活动能力。“所有制动（限制人的活动）的因素尽量避免，有些科室里，病人一进来就给插尿管，本来病人住院前还能走动的，最后只能躺着出去。”刘晓红说，老年医学科的病人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插尿管限制了病人的活动，还可能造成肺部感染。“治病也致病，我们应该避免医源性的伤害。我们鼓励病人下床，帮助他们控制疼痛，教家属怎么给他们理疗。有的病人坐轮椅进来，但是出院时能走着出去。他们一旦恢复了活动能力，对生活的感受大不一样。”

主治医生葛楠告诉我说，老年病的治疗不是绝对“保守”。如果某项治疗能显著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她们有可能比其他科室的医生还要更积极地主张治疗。她前段主治的一位98岁的老人，右腿骨折后，又发生了一次右侧大腿中段的粉碎性骨折。骨科医生看过之后，觉得老人年纪这么大了，又有心梗的前兆，别做手术了。但是老年医学科综合各种因素后判断，如果不做手术，疼痛、卧床等情况就会导致老人活不过一个月，并且丧失了大部分的活动能力。于是会诊后建议给老人做手术，现在老人家已经做完手术四个多月了，身体状况还可以。

与一般职业不同，医务工作者拥有触摸他人的身体、干预它或许会治愈它的权利和特权。正因为如此，事实上他们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承认患者的身体是患者的自我所在，认识到身体是每个人的自我的重要避难所。生命伦理学和卫生法涉及的许多问题，就是与身体的所有者、监护者、管理者和保护者相关的问题。刘晓红尊重患者身体的方式之一，就是尽量保护他们的身体少受伤害，如果治疗带来的弊端大于好处，就会与家属和病人讨论几种方案的获益与风险，转换思路。

在3月11日我旁听到的老年医学科大查房时，主治医生每汇报一个病人的病情后，刘晓红都会问：“病人的社会支持怎样？”主治医生、护士长、护士或是社工，都有可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在医生办公室这个30平方米的空间里，看到了丰富的层次：从医生、护士到社工组成的医护团队，以及对病人从疾病、精神、心理、家庭各个方面的关注。

比如，某个76岁的病人“2003年出现过脑梗，在2014年丧偶之后，情绪一直非常抑郁。女儿工作忙，他在家虽然有女儿和女婿一起生活，但交流比较少，最近一直是护工在照顾。刚入院时有些谵妄，说现在是1960年，自己才48岁等等”。刘晓红提醒说，老人有坠床的风险，一定要注意。他思维有时会不清，所以要问清家人，老人有没有财务问题需要交代，以保证他的财务安全。

主治医生提到，这次住院是因为老人跌倒了，他是在护工扶着走的时候跌倒的。刘晓红交代说：“你们观察一下护工的动作，很多护工对待糊涂的老人，动作很粗暴。你们要教导护工正确的照护方法是什么。”她还提醒，要把老人用药的历史弄清楚，看老人最近是不是加了新的药物，有没有可能是新加药物引起了意识不清。

刘晓红好几次提到，要寻找问题的可逆性因素，哪些是技术上通过治疗可以改善的，哪些是需要加强社会支持的。“从收病人住院开始，我们就要想着他们出去之后去哪儿，有哪些因素是可以改善的。比如老人家如果容易跌倒，就最好别独居了，是不是能搬到女儿家？他女儿家能不能收起地上的小块地毯，把台灯的线藏起来，以免老人再次跌倒？家里是不是有人可以陪老人一起吃饭，别让老人家一个人进餐，两个人一起吃才有食欲。”

对于已经在弥留之际的病人，她强调医护人员一定要会判断人的濒死症状。“如果家属和病人提前知晓，我们可以帮助病人完全心愿。也许他有一些问题需要交代给家人，也许他希望回家离世。如果病人糊里糊涂去世了，对他们和对家属来说，都是永远的遗憾。如果病人需要抢救，一定要告知家属可能的花费。”

在讨论完病人情况后，医生办公室又进来了几个人，他们分别是北京协和医院医学心理科、康复科的医生，还有药师，大家开始了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最具特色的多学科团队查房。大家各抒己见，从各自专业角度出谋划策，以确保患者的情绪稳定、用药安全和得到有效的营养支持。



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忙碌的医生们

参加这次大查房旁听的，还有来自另一家北京知名医院的医护团队。她们遇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一些家境优越的老年人，临终前因为各种原因用上了呼吸机，“呼吸机上了之后，即使这个病人已经没有了任何延长生命的意义，有些已经脑死亡了，科室要拔下呼吸机就是个大难题了。谁都难以承受拔下呼吸机的责任”。

最近几十年，医学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临终死亡时，死亡的过程被大大延长，不断偏离自然。张大庆说，原本大家公认的医学目的有三点，是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的：促进健康、减少疾病、延长寿命。当医学越来越多干预正常死亡之后，“怎么死”变成了一个牵涉医学伦理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的牵头下，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发起了“重新审视医学目的”的活动，他们提出了医学的第四个目的——提倡有尊严的、安宁的死亡。我所采访的老年医学科与肿瘤科，都面临着怎么提倡有尊严的死亡

的问题。

刘晓红说：“上呼吸机和拔下呼吸机，在伦理上都是一样的。没有意义地延长生命，病人自身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们往往没有能力去表达了。联合国卫生组织早就明确提出，人为地无意义地延长生命，是不人道的。如果家属决定了拔呼吸机，在家属签字之后，应该由医护人员来执行。如果为了躲避责任，让家属自己去拔呼吸机，很可能家属会一辈子做噩梦都是在拔亲人的呼吸机，我们医生应该承担起该有的责任，安宁缓和医疗的照护对象同样还包括了病人的家属。”

倾听与送别

护士长郭欣颖刚从ICU病房转到老年科病房时，有一段时间不太适应。ICU的病房里，重症病人基本不能交流了，大多数时候病房里只有机器单调的声响。但是在老年医学科，很多病人充满了交流的愿望。“有



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医师宁晓红是缓和医疗的积极推动者

一个病人每天都希望拉着我聊一个小时，我们本来就特别忙，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一开始觉得很崩溃，也特别不明白：他跟我说这些干吗呢？”但是郭欣颖很快转变了看法，“当我觉得病人烦的时候，其实是觉得病人没有遵守我们病房的规矩。可是我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再想想，为什么他们就必须遵守我的规范呢？”

郭欣颖慢慢意识到了病人讲述自我的价值。在他们被封闭进病房、换上病号服，贴上“病人”这个标签之前，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过往。病房在很大程度上，将人们的过往突然切断，连病人自己都觉得，自己变成了没有未来的、漂浮于真实生活之上的人。

照顾晚期病人并不是个轻松的工作。当患者病入膏肓，医生早已无力回天时，一点十分微小的创伤，都可能造成病人的痛苦。有人精神崩溃、极度抑郁；有人愤世至极，动辄恶语伤人；也有人变得像个惯坏的孩子，无论怎样都无法满足他无休止的要求。有些医生提到，管这些病人，每天早上的查房都是一场心理挑战。

但是北京军区肿瘤科的医生王莉说，工作时间长了，她发现那些不好打交道的病人，往往是没有解决自身的问题。他们并不是对医生有意见，而是还处在对自己疾病的接受过程中，或者是因为家庭内部有着难以明说的难题。

郭欣颖发现，通过与病人聊天，那些穿着同样病号服的病人，在她的眼里有了生动的个性。有些病人老是提要求，其实他们是太孤单，希望获得关注，所以郭欣颖和护士们没事就去晃一晃，和病人说上几句话。家庭支持良好的病人，往往很少提出额外要求。有些病人愿意向医生倾诉，有些觉得与医生说病情太沉重，更愿意找护士聊天。宁晓红从大学社工专业里找来的社工实习生，也起到了很好的与病人沟通的作用。郭欣颖说：“我们几个团队构成了一个紧密合作的集体，对病人有了立体的了解和支持。”

如果不重视医患之间的交流，两方面都容易感觉到屏障。医生的直觉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而患者的直觉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于是这两种情境就产

生了冲突。医学还原主义限制它所看到的東西，把患者繁芜生活中，与疾病的生物学无关的东西统统剔除，可以说医学是去隐喻化，在这种冲突中牺牲了患者生活的独特性。

而倾听患者，本来就是医学中的一个程序，只是它的重要性越来越被遮蔽。协和医院消化科医生吴东告诉我说，美国曾经做过研究，如果医生不打断病人，四分之三的病人只会讲述两分钟就停下来，病人讲述时长的中位数是 92 秒。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病人并不会像医生担忧的那样喋喋不休。而倾听病史有助于医生的治疗。医生尽量不打断病人，让病人有完整的叙述，这样既能在心理上安慰病人，又不会丧失重要的线索。所以当—个疾病难以诊断时，除了做各种检查，也应该回到病人的身边，通过聊天发现更多的线索。

吴东曾在急诊室碰到过一个 40 多岁的男患者，高烧不退，抗生素治不好，查血又发现白细胞不高，让他很疑惑。后来他回到病人身边和他聊天，病人平时在北京支个小摊卖馄饨。吴东追问他是不是家里卫生条件差，有没有老鼠。再联想到动物传播的流行性出血热，最终确定病人患了斑疹伤寒，四环素就能治好。

北京恒和医院的副院长张松伦告诉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基层给老百姓看病，医疗条件很不好，往往缺医少药。所以老百姓来了，他就花费很多时间与他们聊天。“我叫作‘谈情说爱’，谈病情、表关怀。这本是无奈之举，但我慢慢发现，我能从这种聊天里发现疾病的线索，有些疾病不用特别急的治疗，通过等待观察，也能好转。”

这种讲述与倾听，也正是“看病”的本质。疾病是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件，有时是由可辨认的原因引起的，并在特定的时间和背景中发生，由一人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讲给另外一个人听。只有理解了患者如何饱受病痛的折磨，医生才能对患者提供有效的临床帮助。但是这需要医生进入患者的世界，哪怕只是通过想象力，并从患者的角度看待和理解这些世界。当患者讲述症状，甚至只是对疾病的恐惧时，疗愈的过程其实已经开始。患者倾诉的对象往往首先是自己，然后是亲人，最终是医务工作者。

完整地听患者描述他或她在这场磨难中的经历，听到他们自己说出结论是什么，这意味着什么，在那些可怕的事情中他们最害怕的是哪个。这样医生和患者可以共同尝试去直面任何行动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包括不采取治疗行动。倾听病人，也是知晓病人意愿的一种重要方式。

张松伦在加拿大做医学院的博士后时，曾在当地一个大型护理机构兼职。在临终关怀的病房，所有的病人都明确表示过自己对于临终治疗的意图。所以病人的病历本分为四种颜色，分别代表着他们的不同意愿：发生紧急情况时全力救护；同意救护，但不同意创伤性救护；同意维护性治疗，但不采取抢救措施；完全放弃有创救治。这样医护人员就能明确地贯彻病人们的意见。

可是在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过生前预嘱。刘晓红说：“这是应该客厅里谈的事情。当病人住进病房时，已经不是谈论的好时机，这会让病人警觉：我是不是不行了？所以我们还有大量病房之外的工作，我们需要深入社区，让人们明确如何保护自己在医疗上的权利。”

有时候，病人在病房里离世。护士长郭欣颖会帮助完成一个小小的仪式。在病人临终时，她会建议家属温和地陪伴，有些家属会给病人脱下病服，穿上他们自己的衣服。她会告诉家属，人濒临死亡时，肢体的运动功能和感觉功能首先衰退，在逐渐丧失视觉的过程中，人们仍然可以依稀听到外界的声音，听觉和潜意识最后丧失。

如果—个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要反复听到医生抢救的噪声、亲人悲哀的哭声，身心还要继续忍受扎针、灌肠等治疗手段带来的折磨，那么病人在“走”掉的时候，心里必然很不平安。

刘晓红说，很多人不知道，其实临终处于半饥饿半脱水的状态下，体内的内啡肽分泌，会产生一种愉悦感。这个时候哪怕是输液，都会破坏这种愉悦感。逝者的听觉最后消失，他们希望家属在病人耳旁低语，鼓励和赞美病人，帮助他们度过最后的时光。这种对患者生命的回顾，能够帮助患者和家属寻找到种种过往经历的意义，体认到价值与爱。生的愉悦与死的坦然，都成为生命圆满的标志。

病人离去后，郭欣颖会在他们枕边送上一朵花。刘晓红说，这个举动对医护人员也有意义，这也是一情感解脱。大家把哀思放在这里了，回到家就是另一个世界。当家属离开医院时，老年医学科的医护人员还为他们送上一张大家签名的卡片，赞美他们勇敢地陪伴亲人离世。

而对于看到了疾病的残酷，仍旧努力让病人感受到舒适与尊严的医护人员来说，或许正适合罗曼·罗兰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热爱它。■

医生的修炼，医术之上的人学

——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散记

主笔 / 徐菁菁



(张雷摄)

外科手术考验的不仅是手艺，也是“心术”（2006年摄于宣武医院）

医患者之间，如何共同携手对抗疾病，从医生的角度，和谐关系的建立，是关键，也是学问。

良心活

早上8点45分，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梁建涛走进手术室。病人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剂已经在她身体里起了效应。1个月前，CT和核磁共振检查在她的左侧前床突发现了一颗3厘米左右的脑膜瘤。颅腔底部称为颅底。颅底分为三个窝室：颅前窝、颅中窝与颅后窝。前床突是颅中窝蝶骨小翼后缘内侧

的一块区域，临近视神经。简单来说，这个肿瘤恰好位于大脑中间部位，它已经压迫了视神经。按自然病史，它将不断长大，随之而来的是视力的逐渐下降，直至失明。

病人的全身被淡紫色的无菌手术单包裹着，她的头被固定在手术头架上，只有头顶一小块皮肤裸露出来。医生将从那里进入她的大脑深处，取出肿瘤，同时，他们将努力达到这样的目标：保护视神经以及颈动脉和它的分支。如果手术中弄破了血管，会造成大出血，如果血管被压窄了，则会导致供血不足，造成脑梗塞。

大脑是人类身体上最精密、最复杂的部位。梁建涛第一次参与神经外科手术的操作是在2001年——

这种参与不过是在手术室跑跑腿罢了。大概在2004年，他开始有资格主刀急诊脑外伤。这是所有神经外科大夫的成长路径。“来个急诊病人，头破血流，需要开颅把血肿去掉。看着很吓人，但情况并不复杂。”而要在类似的肿瘤手术中搭上一把手“怎么也得七八年的历练”。

但在梁建涛看来，知识和技术的成熟并不是成长中最困难的事情。“我觉得分两阶段看。在早期阶段，你在手术室里打下手，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但相应的工作带来的成就感非常有限。那个时候的压力是有形的，来自生活的和物质的。每天起得最早，回家最晚。有换不完的药，写不完的病例、文书和论文。你还需要拿有限的收入去面对结婚生子。这个阶段会持续非常长的时间。到了后期，相对而言杂事没有那么多，但你需要来承担手术的责任了。心理的压力占据了上风。”“物质最难还是精神最难？”梁建涛说，“我觉得还是精神，这需要过一个坎。特别是一旦手术出现问题，你必须克服它对自己心理的影响。医生做的时间越长，对未知和不确定性的认识会越深刻。刚开始的时候无知者无畏，慢慢做多了，会越来越小心，越来越有敬畏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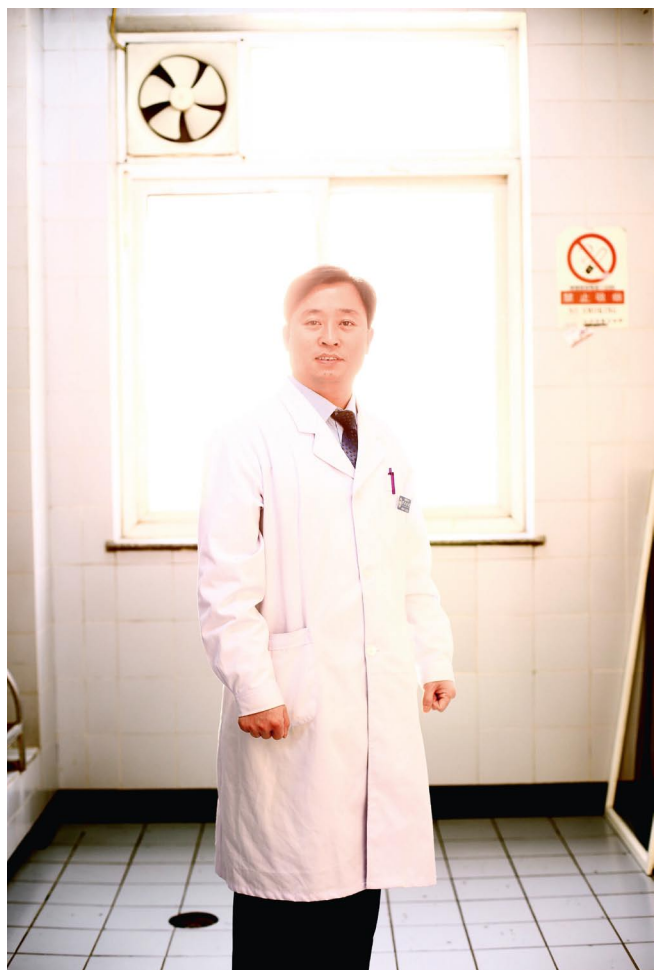
手术室里的分工合作非常明确。年轻医生和进修大夫打开了病人的颅骨，如同橡胶似的软而坚韧白色的硬脑膜被剪开，作为助手的梁建涛和主刀医生鲍遇海主任医师接手战场。

找到肿瘤，切掉它，用语言描述一场手术可能非常简单。但显微镜下的操作要复杂得多。“肿瘤就像是魔鬼，”鲍遇海找到那一块灰白色的组织，“一开始的时候它非常柔软，它会温柔地靠近正常组织，狡猾地在包裹住它们之后再逐渐变硬。”鲍遇海仔细从这个脑膜瘤中分离 Heubner 回返动脉。这是个大脑前动脉较大的穿支。血管完好无损，但出现了逆流——血管受肿瘤压迫的时间太长，导致了血管痉挛。这种收缩使血管的通畅性变差，血流方向发生了改变。这是医生在手术中无法处理的问题。病人的意识和肢体功能会不会受到影响只能看术后的情况。“我们尽力了，对不对？”鲍遇海问梁建涛，问了两遍。

手术室或许是临床医学技术化的最典型缩影。病人被各种仪器和手术器械包围着。他的心率转化为电子化的滴滴声，孤独地鸣叫。他的所有生命指标都以数字的形式显示在电子屏上。电钻和铣刀打开颅骨时冒着青烟，令手术室里充满一种有着古怪甜气的焦味。握在医生手中的双极电凝灼烧着出血的细小血管，发

出“滋滋”的响声。人体似乎只是一架有待修整的机器。而人们夸奖一位优秀的外科大夫，往往会说他“手艺好”。然而事实上，外科不仅是手艺，更是“心术”。

梁建涛是在下午4点走出手术室的。事实上，肿瘤的摘除很顺利，所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花费了几乎两倍的时间用磨钻来打磨颅骨。“肿瘤是从硬脑膜生长出来的，这块膜和肿瘤附着的地方我们叫肿瘤的基底部。将来肿瘤的复发也会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手术时，不光要切除肿瘤，还要把它附着的这层膜拿掉，同时磨掉这层膜周围的骨头。在显微镜下看，这些被侵蚀的骨头呈现出灰色，具有蜂窝状的小孔，不会像正常骨骼一样质密。”然而，这一套程序的实施，需要医生在内心里做出一个抉择。医学的不确定性本质决定了，手术的结果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详细



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梁建涛

（张雷摄）

确切的标准。精心打磨骨质的工作意味着大量延长手术时间，而磨钻的操作本身就存在风险，一旦不慎就可能破坏神经和血管。“做和不做，家属和病人是不知道的，”梁建涛说，“从现在影像学的诊断来看，两者根本没有区别，都可认定为成功摘除肿瘤。但是病人5年、10年以后复发的概率相对就大了。”

基于一定的技术水准，医生是否愿意承担更多的工作，以及冒更大的风险，可能对术后的效果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梁建涛治疗过一位61岁患有巨大听神经瘤患者老王。从最理想的角度来说，听神经瘤的手术目标有两条：彻底切除肿瘤，降低复发率；保护面神经功能，避免出现永久性的重度面瘫。但其实，这两条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对于巨大肿瘤，两者常常不能兼顾。梁建涛见过许许多多来自全国各地、在全国各家大医院手术治疗听神经瘤后患有面瘫后遗症的患者。“面瘫对患者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尽管老王告诉梁建涛，说他这个年纪，对面瘫不是很在乎。但梁建涛觉得：“即使他真的不在乎，做医生的也不能不在乎。”

鲍遇海和梁建涛采用了对医生挑战极大的“坐位”手术。患者坐起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主刀医生可以双手精确分离肿瘤与周围正常结构的界面。使用一般采用的侧卧位时，医生必须腾出一只手持续吸引器。而一场“坐位”手术，意味着准备专门的手术床、寻找专门管理座位手术的麻醉师和术中电生理监测的医生。这场手术中，主刀医生鲍遇海举着双臂、双眼30度仰视手术显微镜，花费了两小时将肿瘤从脑干、小脑、诸多血管和神经上剥离下来。而这些治疗中的曲折都是患者所不知道的。

“手术是个良心活。”梁建涛多次向我强调。良心活不仅意味着做什么不做什么，还意味着一个医生在多大程度上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治疗三叉神经痛是梁建涛的专长。这种疾病号称“天下第一痛”，患者极为痛苦。造成疼痛的绝大多数原因是三叉神经被血管压迫，因此微血管减压术是医学界公认的根治该病的方法。但是临床医学中的个体差异性意味着，这种手术的有效率是90%。

梁建涛曾经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患者在术后很快就表示依然疼痛。作为医生，梁建涛有权利让他出院，于情于理，他都完成了自己的治疗。但他却犹豫了。“这个病人恰好是个残疾人，小儿麻痹，家在山东，来一次北京很不容易。而且他经济状况有限，一旦回去不太有可能再到北京来看病了。”梁建涛找

到鲍遇海，后者提出，患者的疼痛可能是因为神经被颅骨的一个突起顶住，磨去部分骨头可能能够解决问题——但也只是可能而已。要不要对患者提出二次手术的看法？如果二次手术没有成功，患者会怎么想？这会被患者视为医生的无能吗？梁建涛的选择是和病人长谈了病情。“病人一听说做二次手术一开始肯定是抗拒的，花这么多钱，受这么大罪。我把这些问题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病人。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沟通。他接受了，而且手术幸运地成功了。”

并不是每一次尽心尽责的结果都是美好的。外科大夫能从手术的成功中获得极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但“成功的喜悦总是短暂的，我们会很快忘记那些被我们治好的患者，而那些失败的经历会长久地留在脑海里”。

说起2014年的那场手术，梁建涛的神色和口吻一下子就凝重了起来。“我记得太清楚了，一说到手术和风险，我就会想起这个病人。12月24日，正好是平安夜那一天。术前我们的大夫一致认为病人患有的是三叉神经半月节处胆脂瘤，打开以后发现其实是神经鞘瘤。手术的难度变得更大了一些。”在这场手术中，梁建涛在剥离肿瘤和颈动脉时发生了血管破裂。“肿瘤侵蚀了血管，血管壁变得很脆弱。这种颈动脉的破裂造成的病人死亡率非常高，然后就是致死。原则上说，你既需要保持血管通畅，也要止血，还要对大脑不构成伤害。但这个追求很难实现。那次，血流得根本控制不住，病人的大脑一下子就肿胀起来了。我们当天实际上对病人做了三次手术进行抢救，一直抢救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血止住了，血管也是通的，但是大脑损伤，病人活了下来，却再也醒不过来了。”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梁建涛在闲下来时常常会想起这台手术。在血管破裂之前的那一刻，他正在一如往常的努力将附着在病人血管上的肿瘤剥离得尽可能干净。每一次他都追问自己：“如果给病人做手术的不是我，如果我不那么追求肿瘤的干净剥离，病人是否会是另一种情况？”

他向我坦言，他在内心中深刻地自责，但同时也问心无愧。我问他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办。“我当然还是会这么做，因为病人需要彻底切除病变，当然一定是总结了每次的经验和教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手术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不能因为风险的存在而回避。”

下午6点，病人术后的CT结果出来了，看上去情况不错。梁建涛两级台阶并做一步地奔向重症监护



成功的喜悦总是短暂的，我们会很快忘记那些被我们治好的患者，而那些失败的经历会长久地留在脑海里。



病房。病人在那里进行手术后的观察。他掐了掐病人的下肢，呼唤她握住自己的手。右手和右腿没有多大反应。“麻醉可能还没有完全清醒，我们再等一等。”他对我说。

那是漫长的 15 分钟。15 分钟后，梁建涛终于松了口气。

沟通，再沟通

副主任医师马妍是神经外科除了主任凌锋以外唯一操刀手术的女性。2005 年她博士毕业成为一名住院医师。住院医生从事一线的病人管理工作。没多久，马妍就意识到，8 年的学校学习的最大短板是没有教会她应该如何与患者沟通。

有两个病人给马妍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一个病人是 19 岁的小孩，大学新生，诊断是一个特别大的脑膜瘤，长在颅底。一般的脑膜瘤是良性的。但这个病人做了手术以后，活检提示肿瘤的性质不是很好。我当时猜测这孩子可能对病理检查的结果有一定了解。术后他一直处于比较抑郁的状态，很少说话。”该病人并不归马妍直接管理。但观察了几天后，她还是决定向上级医生汇报了这个情况，并建议破格让亲属来病房陪护。这个建议被采纳了。“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孩子所住的病房。房间里有六张病床，从门口到窗口一排三个，对面又有三张。他就住在靠近窗口的那个位置。”马妍回忆，“孩子母亲陪护的头两天都没事。第三天早上我来医院的时候，就听说妈妈吃完早饭去洗碗的时候，这孩子从窗户跳出去了。我回过头来看，他的心理情绪和手术后不可避免的一些精神上的压力，都没有能得到特别及时的疏导。我的感触很大，所谓术后的沟通原来并不只是和病人家属的沟通——可能现在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

“第二件事也是我做得不好的地方。当你刚开始做住院医师的时候，吸引你的东西会非常多。比如手术你能搭上手了，作为一个动手的大夫，你的精力就会集中在这个手术怎么做，这一类病该治还是不该治、怎么治上。你会忽视很多人和人沟通的事情。我当时管理一个肺癌脑转移的病人。脑内有多发转移病灶，从肿瘤的分期来看，其实就是中末期，最晚期了。但由于他有颅压高的表现，我们还是选择了其中比较大的一个转移灶做了姑息性的切除手术。术后病人肯定还是非常痛苦。其实从手术本身来说，术后的检查都很正常，没有并发症，我认为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这些

了，所以病人的其他诉求我就会忽略掉。当病人告诉我他全身到处都很难受的时候，我对他说：疾病发展到这个阶段，肯定都会有不舒服。总的来看，脑子里的情况并没有比以前加重。我的意思其实就是：你没有什么再需要我们做的了。说完之后，我并没有太在意。可是病人家属来找我，他并没有用很生气的口吻，只是说：‘其实病人的痛苦我们是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你身上。’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当病人有各种诉求的时候，你单纯从学术的角度来关注其实是不够的。更多的可能是需要安慰和关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可避免地也成为病人，或者成为病人的家属，我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切身感受。”

在病房里，有时候，语言和药物一样重要。马妍记得一个 20 多岁刚刚当妈妈的女病人，手术治疗血管闭塞合并动脉瘤。“她的术后恢复时间比一般的病人都要慢。我和她沟通的时候发现，她丈夫年龄比她小，他们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务都是这个女病人一人包揽的，她爱人没有了她，自己的生活都很难安排。术后，这个病人的情况有一定波动，出现了发烧，短暂的精神异常。这个过程中，只有她丈夫来照顾他。但他没有办法达到应有的照顾水平。这个姑娘总是哭，她丈夫在照顾她的时候老是在看手机，并没有很好地陪伴她。随着她慢慢好转，我们要求她经常起床活动。可是她丈夫不怎么搭手，她坐起来头晕，就更加害怕站起来会摔倒。结果是，她不活动，分泌物排不出来就总是发烧。我跟我们护士也说了这个情况。”一天这个姑娘又发烧了。一个老护士去帮她做口腔护理。老护士一边帮她擦口腔，一边开口了：“婷婷（化名）啊，你要知道，你不能老这样，你的未来只能靠你自己，靠不了别人。你要不自己坐起来，你可能永远坐不起来了。”“就这么两句话。说完之后，婷婷开始掉眼泪，接着就开始努力好好吃东西，试着自己坐起来。不久就康复了。”

医生和病人的交流并不是单向度的，医生也会在空中接受病人和家属的心理暗示。马妍担任过一段时间住院总医生，负责协调各个组的住院出院。于是正在排队入院的患者和家属常常上门来找她。她遇到过非常体贴的病人：“缺血性血管病的病人一般症状不是太严重，经常是老大爷老大妈自己就来了。病人颤颤巍巍来找你，但是他会特别理解你。我遇到过一个老大爷，他看到我在办公室很忙，他甚至不想打扰我，而是给我写一张纸条。”她也遇到过咄咄逼人的家属。“病房病人的周转不是像酒店一样的规律，我

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一个突发急诊的病人进来，那排队等床位的病人可能就会等得比预期更久。当我告诉家属我们只能尽快时，他们会问：什么叫尽快啊？尽快是一周啊，还是一个月啊？我只能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确定的时间，大概得几周，甚至一个月。他们会很不高兴：你怎么一问三不知啊，你的态度有问题。当他们这样指责我的时候，其实也给了我这样一个心理暗示：如果这个病人住进医院来了，我再和他们进一步沟通得有多难！谁还敢收这样的病人！我还遇到过更糟糕的。病人儿子每天拎着一个大铁棒子站在我办公室门口，问我什么时候能住院。有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回我的办公室。这种情况对你的心理暗示又会是什么样呢？”

马妍从事的是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她告诉我，一般来说，缺血性脑血管病就是脑部血管堵塞或者狭窄造成缺血。大多数病人来就诊的时候都接近正常的状态，只要不犯病，可能就和正常人一样。“我们做的是预防性手术，而非治疗性手术。这个和医治肿瘤还不一样。病人和家属一听到肿瘤自然会有一个危险的预期。一个手术下来，即使出现一些功能性的损伤，但是肿瘤被取出来了，病人和家属还是能够理解、认可医生做了工作。但对于我们来说，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患者因为手术出现了功能性的问题，就算我把血管接通畅了，我的工作也没有一点儿意义。因此手术技术只是一方面，对于我们来说，判断什么样的病人该做手术、什么样的不该做更重要。”

治疗方案的确并不是一个完全依靠科学指标的工作，马妍必须考虑到很多综合性因素，而与病人的沟通往往会提供关键性的信息。“比如颈动脉狭窄，治疗的方式有药物、手术、支架三种方式。循证医学的证据显示：支架和手术的短期疗效大致相同，都要优于吃药。但从长期的效果来看，手术要略微优于支架。同样是颈动脉狭窄的病人，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背景，你会把药物、手术、支架三种方式告诉他，最多再告诉他医学的证据，让他自己来选择。但如果医生和病人有很好的沟通的话，你心中会对他的治疗方式有倾向性。这个时候，你才是从他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如一个患者是主持人，他对声音的要求更高的话，我就不会建议他做手术，因为手术引起声音嘶哑的可能性会大。而对于其他职业的人来说，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在马妍看来，病人和医生之间最容易产生的误解是对治疗效果的期望存在巨大差异。“很多人对疾病

不了解时往往认为，做完一个手术，他就可能和正常人一模一样了。我必须根据病人文化水平的不一样，用各种各样的比喻让他明白这个道理。对于文化层次不高的患者，我会说：你不要把做手术想象成修灯泡，电线一搭电灯泡就亮了。”另一种情况是，医生直奔疾病而去，却忘了了解病人的诉求是什么。“病人来了主诉头晕耳鸣的症状，你检查之后发现有血管闭塞的情况。可是血管闭塞和头晕耳鸣有关吗？虽然片子、数据、各种检查的结果是客观的，但我还会问一问病人，你的要求是什么、希望达到什么效果，我看看我能不能、有多大把握帮助你实现。如果医生只是根据检查给病人装了支架，不和病人沟通解释，那么病人的潜在预期就是你治好了我的血管，我的头晕耳鸣也会消失。但当术后醒来，如果发现头晕耳鸣并没有解决的时候，是会非常难受的。”

马妍说，在手术室里，外科医生“就像个孤独的舞者”。“手术中真正在面对一个个体的时候，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一步你都需要靠自己做一个判断和决策。你面对的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压力。”另一种巨大的压力来自手术室外。“你看《实习医生格蕾》里面的一段情节就是住院医生需要学习怎么和家属宣布坏消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语气语调，每一步应该怎么做。这个非常重要。”但比技巧更重要的是原则。“我不愿意撒谎，一个谎言总需要更多谎言去弥补。”

一次，马妍给一位双侧脑血管情况都很差的烟雾病病人手术。“我们判断先给他的左侧做血管搭桥手术。一般的程序是：切开头皮，把血管分离开，然后开颅，把大脑里的血管和我分离好的血管接上，这是我最经常做的工作。”“在手术室里，病人处于全麻状态，我只能看到通过机器上的数据了解他的状态：脉搏、体温、呼吸、血压。这些指标都是正常的。但当我把颅骨取下来时才发现，病人硬脑膜的张力非常高。一般的大脑摸上去应该是柔软的，像豆腐一样。但他的大脑摸上去好像是在摸鼻梁。这意味着脑子里面的压力非常高。我觉得肯定有问题了。”

“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继续我的手术，等到病人回到病房，清醒了以后，再去发现他的问题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颅压长时间处于高位，病人的预后可能非常差。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弄清楚病人脑子里的情况到底是什么，需要做CT。当时CT是没有办法在手术室里做的。这意味着我需要把开着颅、手术做到一半的病人送去CT室。这个时候病人家属就在

手术室外面，我该怎么和他们解释？”马妍承认自己有纠结，“家属会不会怀疑我术中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会不会觉得是我没有能力完成手术？我的助手对我说：要不我们先赶紧把手术做完吧。从医生的角度来说，这样，我们至少完成了我们的工作。”犹豫了几分钟，马妍觉得这样不好。“第一，你要对病人家属撒谎，你可能要和他们说手术很顺利，术中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第二，颅压长时间增高对病人来说是很危险的，如果出了问题，我的手术做得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还有可能丧失了挽救病人的最好机会。”她很快把病人的头皮缝上，用纱布包好，戴着呼吸机，捏着皮球送病人出手术室做CT。

“出去后我对家属坦诚地说了，我发现了颅压高的情况，但我们不知道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我判断脑子比较深的部位有出血。我不能贸然切进去清理血肿，我不知道它在哪里。现在必须要做CT检查。如果没有异常情况，那么我们再回来继续做手术。如果有异常情况，那么手术方案可能就要改。”马妍回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只有他的女婿和爱人在。家属没有任何的异议，对我们也很信任，让我们赶紧去做检查。结果发现，病人对侧脑子里面出了一个很大的血肿。接下来的手术就完全不一样了。”

与家属的有效沟通，有时候对病人的生命安全至关重要。“一个进修医生就告诉我，他遇到一个孩子外伤之后硬膜外血肿，孩子已经很萎靡，陷入嗜睡状态。处理的第一选择肯定是立刻做手术。这位医生和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沟通。可是一家人拿不定主意，害怕孩子会残疾。我告诉这位医生，你如果很客观地和家属说，有可能这样，也有可能那样，他们很难做决定。这个时候，做医生的要有一些担当了，你不能把所有难题都推到病人和家属面前。你就跟家属说一句话：这要是我的孩子，我肯定就做手术！”

相约星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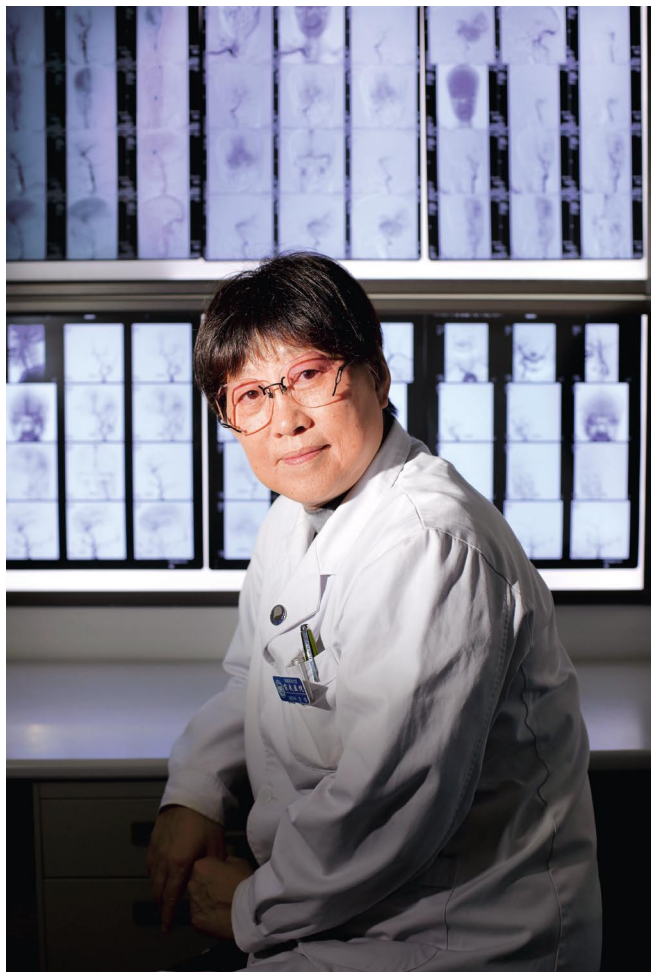
我第一次见到马妍的时候，她站在神经外科多媒体教室的讲台上，台下坐着科室年轻的住院医师。马妍讲的内容和手术、治疗都没关系：《艺术作品里的神经科学》。幻灯片里放的是米开朗琪罗的雕像哀悼基督、西斯廷教堂的天顶壁画和文艺复兴各位大家的绘画作品。马妍分析了这些艺术作品中体现的解剖知识，以及对神经系统疾病的描摹。很快，在鲍遇海的

讲解下，讨论就扩展到艺术史、宗教史上去了。再后来，直接延伸到医学的哲学思考中去了。鲍遇海问住院医师们：“你行医的目的是什么？你做一个手术的意义何在？”

住院医师们沉默了。鲍遇海自问自答：“我们常说：你要对病人负责啊！这句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你们按照手术指征来做手术，要求成功率高。如果你达到了那样的成功率，你就坦然了。这是一个流水线工作的程序。往深里想，我们以现在的眼光看过去1500年盛行的放血疗法，一代又一代的医生做的都是几乎没有收益的负面工作，可以说是在合法合理地杀人。如果500年以后的人回望我们这些医生，我的工作是不是也会得到这样的评判？那我们做工作的价值是什么？什么东西能够支撑你继续做下去。我经常想这个问题，隐隐约约觉得想通了。医学本身存在的价值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寓意。我认为一个医生对医学的爱，是一种朦胧的接近人类真理的体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支持和支撑。医生和病人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他谈到医生的过错。“正确与错误和好、坏没有关系。事实上，医学的错误和正确很难区分界限。一个从学校博士毕业的医生，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执照，神经外科专科医生培训也完成了，但他刚培养出来的，只能做基础性的工作。我快退休了，我做过的工作和他完全不同。同样一个手术，他的死亡率接近90%，我的死亡率接近零。来了一个病人，从法理上来说，他是有权利和资质做这个手术的。病人在手术室里，并不知道我们的情况。这个手术是让他做还是让我做？如果由他来做，病人死亡了。这算不算错误？我是不能责怪这个年轻医生的，因为医生的成长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他没有违法，他也没有不负责任，他只是经验还不够。如果算错误，他到一个经济不发达地区，那里只有他做过这个手术，哪怕只有一例，他就是当地最牛的医生。这种情况又如何评判？医生的错误怎么鉴定？对于医生来说只有两种错误是不能被允许的：不负责任和违反医学伦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行业定了很多规矩，比如24小时到岗、应急措施等规范。事实上，医学的自律要远远高于法律对医学的要求。对于我们来说，你没有做过多少例相关的手术是不能碰这个病人的。”

鲍遇海自然而然地谈到自己的故事。很显然，他已经多次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的这段经历了。他曾经接诊一位老师，其患有前颅底嗅沟脑膜瘤。手术中肿



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

瘤切得很干净，但是术后病人出现了恶性的脑肿胀，没有抢救过来。病人死亡之后，家属非常激动，一度到医院来拉横幅。“这位老师的出事之所以对我的打击如此之大，其本质是它让我形成了自我否定。做手术前我是这么想的：我鲍遇海这么牛，这个手术我只要认真做，还能做死人？结果这位老师就是死了。我回过头查文献，萨米（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WFNS）名誉主席）都有5%的死亡率，我竟然不知道。如果我知道这一点，我应该告诉老师和他的家属：手术会有5%的死亡率，是由于恶性脑肿胀造成，目前医学还没有办法解决。如果我说了这话，老师死了，我不会自责。我没有说是因为我因无知而傲慢。我在帮助别人过程中，我的不完备性给别人造成了震惊和痛苦。这造成了我对自我品格的否定。究根诘底，是在

人与人互帮的过程中，我做得不好，我没有做到对知识的全面把握，和对自己能力的诚实判断。这才是最痛苦的。”

我问鲍遇海：“年轻医生会不会因为经验不足时的过失而难以自拔？”“这是很多外行都会问的一个问题。”他回答：“在整个医学教育和科室文化的传承中，年轻医生或多或少都能够体会到，差错是难以避免的。过去说，医生的成长都是踏着病人的尸体往前走的，确实是如此。我们担心的倒不是新医生陷入自己的错误无法自拔，过度自责，我们更担心的是年轻医生会漠视病人的死亡和伤残。他认为这是医学应有的代价。我总是认为，年轻医生自责得还不够。”

搞这样的对话是神经外科主任凌锋的想法。因为对话在每周二下午5点举行，凌锋把它称作“相约星期二”。谈话的内容五花八门，毫无限制：古陶瓷鉴赏、临终关怀、物种起源的启示、屠呦呦获奖的启发和思考、从医以来最刻骨铭心的事情、旅行风光摄影、人类简史等等。大家常常讨论得热烈，饿着肚子海聊到夜里10点。

除此之外，凌锋会在一个季度组织一次医学人文沙龙。对于住院医生，她要求每人每月必须写一份叙事医学的病历，把它作为医生培养的硬性标准。叙事医学是2001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丽塔·卡蓉提出的概念。她提倡医者把从医过程中正规病历之外的细枝末节、心理过程乃至家属的感受都记录下来，使临床医学更加富有人性和温情，弥合技术与人性的鸿沟，丰富人类对生死、疾苦的理解和认知，也为紧张的医患关系“松绑”。美国六成的医学院已将叙事医学纳入课程体系。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的叙事病历实践已经进行了3年。为什么要做这些？凌锋把住院医生称作“小金砖”。“每个医生都是砌成我们这个医学大厦的一块砖，我们需要通过精致培养把这块砖从土砖铸成金砖。”

人文对话的这个星期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凌锋是从政协委员驻地赶来的。这天，她被跑“两会”的记者问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做医生压力大不大？”“如果说做医生的压力大，那么做消防队员的压力大不大？当兵的战士压力大不大？做医生是在帮助人，帮助人是件快乐的事情，为什么总是要把它描述成一种痛苦的职业呢？”

上世纪60年代，“文革”爆发，凌锋想考入哈军工的梦想破灭。她参军入伍，被分配做一名卫生兵，职责相当于现在的护工。她很快发现，自己能从中获

得很多乐趣。“一次偶然，我帮助一个病人把床头摇高了，病人说摇高之后躺着舒服多了。即使这样一个简单的‘技术’，也能够帮助到病人。从那以后，我经常问病人：您需要摇床吗？为病人做一点事，让我感到被需求，也让我感到快乐。”

1977年，凌锋调到解放军301医院，正式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那时神经外科患者死亡率很高，活下来的患者也大多处于昏迷状态，作为医生束手无策。80年代初，凌锋到法国学习介入神经放射学。1985年，她回国创建了中国首家神经介入中心，建立了介入神经放射学的基本标准和诊治疾病的规范，并摸索建立了一套“双手神经外科医生训练模式”。所谓“双手”，就是培养复合型神经外科医生，既掌握显微神经外科技术，又掌握介入神经放射技术。这在中国和世界上都不多见。2002年，凌锋主持抢救并成功治愈了遭受严重车祸的凤凰卫视女主播刘海若，成为神经外科领域的经典案例。

作为一个在技术上追求精益求精的医生，凌锋并不把技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她坚决反对技术的滥用：“有的患者呼吸困难，血氧饱和度下降，有时是舌根后坠所致。如果改变一下患者的体位，托起下颌，血氧情况可以改善，则不必采取气管插管、切开等更强的干预手段。”“例如脑干海绵状血管瘤手术适应症的问题，很多医师以自己能做这个高风险部位的血管瘤而自豪，很多患者也为自己有这种疾病而惶恐，要求医师给予手术。但我们从文献中发现，该病的自然死亡率仅为3.5%，而即使是具有高超技术的外科医师手术的死亡却也达到8%。人为的干预并不能减少疾病的风险。”

在外界看来，凌锋是医生权利的维护者。2008年，在医患矛盾还没有凸显的时候，凌锋就在政协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医疗环境，制定防止“医院暴力”的法规的提案。2010年，凌锋再次递交关于尽快出台整治“医闹”的“医院治安管理条例”的建议的提案。把医院纳入和商场、车站、码头一样的“公共场所”，由“内保”升级为“安保”；同时建议出台“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根据医暴的程度，该处罚就处罚，该拘留就拘留，该追究刑事责任就追究刑事责任。2014年，她再提案用医德构建医患关系，用法制维护医疗秩序。

但在和我的谈话中，她非常坦率：医生群体也觉得不够。她问我：“你看病的时候，你对医生是什么感觉？你会觉得冰冷。你觉得心里舒服吗？当然不舒

服。因为你现在没有生命攸关的事情，不舒服你也就忍了，但当生命攸关的时候，你忍不了，而你又没办法拒绝，你还不得不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想？你会多纠结？”

凌锋接待过一位母亲。她8岁的儿子得了脑干胶质瘤，属于恶性肿瘤。“她去一家医院排了很长时间队，找了一个技术很好的大牌医生。她问医生这个病应该怎么办。医生说：当然是要手术了。她又问：如果要手术，可能有什么后果？有什么风险？医生回答：‘会死啊，有生命危险。’当时在她眼里，医生的表情看上去是非常鄙视的，好像是在责问她：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就来问我？不到5分钟，医生就把她打发走了。这个妈妈是哭着从诊室里出来的。她说：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有罪，是我生了孩子，让他得了这个病。她觉得极度的无助、自责和内疚。你想想这种感觉，你能感觉到吗？”

“后来这位母亲来找我。我了解了她儿子和她的情况。她是一个舞蹈家，她儿子从小就跳舞，当时街舞已经跳得很好了。她还给我看了孩子跳舞的录像，告诉我孩子的协调能力是多么强，她现在多么不知所措。”凌锋回忆，“我告诉她，谁也不知道这种病的病因，但疾病既然出现了我们总得去面对它。我心里很清楚，这个手术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破坏，就好像从豆腐里取出一个丸子，豆腐必须被劈开。如果这个治疗的结果是会造成孩子立刻瘫痪，甚至更严重的后果的话，我认为孩子现在是不需要接受治疗的，因为他现在并没有受到这个肿瘤的影响。我们可以去观察它。我们等到必须要做手术的时候再做。最起码我们让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这位母亲听完以后说：‘凌医生我就听你的话，我从此以后不再找任何医生了。’过了6年，这孩子正常上学、生活。6年以后慢慢情况不好了，肿瘤已经长大了，而且它是一个囊性的长大，影响了脑脊液的循环，形成了脑积水，影响了肢体活动，颅压也增高了。我和他母亲说，这个时候应该需要做手术。虽然我们不可能把肿瘤完全切干净，但这个时候的手术可以很明显地改善他目前的状态，而且风险不会太大。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孩子确实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到现在又过了两年了，情况还是不错的。”

“很多的医生是只治病不治人。如果你不治人，这个病的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当病人不可避免地面对疾病的时候，你不要让他陷入无助。很多时候，与病人沟通不好，心里是埋着‘结块’的。他不得已接受你给他的手术安排，一旦手术的情况不好，他就会怀

疑你甚至去告你。如果医生和病人的沟通是顺畅的，达成了信任和共识，大家都理解治疗的客观性，医患关系就不会走到这一步。法制是一个方面，是对外的，医生需要内修。”

凌锋反反复复和我强调，医学既不是拯救也不是再造，医学的本真，是用医生的良心，加上技术，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医生的帮助需要到哪一步？

一位女患者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自己做三叉神经痛手术时的经历：“手术车刚把我推回病房，凌主任就兴冲冲地过来看我，当她一见我的头被剃光了，霎时间目光黯淡，情绪凝重了下来，并很是不快地问道：你们给丁老师剃光了头，是否征求了她的意见？虽然梁大夫在说：征求了，征求了。我也马上声明：不关大夫的事！不关大夫的事！梁大夫几次让我慎重考虑，并说他都有点舍不得把我的头发剃了，是我自己坚持要剃光的，是我……可是她根本就听不进去，仍然不依不饶，她的心里还在想着，口中低声地说着：对女患者的头发，我们可要慎之又慎。”

开颅手术不剃光头，只对手术部位进行处理，凌锋绝不认为这是“小题大做”：“这一点点事情我讲了快有10年了。我们很多的医生就是习惯性的。而病人的逆来顺受也是形成习惯了：做手术怎么能不剃头发呢？他们的心理上剃头发已经成预期了。剃光头对女病人的心理就是一个打击，让你羞于见人，无法开展社交。你从人的生活质量来看，一个手术做完了，几天以后，病人洗完头梳梳辫子就出院了，仍和以前一样，这不是很好的一个追求吗？只是你从来不敢想象而已。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是怎么好都不为过的。一个医生应该尽量满足病人恢复正常生活，获得好的生活质量和体验的需求。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你没病的时候你体会不到，所以我们让医生写叙事病历，是让他们在这种写作中学会体验。换位思考说着容易，但你很难站到那个位置去。”

病人坐轮椅的时候，你需要半蹲着和他说话。进病房必须要敲敲门，需要向病人介绍自己。凌锋说：“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住院医生陆夏告诉我：“凌主任要求我们在ICU对病人做任何操作的时候，都要先告诉病人你将要做什么，哪怕病人处于昏迷的状态。她说这是尊重病人。确实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有一个昏迷的病人后来醒过来，他特别感谢护士，说他之前虽然睁不开眼睛，但是护士对他说的话他都能听到。”

“我刚到医院的时候就感觉到凌主任有绝活，最佩服的就是她和病人的沟通。”陆夏说，“我当时管理一个病人，十几岁的男孩，篮球打得特别好，学习成绩也好，得了脊髓肿瘤，一下子胸部以下全部瘫痪了。最早他满怀希望来做手术，但手术并没能救他。这样的事情放到我身上我肯定接受不了。我想和他说鼓励的话又怕刺激到他。我记得凌大夫当时话不多，但意思都说到了：她既告诉了病人非常残酷的现实——他的寿命不会长，也没有办法改变瘫痪的状态，又给他激励。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看到病人的眼睛里一下子就有了光。还有一次出诊看病人，一个脑死亡病人的家属来找她，请她帮忙鉴定，还有没有救治的可能。凌大夫和家属交流，很快能够让他们接受抢救没有意义的现实，而且她谈到器官捐献，过渡得自然而然，家属当时就接受了。”

在凌锋看来：“医生要有非常好的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你才能和病人达成共识和一致。”这是可以习得的吗？“我和你说坐下来，握着对方的手，看着对方的眼睛，这些都不是实质。做好和患者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将心比心。作为医生，你首先必须有对病情的驾驭，对疾病的发展有清醒的预估。在这个基础上，真实地和患者交流。”凌锋发现，很多医生不愿意告诉病人残酷的现实。她去给舞蹈演员、在奥运会彩排中摔伤，导致腰椎骨折粉碎性骨折的刘岩会诊。“所有人都在回避事实。当时的诊断已经非常确切，医学证据显示她已经不可能站起来了，但是大家都对她说：我们在尽力，还在寻找更好的办法。”凌锋和刘岩谈，并不避讳这一点。“我说：‘刘岩，你可能一辈子都要生活在轮椅上了。’——刘岩后来和我说，她最初听到我说这句话时内心里是很抵触的，可是我必须帮助她认清和接受现实。她越接受得早，越容易早日进入正常的生活状态。”她接着说：“但是人之所以和其他生物不一样，是因为有健全的大脑，这才是人活在世界上精彩的地方。而腿只是一个代步工具，用轮椅代步、汽车代步并没有本质不同。我发现你的上肢活动特别美，你能够用它来表达内心的想法，表达你自己，你以后还可以跳轮椅上的芭蕾，你还有大脑，还能够学习。”凌锋感到，刘岩听进了自己的一番话。后来刘岩成了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开的第一门课是《中国古典舞手部动作与印度古典舞手部动作比较研究》。她研究了中国聋人的手语、佛教手印、京剧以及梨园戏手部动作等三大体系，开辟了我国舞蹈研究的一个全新方向。她也确实在轮椅上跳起了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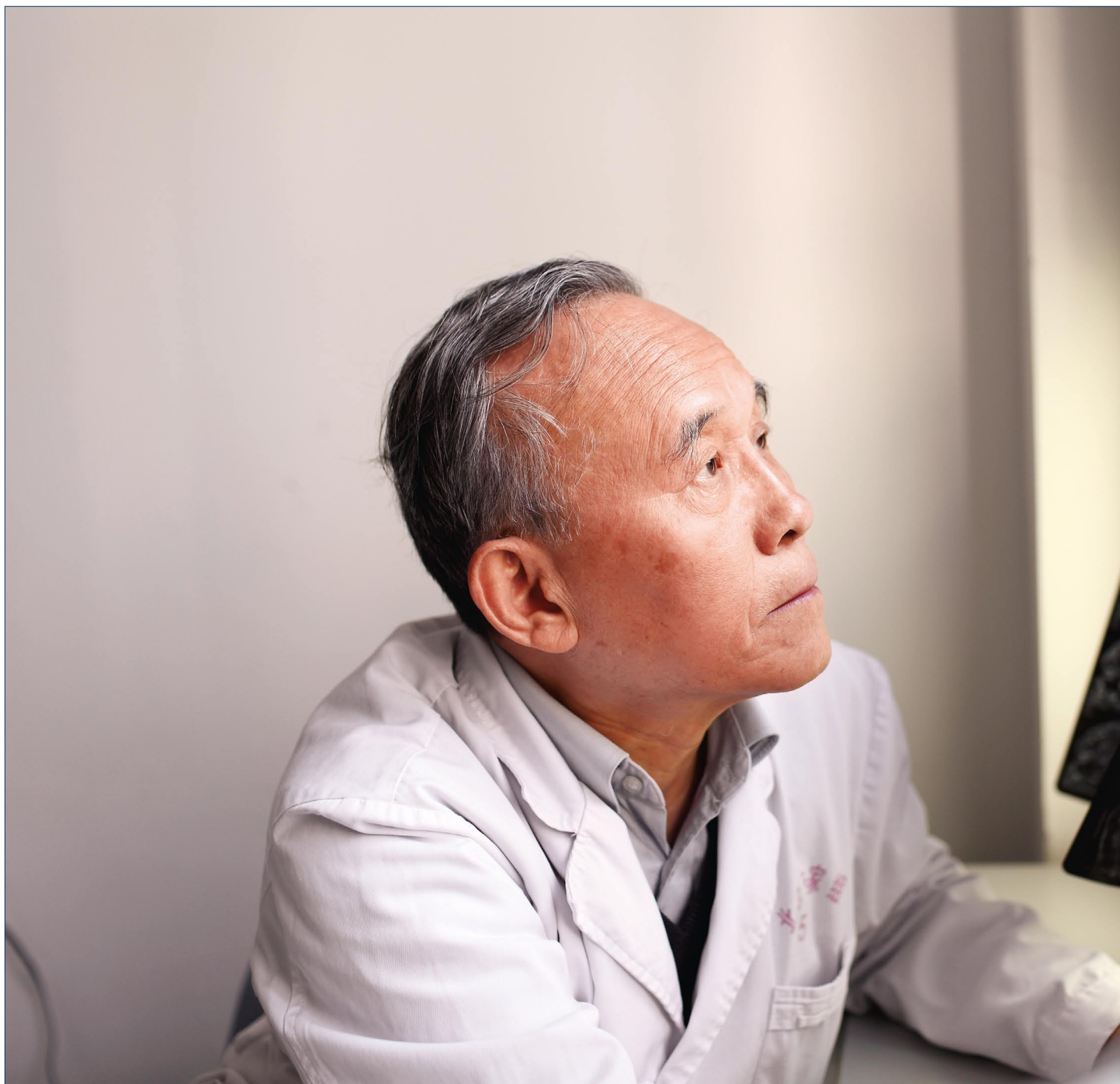
别跟我谈梦想 对兴趣就值得上

350万高薪职位快速反馈，有投必应
zhaopin.com



下载智联招聘APP
快速反馈，有投必应
010-586358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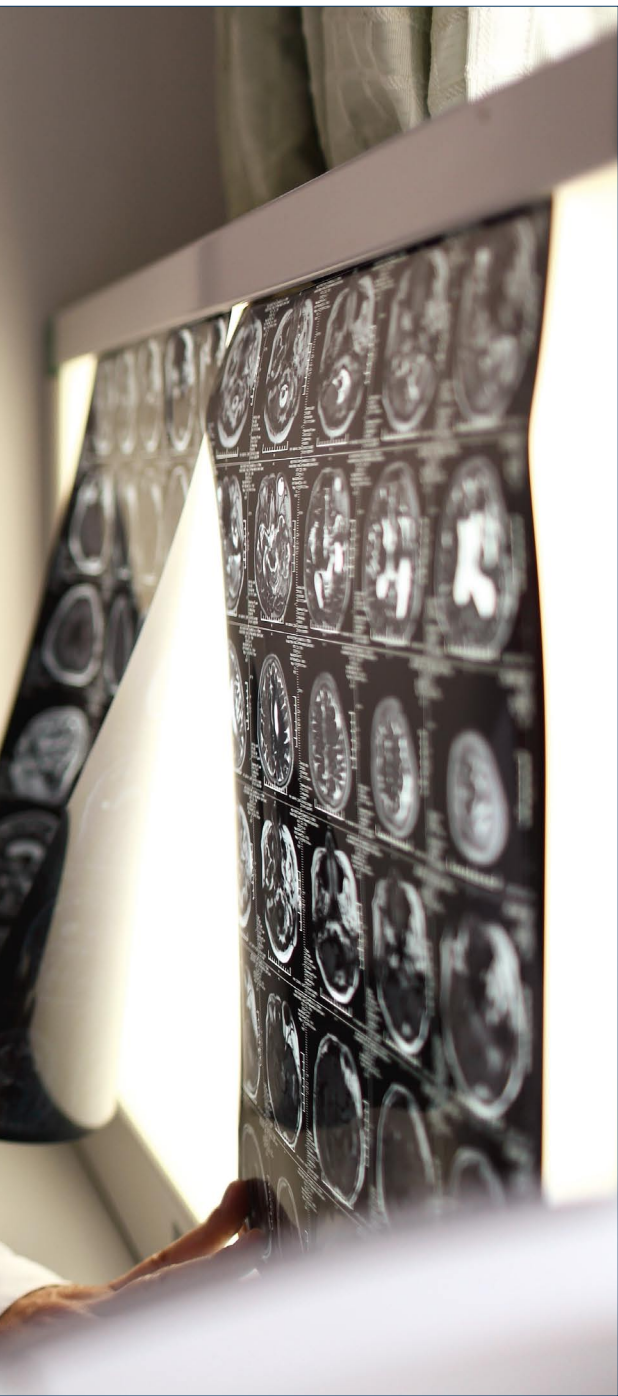
燃青春
趁现在



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专家刘端祺

刘端祺：医者的角色与艺术

文 / 吴琪



(黄宇摄)

医术之上，如何看待生死，对医生与患者，这都是重大课题。

72岁的刘端祺是关注死亡较多的医生之一，从20多岁在艰苦的西北地区行医，到1997年着手创立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他和同事们送走过各式各样的病人。他说行医越久，自己对医学局限性的认识越深刻，常常能触摸到医学的边界。

作为多年的“死亡阅读者”，刘端祺慢慢领悟到，死亡是一种伟大的平等，死亡也是一个伟大的教师。死亡不是医学无奈的失败，而是人们回归生命本源的自然过程。和许多年纪渐长的医生一样，刘端祺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对医疗技术的进步孜孜以求。他开始理解，为什么前辈医学家们以及他的许多老师，晚年不约而同地更愿意进行医学本源的探讨和医学人文的思考。他们不断提醒年轻的同行，不要陷入匠人思维，而忘记抽离出来体味医学的最终目的——如何体面地照顾人的生老病死。无论是医者还是病患，既然能喜悦地迎接生，也可以从容地应对死。他渐渐成为这个理念的传播者：医术总有无能为力之时，而观念和情感可以让人们在医技的绝处，学会优雅地转身。

出诊的艺术

3月14日明晃晃的早晨，北京的倒春寒行将结束，太阳一大早就出来烘烤，仍然穿着羽绒服的人们开始感觉到暖意。街上活动的人变得多了，刘端祺的诊室外也比天冷时热闹。从早上8点开始，他穿着白大褂坐在诊室里，神色舒缓地等待着病人进来。顶着一头白发，刘端祺喜欢笑，一笑眼睛就眯缝起来，抿着的嘴角往上拉出一根弧线，让旁人也感到放松。

退休后，刘端祺只有每周一上午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出门诊，5天前我获得了他的同意，可以观摩今天的门诊。这位老教授给我和摄影记者准备了两把木凳，靠近门边的一角，这样我们既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他的表情，又不会看到病人的正脸。他与我们约法三章，不要拍摄病人的正脸，也不要记录他们的名字，不要

让病人和家属感到任何的不舒适。几乎每进来一个病人，他都会告知有记者在场，以尊重他们的知情权。

这天一大早来看病的，是一对来自北京郊区密云的中年夫妻。45岁的妻子快言快语，嗓门也大：“您快给我看看，我是不是得了乳腺癌？我成天都在愁这个，从过年前就吃不好睡不好。”

刘端祺打开一旁的看片灯，摘下眼镜，脸凑近病人刚才递过来的几张X光片，好似要嗅出它们的味道。回过头来他嘴角已经有了笑意，说：“你感到不舒服了吗？”

女子说：“我乳腺增生啊，疙瘩越来越多，摸着摸着又长了。”

刘端祺笑了：“你乳腺增生的时间越长、数量越多，我越放心。这种情况得癌的可能性反而小。你摸摸自己的嘴唇，再摸摸鼻尖，然后摸摸脑门。这三个地方的软硬度不一样吧？你现在的一些疙瘩只是像嘴唇和鼻尖一样柔软，现在不用管它。如果有的疙瘩迅速长大，质地像脑门这么硬，就应该引起重视了。”

女子：“那这次再给我拍个片子看看吧。”

刘端祺说：“你上次的片子是10个月前拍的，你这种情况一年半到两年拍一次就可以了。今天别拍片子了。”

女子：“我4点半就从密云大山里出发了，好不容易来一趟。您不给我拍个片子？”

刘端祺：“你要是再年轻十来岁，我连两年拍一次片子的建议也不会给。X线‘吃’多了对身体有害。”

女子：“吃什么多了？”

刘端祺：“‘吃’是打比方，身体照X射线多了容易诱发癌症，不要过度检查。”

女子好奇地问：“那我就这么养着，等着得癌？”她觉得自己好像白跑了一趟，没有再得到一次机器的检查，而只是讨来老教授的几句话。

刘端祺笑着问她是干什么职业的。女子说家里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种地为生。“那你周围是不是有人得乳腺癌了？”“是啊，我周围好几个人得了乳腺癌，我从2012年起就到处检查，生怕查得不全。”

刘端祺仍旧笑眯眯，他放下手里的片子，完全转过身正面对着病人，让病人感觉到医生把所有注意力放到了她身上：“你作为农民能有这样的防癌意识，我要好好表扬你，你还是挺有知识的，以前拍过的片子也保存得很好。但是你不要过分害怕，真正得癌的人还是极少数。如果短期内有一个疙瘩突然变硬了，

你再来找我，越长越多反而不用担心。你生孩子了吗？自己喂奶吗？”

女子说有两个孩子，都是自己喂的。刘端祺提高了声调：“那不错，你比城市里晚婚的、没法给孩子喂奶的人安全多了。咱们共同观察你的乳腺增生，等待也是一种方法，回去不要再担心了。”女子有些不甘心，但觉得老教授说的也有道理，她收拾好袋子，好像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停顿了一会儿，还是离开了。

等这对夫妻出门后，刘端祺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嘱咐她要注意什么吗？一般人我会说，回去后注意锻炼身体，少吃高脂食物。可她是一个种田的农民，劳动量不小，你还让人家锻炼身体，这不是无的放矢吗？她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民，不会舍得多吃肉，如果我还嘱咐她少吃肉，那不是让人家营养不良吗？所以我什么都不用说，就可以了。”

这时进来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小伙子，瘦瘦的身材，左手臂夹着一个斜挎包。他想做全身检查，要求查得尽可能全面一些，还专门提到有的朋友建议他查查胃镜和血里的肿瘤标志物。刘端祺按照他的要求，让实习医生开了检查肿瘤标志物、血常规、血象、胃镜等一系列单子，并且嘱咐他：“做检查不如戒烟，你一根烟也不要抽了，酒也要少喝。”等到这位小伙子离开，刘端祺告诉我，他的爸爸一年前因肺癌去世，正是刘端祺给病人治疗的。小伙子家境富裕，怕自己容易得癌，决定自费做个防癌体检。“现在人们的意识比以前进步多了，不少人愿意自己出钱来检查身体，有些癌症的遗传倾向比较明显，比如大肠癌、乳腺癌，尤其要警惕。所以，小伙子愿意检查身体，我挺赞同的。”

话刚说着，突然冲进来一个衣着时尚的中年女子，神情紧张，快速而低声地对着刘端祺和他旁边的实习大夫说：“我挂的是5号，等会儿别跟病人说实情啊，他还什么都不知道。记住了啊，我挂的是5号。”

刘端祺问：“得的是什么病？”

女子说：“肺癌，家属把病人藏在楼下呢，怕他看到了这里‘肿瘤科’几个字。我刚才跟病人编了半天，说他是得了肺炎。我也跟他家里人说，你们那个地方的观念不行，不是只有癌症才死人，感冒弄不好也是能死人的，你们就别瞒着病人了。可是家里人不忍心说啊。”这位女子认识刘教授，这次是介绍一个外地朋友来看病。

等到5号病人进来时，刘端祺问了问病人哪里不



医学是个求真求实的学科，医生一定不要在自己不精通的领域说“过头话”。



舒服，看了片子后，问他是否愿意住院检查。等病人出门了，刘端祺跟家属说：“得给病人下点毛毛雨了，我从他的表情能看出来，他十之八九已经猜到病情了。他的肿瘤离大血管太近，和胸膜粘连也挺多的，做手术风险大，不如先通过放疗化疗缩小肿瘤，再争取手术机会。”

紧接着，另一家人涌进了门诊。一个穿着深色夹克、背挺得直直的男子坐了下来，家人围绕在周围。男子说：“我58岁了，半年前因为肝癌做了手术，肝切掉了一半，还做了氩氦刀介入治疗，但是最近发现癌灶又转移到肺了。”刘端祺详细询问了病情，又看了片子，询问病人有什么想法。

病人说：“好医院我们差不多去了个遍，301医院、302医院、北京的两所肿瘤医院，他们有的建议我做伽马刀、有的让我吃新型的靶向药物索拉非尼，也有的建议我吃中药。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治疗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刘端祺看着病人，和缓地说：“你这个病啊，大家公认的经典疗法，你都做过了，剩下的治疗手段全是带有实验性质的。可以说成熟的方法你已经享受了，那是之前病人的贡献，10年前的病人就没有你今天能选择的方法多。接下来可能是你给别人做贡献了，如果你能从中受益当然是最好，但也有可能你钱花了、忍受痛苦了还没有效果，甚至病情更严重了。”

病人点点头：“从坏处想的话，我还能活多久？”他顿了顿，声音好像突然掉进了一个空洞里。“您告诉我实情吧，我不怕。”

刘端祺放下手里的所有东西，看着病人的眼睛，不紧不慢地说：“那是算命先生干的事情。我以前说过某个病人只能活3年，结果人家13年后还来找我呢。”

病人笑了，压抑的气氛瞬间缓和了一些。刘端祺问：“你们从哪里来北京看病的？”病人说，家在山西。“你们一家子都来啦？这是老伴吧，这是儿子，这是女儿？”病人点头。刘端祺说：“你看，多好的一家人。你能正视自己的病情，比较豁达，我觉得你肯定是个注重学习的人，文化理念不会差。回山西去吧，让当地医生给你调养一下，不要到最后人财两空。靶向药物只对一部分人有效，药物效果的各种折扣打下来，也许在你身上只能起到10%~20%的作用。以你现在的状况，大约要花费几十万，换来的只是有限的时间，你们还是好好考虑一下。不要生命不息，放疗化疗不

止。”

他转过头问病人的儿子：“你喝酒吗？”年轻人说：“有时候喝一点。”老教授嘱咐：“别喝了，你看看你爸爸，你们家的基因对酒的耐受能力不好，你现在起就别喝大酒了。”

病人呆坐着，没有要离去的意思，家属们也总想让眼前的“判官”再说几句。

刘端祺缓缓地说：“我并不是北京最高明的医生，但在这病上，谁也不比谁高明。你们一出这医院门口，就会有大量递小广告的人涌上来，你们也别信那些。中药可以吃，但是如果一服药好几百，一个月要几千上万块钱，这就成骗人的了。传统中药很贴近百姓，都不太贵，太贵了别相信。回家里去吧，多活一天就当多赚一天，每天早上起来高高兴兴的。我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应该明白了。”

终于，病人的儿子接过话头儿：“我们看了这么多大夫，还是您说得最明白。”

刘端祺说：“多亏了我这头白发啊，老大夫这么一说，你们能接受，如果年轻医生说一个病人没救了，人家还不给闹起来？老百姓愿意到北京大医院看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医生不忽悠，不愿意让病人多花钱。”他又轻声地看着病人说：“早点回家安排一下生活吧，别在北京到处颠簸了，哪有自己家舒服。”

病人站了起来，这沉重而关切的嘱咐，似乎说了他的心意。一家人表示了感谢，相拥着走了出去。

刘端祺又接诊了几个病人，大多数是子女带着片子来，病人自身没有过来，有的还是刘端祺曾经的学生从外地推荐来的。刘端祺嘱咐家属：“可以给当地医生提提我的建议，但不要认为我是北京的医生，我就一定是对的，毕竟我没有看到病人本身。也不要多提我作为北京医生和老师的想法，以免给当地医生的治疗带来压力。”

有一位家属带着老母亲的片子来看病，老人家2006年就得了脑膜瘤，在天坛医院做过一次手术，现在复发了，瘤细胞侵犯到了脑干上，体积不小。刘端祺说，脑膜瘤是良性肿瘤，但脑干是生命中枢，肿瘤长到这个敏感部位，就带来了恶性结果。“病人已经做过一次手术了，天坛医院在脑科手术上是有世界性名声的，医生已经把能切除的肿瘤都切了。可这第二次手术就不好做了，留下的是个‘难剃的头’，手术一旦不慎，有可能导致死亡。”

刘端祺建议病人还是去天坛医院治疗，毕竟自己



(黄显强)

除了技术的治疗，医护人员有时也需要给予病人生活护理

对脑瘤没有神经外科医生内行。病人儿子说：“我们现在听说了伽马刀、质子刀、射波刀，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元，您给我们说说，哪个更高级呢？”刘端祺回答说，面对具体患者，各种“刀”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适宜之别，更不是越贵的越好，只能说哪种方法最对症。“我可以说说我知道的情况，但是现在技术变化非常快，也许我的知识已经不全面了，你们也得从其他渠道了解。”

待病人家属出去后，刘端祺对我说，医学是个求真务实的学科，医生一定不要在自己不精通的领域说“过头话”。

一个上午过得很快，刘端祺看了十几个病人，从诊室出来后，老教授问我：“你发现没有，我一张处方也没开。”确实，除了给那个30出头的小伙子开了一些体检单，他只是给一些外地病人写了些治疗和用药的建议，让他们回居住地治疗。刘端祺说，他的病

人大多数辗转就医，已经进行过许多治疗，多数人钱花得差不多了，经济状况不好是普遍情况，作为专家门诊，病人经常不是冲着开药来找他的。很多癌症终末期病人治疗遇到了瓶颈，希望他能够给出建议；另外他近年来一直在推广缓和姑息医疗的理念。“年纪越大的医生，对于治疗反而越慎重。病人不只是器官的组合，我们要注重他们的整体感受，除了关注病人的躯体，也要兼顾他们的生活状态、经济状况、心理活动等等。我完全可以给终末期病人开上一堆药物治疗，但是如果病人的抗癌治疗已经无效，这样折腾着离世，并不值得提倡。”

医学介入下的死亡

刘端祺说，到了他这个年纪的老医生们，几乎都认识到，自己做得再好，也只是带领一个团队建立起

一个手工作坊，能救治的病人总是有限的。老医生们在意识到医学的局限后，更希望在反思中寻找医学真正的目的，避免走向技术至上的极端。这种对医学“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也是他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慢慢领悟到的。

大学毕业后，23岁的刘端祺在河西走廊和甘肃南部的藏、回等少数民族地区行医整整10年。那是“文革”期间，抱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和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忌讳说癌症是“不治之症”，转而在“难治之症”、“疑难杂症”的说法。甘肃南部条件艰苦，缺医少药，刘端祺和同事们既要给阑尾切除手术，也要接生、接骨头、做眼科手术。下基层的时候，他发现在甘肃临夏农村，天气一转暖就流行中毒性痢疾，孩子一拨拨地死亡，有时候几乎家家传出呼天抢地的哭声。他们在调查后发现，农民们堆肥后将粪肥四处撒落施肥，调皮的孩子们玩耍时将粪肥带得到处都是，传播了疾病。还有的农村妇女为了干农活方便，用布带将婴儿牢牢捆在身上，结果造成孩子下肢坏死。“我那个时候就深深意识到，医学绝对不是医生单方面的事情，它与老百姓的文化程度、认知、观念习俗紧密相关。”

刘端祺在这些地方经历了不少病人的离去，经常服务于临终患者。他既目睹过弥漫着超度逝者灵魂诵经声的藏传佛教拉卜楞寺里的死亡，也目睹过穆斯林们静穆的葬礼，很少看到亲人悲痛哭嚎。“我惊讶地看到，不同民族乃至同一民族的不同群体，对生命的逝去竟然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很受震撼。”一开始，他琢磨着是不是这些地方条件艰苦，自然的力量太过强大，人们对生老病死变得麻木。但当他看到丈夫对患病妻子、父母对患病孩子极为深厚细腻的爱，又意识到先前的判断不对。他觉得是不同的生死观，使当地人在亲人活着时十分珍惜，在亲人去世后又不会过于哀凄和牵挂。他认为除了宗教信仰外，边疆人们的生活条件离自然更近，也更愿意服从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更重视“活在当下”。

1978年，刘端祺考取了“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重回母校第四军医大学学习，重点研究胃癌的诊疗。他毕业后在北京当了消化内科的大夫，从而接触到大量的消化道癌病人。当时医学的思路是，把抢救意外死亡的心肺复苏常规和护理模式“移植”到临终处置。死亡来临时，医生关注着病人躯体是否维持酸碱平衡，呼吸机是否正常运作，盯着生命指征的监测，最后病人在各种插管和抢救仪器中离世，连和亲人道别的机会都没有。医生们不自觉地沉浸在技术升级带来的“进

步”中，忘却了死亡本应是一场凝重悲情、温馨而又私密的亲人间的道别。

刘端祺眼见着医学对付肿瘤的办法多了起来，从放疗化疗到各种药物，可是一个老同学在离世前给他发来邮件说：“自从得了肿瘤，我的人格尊严丧失殆尽，没有了性别，没有了长幼，没有了自尊，在医护的眼里，我就是能够喘气的瘤子。”病人的生命得到了延长，但是各种治疗手段的严重副反应，让一些病人埋怨，治疗延长的是受罪的时间，最终还是得痛苦离世。

呼吸机似乎也成了抢救病人的标准配置。刘端祺说，上世纪60年代呼吸机出现时，被看作医学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呼吸机对于严重的心脏病、溺水、雷击、一氧化碳中毒等病人特别有用，只要病人的主要脏器没有严重损毁，呼吸机可以让这些病人活过来，完全恢复健康。

当时他和同学们在医院里实习，最经常的一个工作就是“捏皮球”。因为早期的呼吸机得手工操作，双手握着一个篮球般大小的皮球，通过挤压皮球来带动病人的呼吸。有时候一晚上就得几个人轮着捏皮球，“那时候呼吸机体现的是救死扶伤，这是医学的本来目的”。

但是二三十年之后，先进的自动呼吸机被大量地用在了临终病人身上。医生在患者的躯体功能已经衰竭时，需要切开病人的气管插上呼吸机。有些临终病人其实已经脑死亡，但插上呼吸机可以好几年不断气，可是这个人实际上跟植物人已经没有区别了。刘端祺感叹：“患者的生死被控制在了一台机器的电源插销里。临终的病床上演着机器秀、技术秀、医学秀，病人已与大白鼠无异，医学介入下的死亡被异化了。”

年轻时的记忆会时时出现在刘端祺的脑海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比大城市的人离医学更远，可是那儿人们对死亡的顺从和豁达，在医疗器械泛滥的年代里，反而显得更加珍贵。眼见逝者成了医院规范作业流水线上的物件，刘端祺隐隐觉得医学正在背离救死扶伤的初衷。“我看到太多终末期患者的家庭，不仅人财两空，离世的人走得很痛苦，活着的人也受到非常大的心理创伤。”

刘端祺的感受其实也是不少同行的经验。20世纪的医学，在生物探索与服务方面已经做了太多的努力，但是社会与公众非但不感激反而抱怨，责难越来越强烈，医学正陷入一个怪圈。1977年，美国精神病学和内科教授乔治·恩格尔在《科学》杂志上呼吁，应该刷新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生物—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刘端祺也成为国内缓和姑息医疗的提倡者。“技术治疗方面，我们往往在病人身上做得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但是对病人的情感和精神上的关注，又远远不够。”

1984年中国抗癌协会成立时，39岁的刘端祺是最年轻的成员，后来又担任了北京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那时，关注肿瘤康复与姑息的人还不多，“姑息治疗”这个词，听上去显得太没劲了，更何况又紧接着关联到死亡。医生很容易陷入技术思维，得把切下来的瘤子拿给病人、家属、领导、媒体看，他们愿意拿CT/MR/PET-CT证明一下，病人的病灶确实小了、没了。这样带来一种看上去“立竿见影”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此找到医学和医生存在的价值。

刘端祺说，有时候他在医院里碰见外科医生，说起某个病人，外科医生才惊觉：“那个手术病人跑到你们肿瘤科去了啊。”外科医生做完手术后，病人出院，他们往往认为病人恢复了。但是殊不知，等到病人再次发病，很可能就住到肿瘤科病房去了。“我不是说外科医生不好，他们非常辛苦，也非常敬业。但是我们目前的医学思路，把病人的疾病给片段化了，每个科室只看到疾病的一个表现或一个阶段，难以把病人当一个动态的整体来对待。”

刘端祺虽然倡导姑息治疗，但在推广他的理念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热情，而是有一种万物化于无形的轻巧和自然。在1997年创建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时，刘端祺没有给科室购置呼吸机。科室里的医生们意识到呼吸机的非人道主义，即使家属要求，也会耐心讲解，为什么最好不要给癌症的终末期病人使用。刘端祺认为，康复姑息和临终关怀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医学为了什么”、“为了谁”的根本问题。康复姑息、临终关怀事关肿瘤患者的“优生”，也关系到“优逝”，送人临终和迎接新生命一样，都可以是全家人分享正面意义体验的机会，并非只有悲伤、痛苦和失落。对于科室里的终末期病人，他会告诉家属和病人，减轻痛苦并改善生活质量，应该比单纯延长生命时间更重要。所以他们非常重视用吗啡常规缓解终末期患者的呼吸困难，对终末期缺氧患者不做气管切开，重视糖皮质激素的广泛应用，对“食欲不振”终末期肿瘤病人不进行所谓营养支持治疗，满足病人及其家属灵性的需求。

临床治疗癌症这些年后，刘端祺更加感受到预防癌症的重要性。“太多病人将一生大部分的诊疗费花

在了人生的最后一年，这一年里又以临终一周的花费最大。可是预防癌症花费1元钱，就能抵消治疗费用里的99元。”

刘端祺给我讲述了史书上记载的一个故事。扁鹊一家三兄弟都行医，扁鹊对魏王说过：长兄医术最高，能防范疫病；二哥医术次之，能治初起之疾；而自己居末位，只能治疗病笃之病。“作为当时的医学大家，扁鹊的这番话应当不完全是自谦之词。他的兄长能够防范疾病、治疗初始之病，可是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声。扁鹊这样治疗重症的容易被人们看作‘神医’。疾病的预防工作，不显山不露水，没有多少惊心动魄的场面，连医生自己都觉得‘不过瘾’。”

由于不重视早期的防治，刘端祺说我国的肿瘤防治出现了不合理的“枣核”形局面：两头“尖”——轻预防，轻晚期临终关怀；中间臃肿——为数不多的肿瘤专科医生精力和资金投入的主要服务对象，多数是送上门的住院患者，而且是生存期有限的中晚期患者。中国的贫困家庭有41%是因病致贫的，而癌症中有70%是肺癌、乳腺癌和消化系统癌症。刘端祺认为医疗主管部门应该把现有闲置的医疗资源集中起来，在全国试点专病医院，针对发病率特别高的癌症，凡是符合一定诊断标准的，专病医院集中起来免费治疗。“这样能促进针对这些多发癌症的治疗和科研突飞猛进，实际上能节省大量的医疗资源和国家资金投入。”

医生的气质与角色

刘端祺和老伴都是医生，但是唯一的儿子没有学医。我们聊到这点时，刘端祺脱口而出：“我儿子不具备医生的气质，他从小喜欢下棋，逻辑思维好，喜欢摆弄的是电脑和工程器械类的东西，更适合当工程师。”医生的气质？我感到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说法，便问老教授：“那您觉得医生有什么样的气质呢？”

刘端祺说：第一，医生要有悲悯心，这种悲悯可以是天生的，也可以是后天培养的。第二，医生要耐心细致。第三，医生应该是好脾气，不能颐指气使。医学很大程度上是门沟通的学问。第四，医生要敢于担当，要善断。他强调，医生除了科学精神，同时需要具有人文精神，医学是一门对人要求非常高的学科，医生也是比一般职业要求更高的职业。

“我上医学院的时候，老师们基本上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毕业的医学生。老师们回忆说，那时候医学院严格执行‘宽进严出’的准则，学生的淘汰率相

当高。”有一个老师说他们开学的时候有 30 多人，最后能够毕业的只有 12 人。一方面是当时国家不安定，医学院读书课业繁重，非常辛苦，得结核病的学生不少。另外考试标准非常严格，差一分都不能毕业。那些没有顺利毕业的学生，只能当医生助理，或者是做做开药店方面的工作。中医的学徒出师也非常艰难，帮师傅做家务活三年、在药店打杂三年、抄方子三年，最后能出师的也不过十之一二。“美国的医学教育也跟一般学科不一样，学生本科毕业后才能学医，我越来越觉得这种制度有道理，学哲学的、学历史的、学音乐的、学工程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再去学医，这时候的医学生 20 出头了，又具备了四年综合大学里的修养，可谓身心都成熟了。他们如果选择学医，对于医生应该具备的利他主义、人文修养，有了更明确的认知。”

在优秀的医生眼里，病人是一个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人，而非一个病灶、一个瘤子。刘端祺说，医生要做到“目中有瘤，心中有入”。哪怕瘤子已经全身转移，医生应该首先关注的还是这个病人，从内心同情这个不幸被肿瘤所侵袭的人，包括病人对自己所患疾病的心理感受。他的肉身正在经受病痛的折磨，他有着与健康人不同的精神需求，而不能把他看成是一个瘤子的载体。医生的素养是病人能看见、能感受到的。刘端祺说：“从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交换的眼神、言谈举止、举手投足、治疗方案的确定都体现出医者的素质。病人对不同的医生常有不同的感受，不同医生的治疗理念，完全可能造成患者几乎完全不同的结局。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医生应该保障病人充分而又适当的诊疗；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也要努力去温暖他们的心灵。”

行医 40 多年后，刘端祺说，年纪越大的医生越容易偏向于保守，决策的速度也更慢。老医生不仅看到了每一个方案的积极方面，也会看到它们各自的弊端。这样的好处是老医生能把方案给病人讲得特别清楚，但从不好的方面来说，也给病人和家属设置了更多的顾虑。治疗并不是简单地照方抓药，这就像大厨之间的区别一样，同样的食材，同样的调味料，也得“见人下菜碟”。前些年，他也曾醉心于循证医学，但是循证医学讲究的是概率，按照对大多数人有效的方式来制定准则，他注意到，循证医学是一种不完美的存在。现在他更关注“循效”，即病人是不是得到了医学上的实惠，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疗效。这种理念将医生和病人一一对应起来。“医生就是你，病人就是他，

如何做合格的病人？

几乎每个人都有上医院的经历，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看病”。在刘端祺眼里，如何做病人也是门学问，他觉得合格的病人最好做到下边这几点。

第一，要真实地说出自己的情况

有些病人会歪曲自己的病情，“一下子就把医生带到沟里去了”。这种不真实，有时候是因为病人的虚荣心，比如一开口就说自己经济上不错，有什么好药尽管开。可是等医生开好药方，病人又会吞吞吐吐、犹犹豫豫，实际上是觉得这些药自己承受不起。有些病人主观上没有故意作假，但是在认知观上出现很多误区，自己都分不清哪些是本人真实的感受，哪些是通过其他渠道听来的消息。

第二，好病人不要抱怨

刘端祺说他见过很多乳腺癌病人抱怨丈夫对自己不够好，说“他要真关心我，我能得这病？”男病人就容易抱怨领导不好，认为领导给的压力让自己得了病。“可是如果一个病人来看病，开口就抱怨社会、抱怨家庭、抱怨工作，全是负能量，对自己的病情肯定不好，把医生当作负面情绪的倾倒箱，对治疗也并没有益处。”

第三，建议病人不要以互联网上的信息为治病的标准

有时候刘端祺会碰到病人说：“您说的怎么和百度上说的不一样啊。”刘端祺会“幽一下默”说：“我姓刘，不姓百，据我了解，姓百的度医生并没有受过专门的医学训练。”刘端祺说，他这样解释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又不会和病人发生冲突。

第四，病人应该知道如何对待看病资料

“有的病人把十几年来看病的材料全部带着，拉个小推车，一大摞片子，我看得有十几斤重。可是到了医生面前，手忙脚乱，什么都送上来，医生也头晕。”刘端祺说，看病资料最好拿“两头”，把最早期的片和最近的片子带好就可以了。另外带好初期的诊断报告、病理报告、手术记录，如果还能说清楚前期治疗的简要思路，这就是非常不错的病人了。他见过的最“优秀”的病人，职业往往是会计、统计员、教师、秘书等，她们将自己每一次的化验单据、检查结果、医生意见等做成表格，下一次看病的时候医生一目了然。病情呈现出清晰的全局状况，医生更容易对症治疗。■

不管通常的经验是什么，我们就关注你这个具体的医生怎么治好这个具体病人的病。”刘端祺认为在遵循基本医疗规范的前提下，医生个人仍有比较大的施展空间。“医学的难处在这儿，医学的魅力也在这儿。”

作为医生，刘端祺经常会接到朋友的各种咨询和求助。一天中午我们一起在医院食堂吃饭时，刘端祺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听了朋友的讲述，他对朋友说：“你这样看病的方式是错误的。你父亲的病，30岁以上的医生就能治，治疗方案早在医学界形成共识了，用不着去找老名医。如果是疑难杂症，老前辈给点拨几句，可能让主治大夫茅塞顿开，可你父亲这病真用不着。不过，如果你们找名医是为了在心理上安慰病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是需要配合的表演了。”

刘端祺说，治病这么多年来，他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病人，大多数求医者不知道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病人，这也与医生没有对患者进行充分的教育有关。刘端祺花了很多工夫，告诉病人应该怎样看病。“比如乳腺癌的病人，现在很多人存活期能有十几年。医生就应该跟病人交代清楚，你的存活期比较长，在肿瘤治疗过程中可以规划一下，看病人怎么分配资源合适。乳腺癌治疗初期花费比较大，中间可能不怎么需要花钱，万一复发的话大概是多少费用，这样能指导病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规划如何抗癌。我跟病人聊过之后，病人往往说：我都得癌症好几年了，这是第一次有医生跟我说这些。”

肿瘤患者的治疗过程比较漫长，选择也不唯一，所以医生与病人各自的角色非常重要。肿瘤治疗应该谁做主？刘端祺说，最好在医生的主导下，医患双方不断沟通，共同协商，共同选择明智方案。不同的病情在不同的阶段，应对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早期肿瘤除个别例外，多数患者应当选择手术，无论是哪种早期癌症，手术的治愈率都很高。

所以对于早期肿瘤患者，医生需要做的是准确明白地向患者告知这一喜讯，要非常坚定地向患者说清楚：这个早癌病灶的切除手术“相当于阑尾切除”，癌症已经治愈，复发概率较小，无须再做治疗。这样避免患者拖延病情，也能避免他们被癌症的诊断吓蒙而治疗过度。

而对中晚期肿瘤的治疗，医患双方如何在病程每个时间段都能相互沟通，做出明智的选择，难度则要大许多。这一方面是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另外中晚

期肿瘤的治疗是一个漫长艰辛、跌宕起伏的复杂过程，在肿瘤诊疗全程，期望医生与患者的沟通一蹴而就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刘端祺说，不少中晚期肿瘤患者都有可能面临抗癌治疗终于失效，进入“最佳支持治疗”和实施临终关怀的阶段。而医生如何向患者告知残酷的事实，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从来都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所以医生和家属需要在适当的时候、由适当的人、用适当的语言，向患者进行必要的“临终教育”。

做医生这一行，让刘端祺有很多机会看到真实的人性。“人性千姿百态，有时候会出现我们特别不能理解的事情，但这也是人性的一个侧面吧。”刘端祺前段时间收了一个晚期乳腺癌的病人住院，老太太60出头，家里是北京郊区的，养育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上午刚给她办好入院，四个儿子来了，小儿子跟老太太住在一起，最孝顺，最想给妈妈治病，可他是地道农民，拿不出钱。老大也想给妈妈治病，可是每说一句话都瞅一眼老婆，这个大儿媳每句话的意思都是不愿出钱。我实在生气了，对大儿媳说：‘你出去吧，我和你老公谈！’我也只能说到这一步了。最后结局是几个儿子谁都不出钱，下午老太太就出院了。本来如果好好治疗的话，她还可能多存活几年的。”刘端祺说，做医生年头久了，他已经学会了自我疏通情绪，但老太太的遭遇让他沮丧了半天。“虽然强调医生要与病人共情，可是对于人家的家务事，我们又不能过多干预。我只能自我宽慰说，我也没有资格指责别人，如果我处于人家那种经济状况，也许只能如此吧。”

在肿瘤病人漫长的治疗过程中，有些时候，家属与病人的治疗意见会不一致。医生需要分别跟家属和病人沟通，但是又不能让病人知道这种矛盾。“我们绝不能说：你们是一家的，病人和家属吵清楚了再给我一个治疗决定吧。病人已经疾病缠身，几乎所有的痛苦和矛盾都得由他来承受，如果我们还把压力加到病人身上，病情肯定加重。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代表病人的意愿和利益去与家属沟通，做到不将矛盾带给病人。有些病人出院后才知道我们对他的保护，非常感激。也有病人一直不知道实情，那这个秘密也就随他带进了棺材里。”刘端祺说，他并不主张“视病人如亲人”，医生与病人的距离如果过于接近，就会失去自己的职业角色。“我主张视病人如病人，带着医生的职业水准和深切的情感来对待他们。”

别笑， [海量] 就是爽

职场千机变，看我变变变，
这心情，倍儿爽！



企业用户APP下载



个人用户APP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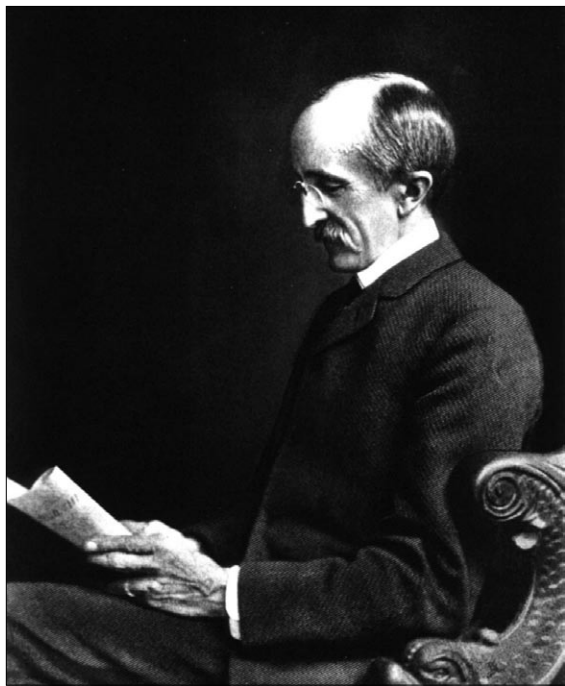
GOOD CHOICE
GOOD JOB

好工作尽在前程无忧!

医与患关系断代史： 权力、壁垒与困境

主笔 / 徐菁菁

通常的说法是，医生与患者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但是，疾病之于医生与患者，他们的感受迥异。在漫长的医患关系史里，这注定了沟通的重要与艰难。



医生爱德华·特鲁多创建了美国第一家肺结核疗养院

安慰

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有一块十字架形状的墓碑，墓碑上刻有一句话：“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1915年，医生爱德华·特鲁多（Edward Livingston Trudeau）葬在这儿。100年来，这句墓志铭广为流传，被视为医学人文主义最具代表性的金玉良言。1873年，25岁的特鲁多不幸罹患肺结核，在休养三年之后，他奇迹般地自愈了，这促使他投身于肺结核的治疗和研究。1882年，他在撒



19世纪，法国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可的医学课



拉纳克湖畔创建了美国第一家肺结核疗养院。

但若回到特鲁多从医的时代情景，他对于自身职业的描述与其说是出于悲悯情怀的感慨，毋宁说是对残酷现实的概括和回应。“有时去治愈”究竟是指怎样一种处境？研究显示，从滑铁卢战役到特鲁多去世的100年，20至60岁的成年人中，肺结核的死亡率是97%。特鲁多去世30年后，1944年美国科学家沃克斯曼（S. A. Waksman）发现链霉素，人类才第一次拥有了治疗结核病的有效药物。

1685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中风时，御医们给他使用了放血疗法，放出了8盎司血液；他们给国王喂下高浓度的锑和足量的硫酸锌催吐，同时令他服下强泻剂，再佐以一系列的灌肠。直到特鲁多生活的时代，五花八门的放血疗法才刚刚过时。1833年，法国还曾进口了4000多万只水蛭帮助医生放血。而催吐和灌肠依然是医生们的法宝。1824年，在伦敦皇家医学院《药典》列举的几百种药物中，只有鸦片有较大的疗效，能够止住不太严重的疼痛。皇家医学院的医生针对各种病患的统一做法是使用芦荟油、番泻剂之类的植物性泻药无情地催泻。1869年，伦敦圣·巴托洛缪医院急诊室里的景象是这样的：“（病人）被打发走时带上了剂量可疑的药物，这些药物从一个巨大的褐色瓦罐里倒出来……10年中，这些由巴托洛缪医院药房分发出来的药物的成分几乎都没有变化，它们基本上由通便药组成。”大洋彼岸的情况同样如此。1905年，美国医学会主席马修斯（Joseph Mathews）描述当时美国老式医生出诊时的情况：“诊疗箱里几乎没有药物……甘汞、鸦片、奎宁、吐根制剂（一种催吐剂）和阿片根散（一种通便剂）就构成了他的全部行头。”仅1891到1892年的12个月中，美国就消费了25.5万磅的芦荟（通便）、11.3万磅的药喇叭（通便）和140万磅的马钱子（催吐）。

德国医生库斯茂（Adolf Kussmaul）在1864年一语道破了发汗、放血、催吐疗法盛行不衰的原因：许多病人对这些疗法深信不疑。生活在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堪萨斯医生亚瑟·霍茨勒坦言：“我知道，某些疾病即使处于初期，我的努力也是徒劳的……我常常在接触马具之前就明白这次出诊毫无用处……”那么治疗的目的是何在？“当然，一个人留下一些药物防止病人再找麻烦，这很大程度是一种欺骗行为……但仅凭平淡的检查，病人是不会付钱的，除非开几颗药丸。这如同牧师在布道过程中，宗教执事说‘阿门一样——既没有坏处，还表明了虔诚’。”于是，医生们应诊时的“通常的程序”是这样的：“在到达病床前，先热情

地问候祖母和婶娘们，拍拍所有小孩的头。他会用深沉的目光和一个令人愉快的玩笑跟病人打招呼，然后他摸脉、看舌，询问病人哪里不舒服，做完这些后，他就准备发表意见并给病人开出他喜爱的药物了。”

开出病人“喜爱”的药物对行医来说至关重要。1807年，莫泊桑在长篇小说《温泉》里，总结了布拉克医生在温泉疗养院大获成功的绝招：“他从头到尾聆听他们（病人）叙述自己的病情，从不打断他们的话头，并把他们提出的一切看法、全部问题、所有打算或希望都一一记录下来。他每天都会把病人喝的矿泉水的剂量稍加增减，这获得了病人的信赖，病人认为这是真心关心他们。”

100年后，萧伯纳在戏剧《医生的困境》的序言里更加辛辣地写道：“在与同事的竞争中，医生不得不通过讨好病人来维持生计。在勉强通过考试，购得一个铜招牌之后，医生很快就发觉自己开的处方无非是：为不会喝酒的人开白开水，为酒鬼则开白兰地和香槟，在家中开牛排和黑啤酒，在路途上开不产生尿酸的素食食物；给老家伙的处方是紧闭的窗户、大大的火炉、厚重的外套，给年轻的时尚追求者的处方则是呼吸新鲜空气，尽量地裸露而不失庄重。他不再敢于说出‘我不知道或我不同意的话来’。”

医生的自述和小说家的观察，折射出一个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熟悉的医与患关系的模式：20世纪以前，结核、梅毒、白喉、脑膜炎、疟疾和产后败血症等感染性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困扰，而传统医学并没有战胜这些疾病的良方。人类生存史上的大部分时候，从根本上来说，人只能凭自己的力量承受身体的痛苦。人们依靠自然、运气以及家庭和宗教，医药是可以尝试的另一个工具，跟治疗仪式、家庭疗法并无差别，也并非更为有效。这决定了，总体上说，医生和铁匠、铜匠等其他职业一样，只是一项谋生手段，并无权威可言。在这样一种雇佣关系中，取悦雇主显然比与疾病的正面交锋更加重要。

但生活在世纪之交的爱德华·特鲁多行医的目的显然不是单纯的谋生，1884年，他在撒拉纳克湖建立了美国第一家肺结核研究所。

从医学史的角度看，在行医的行当上，修道士和理发师都是特鲁多的前辈。但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巨大区别：特鲁多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

尽管医学依然充斥着荒谬，但在18世纪，呼吸生理、消化生理、电生理、病理解剖、疾病分类等学科已经建立。医学的科学化带来了临床医学的专业化，从英国、法国、德国到美国，专门化的医学教育发展



医学界的精英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地意识到传统医学在治疗人类疾病方面的错误和无能，并拒绝将自己的职业混同于自欺欺人。



起来，一个精英性质的职业医生群体出现了。19世纪70年代，纽约成立了皮肤协会、产科协会。19世纪80年代，伦敦有了外科、眼科、皮肤病科、妇科、神经科和耳鼻喉科。从医不再是一种可以“兼职”的行当。19世纪，职业医生的群体已很庞大，1881年，他们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医学会议。

这些职业化的精英医生与传统医生有完全不同的眼界。特鲁多生前已经看到了人类攻克结核病的曙光。他建立疗养院的那一年，德国科学家科赫（Robert Koch）在肺结核病人的痰中发现了结核菌，确认了结核病的病原体，这是人类控制结核病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1895年，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X线，为包括结核病在内的临床医学的影像学诊断打下了基础。1897年，德国科学家弗拉基（G. Flügge）提出了结核菌的飞沫传染说，证实肺结核病人咳嗽时可以从呼吸道排出微滴核，而吸入微滴核是传播结核病的主要方式。

虽然实验室医学的曙光还没有照耀到病床上来，但这些研究成果足以使专业化的职业医生与传统医生分道扬镳。医学界的精英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地意识到传统医学在治疗人类疾病方面的错误和无能，并拒绝将自己的职业混同于自欺欺人。

病人要么自发地从感染性疾病中恢复过来，要么医生也无能为力。那么在疾病和病人厮杀的过程中，医生的存在价值在哪里？“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正是代表了特鲁多那一代职业医生群体回应时代问题时的思想潮流。一场“视病人为人”的运动发端于欧洲医学科学的最高领域。1882年，作为内科医学教授的赫尔曼·诺瑟格尔（Herrman Nothnagel）在维也纳提出：“医学治疗的是有病的人而不是病。”他向维也纳总医院的住院部医务人员强调通过记录详尽的病史与病人建立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虽然医疗活动的能力有限，但医生们至少能够对病人传达理解和同情，而理解和同情本身就具有治疗效果。医生们发现，在初级保健中，三分之一或更多的病人的症状是“功能性的”或“受心理影响的”，病人症状的产生没有器质性损坏。用哈佛大学本科教授皮博迪（Francis Weld Peabody）的话说：“对这些病人的成功诊断和治疗……几乎完全取决于医患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个体医疗服务的基础，离开这一点，医生要了解如此多的功能失调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和麻烦几乎是不可能的。”

权力

伦敦维尔康医史研究所的医学社会史教授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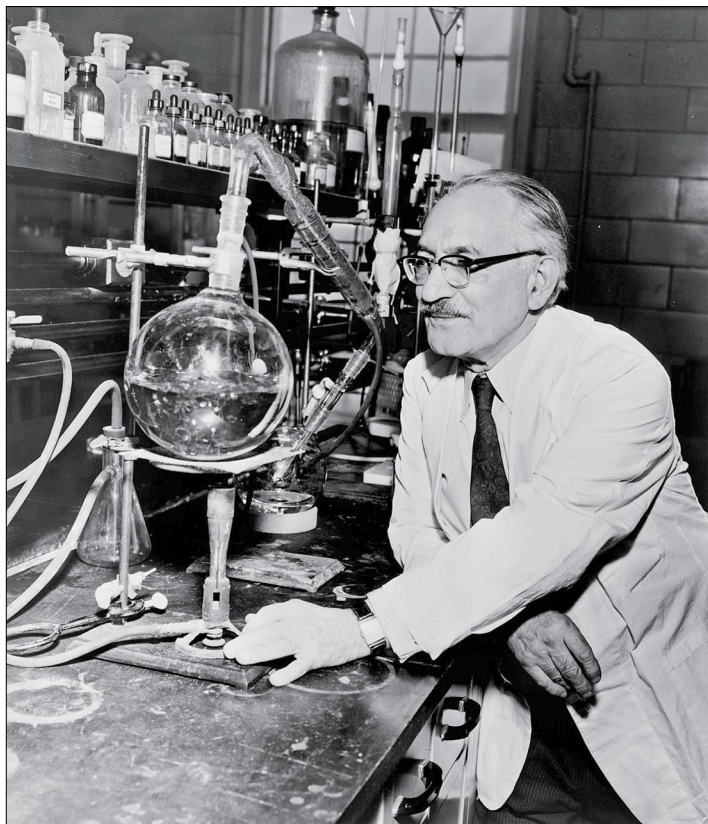
伊·波特（Roy Portey）在《剑桥医学史》中说，新兴的医学精英们“视病人为人”的运动在“二战”前式微了。这并非是说医学界的仁慈之心凭空消失，而是医学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雇佣式的医患关系和19世纪末“视病人为人”的医学理念都建立在一种背景下：面对疾病，医生与病人处于近乎平等的弱势，医生仅仅是病人与疾病斗争的辅助者。而这种关系，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迅速扭转了。

进入20世纪，临床医学的突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踵而来。公众卫生状况的改善（比如更有效的隔离）、某些感染源的致病力发生改变（如导致猩红热和结核的生物）以及治疗手段的改善（比如1928年青霉素的发现和1935年磺胺药的使用）使医生们迅速遏制了猖獗人类历史的感染性疾病。

外科的进步尤其惊人。2014年，美国电视网Cinemax推出迷你剧《尼克病院》，聚焦1900年纽约一家医院的手术室。在故事开篇，一例因前置胎盘而需急诊剖宫产的女患者躺在手术台上，主刀大夫克里斯琴森遭遇了产科最糟糕的结果：手术失败，母子双亡。这是他的第12次失败。手术后，克里斯琴森举枪自尽。那是外科黎明前最后的黑暗。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科突破了疼痛、感染、失血三大难关，迅速进入“黄金岁月”。1911年卡雷尔（Alexis Carrel）因血管缝合技术和活组织移植与培养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奖。1938年，西班牙内战时期，储血技术以及通过输液瓶间接输注给病人的技术被发展出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则催生了处理复合骨折的新方法，推动了整形和矫形外科的发展，促进了血液库和血浆库的兴建。与此同时，更好的免疫学和日益增多的抵御细菌感染的药物都扩展了外科手术的可能性。

1944年，1岁零3个月的小女孩艾琳·撒克逊在阿尔弗雷德·布莱洛克（Alfred Blalock）医生的手术台上接受了先天性心脏病的血管分流手术。低年资住院医生丹顿·阿瑟·库利记录道：“当手术结束，婴儿的嘴唇颜色由青紫色的发绀转变为令人愉快的粉红色时，可以想见我们当时所感受到的兴奋。这可能是心脏手术时代的正式开始。”而仅仅10年后，1954年，第一例肾移植手术的成功开创了人类器官移植的时代。1967年，当巴纳德医生（Christiaan Barnard）成功地将一位妇女的心脏移植到一位54岁男性体内时，移植外科受到的公众关注绝不逊于当时的太空计划。

在公众的眼里，医生所能完成的种种不可能似乎已经接近于上帝，而医学界则陷入前所未有的自信，



左图：美国科学家沃克斯曼

右图：德国医生库斯茂



一切疾病都将被征服。医生们已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领导病人，直接向疾病发起冲锋了。

权威带来了权力。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分析说，从19世纪初开始，人的健康成为工业社会的经济标准之一，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人力资源成为关注的焦点，疾病自然也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通过流行病的防治工作，医学迅速成为国家治理中备受重视的领域，并成为社会经济运行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在自由、民主、平等的人权社会，个体健康权和生命权的提升必然驱使医学在政治经济的双重作用下大幅度扩张。

而20世纪，这种扩张远远超过了人类历史上医学曾触及的边界。

20世纪初，肠道手术专家莱恩（Willam Arbuthnot Lane）曾提倡切除一段肠管作为预防普通便秘的措施。在20～30年代，由于有X线体检发现有“错位”，因此医生们设计了许多术式以固定腹部器官，“肾上拉”成为时尚。1920到1950年间，外科医生做了

成千上万的扁桃体切除术，其中大部分是不必要的。

20世纪70年代，批评者提出了“医学化”概念，用以指代这样一种现象：曾经的非医学问题都被界定为医学问题或者障碍并且加以治疗。这种批评在今天依然有着巨大的讨论空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2年，美国精神病协会计划把悲伤反应列入将于2013年出版的第五版精神病学“圣经”《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5）。这意味着悲伤将被归类为一种精神病，从而允许医生能在更早的阶段对失去亲人而悲伤的病人给予抗抑郁治疗。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在一篇未署名的评论文章中表达了忧虑：“悲伤不是疾病；更应该将其看作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面对亲友离去的正常反应。”伦敦国王大学（Kings College）精神病学专家西蒙·韦塞利（Simon Wessely）指出：184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只包含1类关于精神疾病的统计。1917年增加到59类，1959年变为128类，1980年227类，而2012年已经有347类。“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分类吗？”

他质疑说。在他看来，真正的危险是把腼腆的性格说成社交恐惧症，当人们为亲友的过世悲伤得长久一些时，就被贴上了抑郁症的标签。

美国精神病学家里昂·埃森伯格（Leon Eisenberg）在60年代末期将他确定的几名患有注意力缺陷的儿童作为精神疾病归类到“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多动症）之下。然而随着诊断不断增多，哌甲酯成分的处方使用激增时，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发现。2009年，在他去世前，他告诉科学记者尤格·布莱克（Jorg Blech），他自己不再相信多动症这个疾病。他甚至说，自己对多动症的发现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疾病的经典范例。精神疾病往往被定义为违反一定规则，同标准相偏离的行为。然而标准并不是固定的，孩子们得到越来越多的多动症诊断的时候，到底是谁在改变？是男孩子们，还是规则？

2012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质疑了这种病症在德国的诊断和治疗。德国少年中，每10个就有一个被诊断患有这种病症。柏林夏洛蒂医科大学的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和精神疗法儿童门诊的主任乌尔里克·莱姆库赫（Ulrike Lehmkuhl）从10年前开始关注多动症诊断结果，她认为这种疾病日益膨胀的趋势绝对含有大量水分：多动症不是病毒，会如此快速扩展。90%的多动症诊断是错误的，那些孩子患有的是其他的行为障碍或者精神疾病。而不来梅大学的药物预防研究学教授杰尔德·格拉斯克（Gerd Glaeske）干脆提出，多动症是“归因诊断”。这些诊断是社会压力的产物。这些诊断的目的是使得激发天赋、提升成绩的药物得到正当化。在90年代初，德国哌甲酯的处方数量迅速猛增：从1993年的34公斤到2010年的接近1.8吨，增长速度超过50倍。

医学接管了人们的外貌、精神，同时浸入到生命每一个进程。从古至今，人类有三种机制来帮助自己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宗教——上帝会拯救我；浪漫主义——爱是永恒的；创造性——我的成就将会不朽。但如今，医学不但将衰老和死亡这些自然发生的生理过程纳入它的管理之中，甚至对其发出挑战。剑桥大学遗传学系老年病生物学家奥布里·格雷宣称，衰老也是一种病，并且能够治愈。

医学的高歌猛进，极大改变了作为病人的普罗大众的观念。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希尔伯顿法案》，为医院建设提供巨额政府资金。20年后，这个法案已经在全美资助修建了9000多所新医院。工业国家的进程大致如此，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多数人的住家附近有了医院。当人们感到疾痛的时候，他会到医院去，

笃定地相信能够在这里得救。于是，他办好入院手续，让医生决定穿什么、吃什么、什么时候起床和睡觉。他服下医生开出的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药物，接受各种自己并不大了解的各种医学检查，并授权他们切开自己，切除、修补或者重建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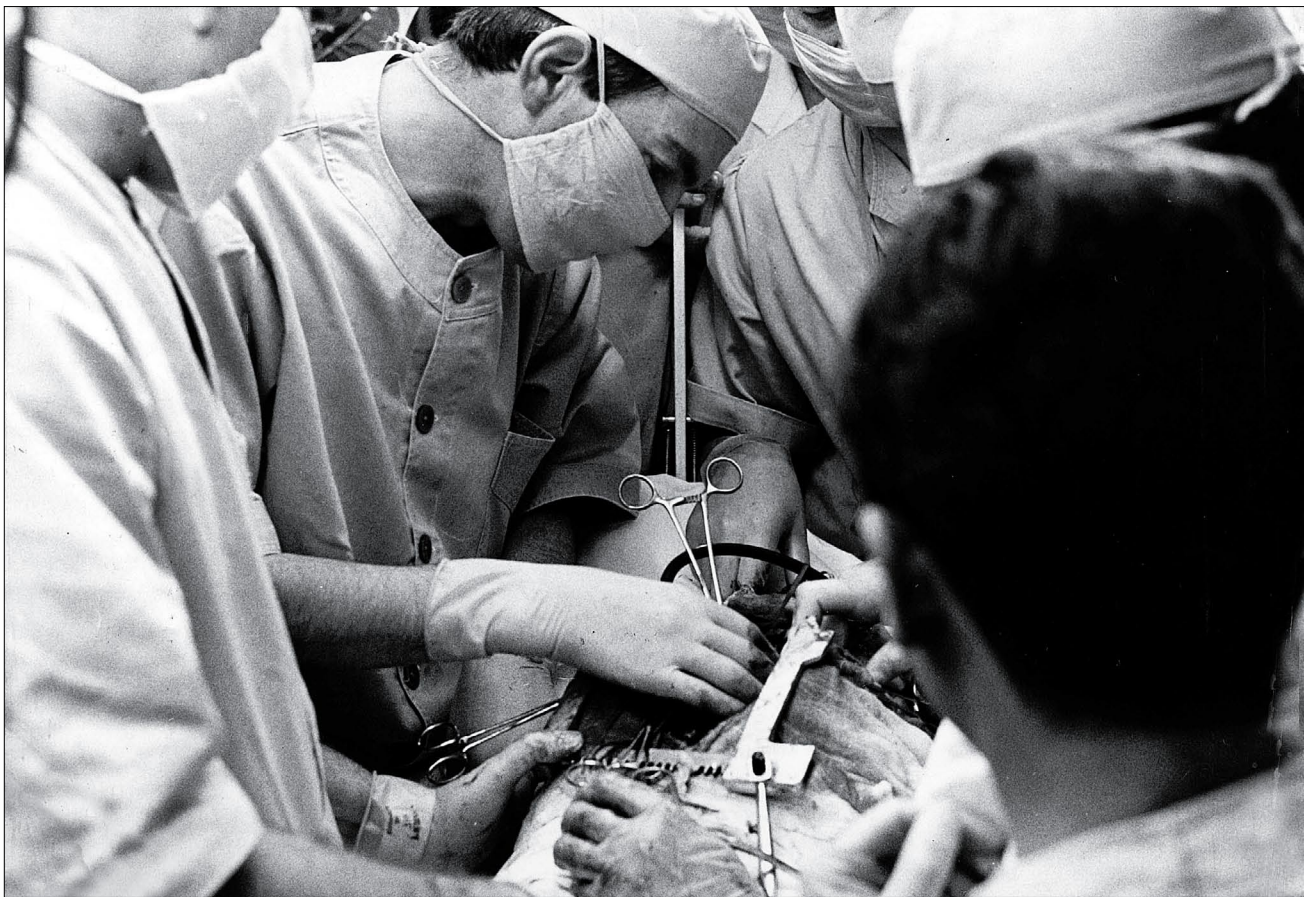
但这种无条件的信任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工业化国家，疾病谱和死因谱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感染性疾病消退了，心脏病、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成为医疗体系的主要问题，然而医学并没有对这些疾病找到药到病除的办法，更勿论癌症、艾滋病，以及层出不穷的新发疾病了。

医学的发展和扩张反而为医患关系制造了悖论：一方面，人们越是对医学提出更高的期望就越是难以满足。临床医学的效果很好，但又远远不够好。美国在1928到1931年间和1981年进行的普查显示，从1928～1931年，被调查的每100人中，有82人次的自述疾病，而到了1981年，这个数字增至212次，增加了158%。人们变得更不健康了吗？这很可能只是因为人们对机体症状更敏感，而且更倾向于寻求对这种感受的解决办法，而这些感受在早几代人中可能被看成是小事一桩而根本未挂在心上。另一方面，现代医学做出努力并不一定导致正向的结果。90年代，美国麻省波士顿大学医院进行了一项研究，一组医生对进入他们医院病房住院的800多位病人进行了随访观察，试图寻找医源性疾病——不是由自然或环境或病人自己的行为所致的，而是因为药物和用于诊断或治疗原来病症的程序所引起。研究表明，这些病人中有290人患上了一种或者多种医源性疾病——大多数为药物所致，其中76人症状明显，有16人因此死亡。

壁垒

当医学的局限被重新认识，医生不再像20世纪上半叶时一样拥有绝对的权威。与此同时，社会意识到，将人们的健康处置权完全交由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封闭群体具有相当的风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医生对监禁者进行的非道德人体试验，受到了纽伦堡法庭的审判。这一事件也引起了人们对医学人体试验受试者的权利和知情同意的注意。在此后的医学研究中，不道德的人体试验现象依然存在。1966年，亨利·比彻（Henry Beecher）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令人震惊的调查报告将美国医生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他指出，纽约布鲁克林的犹太天主教医院对缺乏



1967年，巴纳德医生在南非开普敦格鲁特索尔医院成功完成首例心脏移植手术

知识或未经同意的老年病人进行恶性癌细胞注入试验。在美国的一些权威医学学术机构的病房内，这些试验都很普遍。1965到1971年期间，纽约威伦布克州立医院在一系列关于肝炎的研究中，利用智钝儿童作为试验对象。1972年，《纽约时报》揭露，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卫生服务部为了解梅毒的自然史，对约600名患梅毒的贫穷黑人进行观察，但并不给予治疗，只是提供免费体检和死后免费安葬等措施，从而使得许多梅毒患者失去了治疗的机会。

60到70年代，人们对医生的权威作用、医院的中心地位以及卫生保健制度和医疗服务体系进行了反思，并提出怀疑：医务人员究竟承担多少对病人的责任？在制药工业和医疗器械的巨大利益诱惑下，医务人员还会将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吗？这些反思直接在西方国家推动了病人权利的运动，促进了相关法律的建立。

在面对疾病的战场上，站在同一个战壕里的医生和病人势必进入新一轮的关系调整。智库新美国基金会健康项目主任香农·布朗利（Shannon Brownlee）指出：“最近50年来，医生与病人处理医学决定的方式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代以来，做这些决定一直是医生的专属特权，病人即使参与了，在最终的决策上也没什么话语权。但是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这种家长作风的决策方式开始发生改变。”

医学界给患病的医患关系开出的新药方是“共享决定权”原则。今天我们去医院看病，只要疾病的治疗存在多种可能性，很少会有医生只告诉你一种选择。当他向你罗列出各种可能的治疗方案时，便是在尊重这种原则。

但这种原则真的有效吗？2011年，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访问了8000名就过医的病人们，三分之二的病人更愿意让医生对自己的医疗方案做出最终的决

定。白宫健康政策顾问阿图·葛文德医生在《医生的修炼：在不完美中探索行医的真相》一书中记述自己的一次心路历程。

葛文德的女儿温妮早产了5个星期，从医院回家一周后的一天早上，温妮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甚至中断。在小儿特护病房里，她出现了几次呼吸骤停，心跳越来越慢。医生向葛文德提出了两个选择：给温妮插管，装上呼吸机，或者再观察一段时间，看她是否还能够自己挺过来。这两种选择都存在风险。如果不插管，温妮可能马上陷入昏迷，说不定哪次呼吸暂停之后就再也醒不过来了。但呼吸机会对患者造成伤害，比如肺炎和肺穿孔，这种事情时常发生。而且使用呼吸机是一种极为痛苦的体验。谁来做出这个决定？葛文德在理智上相信自己是最好的人选，但当负责治疗温妮的医疗小组来找他商量的时候，他把决定权交给了医生：“未知的情况太多了，如果我的决定是错误的，我该如何承受这错误所带来的后果？即使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可万一出了闪失，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有人认为，病人应该自己负起做决定的责任，但我需要温妮的医生来为我承担这个责任，不管结果是好是坏，他们都承受得了。”

对于葛文德来说，情感因素是他享受“共享决定权”的最大障碍。但至少，他是一名医生，他了解每一种治疗方案背后的风险和收益。对于绝大多数患者和他们的家属来说，面对医生提出的各种治疗选择，在到达情感关口之前，他们已经被医学巨大的知识壁垒弄得手足无措了。所谓“共享决定权”不像是权利的获得，反而更像是医生不负责任的行为，令疾病施加的压力雪上加霜，从而更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猜忌和对立。

“共享决定权”的失败本质上揭示了现代医学的一条真理：面对疾病时，医生与病人不可能达成100%的权力平等，医患间不可跨越的知识壁垒首先决定了这一点。

知识壁垒并不只对医生有利，更多的时候，它意味着医生和患者对医学角色与功能的看法有着巨大的不同，阻碍了医患之间共识的达成。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曾经指出，英国一项列表式的问卷调查显示了医患间对于医学截然不同的期望。患者认为：医学能够并且应该治愈我的疾病；医生通常可以了解我体内的所有情况，知道我的健康问题出在哪里；医生知道所有应该知道的专业问题；医生大致能解决患者所有的躯体疾病问题，甚至还包括一部分社会问题。而对于这些想法，医生

几乎都持有相反的观点。

医生们看到的则是医学巨大的复杂性、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以临床诊断为例，美国医生杰克·温伯格（Jack Wennberg）发现不同医生的做法通常有很大区别，同样是胆囊问题，医生选择要不要做胆囊切除术，差异指数可能高达270%；装置人工髋骨的差异则有450%；病人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是否要送病人进特护病房的差异性更高达880%。住在加州圣巴巴拉市的病人中，因背痛而进行手术的人数要比纽约布朗克斯区的病人多5倍。这主要是受未知性的影响，另外医生个人的经验、习惯和本能也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郎景和认为，《昆虫记》作者法布尔的话更接近于医学和医生的处境：“不管我们的照明灯烛把光线投射多远，照明圈外依然死死围堵着黑暗。我们的四周都是未知事物的黑洞……我们都是求索之人，求知欲牵着我们的神魂，就让我们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移动我们的提灯吧。随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面目被认识清楚，人们最终也许能将整个画面的某个局部拼制出来。”上世纪60年代，医学界使用乙烯雌酚对相关妇科疾病的患者进行治疗，结果导致这些患者所生的女儿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患上阴道腺病，甚至后来发展为透明细胞癌。这种治疗方法在20多年后才被叫停。沙利度胺曾被用于治疗早孕反应，而它却导致了短肢畸形儿。

医学不能满足人们对它全知全能的期待，医生也一样，在黑暗中一小片一小片完成的认识过程，同样意味着他们不可能给予每一个患者标准化的优良回报。

“公众会认为医疗过失是由于某些医生不称职造成的，律师和媒体也这样想，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医疗过失其实经常发生……”阿图·葛文德指出。令患者们难以接受的事实是：“你也许会认为，治疗不当的例子只集中在少数差医生身上，但事实上，大多数外科医生在行医生涯中至少被起诉过一次，而在医院照顾病人的临床医生，每年都可能犯下重大错误。病人比飞机更具有独特性，也更复杂。医学也不是生产线，更不是产品目录，它比人类涉足的其他任何领域都要复杂。”以心电图为例，患者很少了解心电图的复杂性。而事实上，即使是专家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葛文德指出，研究表明，送到急诊室的2%~8%的心脏病患者会被误诊为没有问题，这些人中的四分之一最终死于心脏骤停。“每次媒体大幅报道骇人听闻的医疗事故的时候，医生很少会感到愤慨。他们通常会想：我也可能会犯这种错误。即使可以打医疗官

司也于事无补。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特洛耶·布伦南 (Troyen Brennan) 指出, 医疗过失的发生率不会因为医疗官司的存在而减少。”

1991 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发表了一系列以医疗事故为研究课题的重量级报告——“哈佛医疗执业研究”项目 (Harvard Medical Practice Study), 研究对象为纽约州的 3 万多家医院和诊所。研究发现, 将近 4% 的住院病人因为并发症而导致住院时间延长、残疾甚至死亡, 而这些并发症有三分之二是后期护理不当引起的, 四分之一则确定是由于医生的医疗过失所致。1999 年, 美国国家科学院国立医学研究院 (Institute of Medicine, 简称 IOM) 发布了一份有关构建更加安全的卫生体制的报告, 报告承认, 在美国, 每年因为医疗差错造成 4.4 万到 9.8 万人的可预防性死亡, 且其中 7000 例的可预防性死亡仅仅与用药差错有关。报告呼吁进行体制性的改革, 以维护病人的安全。但它并没有不切实际地以杜绝一切医疗过失为目标, 它在标题里开宗明义地写道: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To Err is Human)。

加拿大急诊室大夫布莱恩·高德曼 (Brian Goldman) 以一个医生的角度说: “重点是, 在一个医疗知识以两到三年为单位成倍增长的医院体系中, 我们无法紧跟着这些知识的增长。睡眠不足的情形绝对是非常普遍的, 而我们却无法摆脱这个问题。我们自己的直觉偏差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结论。比如说, 我可以为一位胸痛的病人记录下完美的病历, 但如果这位同样胸痛的病人当时胡言乱语再加上呼吸带着些许的酒精味的话, 我写下的病历便会挟带着些许的轻蔑。而这份病历便会截然不同。我不是机器人, 不会每次都做同样的事情。我的病患也不是车子, 他们不会每次都相同的方式去描述他们的症状。因此错误是无可避免的。如果真像我被教导的体系那般赶出所有出错的医护专业人员, 那么这个领域便不会有人留下。”

没有医生会否认, 一个医生的成长是在不断的错误中前行的。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明尼苏达大学, 一名年轻医生为一位 7 岁孩子做心脏手术。手术中, 这名医生不小心误伤了心脏壁, 大量鲜血顿时喷涌出来。这个医生慌了手脚, 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措施, 试图用止血钳钳夹止血, 结果反而扩大了心脏的破口。上级医生上台抢救, 但患儿依然不幸死亡。这位年轻医生害怕不已。他的上级问他: “你在这件事中学到什么?” 他回答: “我应该用手指压迫止血, 再做后续处理。” 上级医生说: “很好, 这就够了。明天的手术

依然由你来主刀。” 这位年轻医生叫伯纳德, 也就是他在 1967 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

这一切都是医学的真相, 但它对于患者来说极为残酷。葛文德指出了医患都无法逃脱的临床医学悖论: “如果一个体系的正常运作必须依赖完美的表现, 那么很多错误会伺机冒出来。” 即使人们能够从理智上接受孰能无过的事实, 但从感情上他们能够接受由患者付出代价的现实吗?

被消解的病人

医患关系的紧张是现代医学中的一个普遍现象。香农·布朗利 (Shannon Brownlee) 指出, 研究显示, 在最近 30 年中, 美国患者对医生的满意度以及对医疗质量认可度急速下降。在网络上, 他们对医生的抱怨和中国病人并没有太多区别: 被医生们匆忙赶出诊室而错过了重要的诊断, 看病诊察时医生盯着计算机屏幕而从未认真看看病人, 不愿意听患者的诉说等等。

诊疗过程给患者带来了多大的压力? 2000 年, 作家玛格丽特·埃迪森凭《心灵病房》(*Wit*) 获得了普利策戏剧奖。该剧描写了文学学者薇薇安·贝林罹患卵巢癌的经历。它再现了患者和所有为她提供医疗照护的医务人员之间的分歧——傲慢的资深肿瘤专家对她撒谎; 年轻恶医生科学家急切地想为自己的研究得到数据, 对她的痛苦视而不见; 护士意识到了薇薇安的痛苦, 却无法转化为有效的行动。该剧在纽约上演时, 剧组不得不邀请心理学家来协助剧后的讨论——观众们在剧终后拒绝离开剧院, 一些人在抽泣, 很多人一次次来观看此剧, 散场后坐在座位上不愿离去。

罗伊·波特 (Roy Portey) 在《剑桥医学史》中说, 现代医学停止了给予病人自己想要的东西。当病人对新药感激不尽的同时, 对开这些药的医生也越来越不满意。在这个时候, 医生头上的胜利桂冠被摘走, 对立情绪也进入医患关系之中。

那种医学原本给予病人却又抽走的东西是什么呢? 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学家尤森 (N.D. Jewson) 提出一种观点: 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 病人消失了。

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间内, 医生们都在努力提出一种认识疾病的方法论。17 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认为, 要了解这个世界, 必须将一个复杂问题尽可能细分为许多简单的部分, 对每一个部分都加以测量, 无法测量的部分必须把它分解为可以测量的形式。他在《论人》和《论胎儿的形成》两本书里提出, 人的各种器官就同钟表里的齿轮和发条一样拨上弦它就能



1930 年，北德意志劳埃德的一家医院内，医护人员护送病人坐电梯

动，血液循环就是动力。1933 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展览馆的入门处安放了一架巨大的透明人体模型，其内脏透明可见。主办方说，这个模型完全采用了最先进的机电零部件，并告知观众可以由这些部件来完成一切生理功能。

如果人体就像机器一样，那么对人体的不断拆分研究也就可能最终解答疾病之谜。笛卡儿的机械论启发了医学家们。

今天，游客们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阿尔基金纳西奥宫会参观一个房间，这个半地下的没有窗子的房间内部装饰着华丽的木制隔板，像小剧场一样的座位由高到低围绕着房间中间的白色石制台面，石台四周则由木头围栏围绕着。这个台面是一张解剖台，这个房间是世界第一个人体解剖实验室，曾经属于博洛尼亚大学医学院。

临床医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病理解剖

学的建立。18 世纪初，在博洛尼亚大学，医学家莫尔加尼（Giovanne Battista Morgagni）认为，病人临床上出现的症状，是因为与之相关的部位或器官发生了病变。他做过近 700 例尸体解剖，将生前找他看病的病人的症状与其死后的病理解剖联系起来，总结在《由解剖观察诸病位置与原因》这本书中，该书被誉为病理解剖学的奠基之作。在书中，莫尔加尼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病灶”。“病灶”就像是机器里损坏的那个点。从此，西方医学就进入到了寻找病灶的还原论逻辑之中。

生理学家们把人体这架机器拆开，研究每个部件的功能，从 500 年前用肉眼细致观察器官和组织，到 300 年前用显微镜观察细胞和细菌，到 50 年前用电子显微镜直接拍摄蛋白质分子和病毒的形态，这种研究路径对临床医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尤森认为，医学知识改变了医疗关系。法国大革

命后巴黎医院的改革，形成了新的医院医学，理学检查和病理解剖在医疗中占据中心地位，从前医生十分注重的病人自述和生活史不再是诊断和解释疾病发生的重要依据。理学检查可以发现病因，病理解剖可以证实身体组织的病变。过去整体而又具有个性的“病人”（sick man），到了医院医学阶段已经化约为各个器官与组织。19世纪实验室在德国兴起，疾病的诊断解释更是化约为细胞和生化反应的微观层次，病人的自述和治疗想法在就诊过程中更加无足轻重了。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勇，从病历上看出了这样的转变。1737年至18世纪60年代晚期，英格兰医生布朗里格（William Brownrigg）在病历中是这样记录的：

1737年6月。托德先生（Mr.Todd），木匠学徒。年轻人，18岁，经常消化不良。近来夏季气候炎热，他喝了大量凉水。一天夜晚，他的腿脚出现大面积水肿，皮肤感染部分扩大，产生许多红斑。微烧，无瘙痒和剧痛。

1737年7月。尼科尔森（Miss Nicholson）小姐，一个爱尔兰女人，感染流行性热病。年约20岁的单身女性，漂亮，活泼，好发脾气；罹患乳房硬化；非常爱吃多汁的食物并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

通过病历，我们可以想象布朗里格和病人问诊，他一定仔细观察了他们，并让他们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感受，甚至于生活细节。

到了19世纪，英国布里斯托尔慈善医院外科医生兼药剂师詹姆斯·贝丁菲尔德（James Bedingfield）留下的病案已经非常接近我们今天所使用的：

乔治·卡特（George Carter），40岁，1818年12月6日在糖厂干活时炙热难熬，随后出外呼吸新鲜空气，病症似为肺炎……其患病症状如下：胸腔与心窝炎症严重；呼吸困难；不能侧卧或仰卧；在病床上只能采取坐姿，或者低头双手抱膝，上体前屈；病人咳嗽剧烈，带有大量浓痰；尿量极少，脉搏跳动过急过重，其面容显示，浓液已渗入胸腔。

1814年12月14日，接收玛格丽特·西梅（Margaret Semay）入院，年龄30岁，病症属常见肺。为缓解症状实施放血，开具含锑类药物处方，并且采用严格的消炎疗法。

很显然，病人的语言已不再是医生关注的焦点，医生所要获取的信息，主要不是病人提供的病情，而是分解为呼吸、脉搏、体温、血液、器官等若干项目

的检验参数。福柯敏锐地指出：当莫尔干尼创建了病理解剖学，法国医学家比夏从组织水平研究生命之后，疾病的征象与可能性不再基于推衍，而是可见的目视、确凿的病理定位和指标。于是医生们不再询问患者“怎样不舒服”，而是径直叩问“哪儿不舒服”。医生们直奔作为客体的疾病，曾经作为主体的病人消失了。

疾病

从科学的角度看，病人的“消失”具有诊断治疗上的意义，它有助于廓清疾病的真相。医生们感到，实现了对病人进行有效治疗，也就没有必要去谋求医患的亲密关系所带来的心理好处了。

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真相是：病人向医生寻求帮助时，他所求治愈的疾病与医生眼里的疾病并不相同。哈佛医学院的社会和心理医学教授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在《疾病的故事》一书中提出，对于病人而言，疾病是疾痛，它牵涉病人及其家人乃至更广的社会关系——他们如何接受病患事实，带病生活，又是如何对付和处理病患的症状以及由之引起的各种困苦烦恼。它也指种种鲜活的经验，是病人对疾病引起的身体异常和不适反应的切身感受。而对于医生来说，疾病是病理理论解释和重组疾痛时提出或发明的。训练有素的医生，透过各自特定的专业理论滤光镜，从患者的疾痛经验中看到疾病。

于是，“对病患来说，问题在于疼痛会干扰工作，甚至导致失业；患者的严格控制饮食以及肠胃严重不适，会加重他们的学业压力；或者心脏病的突发，可能会导致他们对死亡的恐惧，由此引起社交行为退缩，甚至离婚。对医生来说，问题则完全不同：如果血糖升高，他们需要诊断是否需要注射胰岛素；如果有不明原因的器官疼痛，他们需要进一步化验确诊；如果有抑郁症状，他们需要确定病人是否应该服用抗抑郁剂”。

疾病与疾痛的错位，会使医生和病人对“成功”的治疗有截然不同的评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的普通内科医师和临床医学教授丽塔·卡蓉（Rita Charon）在《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中讲述了一个病例：罗西46岁，得了脑膜瘤，她进行了一个耗时8小时的神经外科手术。住院大约一周后，她被告知六周后可以重新开始工作。但是肿瘤和手术使她丧失了左耳的听力，也丧失了许多以往从不曾意识到的大脑正常功能。洗澡时，她感受不到温水，只能感到冷水和热水，她可能丧失了正常大脑的平均感

觉功能，这种功能可以消除正常人对细小温度差别的触觉感受。她丧失了一些听觉过滤功能。她的右耳越来越敏锐，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也许是因为听觉过滤系统失灵，她对所有感官输入都很敏感，正常情况下，这一系统会把某些输入标记为没有意义的干扰而过滤掉。她没有空间感，走路时，她总是有意识地去想应该把脚放在哪里，胳膊该怎么摆。第八脑神经的破坏不仅引起前庭功能紊乱，也引发耳鸣，用她的描述：“脑袋里的尖叫。”迷走神经和舌下神经受损引起吞咽困难。她不能够自主吞咽，甚至吞咽液体也很困难。她需要有意地通过紧缩腹部肌肉来放松食管上部的括约肌，否则就会噎着。周末她再也无法去垂钓，因为光、波浪、移动和在心爱的船上看到的水面对她的感官都是负担。她无法享受食物，无法阅读，她的体重比术前减少了20%。但在医生们眼里，她的治疗被认为是很成功的。从术后的核磁共振检查中能够看到，脑膜瘤已经被完全切除，她感受到的缺陷被认为是神经外科手术中常见并发症，并被业界认为是可以改善的。人们总说她看上去棒极了，但罗西常常对自己说：“他们是不知道啊，我已经是一个不同的人了，再也不会是原来的那个我了。”

类似情形在人类难以攻克的慢性病中尤为常见。美国医学哲学家图姆斯（S. K. Toombs）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多年。在《病患的意义》一书里，她谈到自己在治疗中的感受：“当护理施予者的目标是治愈疾病时，他们构想的治疗几乎完全是按照可能的医学干预来进行的。”医生对病人世界的漠视，甚至“歪曲”，令她无法忍受，她在治疗室里高声声辩：“大夫，你只是观察，而我在体验！”

进一步的，如果现代医学可以完全解决病人生理上的痛苦，还需要去关注病人的心理感受吗？哈佛大学医学史教授查尔斯·罗森伯格（Charles Rosenberg）从医学伦理的角度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邓恩在《突发事件的祷告》（*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中写道：“疾病是最大的不幸，而疾病中最大的不幸是孤独。”然而，现代医学不可避免地放大了这种孤独。在关于医院制度的变迁的著作《来自陌生人的照顾》（*The Care of Strangers*）一书中，罗森伯格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健康的人们生活在适意、温情的家庭和社区氛围之中，尽情享受来自亲人和朋友的照顾与心灵抚摸，而一旦病魔缠身，躯体与心理遭受打击，发生困厄时，恰恰要撤走原有的亲情支撑，将他从原来的生活圈中推出，交给一群陌生的人（医护人员），去接受“孤寂”、“落

寞”，重新适应一切，甚至连获得一次额头抚摸的机会都显得十分奢侈。在罗森伯格看来，科学的医学有千百条理由都难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苦难者要迎击更多的苦难？

在丽塔·卡蓉看来，漠视疾病带来的孤独和恐惧，同样会造成临床上的巨大损失。在《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中，她描述了一场临床相遇的常见情况：

当丈夫躺在心血管病房狭窄的病床上时，妻子心中充满自责：“为什么在他刚开始感到呼吸困难的时刻我没让他去看医生呢？为什么我没让他戒烟呢？为什么我一直都给他做牛排吃呢？”

医生来到心血管加护病房查房，简明扼要地告诉她说：“他的两条冠状动脉严重堵塞，我们觉得他应该马上进行紧急心脏搭桥手术。”她并不能够理解这句充满术语的句子的全部意义：这是什么意思？他会活下来吗？他会死吗？

当妻子面色苍白、疲惫不堪地紧紧抓着丈夫的手腕时，医生心里想的是：“她最好别把那个静脉注射管碰掉，护士费了好大力气才弄上去。”恐惧令妻子嘀咕，说她丈夫对麻醉剂过敏，她还要去康奈尔大学医院再问问其他医生的意见。难道她没有意识到她丈夫病得有多重吗？带他穿过整个城市去问其他医生的意见太危险了，他可能在救护车上就死掉。“她不信任我做她丈夫的医生。”心血管医生想着，心沉了下去。“她若对我持怀疑态度，我做的事情在她看来怎能是正确的呢？”

“双方的隔绝令人瞩目——患者因为疾病的恐惧而被隔绝，医务工作者因为具有疾病的知识而去隔绝。医务工作者具有关于疾病的知识，但往往对患者经历的巨大痛苦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疾病带来的痛苦和愤怒有多么深重。”丽塔·卡蓉总结说，“在患者妻子和心血管医生争论治疗方法的时候，因为词汇和知识的差异上的分歧，因为不信任和恐惧彼此隔离，而在这个过程中，丈夫可能会被心脏病夺去生命。”“若不能触动对方，他们（医与患）就无法运用医学的力量救助患者；若不能找到理解彼此想法的方法，他们注定要失败。”■

（参考资料：《剑桥医学史》，罗伊·波特著；《医学人文十五讲》，王一方著；《医学是什么》，王一方、李政道著；《医学史十五讲》，张大庆著；《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丽塔·卡蓉著；《从病人话语到医生话语：英国近代医患关系的历史考察》，陈勇著；《医生的修炼：在不完美中探索行医的真相》，阿图·葛文德著）



孙宁东摄

孙宁东摄影作品《倾注》——2012年4月19日，解放军四五八医院的两位女医生在为一名乳腺癌患者做手术

镜头背后的医学故事

记者 刘敏

60 岁的空军军医孙宁东花了半辈子时间，终于获得在手术室里自由拍照的权利。

眼前的场景让人有点惊悚。

上午 10 点 15 分，一截裸露的气管正暴露在空气中，医生们刚刚花了一个多小时，在其两侧取出来两块甲状腺肿瘤。被超声刀修剪后的肌肉并不平整，一截纱布正塞在气管旁边，吸收有限的出血，术区看起来一片血肉模糊，分不清哪里是肌肉，哪里是腺体，很难想象这里竟是人的喉咙。

但是在主刀大夫孙宁东和两位助手看来，眼前的一切整洁、健康。乒乓球大小的肿瘤被完整割下，最小的肿块也被找到，干净利索地切掉了。同时，患者的心率、呼吸、血压都非常平稳。两小时前刚刚进来的时候，病人的血压还飙升到高压 160 和低压 90——想到要做手术，基本上每个患者都会紧张得血压升高。孙宁东让打了点降压药，高低血压却又迅速低到了 72/28。“农村患者平时很少吃药，给一点药就会很敏感。”大家在手术室里多等了十几分钟，血压终于恢复到了 84/59。

切开、止血、分离，一切有条不紊，在解放军第四五八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这种手术平均每天都有一台，这场是每年几百场甲状腺肿瘤手术中平淡无奇的一个。

肿瘤切完，孙宁东的任务结束了，下了手术台，他拿过来一个微单相机。

“关上灯吧。”护士们已经熟悉他的习惯，把手术室的日光灯关掉，房间立刻黑了下来，只有手术台上的无影灯明亮地对准术区，两名继续缝合的大夫如同站在聚光灯下工作。

孙宁东蹲到手术台边上，从架子的缝隙里拍助手的眼睛。转了一圈，他又抄起手术室闲置的氧气面罩，把聚焦点透过中间的圆孔，屏幕上就出现了一个中心清晰的圆形取景框。护士做麻醉记录的钢文件夹是全新的，孙宁东一眼看见，拿过来正好变成了一个反射的镜面，拍了一组手术台对称的倒影。

手术台上的大夫已经习惯了老主任的镜头，手下的工作一切如常。没法摆拍，也没法用闪光灯，一切都是直接取景。

最后，孙宁东对准整个手术台按下快门，屏幕上强烈的明暗对照，很像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油画作品，那位 16 世纪的画家最擅长用黑色的背景，记录无声的、带着鲜血的、激烈的冲突。

手术室里的工作，许多也是如此。

手术室能不能拍？

孙宁东的办公室很引人注目。屋子的上半截挂满了锦旗：“战士的贴心人，当兵的好榜样”、“医者仁心，官兵至上”、“神术无声除巨瘤，德技双馨显仁爱”……下半截是一块大展板，印着 18 位医生的眼部特写画面。

这基本概括了孙宁东的身份：医生、军人、摄影师。

孙宁东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1977 年，孙宁东从部队刚考进武汉大学医学院时，姐姐送了他一台海鸥双镜头相机，这在当年是绝对的奢侈品，因为孙宁东，大学同学们留下了大批黑白合影，年轻人们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在游船上，在假山旁，在显微镜旁边，每一张合影都意气风发。那批相片弥足珍贵，照片上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变成了全国各地的



孙宁东

医院院长、医学教授、学科带头人。

但放在 80 年代，还是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记录的价值。孙宁东毕业后回到了军队，变成了军医院里的一名普外科医生。在医院，他可以用相机拍切下来的直肠、息肉作为病理标本，可以拍病人手术前后的对照，但镜头被严格禁止在手术室外。难得几次把相机带进手术室，被科室主任板起脸来问：“你刀子开好了吗？”等科室主任不在时又去拍，麻醉科主任接着训斥他：“你想不想进步了？做好你手术就行了，你拍这个干啥？有啥意义？”

在老医生们看来，手术室是个绝对专业的区域，摄影是与治疗完全无关的闲情逸致，医生已经拥有社会的尊敬，并不需要向外人展示什么。年轻的医生把心思放在这里，简直是“烧包不浅”。

在孙宁东的成长经历里，能吃苦、技术好是做医生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孙宁东的爱人郭徐林也是一名医生，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也是武汉大学医学院的同学，两人如今都在解放军四五八医院工作，郭徐林是特诊科主任。

“大家都觉得医学生是书呆子，因为我们整天都在背，血管的名字、肌肉的名字要背，像三羧酸循环这种生理、生化反应，各种化学公式也要死记硬背，外语也要下死工夫去学。人家患者说哪里哪里疼，你必须得反应出这是哪一块肌肉、哪一段神经。”郭徐林回忆夫妻俩的青年时代，基本会吃住都在医院里，一个医学生要经过见习、实习才能自己上手诊治病人，到了医院后，每年的晋职称、评比都是要必经的考验，从一名应届毕业生，到住院医师、主治医师、主任医师，是一长串艰难的进阶之路。

孙宁东夫妇刚参加工作的 80 年代，医生的工作跟现在一样，都是超负荷运转，孙宁东最多时跟主任两人同时管过 52 张床，那两周时间每天吃在科里睡在科里，要手术，要写病历，要查房：“那时候我曾经一个夜班开过 5 台阑尾炎手术、1 台胃穿孔修补术、1 台肝破裂缝合术，几个手术台挨着，这边打麻醉，我在那边睡觉；这个病号送走了，我躺 5 分钟，再做下一个病号。”

在手术室，主刀大夫是绝对的掌权者。花了 20 多年，孙宁东一步一步晋升到这个位置，2003 年，他当上了四五八医院肝胆外科的科室主任。“当上外科的主任了嘛，这回终于想拍就能拍了。”

2006 年 9 月 28 日，孙宁东办了自己第一个影展，名为《火眼金睛仁者心》。展览中有大量医生眼部的特写，在浅蓝色的帽子口罩之间，手术室里医生只露

出一双眼睛，这双眼睛大多数都戴着近视眼镜，在常规审美里未必谈得上漂亮，但在无影灯照射下，不管面容是苍老还是年轻，这些全神贯注看着手术区域的眼睛，每一双都格外有神。

影展中孙宁东最得意的一张照片叫《又是夜深人静时》，照片中是 2004 年四五八医院第一次做肝移植手术的场景。

当时这台手术已经在夜里进行了 6 个小时，孙宁东和两名年轻大夫已经把病变的肝脏切了下来，手术台交给另外一组大夫继续做新肝移植。两名年轻大夫已经累得瘫软，因为手术没结束，还不能离开手术室。其中一个坐在板凳上，双手抱头闭目休息，另一个直接趴在旁边的台子上小睡。比他们年纪大的孙宁东当然也很疲惫，他跪在台下，镜头穿过年轻大夫的双臂，拍下了手术台忙碌的景象。

“这个是框式取景，有人在打瞌睡，有人在动，你放大了还能看见主刀大夫的眼睛，特别亮。”现在四五八医院已经做过 140 多例肝移植手术了，这张记录历史的照片给孙宁东赢得了很多摄影界的奖项，这是他摄影的一个个人成就。同时，肝移植是当今外科领域最尖端最困难的手术之一，照片中的这个场景，也记录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峰。

B 超屏幕上的结节

孙宁东的语速不快，他总是慢条斯理地跟病人讲话。在甲乳外科，他每天要跟很多人反复讲甲状腺、乳腺肿瘤的病理机制。其中甲状腺癌算是恶性度最轻的一种癌症了。不需要化疗放疗，复发和转移率也很低，很多患者的肿瘤一辈子都不会继续病变。即便是这样轻度的癌症，徒弟毛丽烨坐门诊时也只说是“长了肿瘤，良性或者恶性”，从来不提“癌”字，一提这个字，几乎所有患者都会闻之色变。

孙宁东在肝胆外科时，接触的癌症患者更多。尤其是肝脏，肝癌有四个自然阶段：

第一，早期亚临床期。由癌前病变细胞产生到亚临床肝癌诊断的成立，时间约 10 个月，无任何症状，影像学也难以发现；

第二，亚临床期。由亚临床肝癌到症状出现，一般约 10 个月，常由影像学发现，此时若能早期诊断，手术切除，5 年生存率可达 60%～70%；

第三，中期。由症状出现到黄疸、腹水或远处转移，约 4 个月；

第四，晚期。即黄疸、腹水或远处转移的出现到

死亡，大约2个月。

肝癌总的病程大约2年半时间，其中2年时间都是在没有症状的早期阶段，“当患者感到疼痛再过来做检查，很多已经是肝癌晚期了。一般转归就3个月到半年”。孙宁东一直不用“死亡”这个词，他用的是“转归”：指病情的转移、发展和最终归属。在晚期肝癌这里，所谓的归属就是死亡。

孙宁东见过很多患者拿到检查结果，当场情绪崩溃。“过去有个话：‘是癌治不好，治好不是癌。’‘十癌九个埋，还有一个不是癌。’——实际不是那么回事。”孙宁东觉得很多病人都是被癌症吓死的，医生发现问题，要懂得照顾病人的情绪。

“先想办法让患者住院，再做进一步检查。一开始B超检查出来问题，只能跟人家说是可疑，考虑有某一种可能性，继续做穿刺、切开等的病理检查化验之后才能下结论。绝对不能直接跟患者说：你得癌了。”孙宁东说。

2008年9月11日，郭徐林在B超机器上看到的景象，让她跟丈夫说了一句自己说过无数次的话：你最好再做个检查。

孙宁东上一次年度体检刚刚在4个月之前，身体一切正常。这一次是孙宁东主动要求去南沙群岛的赤瓜礁代职，为边防哨所的官兵们做医疗服务。赤瓜礁条件艰苦，孙宁东想起个带头作用，老同志去过了，年轻人的工作就好做了。临行前的例行体检中，郭徐林发现丈夫的肝脏上长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结节，这是肝癌亚临床期的典型情况。

郭徐林让丈夫接着做了个CT，第二天拿着片子全院会诊，四五八医院分出了两派意见，因为结节只有1厘米大小，很多人觉得是良性的，也有人认为4个月内长出这么清晰的结节，不是什么好事。孙宁东去华侨医院做了磁共振，得到良性的回复；夫妻俩又把片子拿到中山医学院、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去会诊，各个医院的专家都认为良性的可能性大，最好三个月后再复查。这时四五八医院的专家统一讨论，建议还是开刀，把这个病变切下来。

在四五八医院，郭徐林所在的特诊科每天要做近200个肝部B超，节假日不休息，这些患者又会汇集到楼上的肝胆外科做进一步诊断。也就是说，夫妻俩每年要面对大量的肝病患者。郭徐林也很少见到丈夫这样的情况，一年里，能在亚临床期发现的病患不超过10例，大部分患者发现时结节至少已经是两三厘米大，或者已经进入了肝癌中期。

夫妻俩自己就是专家，对病理知识掌握得多，在

此时反而并不一定是个好事。郭徐林立刻意识到一旦是恶性，这个家庭很快将落入什么境地。“我哪能不想啊？按肝癌的恶性度，基本上只能活半年左右。晚上我也在被窝里悄悄流眼泪，但我不能表露出来，这时候病人也存在一些侥幸心理，我们不能进一步谈别的话题。”

孙宁东也很明白。一类癌细胞要发展为肉眼可见的米粒大小，需要三个月时间，但从这里开始，癌细胞的发展是按等比数列增长的。“等差是2、4、6、8、10，等比是2、4、16、256这样的速度，就像乞丐用象棋棋盘跟国王要粮食的那个故事，一开始只放一粒米，等比增长，到最后整个国库掏空了也给不起了。”

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手术做还是不做？当疾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即便是经验再丰富的医生，也会因为情绪的严重波动，无法完全果断地给自己下判断，况且此时的治疗权还在别人手上。跟肝癌打了半辈子交道，孙宁东第一次遇到这样艰难的选择題。“我最后说，如果这是我会诊的病人，一百个人来，我一百个都会说‘切了它’，非要让它发展下去还不如切了呢，睡觉也安生了。”

多年的从业经验，让夫妻俩此时在对方面前都表现出高度的理性。孙宁东回忆：“我爱人没在我面前哭过，后来也再没提这件事。”郭徐林评价爱人：“孙主任非常乐观。”开刀之前刚好是中秋节，两人带着毫不知情的女儿去海岛玩了一圈，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开开心心地过了一个中秋，她甚至没有从父母的表现中发现任何异常。

2008年9月，结节被发现的10天后，孙宁东被推上自己每天工作的手术台。他很得意的是，自己手术前非常镇定，心率是每分钟57次，血压是97/57，跟常人无异。

躺在手术台上，他变成了无影灯和镜头下面那个被观看的人。

手术做到一半，还在开腹状态，郭徐林被叫进手术室，请来的专家肯定地告诉她，这个肿瘤确实是恶性的。切掉的部分做了病理，拿到几个医院再次会诊，结果都是早期肝癌。开刀的决定是对的。

女儿给孙宁东的恢复期留了一组照片。照片上，有老病人回来复查，惊讶地发现之前的主治大夫居然躺在病床上，孙宁东继续在床上给老病号开方子：“我也是人，我怎么不能得癌。”手术一个月后拆线，孙宁东肚子上有一道横贯的伤口，是用类似订书钉一样的钉子固定的。以前给病人拆线时，孙宁东看见对方疼得龇牙咧嘴，总觉得有点夸张：“有那么疼吗？我轻点。”



很多病人都是被癌症吓死的，医生发现问题，要懂得照顾病人的情绪。先想办法让患者住院，再做进一步检查。





(孙宁东 摄)

孙宁东摄影作品《晨曲》——解放军四五八医院的护士阳丽莉在书写交班日志

这一次，孙宁东自己把器械伸进自己的皮肤，一个一个地把钉子起出来。那七八分钟，是孙宁东毕生最钻心的时刻。如果把疼痛分成从1到10的指数，“那次最少也有7或8”。

孙宁东很幸运，自从2008年开刀至今，他的癌症再没有复发过。肝脏有强大再生功能，他的肝脏正在逐步长大，几近恢复至正常肝脏大小。那道伤口，变成了他审视疾病的另一个切入口。

相机拍不到的故事

晚上17点30分，孙宁东带徒弟毛丽烨去查房，13张病床已经住满了，每天早上7点30分查一次，晚上下班前查一次，因为住在医院里，夜里22点，孙宁东会回到病房再转一圈。师徒两个一直都笑嘻嘻的，推开一个门，就开始跟病人寒暄、夸对方恢复得不错。有位大姐第二天要开刀，紧张得几天都睡不着，

孙宁东叮嘱晚上给开点安眠药，让家里再送几件厚衣服免得感冒了。有年轻女孩子坐在床上咔嚓咔嚓地啃苹果，孙宁东逗她：“给我们留几个！”

最后床位上的中年女人满脸愁容，是唯一一个没回应师徒俩玩笑的人。“乐观个啥啊，都好不了了。”孙宁东一愣：“我不是给你看过刀口了吗？肝癌是癌中之王，我这不是好好地活了八年了吗？你得要振作。”女人没抬头，一时有些冷场，大家度过了尴尬的几秒钟。

出门后，孙宁东轻声告诉我，那名患者是乳腺癌，她开过一次刀，现在复发了。师徒俩查房时嘻嘻哈哈，是为了让患者们心情轻松些，早点恢复好出院。但这种复发且转移的乳腺癌再想治愈已经很难了，医生唯一能做的是尽量延长她的生存时间。

2008年的手术之后，郭徐林不准爱人再全国到处拍照了。孙宁东的镜头集中对准了手术室。他找来几组影展的照片：“这些都是偏唯美的。”屏幕上，手术室都呈现出各种精致的美感，对称工作的开刀大夫和助手，小护士像女神一样举着无影灯，一个有美丽大眼睛的女医生聚精会神地研究术区的血管，用来做颅骨手术的不锈钢机械反射着金属的冷光……这确实是“唯美”的照片，医生在无影灯的陪衬下，如同圣徒般散发着神圣的光芒。孙宁东的照片现在经常被媒体借过去，当出现医患关系恶性案件时，这些照片变成了医生这个职业最好的介绍。画面精致、干净、让人体会到一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崇高感。但实际上，真正的冲突往往处在模糊的边界。

孙宁东是广东省暨广州市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专家，就在这几天，他正接手了法院发来的一起医疗事故鉴定。某家医院为一个第二次做剖宫产的孕妇接生，生产后缝合子宫时，妇科医生发现脾脏有破裂伤，就叫来外科做了止血。

“到这一步医院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对的，否则孕妇肯定会有危险。之前的剖宫产出血后，也许跟周围的脏器有了粘连，形成了疤痕，第二次剖宫产时一牵拉，就可能造成了这次脾脏撕裂。”孙宁东觉得这个病例不应该算事故，但问题出在医院没有及时告知病人和家属。术后病人做CT和B超，发现右侧肋骨骨折，左侧脾脏下方有积液，继续追问才知道缘由。病人家属就此将医院告上了法庭。“也许医生确实特别忙，看到手术圆满结束了，忙起来就忘了跟家属交代，但是病人有知情权，医生有告知的义务。对方一旦追责，要精神损失费要营养费，这就变成一次纠纷了。”

这样的纠纷孙宁东每个月都要鉴定几起，甚至他自己都被卷入过这种官司中。2010年，他抢救了一名

从不慎从6楼头朝下坠下的空调安装工人，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人还是没救回来。等病人家属来了才发现，死者在医院登记的是另一个同乡的姓名，那位同乡有医疗保险，本是想让治疗能报销，没想到人没救回来，就连着公司老板一起逃了。

家属咬定医院是跟同乡联合诈保，质问医院凭什么写别人名字，为什么不核实身份，送来时患者还会说话，医院怎么把他治死了。

“你说我冤不冤？病人送来颅内出血、脾脏破裂、胸腔出血并气胸、四肢骨折、骨盆骨折，我们哪里有时间去核实病人身份？没有家属签字我们也必须得抢救啊！”孙宁东这件案子花了一年多时间才结案，最终结果是“法院为了同情弱者、安抚家庭，让我们适当地减免医疗费，医院再给死者家属赔偿两万块钱”。

孙宁东摊手：“假如当初我不治，这个人死了，医院什么事都没有，但是良心能过得去么？”

孙宁东没有拍过这些纠纷，甲乳外科的办公室里也有一副盾牌和一根防暴棍，孙宁东又翻抽屉找出来一瓶辣椒水，他看我在拍照，叮嘱不要拍到他的脸，他并不想与这样的器具合影。

在这个办公室里整天用小音箱低声播放着《黄河大合唱》、《雪绒花》、《水边的阿狄丽娜》的60岁老主任，大半辈子都是一名军人。他的摄影镜头百无顾忌，但展示出来的只是精心挑选过的一部分。那些参展的照片里，也有一些血腥的画面，比如抢救一名艾滋病吸毒者，唯一的血迹是从主治医生护目镜上反射出来的。有一张烧伤手术的照片，女医生把病人烧伤80%以上的大腿抬在自己肩膀上，画面被处理成黑白的，“真实场景整条腿都是血肉模糊的，放出来一般观众受不了”。

孙宁东最后给我看了一个文件夹，里面记录了一个悲伤的现场：丈夫倒车，怀孕的妻子在后面指挥，结果一下子被丈夫撞到了。孙宁东从晚上19点送医开始一直目睹了抢救的全过程：先剖腹，孩子出来已经没了呼吸；摘掉子宫，年轻的母亲出了一桶的血，手术巾全部被血浸透了；半夜零点多，妻子宣告不治。外面等候的丈夫相继接到孩子、妻子的死讯，整个人已经彻底崩溃了。孙宁东记录了手术室内的整个过程，包括死去的女人已经散掉的瞳孔。凌晨1点，主治的急诊大夫全身是汗，筋疲力尽地瘫软在椅子上，为了补充体力，他直接把塑料袋装的生理盐水往嘴里挤，此前手术台上视线锐利的双眼，已经是满目颓然。

“孙主任，你当时什么感想？”“没什么感想，就是没救回来啊，这种事太多了。”

（实习生唐瑶对本文亦有贡献）

银行债转股试水

主笔 谢九

3月8日，国内最大的民营造船企业熔盛重工宣布，拟向债权人发行最多171亿股股票，包括向22家债权银行发行141亿股，向1000家供应商债权人发行30亿股，以抵消171亿元债务。如果此次债转股能够按计划完成，熔盛重工最大的债权人中国银行将持有其14%的股权，并且成为其最大股东，这也将成为我国首个商业银行债转股的案例。在我国企业负债和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的背景下，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债转股将就此突破尤为引人关注。

按照我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不得持有一般企业的股权，其中第43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也就意味着商业银行实施债转股存在明显的法律障碍。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商业银行曾经对大量不良资产实施过债转股，不过当时是通过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来曲线操作，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然后将债券转为股权，并非商业银行直接债转股。这一次中国银行通过债转股成为熔盛重工的第一大股东，应该属于“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银行债转股获得突破，主要还是和当前中国经济去杠杆的大背景相关。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其中去杠杆主要在于降低企业负债率。我国企业负债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尤其是一些过剩产能负债率更是居高不下，这些行业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地方政府出于保护就业和税收的考虑，长期通过银行贷款输血维持这些企业僵而不死，由此使得这些企业的负债率越来越高，加之这些企业自身盈利不强，偿债能力低下，使得企业偿债压力越来越大。此次实施债转股的熔盛重工是我国最大的民营造船企业，造船行业也是我国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几大行业之一，除了造船业外，钢铁、煤炭、水泥和有色金属等几大传统过剩行业的负债压力更甚，在这次熔盛重工和中国银行试水债转股之后，预计在其他一些过剩行业也有可能陆续出现更多的债转股案例，为中国经济的去杠杆探索新的思路。在今年的“两会”期间，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目前银行‘债转股’还在

研究中，需要经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和技术准备才能推开。”

除了帮助陷入困境的企业降低负债压力，债转股的另外一个目的在于为银行的不良资产寻找出路。最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滚雪球般迅猛增长，2013年，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5921亿元，比年初增加993亿元，增速20%；2014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8426亿元，较年初增加2506亿元，同比增长42%；截至2015年底，商业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飙升至1.27万亿元，增长4300多亿元，同比增长51%。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就已经翻番。在不良贷款余额迅速增长的同时，不良贷款率也在快速提升，2013年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2014年上升到1.29%，2015年上升到1.67%。虽然我国商业银行拥有较高的拨备覆盖率水平，但是如果不良资产以这样的速度增长，再高的拨备覆盖率也难以抵挡，尤其是随着经济增速越来越放缓，企业的盈利能力更加恶化，银行不良资产积累的速度还会提升，如果不能得到合理处置，银行高速增长的不良资产有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引爆点，因此，为银行的不良资产寻找出路已是刻不容缓。

在现有法律和制度下，快速妥善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从目前的各种试点方案来看，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几乎都在寻求现有法律法规上的突破。停摆8年之久的不良资产证券化已经悄然解禁，根据有关报道，工行、建行、中行、农行、交行和招行这6家银行将参与首批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总额度500亿元。银行将不良资产进行证券化处理，可以将账面上的不良资产在市场上出售，既可以减轻不良资产压力，又可以快速盘活资金，可算是一举两得。但与此同时，不良资产证券化也容易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也正是由此而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我国的不良资产证券化在2009年叫停，2011年重新恢复信贷资产化，不过都是优质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的证券化重启还是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一次。除了解禁不良资产证券化，被现有《商业银行法》限制的债转股也同样实现了突破，和不良资产证券化相比，债转股对于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效果

果无疑更加明显，银行将债券直接转为股权，账面上的不良资产可以一笔抹消，同时又避免了不良资产证券化带来的大幅折价出售。

从短期来看，债转股对于企业和银行都可以带来双赢。企业将债务转为股份，极大减轻了债务压力，有利于企业轻装上阵，为企业脱困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对于银行而言，将不良资产转为对企业的股权，账面上的不良资产压力也可以明显减轻。不过从长期来看，债转股的负面效应也同样突出。

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任务是去产能，尤其是很多过剩行业里的僵尸企业，是这一轮去产能的重点对象。如果债转股大面积推广，这就使得很多僵尸企业再次获得继续活下去的可能性，无疑会对当前的去产能带来挑战。同时，企业将债务转为股权，也会增加企业的道德风险，债转股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企业逃避债务的一种方式，最终的结果可能不仅不会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反而鼓励企业更大胆地借贷，使得企业在债务扩张之路上越走越远，并将风险转移至银行。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债转股虽然在短期内将账面上的不良资产予以抹除，但这只不过是技术上的处理，真正的坏账风险并没有因此消除，如果企业经营不能得到好转，银行持有企业的股权无法得到合理的分红回报，这样的股权从实质上还是属于不良资产。

另外，从技术上来看，银行持有企业的股权比持有债权需要占用更高的资本消耗，大量债权转为股权，会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我国的商业银行一向有着很强的资本饥渴症，债转股如果大面积推行，银行可能会开始新一轮的资本补充。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银行业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实行过大规模的债转股，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不过时过境迁，当时的经验可能很难再度复制。一是因为当时的国有商业银行尚未上市，因此可以通过行政指令推进债转股方案，不会遭遇太大的阻力；其次，当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受大量的不良资产之后，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因此当时大量的不良资产其实还具有很强的投资价值，不良资产管理其实反而成为一座金矿，当时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中，中国信达和中国华融更是先后在香港上市。

不过今天银行再度试水债转股，背景和当年已经大为不同，首先是大型商业银行基本上都已经是上市公司，除了要担负为实体经济脱困的政策性目标之外，还不得不考虑到股东的利益，因此推行债转股的阻力会远远大于当年。其次，随着中国经济增速逐年放缓，企业盈利能力弱化，不良资产这座金矿的含金量也在下降，因此，对于银行而言，大量持有困难企业的股权，最终能够变现的价值也可能越来越小。■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6年第三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87

- 肖邦的遗产
- 代博、汪晓花、张可驹、雷苗苗对肖邦钢琴奏鸣曲和钢琴协奏曲的精彩解读

纪念册 后布列兹时代

话题 进步与倒退：勃拉姆斯和利盖蒂的《圆号三重奏》

爱乐笔记 键盘好声音之霍洛维茨

我的古典“前传”与“外传”

作曲家档案 保罗·欣德米特（上）

演奏家档案 穆拉·林帕尼：一位被遗忘的优秀女钢琴家

唱片说明书 唱片的镜像（女性篇）

作品 从《四首严肃的歌》看勃拉姆斯“晚期风格”

听片购片与收藏 余青欣古琴曲的版本比较与赏析

《爱乐》2016年订阅须知

2016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6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1

返景复照：叙利亚撤军与普京的战略收缩

文 / 刘怡

从高调合并克里米亚到突然自叙利亚撤军，短短两年时间，普京重复了在俄罗斯历史上曾反复出现的“战略扩张—急剧收缩”循环。他的政治地位虽仍足够稳固，但化解经济困境才是当务之急。



1. 2015 年 12 月 9 日，俄罗斯空军对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控制区阿勒颇进行了轰炸

2. 3 月 14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国防部长绍伊古等官员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议

3. 3 月 15 日，俄罗斯战机从叙利亚归来，降落于沃罗涅日市。一名飞行员的家人前来迎接

与 5 个半月前突然宣布出兵叙利亚一样，这一回，普京又搞了个大新闻。

3 月 14 日下午，在和国防部长绍伊古、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等要员举行会议时，普京出人意料地表示：鉴于俄罗斯军队在叙利亚的干预任务已“基本达成目标”，他决定从次日起逐步撤出目前驻扎在赫梅敏（拉卡基亚港）和大马士革两个空军基地的 36 架俄空军战斗机、20 架直升机以及约 4000 名正规军，以推动

正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三轮叙利亚和谈。3 月 15 日，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第一批苏-34 型攻击机飞离赫梅敏的画面。俄国防部副部长潘可夫同时还表示，鉴于“伊斯兰国”恐怖势力尚未被消灭，撤军并不意味着莫斯科放弃在叙利亚的安全义务。俄罗斯军事人员和防空武器将继续留驻在赫梅敏空军基地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维持其日常运作，并参与政府军对“伊斯兰国”武装的进一步攻势。俄军派出的无人机也将继续起飞

监视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阻止反政府武装利用停火期交换防区或大规模补充军火。

近半年的军事行动过后，普京实现了他最初希望达成的两项目标：稳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控制区，避免反政府武装切断政府军在哈马省和大马士革省的交通线；重新确立俄罗斯作为中东事务主要参与者的地位，获得与美国、欧盟平等对话乃至展开政治交易的机会。第三轮日内瓦和谈的成型，与政府军控制范围的巩固以及俄罗斯的推动委实不无关联。不仅如此，叙利亚危机的持续发酵还使得美国与欧盟的内部意见分歧趋于激化。围绕是否应当“重返中东”，美国政府、国会以及军队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令中东各国质疑华盛顿对全球安全的承诺是否依然有效。正在进行中的总统选战，部分也受到叙利亚危机的影响，争议候选人特朗普甚至放言效仿普京，把叙利亚恐怖分子“炸得魂飞魄散”。在欧洲，汹涌涌入的数百万叙利亚难民甚至引发了“冷战”结束以来欧盟最大的一次政治分裂，默克尔、奥朗德等领导人的支持率屡创新高；相比之下，普京在国内的支持率已回升至74%，正准备角逐第四个总统任期，境遇相去不啻天壤。

但这并不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捷。普京以“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军事干预叙利亚的理由，却在“伊斯兰国”猖狂依旧之际宣告抽身，不免令人怀疑莫斯科国际承诺的有效性。对巴沙尔政权未来的命运，普京也未能做出担保，暗示了他和奥巴马一样无法承担旷日持久的军事干预带来的资源消耗。更重要的是，以叙利亚“支点”撬动欧美解除对俄经济制裁的“杠杆战略”，目前仍然停留在纸面上，前途难测。在国际制裁和低油价的双重压力下稳定住节节下滑的国民经济，对普京而言才是更严峻也更现实的考验。

空中打击上限已到

采用传统分析方法的观察家往往会高估叙利亚之于今日俄罗斯的战略意义。诚然，塔尔图斯港已经成为俄罗斯海军在欧洲以外的唯一基地，地中海东岸也不止一次充当过“心脏地带”强国俄罗斯向海洋进军的立足点，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权势投射和战略资源供给足够充分的基础之上。一个在中亚和近东站稳脚跟，并能持续输出军事和政治影响力的“大俄罗斯”可以利用叙利亚充当向南欧和地中海渗透的踏脚石，一个被阻挡于高加索周边、前出通道遭到土耳其阻遏的“小俄罗斯”却用不起如此奢侈的工具。换言之，

当驻地地中海的原苏联第5分舰队在1992年底宣告解散之后，塔尔图斯港已经沦为了一种象征性存在。

一个简单的数字对比便可窥见其中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构成苏联海军水面舰队中坚的“现代”级和“无畏”级驱逐舰在14节速度时的续航力分别是1.4万海里和1.05万海里，足以伴随航母驶入开阔大洋；到了今天，俄海军在建的新型护卫舰“戈尔什科夫”级和“格里戈洛维奇”级的续航力仅为4500海里和4850海里，缩水50%以上。它们只适于在黑海、波罗的海以及巴伦支海这样的半封闭区域建立制海权，却永无可能觊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战略航线。5个半月的叙利亚干预行动中，俄海军常驻塔尔图斯港的两艘巡洋舰“莫斯科号”与“瓦良格号”舰龄分别长达33年和27年，已是苏联时代硕果仅存的遗产。在造船工业基本丧失新建7000吨级以上大中型舰艇能力的背景下，俄海军在地中海的部署和活动频率只会进一步降低。

水面舰艇续航力的下降，意味着俄军难以在第一时间将实施军事打击所需的人员和物资投送到遥远战区，即使勉强为之，成本也势必极为高昂。莫斯科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缺陷：2010年，俄海军曾以13.7亿欧元的价格在法国订购了2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企图弥补远程力量投送的短板。但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法国拒绝继续执行合同，致使俄军在叙利亚行动中只能动用老旧的“蟾蜍”级登陆舰运送人员和装备。载重量达150吨的安-124型战略运输机在俄空军中也只剩下2架，不得不改用较小的A-50来运输弹药和补给品。事实上，普京选择以空中打击而非地面参战的方式干预叙利亚局势，已经考虑到了俄罗斯军事机器的现状：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周边国家尚可高举出击，但在遥远的叙利亚已无法确保后勤补给。

即使是负担相对较轻的空中介入，所费也相当不赀。著名防务资讯企业简氏资讯集团（HIS Jane's）发布的分析报告指出：为维持部署在叙利亚的36架固定翼攻击机、20架直升机以及至少1500名军人的日常活动（以每天出动30个架次、每个架次投掷5枚炸弹计算），俄罗斯国防部每天要支出230万~400万美元的费用，保守估计每个月的日常开支在1亿美元以上。换言之，不到半年的行动已经耗费了至少6亿美元的军费，相当于俄今年国防预算总额（412亿美元）的1.4%，这还没有计算消耗精确制导弹药、海基巡航导弹以及海上舰艇换防的开支。而俄军承受的

损失虽然相对较小(1架攻击机和1架直升机被击落),但随着作战时间继续延长,装备故障率和人力开销势必进一步增长。在俄国防部已经迫于经济不景气,计划将军费总额下调5%的情况下,降低行动费用至少能确保新装备的研发和军人福利不受冲击。

而从空袭的实际效果看,俄军5个多月的援助使得叙利亚政府军成功稳定了对西部沿海地区以及叙利亚—黎巴嫩边界的控制,这一地区内的人口占目前叙利亚总人口的近2/3。在哈马省和大马士革省中部,空中掩护令政府军维持住了几块分散的大面积控制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交通线,使其不致被反政府武装彻底围困。但从消灭对方有生力量的角度看,空中打击的效果只能说一般:据非政府组织“叙利亚人权观察站”(SOHR)统计,截至2016年3月中旬,俄军的空袭共造成1567名“叙利亚自由军”(最大一支反政府武装)士兵和1276名“伊斯兰国”士兵死亡,另有200~1000名平民死于空袭,但配合俄军作战的政府军和伊朗什叶派民兵战死人数也在1000人以上。换言之,空中行动的效率上限已经封顶。

经历了整整5年筋疲力尽的战争,叙利亚政府军虽然能勉强稳住对西部地区的控制,却根本无法撼动“伊斯兰国”在中、东部腹地的战略优势。俄罗斯本身也在援助控制北部地区、要求独立的“库尔德人民保卫军”(YPG)向拉卡省反攻,足见其早已接受了政府军无力收复全部领土的既成事实。而在政府军捷报频传的2016年1月,“伊斯兰国”对东部名城代尔祖尔的围困仍在继续,“自由军”在拉卡基亚省的战线也并未全面崩溃。在和谈即将展开、巴沙尔或许会被取代的情况下,莫斯科没有理由继续投入成本。

另一方面,在长达近半年的军事行动期间,俄罗斯始终未能找到一个体量足够庞大、目标又完全一致的盟友来分担在叙利亚的安全义务。德黑兰是莫斯科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主要支持者,但伊朗同时还须兼顾也门战局,能投入的物力、财力相对有限。本身面临“伊斯兰国”威胁的伊拉克政府在反恐问题上与俄罗斯立场一致,但巴格达当局需要首先收复本国被恐怖主义武装控制的领土。在独联体各国对联合出兵中东反应冷淡的情况下,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上院)议员伊戈尔·莫罗佐夫甚至在去年9月主动对媒体放风称:“中国的一艘护卫舰已经抵达地中海,航母正在随后驶来。”旋即被中国外交部所否认。对原本就视叙利亚问题为杠杆的莫斯科来说,扩大军事行动有陷入“阿富汗化”的危险,莫如尽早抽身、节约成本。

经济困境的“表”“里”

与2008年在南奥塞梯、2014年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杀伐决断相比,普京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选择无疑带有更精明的算计,这与俄罗斯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前两次战争适逢国际能源市场的“黄金12年”,以油气出口作为经济支柱的莫斯科不仅有能力承担额外的军事开支,面对政治和外交压力也是底气十足。时过境迁,经历了乌克兰危机之后的国际制裁与油价雪崩式下跌,俄罗斯GDP规模已经由2013年时的2.15万亿美元缩水至2016年初的不到1.3万亿美元,人均GDP下滑至全球第75位。俄罗斯央行在3月中旬发布的数据称:全俄GDP在2015年全年萎缩超过3.7%的情况下,预计在2016年内还将继续缩水1.5%,最早要到2017年底才会重新进入增长周期。在布伦特原油价格始终徘徊于每桶30~40美元的情况下,普京被迫承认:此前以50美元油价为基准编制的2016年度财政预算案未免过于乐观,需要根据实际做出调整;俄罗斯经济的疲软状况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人们需要“进一步勒紧裤腰带”。

对这位在1999年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铁腕强人来说,承认政策失误并不是很常见的情况。他曾经指责“外国敌人”要在俄罗斯制造“南斯拉夫式的局面”,通过分离主义让俄罗斯分裂;也指责过“邪恶的阴谋家”通过打压油价掏空俄罗斯的国库,唯独没有怀疑过由他本人在21世纪初一手打造的“能源出口至上”经济模式。正是普京亲手摧毁和逐退了以“野蛮生长”姿态在叶利钦时代呼风唤雨的七大寡头,将过去由私人逐利者掌握的油气“现金牛”(Cash Cow)转移到国有企业或更可靠的代理人手中。能源红利被用来改善社会福利和安抚军队,使政府支持率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油气资源在国际政治中亦被当作“胡萝卜加大棒”加以运用,一方面在需求急剧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待价而沽;另一方面藉此在东欧和高加索重建影响力。在油价超过每桶80美元的2006~2013年,俄罗斯被视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当之无愧的第一梯队(即所谓“金砖四国”),普京亦以罕见的“总理—总统”走马灯模式,牢固地维持着在政坛无可替代的地位。

但不祥的因子也就在歌舞升平中滋长。能源产业的“二次国有化”意味着出口油气获得的现金大部分流入了能源利益集团以及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寻租人手中,国家预算收入、黄金和硬通货储备



石油价格下跌导致俄罗斯经济大幅缩水，官方统计街头流浪人数有 1.6 万人，非官方数据达 6 万人左右

量、GDP 增长率以及本币汇率也都与油气价格直接挂钩，抗风险能力极为低下。从 2000 年到 2014 年，石油一天然气占俄罗斯货物出口总额的比例从不足 50% 上升至 70%，政府岁入的 50% 和 GDP 的 17% 来自能源产业，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却持续萎缩。尽管莫斯科一直在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积累黄金等方式调节市场，但完全无法抑制初级产品部门畸形繁荣带来的“荷兰病”——本币汇率上升，工业出口减少，制造业衰落。早在 2013 年，全俄 GDP 就因为“荷兰病”爆发了 1.5% 的负增长，而那时油价还处在 100 美元以上的高位。

未能借助能源红利实现制造业复兴只是“普京经济学”的缺陷之一。另外，这位曾经的克格勃特工也需要现金流来维持国民和强力集团（军人、警察、特工）对政权的信心。从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开始，各级公务人员（占全俄劳动力总数的 38%）的收入就以超过 GDP 增长率的速度持续增加，叶利钦时代出现巨额

赤字的社会福利保障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弥补。至于强力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们取代七大寡头成为克里姆林宫的经济操盘手，并在事实上垄断了全国金融资本。对能源红利漫不经心的挥霍与“荷兰病”交互作用，使俄罗斯经济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就出现了极其古怪的失衡——人均工资增长率达到两位数，关税增幅超过 8%，GDP 数值却在缓慢下滑，国内外投资额、基础设施建设量以及工业出口总额无不处于缩水状态。

合并克里米亚招来的国际制裁成为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为偿还到期外债，俄罗斯企业不得不卖出卢布并买入美元，造成上千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卢布汇率也持续下滑。普京原指望本币贬值和进口商品减少能带动制造业复苏，却忘了俄罗斯经济一直是在低失业率、高产能利用率的古怪状态下运行，几乎无法找到新的产业增长点。银行、零售商和中型企业在汇率“血崩”中遭遇了洗劫，进口贸易额下滑 35%，商品零售总额下滑 10%，全国贫困人口在两年内增加

了50%、上升到2200万，通胀率高达16%。而在能源出口这项经济命脉也遭遇惊人的“熊市”之后，强悍如普京也只能发出“勒紧裤腰带”的号召，变得无所适从。

不过，简单地将当下俄罗斯经济的处境与1998年那场大萧条相比未免危言耸听。彼时，莫斯科刚刚结束伤筋动骨的经济转轨，GDP在7年里累计缩水超过40%，外汇储备贫弱，抗冲击能力几近于无。而在本世纪初长达12年的能源“牛市”中，莫斯科至少积攒了4000亿美元的硬通货和黄金，短期内不会出现崩盘。俄罗斯能源企业以卢布支付开采费用，获得的出口收入则以美元计算，这意味着在卢布汇率和油价同时出现下滑时，企业的实际收入受到的影响并不像账面数字那么惊人。不仅如此，卢布崩盘甚至还缓解了困扰俄罗斯多年的“荷兰病”——随着本币快速贬值和消费减少，到2016年初，俄罗斯黄金和外汇储备大致与前两年的进口额持平，卢布汇率逐步稳定，通胀状况也有所缓解。唯一的差别在于经济总量大幅缩水。

经济困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助于增强普京政权的控制力。由于无法自海外获得融资，债务缠身的俄罗斯企业必须进一步仰赖政府的支持以维持运转，危机中的银行业也需要政府的担保来提振信心。更重要的是，在危机中损失最小的恰恰是赚取美元的油气出口企业，而他们也是普京政权的基本盘。在私营经济凋敝的情况下，巨型国企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话语权可能进一步上升，这意味着普京的地位在2016年将比2014年时更不可取代。无怪乎他在1月底告诉经济发展部长乌柳卡耶夫：“对现状我们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

欧亚主义的绝唱

但即使是普京这样一位枭雄，也不可能把需要“进一步勒紧裤腰带”的经济困难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同时强加给国民。经历了后苏联时代的混乱无序与贫困萧条，俄罗斯人对普京的热爱建立在现实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普京”这个姓氏意味着对收入增长的预期和更多的消费机会，无条件的忠诚则并不存在。他们可以接受一个时期内的工资冻结和收入缩水，也愿意相信政府对“外国阴谋”的解释，只要这一切不是永久性的。但对外战争的长期化却会唤醒人们对阿富汗的遥远记忆，那意味着无止境的被盘剥、

牺牲的常态化以及整整一代年轻人希望的丧失，因而是绝对无法容忍的。即使俄罗斯不可能像乌克兰或中东那样爆发街头革命，支持率的流失也会增加普京继续执政的难度。因此他必须早做决断，提前结束军事行动。

宗教因素则是结束海外用兵的另一层隐因。今日俄罗斯的1.43亿总人口中，有6%为穆斯林（路透社的估计则为14%），其中相当一部分与莫斯科具有离心倾向。而在5个半月的叙利亚干预行动中，俄军打击力度最大的却是逊尼派领导的“叙利亚自由军”、“伊斯兰阵线”等反政府武装，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这两个逊尼派穆斯林云集的地区强国也与莫斯科爆发了激烈矛盾。倘若来自逊尼派的敌意与俄国内固有的分离主义运动形成合力，在高加索地区或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制造恐怖袭击和政治动荡，潜在影响力将扩大到数百万人之众。将俄军撤出穆斯林教派斗争的最前沿，使中东问题重新成为中东人自己的包袱，也是明智之举。

然而无论如何，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主动出手，几乎已成为普京欧亚主义地理战略的绝唱。这一酝酿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21世纪初达到巅峰的战略，本质上是希望在国土面积和人口大大缩水、常规武力以及经济规模不敷使用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俄罗斯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它的对应物则是以转型后的东欧国家为代表的“中欧主义”，即经济上与西欧一体化，安全上依靠“北约”，以及亚洲新兴经济体秉承的以借助人口优势、发展全球外向型经济为特征的“太平洋主义”。俄罗斯由于体量过于巨大，不可能亦不甘心被欧盟所吸纳，自然无法奉行中欧主义。因为太平洋部分人口过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实现太平洋主义转型亦困难重重。如此一来，返回过去三个多世纪里曾被历代俄罗斯领导人所反复奉行的欧亚主义，几乎成为必然。

欧亚主义的实质，在于通过地理攻势重新巩固因苏联解体带来的破碎西部疆界，同时培养中亚与高加索诸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对莫斯科的向心力，最终形成一个横跨欧亚大陆、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与可观劳动力数量的政治—经济实体。2011年莫斯科方面提出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欧亚联盟”方案，便是这一战略的直接反映。而普京在经过数年的酝酿和试探之后，选择乌克兰作为其欧亚主义最重要的练兵场，绝非草率之举：作为俄罗斯与东欧之间的“新边疆”，乌克兰南邻黑海，西接喀尔巴阡山，拥有

4600 万人口，穿越乌国境内的天然气管道网络对莫斯科更是意义非凡。倘若能彻底取得基辅当局的政治归顺——最低限度也要中止乌克兰的“入欧”步骤——长期依赖“能源大棒”的俄罗斯对外战略将获得地理上的坚实支点。

只是这次踌躇满志的赌博，最终以满盘皆输而告终。即使普京随后就在叙利亚的反击分化了美欧联盟，并重新凸显出俄罗斯之于中东事务的重要性，他的“杠杆”至今也未能彻底撬动冷酷的经济制裁。莫斯科剩余的资金储备和中俄经济纽带可以保证俄罗斯不至于堕入 1998 年时的悲惨状况，但缺乏新投资和闲置产能的现实意味着普京的机动空间比 1998 年时的叶利钦更小。而希望从进一步国有化中获利的强力集团代言人，已经在和希望趁乱收购廉价俄罗斯企业、使之私有化的势力展开暗战，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普京的批评者、乌克兰裔美籍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莫托尔在不久前断言：普京政权的崩溃已近在眼前。这显然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他正确地指出：即使是强人普京也未能在俄罗斯建立简洁、高效的垂直权力系统；当危机来临时，控制最多经济和政治资源

的新寡头和地方领导人最关心的未必是中央政权的稳固，而是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不受损害。实际上，在最近一年多的经济困顿中，恰恰是类似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这样的能源巨头在从央行大笔借入美元，通过牺牲国家的政策空间来维持自己的账面平衡，而这些巨头的掌控者恰恰是普京最重要的伙伴。从这个角度看，今年 2 月 3 日俄联邦内务部再度通缉前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或许并非偶然：整整 13 年前，正是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整肃揭开了普京对俄罗斯能源产业实施“再国有化”的序幕。而出狱之后的霍氏长期以温和派反普京人士的代言者自居，并且不止一次暗示：假如普京被迫辞职，他愿意充当过渡时期政府领导人的角色。如果说从叙利亚撤军反映了普京实施战略收缩的意图，那么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再度威摄则彰显了这位强人总统的决心：即使困难重重，他依然没有让出舞台中央的打算。☑

（参考资料：Joshua Yaffa, *Merry Christmas, Mr. Putin*; Andrey Movchan, *What's in Store for the Russian Economy in 2016*; Alexander J. Motyl, *The Collapse of the Putin Regime in Russia* 等）

《读书》2016 年第四期目录

许 宏 前中国时代与“中国”的初兴
姚大力 报告文学能讲述历史吗？
王 炎 阿拉伯的劳伦斯
万俊人 化敌为友如何可能？
黄晔耘 出口葡萄酒，“进口”政治哲学
熊秉元 苦涩的陪榜者塔洛克

短 长 书

禅边风月（詹福瑞）红楼苏州云乡梦（祝兆平）·文明史与师道尊严（冯庆）·警惕人文学术研究的“技术化”！（陈斐）

彭 刚 如何从历史记忆中了解过去
沈卫荣 “吐蕃僧诤”背后的历史叙事
冯兴元 安·兰德与哈耶克的对立
龚 龔 简·奥斯丁的读者们

品 书 录

酷刑与文明（刘治）·批评家不要忘了“临水的纳蕤思”（李松睿）·川端康成哪去了？（周朝晖）

李庆西 魏延之叛 老谈三国
万 明 中国的“白银时代”与国家转型

所 思 荒原狼的嚎叫
唐克扬 看千年都市，究竟芜湖
白谦慎 薛龙春 艺术史有没有自己的方法
郭 平 纸上琴声犹可闻

读 书 短 札

《越中名胜杂说》校札（仲秋农）·张敞密报废帝刘贺 北窗读记（刘涛）



《读书》
生活需要读书，
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A close-up portrait of actress Maggie Q. She has long, dark brown hair and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Her right hand is raised to her mouth, and she is biting her fingernail. She is wearing a black, high-necked garment.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muted blue-grey color.

犀牛角成分，等同你的指甲。

犀牛角由角蛋白构成，你的指甲也是。
不要为“指甲大小”的事情，谋杀珍稀的犀牛。

啃指甲救犀牛

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
when the buying stops, the killing can too

野生救援
WILDAID


AFRICAN WILDLIFE FOUNDATION
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

Maggie Q

wildaidchina.org

吴廷觉，缅甸新总统

文 / 张星云

吴廷觉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当选缅甸政府新一届总统。



3 月 15 日，在缅甸首都内比都，新当选总统吴廷觉向媒体致意

2010 年，缅甸军政府为了推进民主进程，建立文人政府，将它亲手扶植成立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协会简写中的最后一个字母从 A 改成 P，摇身一变成了全缅甸最大的党派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并以此参选当时的新一届政府大选。而昂山素季的党派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早在 2007 年就被撤销了参选资格，结果可想而知，巩发党获得议会大部分席位。就在大选结束一周后，军政府为了分散外界注意力，释放了昂山素季。2010 年 11 月 13 日，她结束了 7 年半的软禁后重获自由，在缅甸新的政治环境中没有任何位置。这时的缅甸人人拿着手机，仰光的网吧五步一个十步一个，Facebook 和 Twitter 正在成为人们主要的交流方式。这些，她从来都没见过。

获释当天，民众和记者们全都挤在仰光大学路 54 号院门前，那是昂山素季被接连软禁 20 多年的地方，所有人都将目光对向了趴在院门栅栏上的昂山素季。“我与大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所以肯

定与你们有很多事情要聊。”她说道，“只有大家共同合作，才有可能达到我们最终的目标。”就在昂山素季演讲的同时，她的右侧站着一名戴眼镜的白衣男子，昂山素季不时侧身对他耳语。他就是昂山素季的得力亲信吴廷觉，在她被软禁的最后 7 年半中一直担任着外部世界与昂山素季的联络工作。5 年多过去了，如今 69 岁的吴廷觉登上了权力中心，成为新一届缅甸总统。

去年 11 月 8 日昂山素季的民盟赢得议会选举，在人民院和民族院获得将近 80% 的席位，完全掌控了议会。但由于缅甸宪法中规定配偶和子女是外国人的缅甸公民不能参选总统，而昂山素季的两个孩子都是英国国籍，因此她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一直在与军方展开修宪谈判，最终无果。根据缅甸宪法，人民院、民族院以及军方各推举一名总统候选人，得票最多者成为总统，其余两人为副总统。今年 3 月 10 日昂山素季提名自己的亲信吴廷觉作为总统候选人，在军方及军方所影响的巩发党只占议会四分之一席位的情况下，吴廷觉最终获得议会总共 652 票中的 360 票，顺利当选总统。吴廷觉的当选被媒体誉为“近几十年来缅甸的第一位非军队背景总统”。由于吴廷觉一直行事低调，之前从没有在民盟中发表过公开讲话，因此在刚刚当选总统之际美国媒体误认为他此前是昂山素季的专职司机，但其实正是作为昂山素季亲信的角色，吴廷觉才偶尔为昂山素季开车。

经历

吴廷觉与昂山素季的第一次相识是在他们中学时代，他们是仰光卫理公会高中的校友，昂山素季比吴廷觉大一级。这所学校是仰光著名的西化知识分子和名流精英学校，学费昂贵，设有网球场，由美国卫理公会经营。身为昂山将军的女儿，昂山素季在卫理公会高中没有任何特权，这所学校，几乎每名学生都可以吹嘘的后台。那时百姓在仰光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但卫理公会高中的学生都是坐私家车去上学。“我们四个总统中的三个、吴努总理、皇室亲戚、达官显要，以及成立国际学校之前的外交官，所有这些人的

子女都在我们学校。”玛丹姬回忆道，“我们学校是唯一一男女合校的教会学校，也是全缅甸最优秀的学校。大部分保守的民众都不想让他们孩子上男女合校的学校，因此可以说我们的家长是仰光最开明也最西方化的一群人。”玛丹姬那时比昂山素季小两级，后来成为昂山素季1990年大选时的最得力助手，但在随后昂山素季被软禁期间因政见不同与她决裂。

吴廷觉的家庭背景当然殷实。他的父亲敏杜温(Min Thu Wun)是缅甸著名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20岁就开始写诗，毕业于仰光大学，后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曾任仰光大学缅文系主任。他写过大量的儿歌，后汇编成《写给貌魁们的诗》出版，代表作有《亲爱的姑娘》、《胜利花》等。他也是缅甸实验文学运动的主要作家，小说主要关注缅甸当时的百姓阶层和对大自然的向往，短篇小说《昂大伯骗人》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以及权贵阶层的丑恶，而《穿耳眼的仪式》则揭露上流社会的虚伪。同时，他编写的缅文字典则帮助很多文盲识字。

卫理公会高中带给吴廷觉的除了硬件设施，还有英语环境和国际视野。那时仰光还没有国际学校，所以各个种族不同语言的学生打成一片，另一名那时在卫理公会高中上学的同学婷婷回忆称：“我们的父母那一代都是英国统治下长大的，因此英文都很好。而学校规定，除非上缅甸语文课，否则我们必须用英语交流，即使在操场或者食堂，也有专门的老师监督，要是我们讲缅甸语就要被罚站。”

1962年，吴廷觉进入仰光大学经济学院学习，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在留校攻读硕士期间同时任教。1970年，吴廷觉转入大学计算机中心学习计算机编程与分析，并获得该校第一批公派留学的机会，1971至1972年到英国伦敦大学计算机学院学习，取得计算机硕士学位。他在1975年于东京又获得了一个计算机硕士学位后返回奈温将军统治下的缅甸，同年加入了缅甸政府的工业部，在其下属的重工业公司工作，1980年转到计划和财政部下属对外经济关系司任职。

吴廷觉在政府工作的10年是缅甸暴风雨来临前的10年。1987年缅甸国务院秘书长盛伦(Sein Lwin)下令废除大额货币，在一场通货膨胀导致的街头抗议中，军政府的镇压使几千人死伤。此时昂山素季刚刚从英国回到缅甸，并决心继承父亲的衣钵。军政府领导人奈温将军突然辞职，并提议实行多党制，举行大选。昂山素季在风雨摇曳的时刻建立全国民主

联盟，作为独立政党参加1990年大选，她自己担任党秘书长。在那场1990年的风暴中，父亲敏杜温比吴廷觉走得更前，敏杜温加入昂山素季的民盟，并代表民盟参选议员。

后面的故事路人皆知，虽然民盟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大选，但军方以缺少宪法为由拒绝承认大选结果，并要求包括敏杜温在内的胜选民盟议员候选人们签署“190号声明”，放弃组成政府的权利。昂山素季被软禁，而军政府则开始大批追捕当初的民盟议会候选人。敏杜温的所有文学作品遭军政府封杀，从缅甸出版物中被清除。1995年6月，当时非常流行的《文学日报》曾因想要发表一篇向敏杜温致敬的文章，而被勒令停刊整顿。心灰意冷的吴廷觉1992年便辞去缅甸政府的工作，加入民盟，开始为昂山素季工作，而敏杜温迫于军政府的压力，1998年辞去了民盟的职务。

吴廷觉此后的人生隐匿在民盟和昂山素季的背影后。他担任昂山素季助手20多年，即便在昂山素季被长期软禁时也常去探望，深得昂山素季信任。

他其中一个高光时刻是2000年。当时刚重获自由的昂山素季被规定不允许自由前往其他城市。2000年8月24日，她和诸多民盟成员一起想尝试突破军方的控制，却再度止步于仰光郊区，她拒绝回家，于仰光南郊的曼德勒火车站待了9天，与军方对峙。民盟成员登瑞(Thein Swe)与吞敏(Tun Myint)当时和昂山素季在一起。吞敏回忆说，在曼德勒火车站，没有人卖他们车票。“所有尝试都没有结果，到了晚上快22点，我们都很疲惫了。”军方开始用水龙头向站台喷水想赶走他们，但是他们依然不愿离开火车站。“当时吴廷觉来到站台，一名军人对他很无理地说话，平静的吴廷觉挑衅似的反击，让这名军人‘礼貌’地威胁他。”

最终9月2日，200多名防暴警察出现在站台，逮捕了他们，昂山素季再度被带回了她的别墅重新被软禁起来，而吴廷觉和其他民盟成员则被带进了著名的永盛监狱。吴廷觉在永盛监狱里待了4个月。“我们这些人中第一位获得探监的犯人。”同样被送进永盛监狱的吞敏回忆道，“人们给他带来了食物，但他并没有吃，他让人们把这些食物送给其他牢房的犯人，并要求一定要将这些食物分享给所有犯人。”登瑞则说：“我那时发现吴廷觉并不将穷人与富人分开对待，对所有人都很平等。”如今登瑞与吞敏都已经成为民盟在两院的议员，而当时和他们一起坐牢的



(蔡小川 摄)



(蔡小川 摄)

左图：中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许利平

右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环孟加拉湾研究室主任宋清润

吴廷觉则成为总统。

2012年，昂山素季以她母亲的名字建立杜庆芝基金会，吴廷觉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基金会主要在昂山素季的选区高穆从事教育和卫生方面的公益工作。吴廷觉的夫人杜素素伦（Daw Su Su Lwin）是人民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他的岳父吴伦（U Lwin）则是民盟创始人之一。吴伦曾经在军中服役19年，后来又在缅甸政府先后做过财政部长、副总理，横跨军政两界。吴伦曾在1989至1995年昂山素季第一次被软禁期间担任全民盟的副主席，和主席吴昂瑞一起掌管全民盟的事务，并在昂山素季被释放后将全民盟指挥权交回予她，保住了全民盟的团结。

进程

缅甸近30年的历史进程远比所有人的个人命运

要复杂得多。早在去年11月8日民盟赢得议会选举之后，昂山素季就曾表示她作为民盟主席将“超越总统”。由于2008年通过的宪法中依然规定子女或配偶为外国国籍的缅甸公民不可以参选总统，昂山素季依然被这条规定所束缚。因此在去年议会大选结束之后，昂山素季和民盟马上就与军方展开了好几轮的谈判。

在经历了1990年大选结果被取消，大量逮捕民盟党人之后，军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大大降低。西方各国陆续开始制裁缅甸政府，也正是在此背景下，2003年8月军政府宣布七点民主路线图计划，重启制宪议程。虽然民盟并没有参加制宪会议，但2008年5月新宪法成功通过公投，填补了1988年以来的宪法真空，也为之后的多党民主制铺路，成为如今政府合法性的基石。2010年吴登盛总统的上台和此次民盟获得议会多数席位，都是基于2008年通过的宪法。

按照中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社会文化

研究室主任许利平对本刊的说法，在吴廷觉此次成为总统之前，昂山素季与军方有过至少三回合的谈判。第一次是议会选举结束之后，缅甸前军政府领导人丹瑞大将（Than Shwe）派自己的孙子与昂山素季进行了一次见面，几个小时的会谈让军方对未来政权交接、民盟施政，以及国家改革等方面进行摸底。第二回合是作为丹瑞亲信的原巩发党主席吴瑞曼（Thura Shwe Mann）与民盟进行谈判。第三回合则是现任三军总司令敏昂兰（Min Aung Hlaing）与昂山素季进行了不止一次的谈判。谈判的重点则首先放在是否可以冻结宪法中的约束总统候选人外国籍家属的条款，以让昂山素季真正当选总统，目前来看显然这一点民盟和军方没有谈妥。此外未来军队地位的问题则是双方谈判的重点。早在1990年大选后，昂山素季就曾表示对缅甸进行彻底改革，最终怕遭到清算的军方不愿意交权。而此次如果民盟掌权后想要修改宪法，也主要想推进军队职业化，因此与敏昂兰的谈判，则被视为今后军队权力的讨论。谈判的最后一点，则是此次总统人选的问题，因此吴廷觉也必然是民盟和军方都认可的一个结果。

按照多方的猜测，昂山素季很有可能出任新政府内阁中的外交部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环孟加拉湾研究室主任宋清润对本刊表示，出任外长将是她的一个优势，而缅甸现在迫切需要与外界进行接触、需要来自国外的投资，将缅甸打造成一个正面积极的形象，还有望将一些还在实行的西方制裁取消掉。外交部长作为内阁核心成员，是缅甸国家国防与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而该委员会是缅甸军方与内阁进行协调的重要组织，只有担任外交部长，昂山素季才能进入该委员会。而在该委员会成员中，外交部长是唯一一名民选部长。

但目前的宪法规定，如果昂山素季想要进入新政府内阁，则必须先辞去民盟主席的职位。此外宪法还规定，总统的权力高于任何内阁成员。如果昂山素季真如此选择，将会导致一个悖论：内阁部长昂山素季将对总统吴廷觉的行政决策施加影响。“这就是缅甸政治戏剧性的一幕，亚洲特色的政治转型可能和西方不太一样，受到很多亚洲国家自身传统、文化和国情的因素影响，说与做往往是不匹配的，这就是亚洲政治的现实，所以才突然之间造就了吴廷觉这么一个总统。”许利平说道。

早在1960年昂山素季随获任命为缅甸驻印度大使的母亲前往印度，她们当时在德里住的房屋如今成

了印度国大党的总部，现在一幢房屋里挂着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的画像。巧合的是，如今昂山素季如果不做外长，也很有可能重走索尼娅·甘地的道路。2004年印度大选中，国大党获胜。身为国大党议会党团领袖的索尼娅·甘地按照惯例将担任总理一职，但由于她的外国血统，反对党反对她出任总理。最终索尼娅·甘地5月18日宣布将不出任印度新政府总理，被她推荐的前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就此成为此后10年的印度总理，而索尼娅·甘地则始终作为国大党主席在背后施加影响。

然而，军方依然在缅甸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影响巨大。宋清润觉得如今民盟和总统依然很难节制军方，而军方可有力制衡民盟施政。首先依据宪法，军方独立，不受总统节制，独立管理人事、开支、军事行动等军务，还掌握两个庞大的经济集团：缅甸联邦经济控股公司和缅甸经济公司（集团），与军方关系密切的大企业家也不少。其次，军方掌握国家几个核心权力机构，在社会治安、国家安全、民族和解等问题上发挥关键影响力，总统需与军方协商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军人在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国防与安全委员会11名成员中占6席，民盟官员最多占5席。国防、内政、边境事务三个部长由军官出任，其中，内政部掌管全国警察、情报等工作，机构人员遍布全国各地，负责社会治安等管理工作。联邦、省和邦、联邦直辖区、民族自治地方应有国防军总司令提名的军人参与国防、安全和边境管理等行政工作。再次，军人占据联邦及地方议会25%的席位（加上巩发党议员则在联邦议会占近三分之一席位），只要军人不同意，任何修宪提案都过不去，昂山素季就当不了总统。此外，宪法规定一旦军方认为出现联邦分裂、民族团结破裂等重大违纪，军队有权收回所有政治权力，终结文人政府，接管政权。

“短时间内，军人很难退出缅甸的政治舞台。”许利平评价道，“但我觉得昂山素季在经历过这么多年后，会比以前更成熟了，懂得去妥协、去协商，也不会轻易地推动修宪。”许利平认为消除贫困和民族和解将是民盟上台后聚焦的主要方向，由于民盟的任期为5年，只有努力解决这两方面问题才能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如果昂山素季的新政府能够促进民族和解问题，将会使缅甸少数民族武装集中的中缅边境稳定性更强，而稳定性将给中缅两国跨境合作带来更多的机会。■

中国渔船被击沉：冲突背后的渔业现状

记者 付晓英

长达 20 年的过度捕捞使中国近海渔业资源越来越接近枯竭，越来越多的中国渔业企业走出国门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因为非法捕捞以及一些捕捞陋习，也使中国渔船饱受诟病，甚至经常成为国际纠纷的主角。

被击沉的中国渔船

中国渔船被阿根廷海岸警卫队击沉的消息传入国内后，舆论立刻炸开了锅。事情发生在 3 月 14 日，阿根廷方面称，该渔船涉嫌在阿根廷海域内非法作业，海岸警卫队追赶数小时下令其停船未果，渔船企图逃向国际水域并试图撞向巡逻船，不单让船员生命受到威胁，还威胁到巡逻船海警的安全，因此警卫队才开火。在遭到射击后，渔船船身缓缓倾斜，最终在临近马德林港的海域沉没。所幸，沉船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包括船长在内的 4 名船员被阿根廷海警救起，其余 28 名船员则被附近的中国渔船救起。

被击沉的渔船编号为“鲁烟远渔 010 号”，属于中国水产总公司旗下的烟台海洋渔业公司。从公开的资料来看，该公司似乎实力不俗：拥有远洋生产渔船 41 艘，远洋捕捞船队遍布太平洋、大西洋，常年在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渔场从事鱿钓和底拖网作业，年均捕捞产量近 4 万吨，被称为“北方远洋渔业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其介绍，这家公司的传统强项是鱿钓——而这次出事的“鲁烟远渔 010 号”即为专业的鱿钓船，这艘渔船于 2010 年建造完成，船身长 60 多米，价值上千万元，此前在秘鲁渔场作业，2015 年底才转至阿根廷附近的南大西洋海域。

渔船被击沉后，对于阿根廷方面的言论，烟台海洋渔业公司最初回应称，船只严格遵守了规定，在公海上捕鱼作业，未进入阿根廷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内，并对阿根廷方面的武力执法感到意外和震惊。双方各执一词，事实究竟如何目前仍不清晰。但阿根廷海警在执法过程中击沉渔船的行为在 15 年中尚属首次，此举也引发了很多争议。

阿根廷附近的南大西洋海域是极佳的远洋渔业作

业区，这里公海面积广阔，渔业资源丰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渔船，也是中国远洋渔船作业的重要海域之一。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的《西非渔业资源之殇》报告称，2014 年，南美海域已经成为中国第四大海外渔场。

中国渔业对阿根廷海域的开拓始于 1987 年，中国水产公司最早进入，其他渔业企业则逐渐跟进。目前，中鲁渔业公司、上海水产集团、浙江远洋渔业公司等都在阿根廷独资或合作开展捕鱼作业。但中阿渔业合作仍然存在诸多难题，入渔许可是其中之一。2015 年 11 月 10 日，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发布的一则消息称：“阿根廷曾承诺给予中方 20 艘鱿钓船的入渔许可，但进展缓慢。2014 年 2 月，阿根廷就批准了中国 4 家企业 9 艘鱿钓渔船的入渔许可，但截至 2015 年底，只有 1 艘完成相关手续。”

办理阿根廷入渔许可手续复杂、费用高昂、过程缓慢，因此，迟迟等不到阿根廷入渔许可的中国渔业企业更多情况下，通过收购阿根廷的渔业企业来获得入渔许可。2014 年，上海水产集团以 2150 万美元收购阿根廷阿特玛渔业公司 100% 股权，4 艘渔船因此取得许可证，可以在阿根廷海域内合法捕捞红虾、鱿鱼、鳕鱼等产品，得益于此，集团年捕捞产量增加 1 万吨。

丰富的渔业资源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能够以正规合法的方式收购阿根廷本地渔业公司的企业极少，绝大多数渔业企业不具备准入条件，但却同样希望能从市场中分得一杯羹。在利益驱使下，该海域成为非法捕捞的重灾区。据阿根廷媒体报道，每年在阿根廷海域内非法捕捞的渔船通常在 400 艘左右，但仅有少数的渔船被查扣，绝大多数非法作业的渔船最终逃脱了制裁。阿根廷国家通讯社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从 1990 到 2013 年，阿根廷海军共逮捕过 20 艘在阿根廷海域内非法作业的渔船，其中 4 艘来自中国大陆，7 艘来自中国台湾，其余 9 艘则来自韩国、西班牙、日本和波兰。

针对愈演愈烈的非法捕捞，阿根廷方面加大了执法力度。此次“鲁烟远渔 010 号”被击沉是中国渔船与阿根廷方面发生的最严重的冲突，然而却并非第一

次。此前，中国渔船与阿根廷方面还发生过几次广为人知的冲突。2012年12月24日，阿根廷海岸警卫队以涉嫌非法捕捞为由，扣押了两艘来自中国山东省石岛港的渔船“鲁荣渔6177”和“鲁荣渔6178”，这两艘渔船当时正在距离阿根廷马德林港约400公里处的丘布特省海岸专属经济区内捕鱼，被阿根廷海岸警卫队拦截，并查获10吨冰冻鱿鱼和其他新鲜鱼类。2013年6月17日，载有180吨冻鱿鱼的中国渔船“福远渔873”也因非法捕捞被截获。这三艘渔船最终被分别处以550万比索（约合100万美元）的巨额罚款。但非法捕捞行为并未因巨额罚单而停止，2015年4月6日，编号为“沪顺渔809”的渔船又在马德林港海域被查扣。

因为多次被查获，中国渔船在阿根廷的形象并不光彩。阿根廷记者罗伯特·马图拉纳曾在报道中称：“当一群中国渔船来非法捕捞时，总会有一艘船上带有最先进的雷达技术，海岸警卫队要来的时候，他们能立即发觉。阿根廷巡逻船经常从北面过来，雷达发出警报，然后所有中国渔船都逃掉了。”他还说，中国渔船经常能事先从阿根廷海岸警卫队内部的腐败官员那里得到巡逻船离港时间等信息，进而在更充裕的时间内逃脱。

冲突背后的中国渔业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渔船在南美海域的纠纷仅为冰山一角，在黄海、东海、南海、日本海等中国周边海域的纠纷更加密集。老渔民刘刚向本刊记者讲述了自己的远洋捕捞经历。他工作的渔船曾多次冒险进入朝鲜和韩国海域，也曾因非法捕捞被海警查获扣押，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渔船被扣押，问题也并不严重，解决起来也很“轻松”。“如果渔船在捕捞过程中被发现，又无法逃脱，只要听从对方的执法要求，不反抗不对抗，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麻烦。如果渔船在韩国海域被扣押，老板交了罚款他们就放人，韩国人素质很高，渔船上的东西他们都不会动；如果渔船被朝鲜扣押就比较倒霉，不仅要给他们交罚款，渔船上的东西还会被搜刮一空，甚至连船员的拖鞋都不放过。”刘刚说。

他经历的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冲突是在2012年。“我们当时一共有两艘船作业，头船在前面带路，跟船在头船后面作业。我们原本是在朝鲜的海域作业，后来跟着鱼群进入了俄罗斯海域。头船在进入海域后不久就被俄罗斯海警发现，对方开了12炮，好在没有击中要害。不过那次也是不走运，头船的发动机坏



3月15日，阿根廷海军司令部发布照片显示，阿根廷海岸警卫队击沉一艘中国渔船



山东大学海洋学院教授王亚民

(蒙小川摄)

了，没能顺利逃脱，被俄罗斯海警扣押，最后交了几百万元罚款，船长为此在俄罗斯坐了半年牢。”刘刚说。他当时是跟船的船长，见形势不妙，指挥船只迅速逃离俄罗斯海域，才侥幸躲过一劫。

为打击非法捕捞，近年来各国的执法力度都在加大，开出的罚单金额也一路飙升。但渔船老板们并未在逐年增加的风险面前望而却步，他们甚至提出了“联保”的策略来分散风险。“通常就是10条左右的渔船结成联盟，联盟中的船队共同承担风险。联盟内的某只渔船如果被查扣，其他渔船就会联合起来去‘抢船’，这时候执法方如果只有一条船，肯定招架不住九条渔船的集体围攻，‘抢船’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万一‘抢船’失败、渔船被查扣罚款，联盟内的渔船也会共同承担罚金，这种做法现在非常普遍。”刘刚对本刊记者解释说。

刘刚工作的渔船虽然遭遇过查扣和高额罚款，但渔船老板并未因此收敛。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私人渔船都会选择铤而走险。在刘刚看来，这是无奈之举。“我被渔船老板雇用为船长，拿的是一年十几万元的固定工资，但渔船老板的收入完全取决于捕获量。现在国内海域基本上被捞空了，根本打不到鱼。一条渔船动辄投资成百上千万元，老板要收回成本、要赚钱，只能越界去国外海域偷鱼。”刘刚说。他们最常去的就是韩国和朝鲜海域，那里渔业资源丰富。“一小时甚至半小时就能捕获1吨鱼，相当于国内海域一天的捕获量。”他对本刊记者感慨道。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近海渔业资源越来越接近枯竭，这是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很多人可能认为污染是海洋生态系统破坏的主要原因，海洋污染虽然也是原因之一，但影响区域相对有限，一般为靠近岸边的局部海域。而过度捕捞影响的是全海域、是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相比于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山东大学海洋学院教授王亚民告诉本刊记者。

过度捕捞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彼时中国渔业生产技术发展迅速，渔船数量增加，渔民的捕捞能力也随之增强，使得20年间近海捕捞量持续大幅增长。根据《中国渔业年鉴》公布的数据，从1986年到1996年，近海捕捞量从430万吨增长至1153万吨，平均每年增长10.4%。在这种形势下，海洋捕捞强度很快超过了渔业资源的承受范围，为了保持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1999年，国家出台了捕捞量“零增长”的政策，对渔船数量和捕捞量实行控制，希望能够遏制海洋捕捞业掠夺式的增长。“当时提出渔船数量要控制在20万艘左右，但效果并不明显，2002年，渔船数量大约增加到22万艘。但即使实行零增长，中国近海渔场也依然处于超负荷状态。”王亚民说。

过度捕捞改变了海洋生态系统，使鱼群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中国海洋发展报告》称，渤海和黄海有记录生物物种原本有300种，东海有760种。然而1997～2000年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渤海和黄海的生物仅剩180种，东海也只剩620种，海洋生物物种的种类分别减少40%和30%。带鱼、大黄鱼等有重要经济价值的优质鱼类数量更是衰退严重，带鱼的产量由1990年的49.8万吨增长到2004年的140.3万吨，之后开始下降，2011年产量降到了111.8万吨。而大黄鱼在经历了70年代的高产量后，进入80年代产量骤减，到2010年产量已由产量峰值的19.7万吨下降到

6.3万吨。“如今，中国近海捕捞的主要是营养层级和经济价值低的劣质鱼种。”王亚民告诉本刊。

国内渔业资源的衰减促使国内越来越多的渔业企业走向海外。“绿色和平”中国森林和海洋项目经理江雍年告诉本刊记者，2014年底，中国远洋渔业总产量和总产值分别达203万吨和185亿元，远洋作业渔船达到2460艘，2015年底则增长至接近3000艘，无论是船队总体规模还是远洋渔业产量均居世界前列。

然而，中国远洋渔业扩张的同时，冲突和矛盾也随之而来。在走出国门的众多渔业企业中，除了中国水产总公司等早期的开拓者，目前绝大多数的后起之秀都是私企。很多渔船来源复杂、装备精良，它们通常以两艘船为一队或若干对船为一组，经常偷偷进入对方专属经济区甚至领海内从事非法捕捞，还将许多捕捞陋习带出国门，使用网眼极小的“断子绝孙网”和大功率渔灯等争议性捕捞设备，导致矛盾冲突频频出现。

除此之外，江雍年还告诉本刊：“很多新成立的远洋渔业企业都是奔着远洋渔业诱人的补贴政策而来，之前根本不曾涉入渔业行业，其中还有很多是以

前的煤老板。他们对海洋文化没有深刻的体会和爱护。还有一些渔企原本在国内捕鱼，因为国内的渔业生产标准提高，于是决定在不考虑产业升级的情况下把落后的捕捞运作及管理模式直接输出到其他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去。”他担忧，这些渔企将会成为未来中国远洋渔业国际纠纷的主角。“企业在干坏事，政府忙着买单，国家的形象还受到损坏。”

而中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2015年10月，农业部办公厅下发《关于严格遵守北太平洋渔业管理组织有关管理措施的通知》，从渔船注册、数据报告、公海登临检查、船位监测和其他管理措施、秋刀鱼渔业养护和管理五个方面做出了明确要求。此外，从技术方面，目前中国每艘远洋渔船都装有卫星雷达导航系统及船位监测系统。理论上，如果中国渔船进入不该进入的区域，船位监测系统可以自动发出提醒。但江雍年也告诉本刊，该系统还存在很多急需改进的地方。“由于船只位置是由渔船在一定期限内主动报告的，而非实时自动汇报，渔船很容易利用时间间隔进入禁捕海域。因此，很多方面仍有待改进。”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刚为化名）



最美的滇与藏

踏寻旅人心目中的心灵圣地
深入绝美与隐秘之境
呈现与众不同的行走记忆

内含周刊：
《最美的滇藏线》
《去墨脱》
《腾冲》
《西双版纳》

可在以下电商购买本产品

亚马逊 amazon.cn JD.com 当当网 dangdang.com



(插图: 张曦)

天价学区房，“超级学校”的投入产出

主笔 / 贾冬婷 记者 / 龚融

教育资源就像一块蛋糕，理想的切分当然是均衡化。但是均衡是个长期过程，这一过程中的“超级学校”仍是众人争抢的稀缺资源——学区房作为唯一的主动选择通道，其“天价”不断被刷新。

“天价”换来的最牛小学

“现在炒得沸沸扬扬的‘天价学区房’46万元一平方米，听着挺吓人的，不过我都麻木了。我那间平

房要卖也得这个价了，我还不想卖呢。”皮诺是过来人，她前年用每平方米11万元的价格——那时候也是“天价”——买下了西长安街附近四合院里的一间15平方米小屋。虽说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但她一点也不后悔，孩子从最差学区的“渣小”，一步到位，成了全北京“最牛小学”实验二小（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学生。她回头看这个过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真是步步都踩在了点上，简直可以用‘传奇’来形容。”

和皮诺约时间只能见缝插针，她是全职妈妈，要赶着收拾家务和接送孩子的空当。我们在她租住的小区楼下见面，这里离学校就100多米，她和儿子手拉

着手就走过去了，也是为了让他每天能在家多睡会儿，赶上刮风下雨也能舒服点。“儿子每天上学高兴得不得了，家长受点罪就受吧，择校是无怨无悔的。”皮诺说，她张罗买学区房也是无奈之举。早几年她根本没考虑这事，老公单位有共建，也托了关系准备了20万元赞助费要上某某小学。没想到2014年初收到通知，共建取消了，走条子也不允许了，而孩子第二年就要上小学了，这意味着只能被动接受划片。他们家住丰台，对口的小学很“渣”，小升初更没有什么好的选择，觉得特别气愤、无助和恐慌。哭也来不及了，只能马不停蹄地看房。当时新闻里铺天盖地说要均衡教育资源，皮诺想着，最好的资源在西城，均衡也应该是西城首当其冲，加上老公单位也在西城，她就奔这边选了。起初打算凑80万元作首付，在差不多的学区里买一套能住的房子。但是看了一圈发现，西城楼房房源可选择得很少，看得上的怎么也得四五百万元，买不起；能买得起的又看不上，都是些“老破小”——或者户型不理想，或者隔音效果不好，或者挨着垃圾场，老旧的程度让人绝望。她意识到，在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通过买楼房来择校是不现实的，于是转而考虑买平房，先落个户口再说。

平房有平房的好处。皮诺想，看着单价挺高，但是总价低啊。买楼房最便宜也得400万元，但是买十几平方米的平房200万元左右就够，大不了再租个房子住，和买楼房相比，等于“零割肉”。不过真正操作起来，她发现平房市场里的水太深，很少有房主对外卖的，本来就稀少的房源早被一些小中介敛在手里了。“他们挣的不是佣金，是差价。中介看上一套房子，就给房主压了‘大定’，比如房主要卖100万元，中介先给70万元，过户后再付余款，房主也乐得省事。之后中介转手再卖多少钱是他的事，就跟房主没关系了。买到手，还有产权是共有还是私有，能不能落户等各种陷阱。”皮诺回头想想这个过程都后怕，“其间中介也推荐给我一套4平方米的房子，130万元。我一听就说：‘这房主想钱想疯了吧。’中介也尴尬地笑了笑，他也觉得离谱。后来不也卖出去了？”

皮诺一开始并没有想着要上所谓的“最牛小学”。“一是上不起，二是不敢上。都说学生背景高官权贵的，人家天天出国游，豪车多少辆，我们去了自己都自卑，何必让孩子受那个罪，对他成长也不利。”她做过生意，从投资角度考虑，也愿意买普通小学，最保险。“买好的小学，它要慢慢向外兼并，是走下坡路；买普通小学，是往上走的，低点买进肯定是利好。”她自认“对政策比较敏感”，当时已经传出好多“牛校”建分校、

合并校的消息，离实验二小最近的浸水河小学成了他们的首选。“都说它离实验二小最近，第一个兼并的是他们。当时想着如果消息成真，实验二小的资源能分一杯羹给我们，就很满意了。哪怕它不被兼并，西城的普小我们也能接受。”她在那附近几乎谈妥了一间平房，11平方米，120万元。等夫妻俩带着钱去交订金时，房东却坐地起价，反悔了。他也听说了合并的风声。“我这房子要划到实验二小分校，要30万元一平方米了。”他们只能继续折腾，跟着中介一路看到了国家大剧院西侧的西交民巷。皮诺的老公是搞建筑的，他一眼看上了这里的房子，不像别的大杂院就是一堆烂砖头，这里至少外面红墙灰瓦的，已经算是平房里的“翘楚”。不大的院子里被隔成了几间，十几平方米一户。皮诺说，这里原本本是一家人，四兄弟，后来倒手了几次，院子里就乱了，来了三个外姓的。要出售的这户也是因为和隔壁邻居常年不和，一点小事就能掀起轩然大波，不是你家房子漏水淹了我家的，就是你家风扇吹着我了，最后因为翻盖问题两人大战了几百回合，据说耳朵都要打掉了，实在没法再住在一起了，这家索性把房子卖给了中介，一走了之。当时的售价也还不太离谱，每平方米11万元，15平方米要价170万元，他们借一借也能凑足。那时候已经顾不上挑学校了，对口的小学是长安小学，在西城区算差的。皮诺说：“第一眼看到校门，都想哭。”

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2014年8月，皮诺一家办好了落户。9月，长安小学就并入了实验二小，而且由本校直接管理。“老师全部换成了实验二小的老师，学生换上了实验二小的校服。”又过了一个月，平房还没装修完呢，这里就贴出了腾退拆迁入户调查的通知。他们又赶上了拆迁，这意味着每平方米可以得到30多万元的拆迁补偿。2015年孩子到年龄要去上学时，学校又打来电话，通知他们，长安小学校区要改建，孩子可以直接到实验二小的本校报到。回想这个过程皮诺也觉得神奇，她形容：“生活需要我们含泪前行，然后在不经意间给你一个微笑。”

平房里几乎没有生活质量可言。搞建筑的老公将这间15平方米的小房子改造了一下，隔出了厨房和卫生间，还加建了一个小阁楼，使用面积扩大到了20平方米，勉强可以挤进他们一家三口。更可怕的是平房周围的环境，根本不是想象中鸡犬相闻的小院。皮诺告诉我，大杂院里鱼龙混杂，街坊四邻多是等拆迁的本地人，或者低收入的外地租户，更替频繁。皮诺记得第一次带儿子上平房旁边的公共厕所，她在外边等着，谁知道孩子刚一进去，马上大叫一声就出来了，

面色仓皇。她赶紧问怎么了。儿子一脸恐惧地说：“里面、有……”她说：“有什么呀？有狗啊？”儿子说：“有人……”他之前不是没有上过公共厕所，只是从来没有上过这种没有隔断、几乎“赤诚相见”的简易厕所。为了孩子上学更近，也有个好的环境，他们把这间平房租给了一个同样有上学需求的家庭，自己在学校附近重新找房子租住。小学附近的房源永远是捉襟见肘的，便宜的往往有致命伤，状况稍好的价钱又太贵，60平方米比较新的房子租金能到1.1万元。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间4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6000多元。“生活还是受了挺大影响，流离失所的感觉。现在住的已经是租的第二套房子，房租还在涨，也不稳定。”皮诺还是希望将来卖了丰台的房子，在这附近换一套小房子，守着孩子上学。

皮诺有时也会感叹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只有孩子”。“孩子开学以后就川流不息地接送上下学，其余时间也是围着他转，从早上准备早餐开始，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辅导孩子功课……真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她说，谁也不愿意花样年华就这么黯淡下来，这么折腾学区房也无非是为孩子争得一个机会。“老公是清华毕业，孩子资质可想而知也差不到哪儿去，但以前这样的‘牛小’机会根本轮不到普通人。学区房起码是用市场杠杆来衡量的，我的每一分真金白银知道流到哪儿去了。买了学区房，起码还有希望在。”

让皮诺庆幸的是，他们买平房的时候，教育“均衡”才刚刚开始，实力较弱的小学——所谓“坑校”——附近的学区房还没涨起来，所以她才能以11万元的单价买到手。现在这些“坑”都被合并校等政策填满，再加上拆迁的潜在利益，附近的平房水涨船高，46万元一平方米的天价早已不是个例。“说到底还是教育均衡得不够快，再快点，房价就能下来了，我们也能在这附近买个一居了。如果五环内都均衡到了，都成了学区房，原地不动也能接受好的教育，那我们又何必挤到二环内的平房里受这份罪呢？”

学区房：不确定性的解药

“一旦开始考虑学区房，就像是中了毒，其实是对未来教育不确定性的一种恐慌。90%的人都解脱不了，必须买下房子，提前消费，把确定性握在手里，才能解毒。”池雨形容。他因为前几年成功出手一套学区房，成了公认的学区房专家，越来越多的人来找他咨询。

他分析，学区房的存在，根本原因还在于教育资

源的不均衡。拿北京来说，行政区之间的不均衡不光存在，而且还特别明显。东城、西城、海淀三个区是教育高地，集中了最优势的资源。小学还不那么明显，到了初、高中更加突出。举例来说，北京高考平均分前10名的学校，常年被西城、海淀垄断，其他区只有个别学校偶尔进入过。而各区内部学校之间的不均衡也很突出。有数据统计，海淀区10所重点小学的教育事业费用支出平均为3300万元以上，而普通小学的平均教育支出不到1000万元。

学区房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最近两年陷入一种疯狂状态。学区房专家敖其告诉我，某种意义上，这是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强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资源公平化和均衡化的一个副产品。这牵扯到两个阶段的制度设计，幼升小和小升初。幼升小，一直是就近入学原则，只不过以前有其他路径，所以老北京和有门路的人，都不怎么在乎划片，反正可以通过单位共建入学，或者找人递条子，大不了交些赞助费。这一阶段最大的改变是2014年取消了“共建”，之前有共建的单位很多，尤其是在传统“牛校”众多的西城，更是众矢之的。根据池雨的估计，之前共建入学的比例接近一半。共建取消后，有一个新词叫“政策保障”，这是核心部委才能享受的一个指标，以往有共建校的央企和外企等都被排除在外，范围大大缩小。除了这部分“政策保障”入学之外，绝大部分人的蛋糕都被动了，他们新增的择校需求都转嫁到了学区房。

第二个阶段是小升初，现在把途径收紧为两种，一种是9年一贯“直升”，第二种是学区内“派位”。以前择校招数多样，比如说“点招”，去年完全取消了；还有“特长生”，比例也被严格控制了，比如西城区控制在5%以内；再有一种更普遍的“推优”，是按综合排名被推荐到好学校，但是这个比例也在收紧，以前西城区是25%，去年降到15%。也就是说，教委不鼓励大家在义务教育阶段去拼，但这么一来好学上进的学生凭借自己的能力进入好学校的机会也被没收了。其他路都被堵死了，升学的路径就变成了直升和派位，这两种都不是学生所能左右的，直升是看住房对应哪个学校，派位看在哪个学区。池雨说，直升是2014年在派位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初衷是把劣势的教育资源和优势的教育资源捆绑在一起，增加竞争力，“渣小对牛中”，但客观上也导致了学区房从一个纯小学的概念，扩大到可以直接对应某个中学。一个东西功能多了自然就值钱，所以房子也涨价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现在风口浪尖上的宏庙小学，之前在西城区不算‘牛校’，但它两年前教改之后直升了实验中

学，那是西城区数一数二的中学，结果学区房暴涨，一个月一个价，从每平方米不到6万元，到现在的16万元都打不住。这还不是那种买名额的平房，而是能住人的标准楼房。就是因为把小学和中学提前绑定了，购买中学未来预期的家长把这部分学区房价格炒起来了。”

为了遏制不同行政区之间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加剧，2014年教委又提出“锁区”，即在中考时西城、海淀、东城三个强区之间不可以互考，其他区考入又有名额的限制。池雨告诉我，这样一来，如果早期选择在一个弱区里，之后再想通过中考的方式进入到强区中，付出的成本更高，难度更大。从这个角度看，也把本来对于孩子中学的预期迅速转嫁到小学市场，但凡有办法的家庭，都试图在小学阶段就把学籍转到强区里来。其实从宜居环境来讲，东、西城几乎没有特别好的小区，九成以上的小区都是90年代以前的，购买学区房就意味着生活质量和居住品质的牺牲。池雨认为，学区房是家长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状态下，靠经济杠杆做出的一种无奈选择。

池雨也曾是“中了学区房之毒”的家长中的一员。他是北京邮电大学的老师，2008年儿子两岁，开始研究孩子上学的事，发现划片的小学实在太差。“红砖平房，没有操场，窗户漏风，全区倒数第一。”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去研究，以家到单位的6公里为直径，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圆圈，圆圈里的50多所小学都是调查对象。他不迷信数据，因为自己就是研究大数据的，太明白那些数据是怎么刷出来的，而资金、硬件，包括成绩，都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但是一些靠时间积淀下来的东西是无形的。于是就用最笨的办法，在放学时段跑到学校门口和家长聊，老师负责吗，吃得怎么样。也并没挑顶级“牛校”，觉得对孩子成长并不好。最终他选择了一所口碑不错的小学，以每平方米4万元的价格，买下了一间50平方米的学区房。虽然已经“解毒”，但池雨特别能理解那些还在焦虑中的家长的心情，也愿意提供指导，至少让他们的选择不那么非理性。就像“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这也是他要求使用“池雨”这个化名的原因。

来找池雨咨询的家长三教九流，大多数人给孩子设计的轨迹都有自己受教育的影子。比如一些“牛校”毕业的家长，就会对择校特别淡定。反而有一些当年因几分之差和清华、北大擦肩而过的，会有很强的圆梦情结，把这条路加诸孩子身上。池雨说，这些都无可厚非，不过对于那种孤注一掷、举家投入的家长，

他多半会劝一劝。“如果教育变成了一个奢侈品，一切都围着孩子转，就太过用力了，也会把这种压抑和回报心态传递给孩子，可能会带给孩子一个灰色的童年。”

谁推动了超级学校？

每一次学区房天价的刷新，都可以标识出教育“宇宙中心”的所在地。这一次当然是北京实验二小，公认的最牛小学。这所小学就在西长安街南侧的第二排，横跨两个街区，仿佛空降在胡同区的航空母舰。单价卖出46万元的那间11平方米小屋就在文昌胡同，胡同里的平房院落寥寥无几，每一个院子都被分割成十几平方米一间的小屋，大都房门紧闭，留下满墙求购的招贴。这一次的天价学区房是谁并不重要，因为未来这里的每一间都可能会创造新的纪录。去附近的一家中介门店询问，店员张占介绍，实验二小的学区房就集中在它西侧的三条平行街道上，文昌胡同、文华胡同和新文化街。他告诉我，平房他们不做，只做楼房。新文化街上有六栋楼房身在其中，不过在售的房源只剩三套了，80年代的老房子，单价14万元起。他向我推荐一套77.7平方米的三居室，南北通透，1110万元。

超级学校是一种极度稀缺的资源。池雨说，实验二小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靠学区房入学的学校，前几年大部分都是单位共建，剩下的则是靠“拼爹”——找关系入学。甚至共建名额都供不应求。一位在国家某重要部门工作的妈妈告诉我，前年儿子入学，单位有20多个适龄的孩子，但是共建名额只有10个，怎么办？入学前先考一轮来筛选。即便现在取消了共建，给普通人释放出了少量就近入学名额，附近的学区房也是有价无市，出一套就是天价。

为什么选择超级学校？池雨认为，一部分家长是社会精英，也希望孩子与有着同档次氛围家庭的孩子成为同学，他们有动力选择超级学校。另一部分家长看重品牌效应。“上超级学校有点像是买LV包，是一种形象，给孩子一种最好学校里的学生的自信感。”他说。从教委的拨款、软硬件投入、老师的师资力量、生源的一代代积累来看，超级学校与普通学校确实有差异。对孩子来说，更大的不同其实不在知识积累，而在“素质教育”层面，比如超级学校有音乐厅，有专业钢琴、小提琴老师，培养音乐素养就有优势。与外界的交流和活动也多，比如之前实验二小的体育节在“鸟巢”办，艺术节在人民大会堂办，校长说：“咱们有这个实力，为什么不让孩子们去见识一下？”池



(于楚众摄)

为孩子的教育谋一处学区房是家长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状态下做出的无奈选择

雨认为，这些教育资源的投入都有回报，但对每个家庭来说，它的必要性是可以讨论的，并不是必需品。

皮诺对这所“神一般的学校”的满意度超出了她花 170 万元买房的预期。她不无得意地提起儿子和其他低年级学生上课的老校，那里原来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克勤郡王的王府，后来翻建，仍保留着三套院的古典建筑格局，相当漂亮。等到升入四年级会进入一墙之隔的新校区，那个校园更现代也更气派。更重要的是孩子入学后的变化。“他原本内向，现在变得开朗、活泼了，远远地一看见老师就很开心地喊。”让她体会最深的也是老师对孩子的态度。“原来担心的权贵化并不存在，因为老师们都见过世面，反而没有那种特别势利的。我们这一批是从分校并过来的，但老师们都一视同仁。我儿子有一段时间脚趾头骨折了，医院给打上石膏，没法动弹了，怎么去上学呢？我去问老师，老师说你把孩子抱到学校，其他的事我们来管。就这么一个多月，我把孩子送到校门

口，老师再把他抱到教室。六七岁的孩子得有 50 斤，还背着书包，带着一壶水，老师摸他的脸开玩笑：‘你该减肥了啊。’”

超级学校就在各方推力下日渐膨胀。比如实验二小，取消共建之后，保障入学需求几乎不减，又新增了就近入学名额，导致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张，一班 40 个人，每届都有 20 个班，变成一艘超级航母。池雨说，规模过大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硬件使用过于拥挤，或者管理上的难题，有些学校怕太多孩子互相打闹，下课后不允许去操场嬉戏玩耍，只能在教学楼同层活动。他认为，超级学校的规模问题不能用进一步扩大规模去解决，那是种恶性循环。

一到下午 3 点半的放学时间，实验二小所在的新文化街就堵得水泄不通。尽管校门口道路调整为两条只能从中心向外的单向道，而且沿着院墙按班级划分了空间，但接孩子的各种车辆和人流仍无法从根本上缓解。皮诺也深有体会，她把家租到学校对面也是为

了孩子少受拥堵的罪，但周边逼仄的街道和环境无法逃避，附近也没有适合遛弯休憩的公园，只能画地为牢。

均衡：学区房出口

教育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提升的，所以无论是将蛋糕做大，还是将蛋糕切分得更均衡，最有效的方式都是将超级学校的优势教育资源向外输出，于是合并校或者办分校遍地开花。

黄城根小学也是一所众人挤破脑袋想要进入的超级学校。这所位于皇城脚下的小学建于1904年，是最早的公立小学之一，如今也是被均衡教育资源的重点。杨老师告诉我，这一进程自2013年以来就开始了，黄城根小学成立了教育集团，将原来的官园小学、后广平小学合并进来，又在房山、怀柔、丰台设了分校。她的第一感受是这种均衡根本无法实现。“本来是完全不同的学校，在原来的管理模式和教学理念上都有很大差别，老师们的状态也不同，想快速融合是不可能的。但是黄小的模式不一样，它采用了一种完全合并的方式，把原来的本校、官园、后广平三所学校的资源完全打散了再分配，把学生按年级分到不同校区。这样校与校就完全打通了，身边就有本校老师，可以一起学习一起研究。”

这种完全式合并也是出于旧城内超级学校的发展需求。杨老师说，原来黄城根小学的空间局限，在老城再扩张也赶不上需求的增加，现在的合并校每一个都不大，相互又离得不远，只有这样合并。“其实黄小的划片生源就10个班，还有6个班是留给政策保障入学的，所以一个年级就有16个班，一个校区只能容纳两个年级。”杨老师在这次改革中被调到官园校区，这个校区在合并时新修了校舍，硬件看上去不错，但是空间仍是捉襟见肘。她带我去看后面的操场，被四周的楼群和大杂院包围着，跑道只有200米的样子，只够一半学生去上课间操。

“从教育者的角度看，如果只是换块牌子，派个校领导过去，那样的合并没有意义，换汤不换药。”有20年教龄的杨老师告诉我，整体改变是需要时间的，最应该均衡的是优秀的教师资源。“老师是每一节课的根本。合并的重点也是提升老师的状态。通常是由本校的老师上一节公开课，其他人坐着听，之后再一起研究，形成教研模式。比如黄小的数学课就和普通学校不一样，不只局限于课本，或者说把课本容量扩大，通过公开课就能推广开来。以100以内数的认识为例，最基础的是数数，从1数到100，大部分孩

子很快就能掌握，之后就可以延伸，可以用摆小棒的方式，从10个1变成1个10；还可以用计数器，用正方体的模型，用数轴，这个容量就不一样了。学会了百以内的数，再去类推千以内的数，那么类推的能力也加强了。”

教育均衡给超级学校带来的挑战还有生源。杨老师说，原来共建生占大部分，父母单位都不错，也都比较重视教育，而且这部分需求都不能完全满足，要先通过考试来刷掉很大一部分人，所以能够进来的生源整体质量很齐整。现在大部分是直接接收的本片区孩子，这些家长反而一开始不能接受黄小的严谨作风。一部分是附近的新小区家长，听说被划入黄小还专门放鞭炮庆祝，但进来后，又觉得黄小给的压力大了，孩子压根儿就没有玩的时间了。还有一部分是胡同里的老北京，他们觉得差不多就挺好。“他这字写得比我当年强多了，你学校还教条呢？”杨老师记得，学校第一次开家长会，有人光着膀子、穿着拖鞋就来了。“当时我们觉得不可思议，黄小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家长？那次就提出黄城根小学家长的校规，家长也需要教育。所以黄小教育的对象不只是一个班40个学生，而是在这个基础上乘以2，是父母；再乘以2，是祖父母，一共160人。学校教育固然重要，某种程度上，家庭教育更加重要。”

一个学校积累的优质教育资源就那么多，黄小也担心在均衡中被稀释。杨老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坚持自己的特色。“现在老说要减负，但减负以后就不学习了吗？有的学校就真不学习了，天天搞这样那样的活动。但是黄小不允许，减负不减质，回家不留作业了，但课堂上除了精讲还要精练，仍然注重抓基础。如果没有了这种坚持，那多年以后就不会有人挤破脑袋进黄小，所谓的超级学校就和普通学校一样了。”

“水里兑一点酒还是水，酒里兑一点水还是酒。”池雨说，现在的模式是统一搞公立学校的均衡化，但真正的均衡需要时间。大多数合并还只是挂上了分校的牌子，意义比较表面。从更大格局来看，学区房的疏导出口还不够多元。他认为，其他的民办学校、国际学校、民工子弟学校都没有发展起来，择校家庭的选择渠道还是太少了。“学区房的突出问题主要来自极端高价房源，有这种需求的家庭正好也是私立学校的匹配群。但目前北京好的私立学校就那么几个，而且挤不进去，录取率几乎是20比1，比进实验二小更难。”

（文中部分人物采用化名。感谢“家长帮”论坛对采访的帮助。实习记者唐瑶对本文亦有贡献）



贡斌：复原真纸体系

记者 艾江涛 摄影 蔡小川

“纸的功能，是真实记录与还原当下的书写状态——你的情绪、速度与情感。”

在朝阳区百子湾的一间造纸作坊里，穿着一身麻布衣衫的贡斌，举着一罐叫作苏门答腊黄金曼特宁的咖啡粉，执意让我闻一闻：“浓郁的味道让你想到热带雨林，名字起得也好，一个朋友喝后说让他产生一种金碧辉煌的幻象。”这让我想起一年前的一次拜访，当时，他也拿着一罐咖啡让我感受。贡斌对植物的迷恋与深知，却令人印象深刻。自然，这与他从事5年多的古纸复原，不无关系。

生长在这个古老的国度，多数人大概如我一样，只从历史课上接受过如下常识：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是在东汉永元十七年（公元105年），由一个叫蔡伦的宦官发明。少数人可能还感受过造纸工厂的喧嚣，又或者体验过某个村落流传至今的古法造纸，但事实上，人们早就对这种充斥我们生活的东西，习焉不察。然而，贡斌认为充斥市面的所谓的纸，与能够真正代表中华文明高度的纸，纯然属于两个系统，前者带来的环保与污染问题，影射出现代文明的痼疾——用不断进化的新技术，来解决错误方法所造成的问题，并因此产生新的问题。简单来说，“‘paper’不是‘纸’，前者属于木浆体系，仅能完成传播的功能；后者属于韧皮纤维系统，能真正实现‘纸寿千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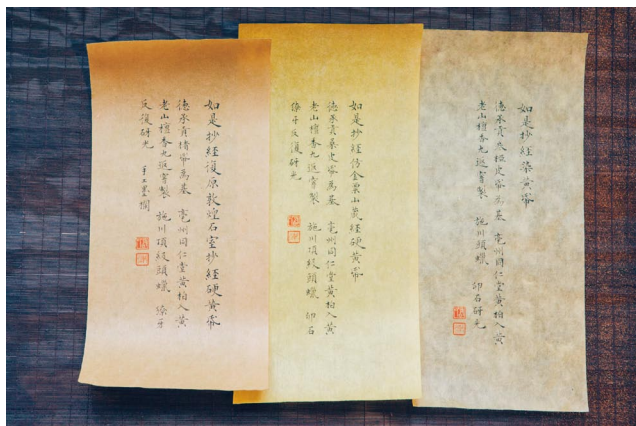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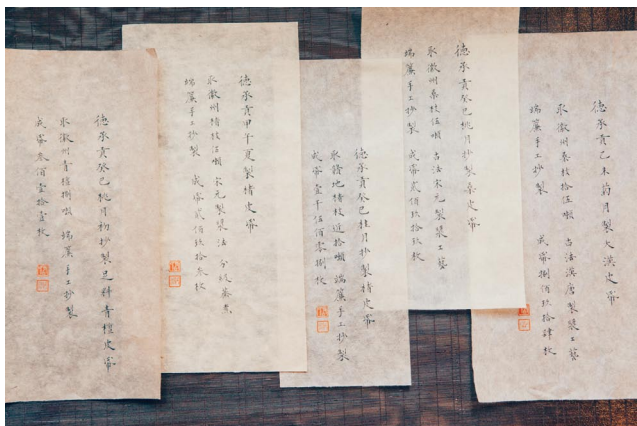
义上的传承功能”。而从事实层面做出的合理推断是，那套材料与工具造就的传统工艺，从元代起就已失传，“现在市场上能看到的文物修复所用的造纸工艺，都是明清系统的工艺”。贡斌要做的，是接续与还原元朝以前的传统造纸工艺，找到他理想中的“真纸”——这种真，成了他面对世界的基本前提，也一度引起我探究的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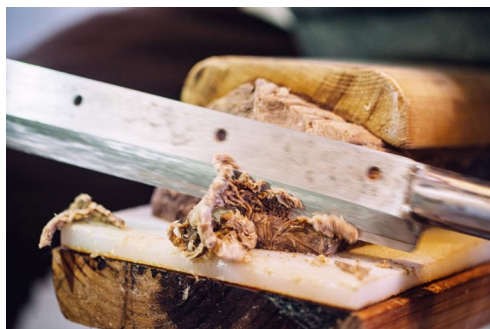
其实，早在2012年，贡斌的德承贡纸坊刚刚成立一年多，他的古纸制作还在试验阶段时，我就在机缘巧合下认识了他。朋友带着我到了那间有着老式窗户、摆满各种纸张的造纸作坊，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从切料、捣浆、抄纸、压榨到晾晒各个环节的设施。在大厅旁边的小间里，贡斌还让自己的搭档——专门负责试纸的画家伊西成，拿墨点在刚刚生产出的纸上，让我们观察吃墨的程度与晕染的层次。“纸的功能，是一种真实的还原，为什么说‘见字如面’？一张好纸，我能从笔锋的运转中，感觉到你的情绪，你的速度，你的情感。”

如果说几年前还是一种醉心于试验的状态，而今贡斌，做纸已经成为一种宿命，之前的所有经历都是为此而做的准备。在2009年开始研究造纸之前，贡斌跳了十几年的霹雳舞和现代舞，又跑到贵州大山深处做了三年的儿童公益项目。如今看来，“以前做舞蹈，对节奏的把握，在做纸中特别重要。同样，我那会儿去山里和孩子们玩，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寻找那个真，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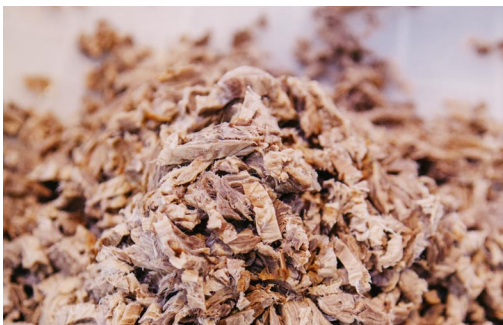
1. 德承贡纸坊创始人贡斌

2. 写有原料、制法与产量的原纸纸样





1



2



3



4



5



6

现人与自然那种相互给予、相互成就的关系”。贡斌说。

霹雳舞与“彩虹计划”

尽管在聊天的过程中，贡斌会随时用手打一段节拍，甚至哼一段旋律，很难想象，从上世纪80年代起的十几年里，他是一位跳过民族舞、霹雳舞、劲舞、现代舞，做过唱片、剧场的舞者。

与现在的许多北京孩子一样，贡斌在小学三年级时就被母亲送到区少年宫下面的艺术馆，学习唱歌和跳舞，不同的是，那时的老师不收费，只视天分施教。大约有两年时间，贡斌每天放学后，都要先去老师家

练习舞蹈基本功，之后再回到家中。

改变命运的一件事情发生在1986年，彼时，中美民间交流增多，包括贡斌在内的几十个孩子，被选中赴美参加为期一个月的舞蹈合演活动。机缘非常巧合，一个下雨天，贡斌本想跟其他孩子一样不去练舞，却被母亲硬拉过去，结果恰好赶上区少年宫下来挑人。几天之后，12岁的贡斌，拿着报名表，穿着母亲织的一件白毛衣，和一群孩子跟着北京市少年宫的老师现学现练了一段舞蹈，由于对动作的模仿和捕捉能力很强，那天只有他被当场选中。此后，他们在美国老师的带领下又排练半年，才赴美表演。

美国之行不可想象。带队的老师是谭盾的室友，



贡斌的德承贡纸坊古纸制作工序：

1. 切料
2. 切好的树皮原料
3. 捶料
4. 划漕
5. (端簾)抄纸
6. 上榻
7. 压榨

从纽约、华盛顿到洛杉矶，所到之处都有礼物，挑不过来的冰棍，地上可以亮的灯，市长家的游泳池……无数新奇的体验震撼着贡斌，也让他感受着世界无限的可能性。然而这趟旅行也让贡斌错过了两年一次的舞院招考，加上之后的受伤，他只得就读普通中学。因为调皮，所在的慢班被剥夺了高考资格，他只能上职高。毕业后，他卖了三个月的衣服，后来又为上警校去夜校补习，一度远离了跳舞的梦想。

1992年，夜校同学带他去北京有名的夜总会——月坛健康城跳舞，贡斌一下被巨大的电视墙和劲爆的音乐震撼。“所有的血在往上升，那种感觉太自由了。”很快，他被那里的老板看中，从此踏上上世纪90年

代异常生猛活跃的体制外舞蹈圈子。

在那个改革开放初启的年代，夜总会与迪斯科，几乎成为某种消费、娱乐与先锋文化杂乱并处的生态圈。贡斌一边和沙宝亮、杨坤等后来鹊起的歌星赶场子，一边和“魔岩三杰”、罗琦等摇滚圈的人喝酒、茬架。“那时候大家都是穿着军大衣，什么时候都夹着酒瓶。”一次帮朋友打架被扎后，贡斌跟着陈爱莲艺术团去了东莞，随后奔袭大江南北演出。“有时观众会上来和你一起跳。有时你正在跳舞，突然枪响了。”

逐渐地，他开始感觉很多东西越来越表面，越来越不真实，更重要的是，舞蹈最初带来的快乐与自由也在减少。他渴望寻找一些更本质的东西，寻找事物最初的状态。2006年，贡斌决定以个人身份，前往贵州织金县官寨乡下面的10所小学，开展他的公益计划。贡斌陪着路最远的孩子一起回家，让每个孩子命名一块在上学路上发现的石头，让他们每人画一幅彩虹，并在旁边写下自己的梦想。2006年12月，在摄影师江俊民和策展人舒阳的帮助下，孩子们的画作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的“织金彩虹计划”主题展上展出。观众可以认领那些容易实现的梦想，同时也可留下自己的彩虹梦想。用策展筹集的钱，贡斌为那里的孩子们买了安全帽，修建校舍和道路。

贡斌公益计划的一项，是教会孩子们当地的民间技艺，其中就有蜡染、刺绣、雕版印刷以及手工造纸。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接触并学习贵州当地一些民间的造纸工艺。没有想到的是，造纸成为他日后生活的重心所在。

溯源：带着问题寻找答案

2009年，贡斌一边帮朋友做些广告及演出的策划，一边开始研究古法造纸。两年之后，他成立德承贡纸造纸坊，不久，正式放弃舞蹈，开始全力造纸。

某种程度上，自蔡伦发明以来，传统造纸术的基本特点并未太多改变，也就是《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一书中所概括的：“植物纤维原料，经过切断（剉）、沤煮、漂洗、舂捣、帘抄、干燥等步骤，制成的纤维薄片，称之为纸。”

经过最初的阅读资料与实地考察，贡斌对手工造纸的基本环节已然了解。但是他发现，“现在修复的古书画用纸，集中在竹纸和今宣纸系统”，远至宋代。像《五牛图》这样的书画，则采用唐代的古宣纸。目前必须恢复那个年代的材料体系，才能真正解决种种修复问题。



抄纸用的簾子

材料与工具互相配合，最终形成造纸工艺。要了解古纸材料，除查阅零星记载的文献材料，还要首先熟悉那些古纸的质感，并对其进行科学分析。在学习过程中，一些前辈朋友慷慨拿出收藏实物，供贡斌研究。尤其是陆宗润老师，每每拿出唐宋明清的书画真迹，教他仔细观摩。贡斌觉察到自己的进步，源于“拿真东西上手，感知纸张上字与纤维的变化。那种感觉就是你造纸过程中需要寻找的，就像练武，到一定程度，一搭手就知道怎么回事”。

科学分析古纸的纤维成分，为复原提供更直接的参照。贡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他后来不断念叨的“奶奶”王菊华。86岁的王菊华长期供职于中国纸浆造纸研究院，是国内造纸领域的权威专家。有一次，贡斌带着试验样品，去中国纸张研究中心检测材料状态，发现与古纸图谱不一致。为了搞清原因，研究中心专家向他推荐了王菊华。看到贡斌试做的古纸，王菊华非常高兴，不但帮他分析问题，还向他推荐领域内更多的专家。

王菊华几乎参与鉴定了国内所有重大发现的古纸

成分，《五牛图》正是由她分析确定，画心纸原料为桑皮，命纸则为100%的檀皮。而在一系列颇具争议的“西汉纸”的考古鉴定中，王菊华将其认定为纸的几种主要雏形：薄小纸、麻纤维片与树皮布，从而捍卫了蔡伦作为造纸术发明者的历史地位。据她介绍，东汉时期的造纸原料主要有楮树皮（构树皮），材料为麻的破渔网和破布，史载“用树皮做的叫皮纸，用破渔网做的叫网纸，用破布做的叫麻纸”。唐以后，麻的种类进一步扩大，树皮种类也扩展到桑皮。竹纸与草纸则盛行于宋代和明清。贡斌恢复的元以前的古纸体系，主要为楮树皮、桑皮、麻与竹子的纯料体系。

“材料是永远的老师。”在摸索过程中，贡斌发现许多民间的造纸工艺，多半未加思索地沿革旧法，而这种旧法并未真正接续当时的工艺，更多时候出于惰性与便捷，而被篡改。一个简单的例子，造纸的树皮，最合适的收取季节应在冬季，桑皮则在清明之前。原因在于，冬天水里细菌少，水质洁净；此外，用以使纸浆均匀悬浮的植物纸药，性状更为稳定，不易挥发。多数民间手工造纸者对此无知的原因在于偷懒，立春过后，树皮易剥，无需蒸的环节。然而，“就差这一个工，质量却差远了”。

蒸煮提纯植物纤维的过程，更能看出现代与传统工艺的差别。为提高效率，上世纪50年代起，人们将树枝连皮带壳，放入火碱中一次蒸煮提纯，以去除树皮中含有的木质素、果胶及其他非纤维成分。贡斌则采用碱性更弱的传统的草木灰、石灰与日光漂白结合的“分级蒸煮、逐级提纯”的方法。后者虽然费时费力，但对比之下，“现在看不出来，但是过了几十年几百年，前者就会出现质量问题”。对此，王菊华给予科学解释：“强碱之下，纤维素易于溶解，但聚合度降低，纸张抗虫害、抗老化能力，乃至强度都会降低。”

纸药也被视为蔡伦的一大发明。这种多采用黄蜀葵、杨桃藤、仙人掌等制成的神妙之物，不但有效提升了纸浆悬浮的均匀度，便于抄纸，而且由于其作用时间有限，有助于人们将经过压榨脱水后的一叠湿纸，毫不费力地揭开晾晒。然而，伴随造纸术产生的纸药的传播，却开了个历史的玩笑。造纸术西传之时，纸药并未传去，以至于时至今日，西人仍不会使用。王菊华讲起一段往事：某年，一个德国专家到院里访问，提出疑惑：“你们的纸抄好后粘在一起，压榨成一块饼之后还能揭开，简直不可思议。”一直以来，他们都是抄一层纸，垫一层布。然而，纸药东传日本，却得以更多研究发展，日本人分析成分后，进而制出替代的化工产品，销往世界。

即使使用纸药，不同长短的植物纤维，要达到相似的悬浮效果，用料的量相差很大。经过试验，贡斌发现：“三亚皮、青檀皮，一两捆就行；构皮需要四捆，桑皮则要八捆。在这个材料体系里，所有成本都在成倍增加。”

所以有新的发现，在贡斌看来，是因为与一些“带着结论寻找答案”的学者相比，他更多时候是带着问题寻找答案。一些时候，更为奇妙的感觉，则似乎与他习自舞蹈的节奏感有关。

而让贡斌有更多宿命之感的，是一些颇为神奇的巧合。2014年底，贡斌在一个养蚕基地收了15吨一年生的桑枝。经过第一次的蒸煮剥皮，剩下的料不足800斤。再经过草木灰与石灰的分级蒸煮后，原料进一步减少到300斤。一直忙活到2015年下半年，正当他们想用这批料来做唐纸时，国家图书馆拍下的一卷唐代雕版印刷的佛经，找上门来修复，这批原料仿佛恰为这件文物而备。

还有一次，贡斌在拜读陈大川先生的《纸：由洛阳到罗马》时，发现里面提到一本书，由一位在清朝做官的德国人所写。他马上给德国朋友发信询问，结果不到两小时，对方回复：那本书在他朋友爷爷的旧书店里找到了。“只有一本，放在旧书店的角落里，从没有人动，就像在那等待我一样。”贡斌说。

有时晚上睡不着，贡斌甚至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不是为了明天的日出而活，如果把这些纸做出来，随时可以放手。”

让贡斌产生更大使命感的人，是作家钟阿城。2013年，阿城通过朋友找到贡斌，那时他正在写作《洛书河图》一书，觉得国内当时的手工纸均无法代表中华文明的高度，想看看贡斌能否做出真正的古纸。两人谈得投机，阿城当晚就把贡斌带到家里，让他拿些古画真迹用以研究。时间临近年关，纸坊的工人都已回家，贡斌一个人在那研究试验，结果没到两个月便做完了，成功复原出宋以前的古纸。阿城看后特别满意。

由纸开始，塑造真的体系

“德承贡甲午夏制楮皮纸，取徽州楮枝五吨，法宋元制浆分级蒸煮，端簾手工抄制，成纸二百九十三枚。”这是贡斌让人用小楷，在一次造纸样品上的记录。这样的记录大约有十几张，从而看出德承贡纸原纸的类型及产量。

目前纸坊各类型原纸从几刀到最多二百刀，产量不过几千张而已。产量既小，加上为求完美的投入，

成本上升在所难免。我曾经问他，这样造出的纸固然很好，但限于产量与价格，普通人能用到吗？

贡斌回答：首先看他对此有无正确的认知。关键在于人和心。这个时代，大家还知道什么是真的东西、好的东西吗？有一次，贡斌和一个老师喝多了，特别感慨：在欧洲中世纪，所谓那么黑暗的时代，人们还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现在这么好的时代，大家知道吗？

问题依然绕不开传承与学习，要回到人本身。“学什么？什么人教？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要学，则首先要用真的东西，贡斌以学习厨艺为例：“如果为了便宜省料，用地沟油来练，你也练了，菜也熟了，但那是人能吃的吗？”

感慨在于，在这个教育体系中，教与学的双方都有不恰当的企图心，在所谓名正言顺的理由下，行苟且之事。这样一来，一代代人都在虚妄的体系里，寻找所谓的真，只会更加肆意无惮，自欺欺人。

似乎也是为了践行做公益之时对教育的思索，2014年贡斌在张御群等人的提议下，在纸坊成立“好学会”，下设识字班、习字班与如是抄经班，让学员们以特制纯料的纸，学习识字，以及书法、抄经中所蕴藏的传统文化与法度。如是抄经项目，目前由李敬居士负责推广，去年还曾被“世界佛教论坛”邀请做现场表演。

在印刷术盛行之前，文明的传播主要赖于抄写。国人抄经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至1600多年前，而在佛教盛行的唐代，专门抄经的经生已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古人抄经并非单一把字写好即可，是包含笔墨纸砚、技法以及仪轨在内的综合汇集。为此，贡斌找到制笔大师李小平，用其复原的“隋唐缠纸笔”，作为抄经用笔，同时又寻墨找砚。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材料体系的还原与使用，构建一种真的价值与文化体系。

某种意义上，做纸也在改变着贡斌的气质。“一张纸，从过去到现在，巨细无遗，什么东西没有记过？同样，人的内心也应该慢慢达至平常，没有分别心。纸让我在面对不同人时，逐渐变得平和。”

贡斌告诉我，他自小是个较劲的人，总皱眉头，喜欢盯着太阳看，直到眼中影像从一个太阳变成两个。做纸的过程，自是修炼，但性格使然，仍能感受到他容易激动的一面。和王菊华等老师吃饭的时候，谈起有关部门的机械与琐屑，他依然不愿妥协。

“以执著破执著。”接下来，贡斌正在筹备手工造纸技艺传承研究中心，在此之下，造纸研发基地、研究论坛等诸多庞大的计划，都已进入视野。■



基因的力量：一次北欧生命科学考察

文 / 李伟



左图：哥本哈根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安装鲸骨架，这头鲸长14米，体重超过30吨

右图：哥本哈根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了很多极地动物，以进化论为主线构建了展览的陈列



（翻拍自）

鸟类如何成为白垩纪大灭绝的幸存者？DNA如何揭示人类的历史？个体化医疗能否攻克不治之症？新的基因技术正不断拓展认知领域，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博物馆中的进化论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最著名的景点就是看海边的美人鱼像。但是有另外一个地方，常常被忽略，却能令人大开眼界。这就是丹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包括了三个分馆：动物博物馆、地质博物馆和植物博物馆。最有特色、藏品最出众的，当属动物博物馆。

动物博物馆的中心是一副巨型的梁龙骨架，它有17米长，超过10米高，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6具恐龙化石之一，其40%的骨架都是由原始化石组成。这个比例在所有博物馆藏品中是最高的。2009年，古生物学家莱蒙德的儿子，在美国怀俄明州的采石场发现了此具梁龙骨架。骨架被挖掘出之后在鹿特丹被修复组合，并进入拍卖市场。丹麦自然历史博物馆以超过650万美元的巨资买了下来，成为博物馆的标志性展品。

博物馆的另一大特色是对鲸骨骼标本的收藏。丹麦地处北欧门户，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在其管辖之内，鲸资源非常丰富。经常有鲸搁浅于格陵兰的海滩上，因此丹麦科学家有更多的机会取得这些庞然大物的标本。展馆中就陈列有蓝鲸骨骼标本，全长十几米，头骨有铲车那么大。鲸的心脏就像一口巨大的钟，挂在充满保存液的玻璃缸中展出。其实，被展出的蓝鲸骨骼在其家族中只能算是普通身材。作为地球最大的生物，其



身长可以达到 30 余米。我们在博物馆的仓库里就看到了更大的蓝鲸骨骼，像一列小火车。

丹麦动物博物馆展示了许多特有的极地物种，如北极熊、驯鹿、麝牛，还有复原的猛犸等等。科学家们并非简单陈列，而是力图以进化论的体系与逻辑构建展览。比如在鲸的展室中，还展室了牛、羊等偶蹄类动物。达尔文在环游世界时，已经知道鲸并不是鱼而是哺乳动物，但他并不知道是哪些哺乳动物进入海洋后，演化成了鲸，也就是说鲸的进化路径并不清楚。这个问题也困扰了生物学家许多年。

直到近些年基因测序技术大规模使用后，科学家们通过对基因的研究和比对后才发现，我们最常见的牛羊等偶蹄类动物，和鲸有相近的亲缘关系。它们是鲸的近亲。后来在孟加拉发掘出一种古生物化石，通过对化石 DNA 的提取和测序，它被认为是鲸的进入大海的祖先。这个我们从没见过的远古生物也被丹麦科学家们复原出来，做成了模型：它就像一只狼，但没有了耳朵，有着锋利的牙齿，身体更具流线型，手脚都长出了蹼，而尾巴则像蜥蜴。

华大基因为丹麦动物博物馆的科学家们提供了技术支持。合作主要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包括鸽子基因组、蚂蚁基因组、社会动物行为遗传的研究等，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至今最突出的成果，是 2014 年在《科学》上以专刊形式发表的鸟类基因组系统演化史项目，该项目彻底解决了现代鸟类起源和演化的历史争议，是演化生物学的一次重大飞跃。

“物种从何而来、如何演化、如何发展，是生物演化研究中最基础的问题。基因组的应用使我们得以重现历史，回答这些最根本的科学问题。”华大基因科学家张国捷说，“这是迄今为止对同一类群物种最大规模的基因组演化历程分析，也是我们利用比较基因组学揭示生物宏观演化历史的重要一步。”

Jon Fjeldsø 教授是张国捷在丹麦动物博物馆的合作伙伴。Jon 留着长长的胡子，与达尔文有几分相似。他不仅是一名出众的生物学家，也是一名画家——为各种鸟类画插图。这些精美插图被应用于《科学》杂志上。在他庞大的标本仓库中，最重要的收藏是一只渡渡鸟的头骨和完整的内脏标本。渡渡鸟早已灭绝，世界上只有两处博物馆保存着渡渡鸟化石。



（张明余）

上图：哥本哈根大学的艾斯克（左）是丹麦的学术明星。他通过研究古 DNA 探索生物演化的历史进程

下图：丹麦生物学家吉尔伯特教授通过基因测序研究鸟类的进化线索。他也是一名画家——为各种鸟类画图

Jon 向我们解释，鸟类是白垩纪物种大灭绝事件中的幸存者，其后它们在短期内经历了一次超级物种大爆发。然而，现代鸟类的演化历史和亲缘关系，这一最基本的问题却是困扰了学界数世纪的未解之谜。另外，鸟类快速演化形成了超过 1 万个不同物种，产生这些鸟类生物多样性背后的分子机制也知之甚少。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华大基因与众多科学家组成的国际鸟类基因组联盟，共同完成了 48 只鸟类物种的基因组测序、组装和全基因组比较分析。这 48 只鸟包括乌鸦、鸭、隼、鸢、企鵝、朱鹮、啄木鸟、鹰等，囊括了现代鸟类的主要分支。

之前所有试图重建鸟类演化树的努力，无论是用部分 DNA 测序，还是使用解剖学、行为学的特征都遇到很多的困难，所得到的演化树之间充满矛盾。研究人员表示，现代鸟类在早期发生了快速的物种形成大爆发，因为这一快速扩张的时间很短，没有演化出足够多的序列差异，因此很难区分早期分支的亲缘关系。为了估计鸟类之间的关系图谱和分化时间，研究人员决定采用全基因组的信息来构建鸟类的物种演化树。

作为研究重要成果，这棵新的鸟类演化树彻底解决了鸟类的早期分支问题，还对一些旷日持久的相关争议给出了确切的答案。比如，新发现确认了水生鸟类有三次独立的起源；主要的陆生鸟类如鸣鸟、鸢、啄木鸟、猫头鹰、鹰、隼等都来自同一祖先；这种祖先的鸟类是顶级的捕食者，它同时也是一种在美洲已灭绝的巨型恐鸟的祖先。

全基因组分析结果提示，现代鸟类的扩张发生在 6600 万年前的物种大灭绝事件前后。这次物种大灭绝事件杀死了地球上的所有恐龙，只有部分鸟类存活了下来。之前的一些研究推测现代鸟类的扩张应该发生在大灭绝事件之前的 1000 万年到 8000 万年，而全基因组分析的结果推翻了之前的结论。

基于这些基因组数据，研究者认为仅有很少的鸟类从大灭绝事件中存活了下来。后来这些鸟类逐渐演化出了 1 万多种新鸟纲 (Neoaves) 鸟类，95% 的现存鸟类来自这一新鸟纲鸟类。大灭绝事件释放的环境也许为鸟类新物种的形成创造了良好条件，导致它们在不到 1500 万年的时间里快速产生了很多新物种，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何现代鸟类具有如此丰富的多样性。

基因组测序技术日渐成熟、成本下降，以及构建演化树计算方法和比较基因组学等领域的发展，这些条件使研究人员能更好地解决这些科研难题。

2015 年 6 月，研究项目进一步扩展到所有鸟类，启动了“万种鸟类基因组”项目，预期在 5 年内建构

1.05 万种现生鸟类的基因组图谱，实现对鸟类生命之树的数字化重建。这是国际上首次对同一大类群的所有现生物种进行完整的基因组研究。

用基因组研究历史

哥本哈根大学的艾斯克 (Eske Willerslev) 教授是丹麦的学术明星，在电视上经常能看到他的演讲或对他的采访。他是大学地质遗传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方向是古 DNA 和生物演化。如果说历史学家只能讲述最近四五千年的故事，考古学家的视野再远一些，可以描述一两万年前的状况，那么作为古 DNA 研究者，艾斯克将目光深入到几十万年前的生物世界。他最古老的一份研究样本取自 70 万年前一具被冰封的古马骨骼。

艾斯克的办公室里贴着一张 2010 年《自然》杂志的封面海报。封面文章是他与华大基因的合作成果，他们完成了世界上首个古人类基因组项目。从格陵兰岛上 4000 多年前萨卡克 (Saqqaaq) 文明的一个古人类的头发中，艾斯克提取出细胞核 DNA 碎片，做出了世界首例古人类全基因组的深度序列测定和解读。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

他对于古 DNA 的研究始于 1999 年。“最开始的时候为了获得古 DNA，我们在北极地区打冰柱，研究冰柱里面的 DNA 序列。”艾斯克说，“通过冰柱不仅可以获得植物的 DNA，还有各种微生物 DNA，偶尔也能发现动物 DNA。”这一学科可以研究古代环境的变化如何对生物体产生影响。很长时期以来，科学家们只能通过化石标本的外形来判断标本是什么物种，对多数残缺的样品而言，推测往往很困难。植物的化石可以保存得比较完整一点，但是动物的化石保存下来非常困难。

2010 年之后，由于新基因测序技术获得重要发展，艾斯克发现许多研究工作可以借助基因测序取得突破，让想象成为可能。其中就包括关于格陵兰岛原住民的迁徙问题，他们究竟是来自亚洲还是来自欧洲？这个问题争论了很多年。

艾斯克此前在格陵兰岛发现了一个古人头发的样品。“当时我和华大基因的同行讨论后，决定用新的测序技术来研究这一样品，但是那时候很多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工作。因为在古样品里，受到的污染非常严重，样品里会有很多的微生物污染，所以绝大部分的样品里都是微生物的 DNA，不可能拿到人的 DNA。”艾斯克说。

在古 DNA 研究里有两个很重要的挑战，一个是微生物污染问题，另一个就是在制备 DNA 样品时，绝对

要避免引入现代人的 DNA。因为人在操作样品过程中，实验者可能会把自身的 DNA 混杂进去。此前发表过很多人类古 DNA 的文章，但后来发现许多都是现代人的污染，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古人 DNA。“所以我们开发了一个新技术，叫 DNA 指纹技术，可以实时检测在整个实验中 DNA 的变化过程，以防止在实验操作过程中，会有现代人的样品和环境微生物 DNA 混杂进来，这个技术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艾斯克解释说。

另一个问题是，此之前的古 DNA 研究仅能得到 200 个左右碱基长度的 DNA 序列。但实际上如此少的 DNA 片段，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太多的有用信息。现在通过新的测序技术，我们可以一下子研究整个基因组序列。

经过反复尝试，艾斯克和华大团队通过各种方法的改进，最后终于获取到了格陵兰古人的 DNA 样品。所以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是当时全世界第一个最完整的古人全基因组序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像研究现代人 DNA 序列一样，来研究古代人 DNA 序列。这样就有了可比性。例如我们可以搞清楚，在人类的迁徙过程基因交流有怎样的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性突破，有了这个技术之后我们就可以攻克很多有趣的难题。”艾斯克说。

他很快又将这一研究方法扩展到大洋洲，希望搞清楚大洋洲古人类的缘起。他们是从非洲直接迁徙过来的，还是来自东亚？他通过对一个大洋洲古人的毛发获得了首个大洋洲古人的全基因组序列。再通过与其他人类群体比较后发现，大洋洲古人包含了非洲和亚洲两个族源，此前两种假说都成立。

另一项研究是关于欧洲人的演化历程——到底是先于亚洲人，还是后于亚洲人？同样，亚洲人的演化过程，与美洲人是否同步，还是先有亚洲人，再有美洲人？通过基因测序及比对，他们发现早期人类迁徙是一个很快速的过程，当人类祖先走出非洲后，很快就分布到了全球各个区域。艾斯克团队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了 100 多个青铜时代的古代欧洲人的 DNA 样品，发现在那时期的欧洲人群里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多样性，甚至已经有中东地区的人群混杂在当时欧洲人中，说明当时人群迁徙如同今天一样，是很频繁的现象，这是超乎意外的发现。

在动物演化方面，艾斯克对马骨骼化石碎片进行了基因组测序。这副化石深埋于加拿大育空领地蓟溪遗址（Thistle Creek）古老的永久冻土层，有 70 万年的历史，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可以获得基因组序列的样品。这项研究为包括远古人类在内的诸多已灭绝物种的基因组图谱绘制奠定了重要的遗传学基础。2014

年为华大基因启动的北极熊基因组测序研究项目提供了珍贵的北极熊群体样品，该研究以封面故事发表在《细胞》杂志上，揭示了北极熊适应北极地气候之谜。

艾斯克团队最近的一项工作，是通过古 DNA 研究导致病原菌的演化过程。他们在古人的牙齿里发现许多微生物，其中有很多是病菌或者病毒。通过跟现代病毒的比较，可以完整地看到这种病毒不断变化的过程。

黑死病曾是人类的噩梦，在历史上多次爆发。但是在更远更古老的人类样品里，他们也发现了这些病菌的存在。因此，这些病毒并非只是在中世纪爆发时才开始产生，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通过古 DNA 的技术，还可以揭开病毒或者细菌的逐渐演化的过程。“有一些病毒早先时候非常致命，人一旦被感染，就会很快死去。但是宿主没有了，对病毒的繁殖和扩散也不是有利现象，会导致病毒的灭绝。”艾斯克解释说，“慢慢地，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病毒本身也在不断地演化，演化产生一些变异，能够使人更好地耐受，直到它传播给其他个体后，之前的宿主才会死。”于是通过对古代病毒和现代病毒序列的比较，以及古今人类基因组变化的规律，就可以看到宿主和病毒有共同变化的趋势，这对研究现代病毒的变异也很有借鉴意义。

个体化医疗

Jan Staffan Normark 先生曾担任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秘书长，他也是一位著名的遗传学家。每年给获奖者打电话，通知获奖的消息，是 Staffan 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时差原因，获奖者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接到电话。但为了公正性，委员会必须尽快通知获奖科学家。所以每到这个时候，Staffan 就会为自己准备一些零食，一边打电话一边消磨时间。在办公室里，评委们都会有一张正襟危坐的画像，而 Staffan 的画像则是跷着二郎腿吃零食的形象。

Staffan 告诉我们，诺贝尔奖的评奖有两个标准：第一是新的发现；第二是对新发现的价值认定。有的成果很快就被认为极具价值，而另一些则过了多年之后才重获认可。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青蒿素发现 30 多年后，屠呦呦才走上诺奖的领奖台。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到最近半个多世纪，不难发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价值”，始终围绕着以基因研究为重心的遗传学领域。迄今为止，只有四人曾经两度获得诺贝尔奖，而其中就有两人是因为遗传学领域的发现而得奖。弗雷德·桑格两度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莱纳斯·鲍林获得化学奖及和平奖。这项诺贝

尔奖得主的名单就像一份遗传学发展史的名人录：摩根、缪勒、比德尔、泰特姆、克里克、沃森、威尔金斯、尼伦伯格、莫诺、史密斯、巴尔的摩，还有科恩。

如同两获诺奖的英国生化学家桑格所说：“从1943年开始，（基因测序）这个主题就成了我的研究重心，这源于这项工作固有的魅力和我自身的信念，因为我深信测序对理解生命物质非常重要。”

目前最受诺奖青睐的领域当属个体化医疗，仍旧与基因研究密切相关。

个体化医疗，又称药物基因组学，也就是说药物是根据患者的基因组定制的。目前，大多数药物要么适合所有人服用，要么谁都不能用。参与药物测试的患者都是随机选取的，只有测试结果显示该药物在大规模样本中安全有效，才能投放市场。

药物基因组学有望改变这一状况。不同药物的代谢方式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随着科学家逐步解读出这些因素，医生应该有可能在将来据此为患者开药。基因检测结果应该能够帮助医生预见哪些病人对哪类特定的药物反应最好。此外，它还可以指引医生避开会使特定DNA患者产生不良反应的药物，从而让治疗变得更加安全。

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研究员贺兵博士，正在与华大基因合作，通过全基因组测序的方法去研究糖尿病肾病的遗传因素。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院，1998年获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博士。糖尿病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严重疾病，很多糖尿病患者会导向肾病，并引发肾衰竭。“这状况可能由多种因素所致，但有明确的遗传倾向。例如并非所有糖尿病人都会发生肾病，有家族史的危险倍增。”贺兵说。

他的团队正在从世界上一种糖尿病发病最高的芬兰，收集了近90对兄弟/姊妹家庭的DNA样品：二者均患糖尿病，但只一人有肾病，另一人无肾病为对照。DNA样品由华大基因完成全基因组测序，以及序列结果的前期质控分析和处理。目前重点分析蛋白编码区以及相关的调控区的突变，初步的发现将进行第二轮更大样品量（2500病人和3000对照）的统计学证实。最可能的致病突变进一步引入糖尿病小鼠的基因组，在动物实验上最后证实是否发生类似人的肾病。目前贺兵的研究正在密切观察小鼠的肾脏变化。如果能够找到糖尿病肾病的基因，则可以对相关人群进行检查和早期干预，并研制针对性的药物。

借助基因研究，人类对于糖尿病已经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在哥本哈根大学，我们见到了Torben Hansen教授，他也是诺和诺德基础代谢研究中心代谢

基因组学的负责人。Torben的一项主要课题便是针对糖尿病的遗传基因研究。

格陵兰的因纽特人是Torben的研究对象。“因纽特人的肥胖比率很高，但是他们虽然胖，却很少有肥胖症，健康指标也是正常的，糖尿病的发病率也不高。”他采集了大量因纽特人的DNA样本做测序，发现一个蛋白质的表达对糖尿病形成有重要影响。“如果父母双方特定基因有突变，不能正常表达这个蛋白质，就很容易患糖尿病。如果双方都没有突变，或者仅一方有，虽然肥胖，但是得肥胖症、糖尿病的可能性就低。”Torben说，“这就是为什么格陵兰人只有15%的糖尿病发病率。”

他的另一项成果是针对单基因糖尿病的研究。研究人员在糖尿病患者人群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糖尿病类型——单基因糖尿病，它不属于通常所说的一型或二型糖尿病，但往往会被误诊为后者。而对于单基因糖尿病患者施用胰岛素通常起不到治疗效果，有些甚至会加重病情或引起其他器官损伤。Torben教授与华大基因一起通过三年多的合作研究，现在已经开发出应用基因芯片筛查的方法诊断区分单基因糖尿病，价格只有300美元。目前已有上万个丹麦糖尿病患者使用次芯片进行筛查，调整治疗方案。

Torben团队还研究了妊娠糖尿病的问题。许多孕妇在怀孕期间患上糖尿病，但生完孩子后会好转。Torben用10年的时间跟踪研究了380名妊娠糖尿病患者，发现11%的女性在生育完后依然患有糖尿病。结合单基因糖尿病的芯片检测，他发现这些依然患有糖尿病的妇女中大多有这18个基因突变中的部分突变，这些突变大大增加了妊娠糖尿病患者后期患上糖尿病的风险概率。如果孕妇事先对自己的基因状况有所了解，就可以进行适当的风险控制和干预措施。

2001年，临近人类基因组第一个草图公布的时候，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描述了对人类基因组前景的设想。他预测，到2010年，科学家将能够解读基因如何影响几十种常见病，如乳腺癌和心脏疾病等，为预防性治疗铺平道路。再给医学10年的时间，就可以使用“定制药物”来治疗这些疾病了。到2030年的时候，基因药物会将发达国家居民的平均寿命延长到90岁。

这些大胆的预言已经开始被逐步证明并实现。遗传学已经影响了对HIV、流感、癌症等多种疾病的治疗方案的设计。只针对特定基因型的乳腺肿瘤发挥作用的赫斯汀（Herceptin），已经挽救了许多生命。基因检测也使人们能够开始预测患特定疾病的风险。目前为止，柯林斯的预言还未出错。■

暗物质卫星“悟空”：漫漫取经路

记者 曹玲

经过三个月的太空漫游，我国首颗暗物质探测卫星“悟空”开始巡天执行任务。3月17日，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在轨交付仪式上，“悟空”正式交付给用户单位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之后科学家将与“悟空”一起寻找暗物质。

暗物质探测卫星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总研制，系统总设计师李华旺说：“就拿电视机来比喻，我们负责制造电视机，质检合格出厂，交由用户使用，我们负责售后服务，至于怎么用就看用户的了。”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首席科学家、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常进表示，到目前为止，卫星在天上工作了85天，搜集了4.5亿个高能粒子，覆盖了三分之二天区。“我们要测量电子、伽马质子等，现在探测器完全能够满足所有的科学目标。我需要一定的时间，获取一定量的高能粒子，才能告诉大家有没有探测到暗物质粒子，暗物质粒子在天上的什么地方。”

暗物质探测卫星和应用型卫星不同，是我国发射的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科学实验卫星上天之后要有科学产出，提供科学知识。”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吴季说。据他介绍，今年我国将陆续发射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实践十号卫星、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等科学实验卫星，“我国空间科学正在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选择空间科学卫星的研究目标非常重要，其成果只有世界第一，没有中国第一。空间科学卫星的目标由科学家来定，而不像应用型卫星目标由用户来定。”吴季介绍，2011年1月，中国第一个空间科学卫星计划“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正式启动，首批空间科学卫星遴选项目时重点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科学产出的重大性，即是不是重大前沿，能否实现重大突破；二是考虑它的带动意义，是不是能广泛地带动学科的发展，带动更多的科学家参与数据分析。

暗物质探测卫星成为“空间科学先导专项”发射的第一颗实验卫星。为什么要这么迫切地去找暗物质呢？

所谓暗物质，是指不发射任何光及电磁辐射的物

质，目前人们只能通过引力产生的效应得知其存在。长期以来，暗物质和暗能量都被认为是笼罩在21世纪物理学上的两朵“乌云”。天文学家推测，宇宙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暗物质和暗能量，暗物质占宇宙的25%，暗能量占70%，通常所观测到的普通物质只占宇宙质量的5%。也就是说，我们的宇宙大部分由看不见的物质组成。“宇宙中所占比例最多的东西反而是人类最迟也最难了解的，至今仅知道它们的存在，但还不清楚它们的性质。”科学家认为，暗物质是宇宙大爆炸的产物，在宇宙演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决定着宇宙未来的命运。

“按照现有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科学家预测到61种基本粒子，这61种基本粒子都找到了，包括前些年找到的‘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但是暗物质粒子的物理性质和这61种粒子不吻合，现有的物理知识无法解释暗物质。如果我们探测和研究暗物质粒子，很可能会导致物理学的革命性突破。”常进说，“如果能揭开它们的秘密，就有可能解决宇宙之谜。”

为此，暗物质成为当今科学界面临的最前沿问题之一，目前中国和世界多个国家已着手筹建或实施多个暗物质探测实验项目。“悟空”自2015年12月发射升空起就备受关注。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的数据显示，“悟空”是迄今为止观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超过国际上所有同类探测器。“悟空”预计在轨工作3年，前两年主要进行巡天观测，后一年根据前两年的观测结果进行定点扫描探测。常进说：“目前数据分析正在进行中，预计今年年底将公布首批科学成果。”

暗物质是什么

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才是天空真正的秘密。

了解一些你看不见的东西是很难的，暗物质既不发光也不吸收光，和光没有任何相互作用。它所谓的“看不见”，不单单是说用我们的肉眼在可见光波段看不见，而是说不论探测什么波段的电磁波，比如红外线、紫外线、X射线、伽马射线等，都看不到它。

但是科学家知道它们存在。上世纪30年代，加



(成都商报 供图)

2015年10月30日，四川锦屏极深地下暗物质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正在分析实验数据

州理工学院教授弗里茨·兹威基（Fritz Zwicky）观看邻近的星系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他研究星系团的运动，对星系团里有多少物质做了估算，然后对比人们能看到的物质数量，结果发现那些星系都转得太快了，如果仅仅用它们内部所含的物质来计算，巨大的离心力应该早就让它们分崩离析。如果宇宙中的每一个星系都像一个旋转木马，它们转动得太快，上面坐着的游客们应该都会飞出去才对。

所以其中一定有其他物质在影响星系的运动，那是什么呢？兹威基敏锐地指出，这些物质不能被直接观察到，但却同样能够产生引力作用，从而帮助将星系聚集在一起而不至于被撕碎。1933年，他成为第一批真正了解暗物质存在意义的人，称其为“迷失的物质”。

这个革命性的想法一开始却被大大忽视了，人们尊重兹威基，但没人愿意认真对待他的观点。他的伟大洞察和理论都被搁置一旁，无人问津。当时人们认为他是个疯狂的理论家，有劲没处使，所以才发明这么一种全新的物质出来。

兹威基的测量基于星体和星系的物质数量，但是怎样衡量太空中的物质数量？虽然无法直接测量太阳，但可以测量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的速度，太阳的质

量越大，行星想要留在它的轨道，旋转速度就要越快。

牛顿和爱因斯坦都认为，一个物体的质量越大，万有引力就越大；一个物体离中心越远，它在轨道里就运行得越慢，因为万有引力变小了。就拿太阳系来说，水星的运行速度相比海王星来说更快，因为水星离太阳更近。同样的，对于一个星系你可以预期，如果距离越来越远，物体运动速度就会越来越慢，以维持在正常的轨道。但事实上，外围恒星运动的速度远远超出了预期。

兹威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50年后，一个叫维拉·鲁宾（Vera Rubin）的年轻女科学家在观测类似银河系的星系旋转曲线时发现，越来越远的气体和尘埃的轨道运行速度始终保持不变。如果一个城市是一个星系，道路上的车辆是一颗恒星或者行星，不管道路交通多繁忙或者其他因素多复杂，每一辆车都以相同的速度穿梭在城市里。她又观测了其他星系，发现也是同样的情况。鲁宾由此认为，宇宙中存在着我们看不见的物质，为弥散于星系各处的气体提供着引力。

“地球附近也有大量的暗物质。天文学家发现，银河系里成千上万颗恒星的实际观测速度要大于理论上的速度。太阳的速度理论上是每秒160公里，但是现在观测太阳的速度大概是每秒240公里。如果不存



科学家维拉·鲁宾认为，宇宙中存在着我们看不见的物质，为弥散于星系各处的气体提供引力

在暗物质的话，太阳系就应该处于银河系的更外围，而不是现在这个位置。”常进说。

科学家分析了上百个星系，都有同样的形状，运转速度都太快了，需要暗物质把它们保持在一起。这时，科学家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什么是暗物质，如何在太空中找到一些看不到的物质？

被称为引力透镜的效应为暗物质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如果有一大团物质，例如星系团恰好位于一个遥远光源的前方，那么前景天体就能弯曲从其附近经过的背景光，由此会产生一系列的光弧，把这些弧线连接起来就会形成一个“爱因斯坦环”。质量越大，它对光线的弯曲量越大。然而，在星系团中没有足够的可见物质能产生出我们所观测到的弯曲，于是，那里必定隐藏着不可见的额外质量。

暗物质的存在似乎突然间被揭开了。一旦暗物质出现，科学家又怀疑它是不是一种新的没有被发现的粒子，还是一般的看不见的物质。最初，科学家认为它和组成你和我的物质一样，但是不会发光。

科学家设想宇宙里不会发光的哪些物质可能是暗物质。黑洞有可能是，它不会发光，可以透过引力透镜发现；隐藏在银河系晕轮里的大质量致密天体可

能是，它们可以通过引力透镜观测，但它们的质量还不足以描述暗物质的数量；褐矮星同样是怀疑的对象，它们数量足够多。除此之外，暗物质的候选者还有中子星、自由行星、白矮星和非常微弱的红矮星和大质量弱相互作用粒子（WIMP）。

无论暗物质是什么，它们的数量和质量都比恒星和行星的普通物质多上10倍。所有由原子、质子、中子组成的物质，数量都比不上科学家在星体和星团中所观测到的物质的数量。

科学家继续寻找新的可能性，继续研究暗物质，以前发现的奇异粒子，例如中微子成了他们的研究对象。像暗物质一样，每次数以百万计的中微子穿过地球，但是它们太轻了，没有办法解释暗物质对万有引力的影响，而且科学家可以在粒子碰撞实验中产生中微子。

在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后，许多科学家相信暗物质是一个新的奇异粒子，和地球上的物质完全迥异。每秒有数十亿暗物质经过我们，但从来不和普通物质发生碰撞。如今，我们知道暗物质是一些笨重的物质，速度不是很快，我们看不见它，它对我们没有影响，和普通物质也不产生相互作用。

目前，对于暗物质是什么，最普遍接受的想法是一些叫作大质量弱相互作用粒子的物质。大质量弱相互作用粒子对大颗粒的作用力很小，它们的特性和暗物质的可能性很接近。

寻找暗物质

对于这些擅长隐身的暗物质粒子，如何才能找到它们呢？

“如果理论上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把它找到。通俗地讲，我们去找一个人，只知道这个人可能存在，但是这个人穿什么衣服、长什么样子，我们根本不清楚，只能通过排除法，或者说一步一步筛选，从一些可疑的迹象筛选。”常进说。

目前，人类用来捕捉暗物质的方法仅有三种，可以形象地称之为“上天、入地、对撞机”。目前国际上有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安装在国际空间站上的阿尔法磁谱仪，以及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费米太空望远镜等设备在寻找暗物质，但目前找到的都还只是一些“疑似证据”。

其中，“上天”是间接探测方法，即捕捉暗物质互相碰撞、湮灭时产生的痕迹。当一对暗物质粒子偶然相撞的时候，会同时湮灭，可能会放出质子、电子

及它们的反粒子、中微子和伽马射线。如果能够精确测量到这些粒子的能谱，就可能会发现暗物质粒子的踪影。

我国发射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采用的也是间接探测的方法。“暗物质卫星只是瞄准暗物质可能产生的一种现象，也就是暗物质粒子湮灭或者衰变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高能粒子，这叫间接法。至于间接法不能找到暗物质，我现在也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尽管暗物质粒子探测器最主要的目标是去找暗物质，但是这个探测器本身就是一个望远镜，一旦打开这扇新的窗户，必然有很多新奇的现象。究竟这个新奇的现象是捕捉到了暗物质，还是其他的一些新的天文、物理现象，我们还不清楚。”常进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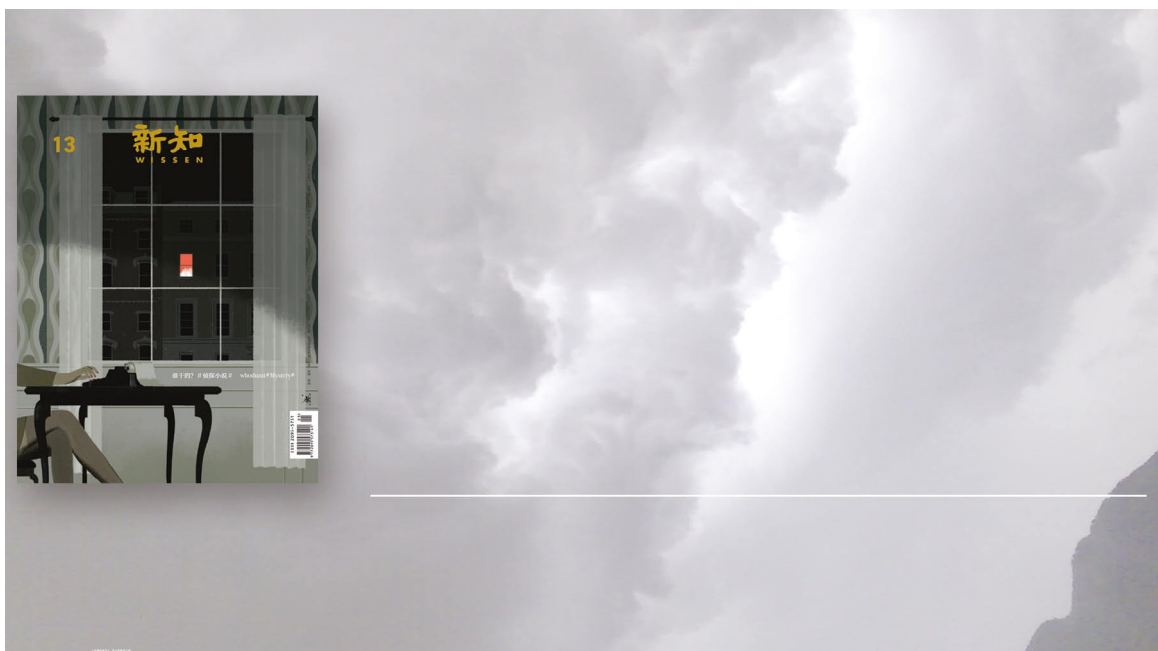
“入地”则是一种直接探测的方法，该方法是直接探测暗物质粒子和普通原子核碰撞所产生的信号。比如美国低温暗物质搜寻计划（CDMS），位于明尼苏达州地下 800 米深的一个废弃矿井，费米实验室在此设计了一个探测器可以探测暗物质。暗物质就在我们身边流动，任何动静也没有，很小的概率它会撞上探测器感应装置原子的原子核，那就是科学家希望看到的。

位于我国四川的锦屏极深地下暗物质实验室也是如此，这是我国首个用于开展暗物质探测等国际前沿基础研究课题的极深地下实验室，其上方有厚达 2400

米的岩石层，可以将穿透力极强的宇宙射线隔绝到只有地面水平的大约亿分之一，为探测暗物质提供了一个几乎没有干扰的环境。

“对撞机”则是在加速器上将暗物质粒子创造出来，并研究其物理特性。常进说，由于暗物质粒子即使被创造出来，也不会被探测器发现，只能通过其他可以看见的粒子来推测出是否有暗物质粒子产生。虽然暗物质粒子不能被直接观察到，但它一定会带走“能量”，即创造暗物质粒子需要能量，因此从丢失的“能量”和分布可以推测暗物质的某些性质。目前，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被认为很有可能创造出暗物质粒子。

“这三种方法互为补充，可以互相印证。如果我们在天上找到一种暗物质粒子，质量超过现有加速器的能量上限，那么加速器的能量就必须进一步提高。如果我们把暗物质的质量弄清楚了，会指导地下的直接探测实验修改他们的方案，比如现在清华大学、上海交大致力于寻找低质量的暗物质粒子，国际上一些组织主要探测大质量的暗物质粒子。如果我们准确地知道了暗物质粒子的质量，那地下实验就会变得比较明确了，究竟是找怎样的暗物质。”常进说，“至于暗物质卫星究竟能发现什么，还要等数据分析的结果。”



百年宝马升级“第一战略”

主笔 / 李三



宝马集团董事萧绅博

奔驰说：“没有你的那30年好寂寞。”宝马回：“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在两大豪门的斗嘴中，宝马迎来百岁庆典。

2016年3月7日，宝马集团在慕尼黑莫萨彻（Moosacher）大街6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拉开了百年华诞的大幕。Moosacher大街66号紧邻宝马集团慕尼黑工厂、四缸大厦、宝马世界和宝马博物馆，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所在，100年前，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Bayerisches Motoren Werk）就是用这个地址注册成立了公司，这里的一部分曾经是宝马公司最初的厂房之一。所以说，这里正是宝马百年的起点——传奇是从一个引擎开始的。

人类100岁没有不老态龙钟的，但百岁宝马却好像浑身上下到处是可秀的肌肉。宝马集团董事长科鲁格（Harald Krüger）激情宣布：百年庆典活动的主题是“下一个100年”。不断寻找更好解决方案的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到每个宝马人的血液里。

3月16日宝马年会，集团全新的“第一战略”在这一天发布。事实上，全新“第一战略”是2007年的升级版，科鲁格说：“我们相信在未来10年中，汽车工业将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可能比之前100年所经历的变化还要多。全新战略将为现在和未来创造新的标杆。我们将引领宝马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彻底转变个人交通出行方式和理念，并重塑整个汽车行业。”

在慕尼黑，本刊记者见到了宝马家族的新成员——BMW iNEXT概念车，直观看去，这个就像从科幻片中走出来的家伙确实与众不同，难怪宝马集团设计高级副总裁霍伊顿克（Adrian van Hooydonk）由衷感慨：“对于一名设计师而言，你可以脑洞大开，因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让你梦想成真。”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果然听到了一些颇具想象力的回答，听起来蛮有未来感。比如问：100年之后还需要方向盘吗？回答是：那时它的形状已经不算是“方向盘”了，而是“方向控制器”。问及与互联网企业相比，宝马的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处于什么水平？回答是：究竟是IT公司学习制造汽车快，还是汽车公司学习IT技术快？

未来在远处，远处有多远？在对未来交通的种种描述之后，总要归结到一个问题：概念车何时能出现在公路上？科鲁格的回答有些任性：“如果我个人就可以决定的话，我当然希望这辆车尽早上路。公司现在希望展示的是2030年的交通出行情况，一些科技和材料的创新也许即将发生，我们希望早日迎来这些创新。”

相对于畅想未来，中国话题显得格外迫切和现实。去年12月，宝马集团对中国业务进行调整，集团董事萧绅博（Peter Schwarzenbauer）直接负责中国业务。此番调整，一方面旨在大力推进本土化策略，另一方面凸显中国市场对于宝马全球战略的重要性。在年会上，萧绅博的中国表态说得已经很明白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宝马会逐步加深在中国的本土化，这会在将来为我们的营业额做出巨大贡献。”

三联生活周刊：为了和全新的“第一战略”匹配，宝马品牌在接下来几年中，将在产品方面做出哪些进一步优化？

萧绅博：有两方面是我们努力的重点：一是推动电动车型发展，因为我们认为，长远看来，电动将成为主流；二是满足客户对高性能车型的需求，扩大

M 车型，我们已经注意到全球客户对这类汽车的需求正在扩大。

在技术方面，我们在电动车领域也收获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也将逐步应用到其他产品中。MINI 品牌也会推出一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我们会推出一款新的 i 车型，它将集中宝马所有最先进的技术，包括自动驾驶和数字互联、新一代电动出行方式、轻量化车身以及开拓性的内部设计。我们会坚持将驾驶者放在核心，确保即便高度自动化的汽车，顾客也可选择自动驾驶抑或自动驾驶。

三联生活周刊：产品方面以外，宝马是否有计划拓展业务外延？

萧绅博：关于出行服务，我们不会模仿滴滴或 Uber 的模式，我们会在汽车共享和租赁方面探索自己的道路。例如在汽车共享方面，宝马的汽车共享在欧洲、美国已经有非常成功的经验，我们希望能在中国延续成功；汽车租赁方面，我们也会在中国继续发展相关业务。

三联生活周刊：从销量来看，奔驰与宝马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你认为原因是什么？宝马今年能实现全球销量冠军的目标吗？

萧绅博：我认为奔驰增长的原因是因为它做了原本在过去几年就该完成的事情，包括本土化和经销商网络扩展。这些方面，奥迪和宝马很多年前以及现在一直在做。我们在中国的产能根据市场需求可以达到 40 万辆，我们仍有信心到今年年底保持全球第一豪华汽车品牌的位置。

我们去年年底推出的产品以及 2016 年的 10 余款新车都会成为今年持续增长的因素。全新的“第一战略”规划也将在更远的未来保证宝马集团良好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互联对高档车厂商的未来如此重要？

科鲁格：目前数字化趋势对交通出行的影响正在席卷全球，而这正是一个将交通出行变得更简单、更安全、更便捷的机会，也是一个激发新客户群体的绝佳机遇。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了互联，在车内也不希望与世隔绝，所以，互联对我们非常重要，未来几年，我们将专注于不断拓展科技储备，扩展数字化连接的范围，并积极强化可持续出行。

现在我们已经不仅仅生产汽车，也同时提供出行服务。目前，DriveNow 汽车共享计划已经有 24 万名用户。我们与 IT 公司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而市场竞争对于消费者是有好处的。

三联生活周刊：为何宝马不现在就生产出足以匹敌特斯拉的畅销车型？

科鲁格：我们对电动交通很有信心。去年我们销售了近 3 万辆 BMW i 车型，增长 66%。电动车市场是马拉松比赛而不是短跑冲刺，需要一个较长期的发展过程，很多问题，如电动车的占比、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政策导向等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会持续在电动车上的投入。总的来说，尽管企业运营是以提高效率、争取盈利为中心，但我们也需要推出有吸引力的产品。

三联生活周刊：与谷歌、苹果主流互联网企业相比，宝马的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处于什么水平？

萧绅博：有个问题值得思量：究竟是 IT 公司学习制造汽车快，还是汽车公司学习 IT 技术快？一方面国际上有谷歌、苹果，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有百度和腾讯，都想在汽车市场分一杯羹。我认为，汽车不能光谈 IT 技术，我们仍要看到汽车本身还需要打造能确保安全的硬件。在 10 年之后，你可能会开一辆可以完全自动驾驶的汽车，但这和使用智能手机并不一样，汽车出事故是会危及自己人身安全的。在结合硬件和智能化上，人们更愿意信赖哪家企业？我们相信宝马是这个行业的前驱者，将生产出智能的完美汽车。

三联生活周刊：在 100 年之后还需要方向盘，还需要驾驶吗？

霍伊顿克：到那时，它的形状已经不算“方向盘”了，而是“方向控制器”。预测 100 年之后的事情是很困难的，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趋势。从设计团队的角度看，我们希望引导未来趋势，而不是坐等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宝马如何吸引年轻人愿意去购买汽车，享受“纯粹驾驶乐趣”？

霍伊顿克：我们清楚年轻人的消费心理，我们需要增加他们接触产品的机会。另外一个有关 DriveNow 的优势是，这个服务可以让客户了解宝马公司的产品，让他们喜欢我们的产品，在未来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购买我们的产品。当我们推出 M2 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对这款车充满期待。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历史会如何评价你的企业？

科鲁格：我希望历史会如此评价：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公司，这个公司的人对于交通出行和车辆充满激情。

在一个数字化时代做领导者与以往 100 年间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所不同。要想吸引和培养年轻员工，就必须有一个充满激情的、透明的企业文化。在公司策略的制定过程中，我们时时自省，也时时重塑和突破，因为，企业的文化最终令企业与众不同。■

家族历史十万余年
领地最长达
一千七百公里
至今仅剩一千余位成员
谁是最没落的
贵 族

为保护珍稀的江豚
WWF在行动

更多信息登录：www.wwfchina.org







安东尼·葛姆雷和他的作品——软钢雕塑系列“驻”

安东尼·葛姆雷：把身体看作一种场所

文 / 曾焱

画廊中央被隔出一个围合空间，红土铺地，再注入海水，按 50 : 50 的比例混合后，体积约 95 立方米，水平线高至 23 厘米。在现场，这些枯燥的数字构建了一个可被围观的“混沌世界”：《屯蒙》。

通往作品有三个形似门框的并排“窗口”，观者可以站上其中任何一个，“感受已建成的世界，与未经造作的自然之间的关系”。

当然，也是感受久负盛名的英国当代艺术家：安东尼·葛姆雷。在 1994 年获得透纳奖后，他的雕塑和装置就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各个知名博物馆里成为展厅巨星。

《屯蒙》，英文名为《Host》，曾在不同的地方展出过两次，最早是 1991 年时，为美国查尔斯顿的老城监狱而构想，第二次是 1997 年在德国基尔艺术馆。这第三次是在北京常青画廊。葛姆雷将这件作品描述为“生命化育之地”——“这是一个自然力的世界，一注原始的汤水被引进博物馆中，它就像一幅在变化中的画，你可以感受它，也可以观察它。重点在于，它让内与外之间的区分，复归为一。同时，亦将一个自然力的世界带入到一个文化的框架里。这是一个成形中的景观，未经过人工的构想、规划与阐释。”

当场域改变，是否会对作品附加全然不同的解读？葛姆雷给我的回答是：会。他从来认为语境比作品本身更重要。即便此时，我们只是一起从画廊一楼爬到了二楼，所见景观就不再是那个荒蛮、单调并且沉重的“天地万物之始生”。阳光从天顶玻璃穿透进来，浮在水面，与建筑细部结构的倒影、红土的色彩结为一体，像一幅山水画像。葛姆雷俯看了一会儿，拍拍围栏，轻声说了句：Nice！

但令人费解的是，葛姆雷想到的竟是用“针灸”来向我阐释这种语境变化。他说，展览中那些雕塑，参照就是他自己的身体，而不是被理想化了或者被操纵了的身体。而这些身体如何被制作、被摆放，他认

为就像在中国针灸中的用针一样，最终是为了重新找到一种平衡。

在装置《屯蒙》的另一侧空间，有两个身体雕塑。这是两个版本的“边缘III”（2012）。它们以非常规的方式被嵌入到建筑之中——巨大的铁铸“人形”，经横向固定后，以与墙面垂直的方式向外探伸，一个从贴近地平线的高度仰望，另一个从天花板俯身。它们给人的印象好像可以不受重力控制，对空间的占有，形成一种沉默的挑衅感。

葛姆雷的期待是以此来“破坏建筑和观看者之间原有的稳定性”，并为观众站到《屯蒙》门框上的感受提供思想准备。

但对于观看者，我觉得两个铁铸人形其实更像一条高速通道，将他们直接导向葛姆雷的雕塑中最重要的概念：“身体”。葛姆雷最早即成名于以自己的身体为原型，由此出发探索身体与空间的关系。



（斯科特·尼德曼 摄）

葛姆雷作品：《屯蒙》（1997）

泥，海水

整体深度：13 厘米

装置现场，德国基尔艺术馆



(Elii Trippner 摄)





[Cesar Flores 摄]

3

这次在北京，虽然主体装置是《屯蒙》，但在画廊二楼和三楼，还有 5 件首次展出的软钢雕塑系列，合名为“驻”。与葛姆雷近几年尝试用大小不等体块来模仿人体姿态的体系列一样，这 5 件作品也是由具身而抽象，通过采用软钢板和方形截面软钢条为材料，将身体转化为建筑语言来表达。按照解剖学的比例，雕塑被明细地分为水平层和垂直柱两种，并切成 5 毫米至 20 毫米厚的尺寸，看上去既是人形，又好像一栋建筑模型的骨架。然而不同于建筑的是，作品有意让人感到脆弱与潜在的不稳定性，好像一碰就会倒下。

葛姆雷身为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的荣誉成员，当然清楚建筑该

安东尼·葛姆雷作品：

1. 《临界物质 II》(1995)
铸铁
可变尺寸，60 个实物大小个体
装置景观，Stadraum Remise，维也纳
2. 《别处》(1997)
铸铁
100 尊塑像，每尊 189 厘米 × 53 厘米 × 29 厘米
装置景观，英国默西塞德郡克罗斯比，2005 年拍摄
3. 《天穹 II》(2008)
32 毫米方形截面钢管
10.7 米 × 11 米 × 8.1 米
装置景观，墨西哥城，古圣伊尔德丰沙学校

为何物，他对雕塑所做的零碎空间分割，经过了严密计算，实际上又暗喻对我们身体和日常处所的解构。葛姆雷说，他自己在伦敦的工作室就位于钢筋水泥之间，曾目睹在这个工作室的窗外，18个月里就建起了一幢22层高的新楼。通过在雕塑中将“身体”解构为这些最小的结构，他想让人重新思考城市之中的“身体”，发现它们是多么的不稳定。对比在画廊一层的两个身体雕塑对空间所做的悍然破坏，楼上这5件作品则是在用另一种方式，以少而轻薄的材料打破了建筑的稳定性。

葛姆雷在24岁以前都还没有决定要做一个职业艺术家。他1950年生于伦敦，21岁那年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学习的是考古学和人类学。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不免要联想到，后来他那些被搬到海滩、山谷或高楼之上的身体雕塑，它或它们，在静默中那种与世隔绝的姿态与气息，实在很像是考古现场刚刚被发掘出来的古代器物与雕像，携带了另一个世界的密码。而在他那些著名的装置作品中，一如《土地》和《屯蒙》，从门框一样的“窗口”中泄露出来的内景，和墓室打开后的视角也有几分相似。

由于生在虔诚的天主教徒家庭，葛姆雷从小就被教导“身体是罪恶的源泉”，被要求粗暴地将精神和肉体分开。这样的印记也许一直延伸在他的身体雕塑中。他将自己的身体原型倒模为成百上千的作品，再放置于自身之外，审视、背弃、亲密、疏离……一切皆成可能。

1980年，葛姆雷30岁那年做了一个叫《床》的作品。那是他第一次在雕塑中表现出明显意图：寻找葛姆雷式的“身体”。那次他用了600块面包为材料，先将它们排列整齐为矩形，然后从中吃掉两个相对而卧的他的“身体”，他整整“吃”了3个月，作品才算完成。如果说《屯蒙》是试图把外在的东西内化，把外部自然引入一个人工环境，那么最初这张《床》就是另一种反转。他解释，面包通常是被吃掉，然后转化成能量和排泄物，但他希望把面包的“被吃”留存下来，而不是消失。这种对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的记忆，包括吃者和被吃者的区分，葛姆雷以自己对于东方哲学那种令人惊讶的迷恋，将之接驳到印度人在《梨俱吠陀》里对火神阿格尼（Agni）和苏摩酒（Soma）的描述，也就是所谓“火焰与燃料”的关系。

西方雕塑观念强调要将目光注视在事物上，但葛姆雷更感兴趣的是让事物自身呈现在眼前。“这就意

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雕塑，都在将事物转化为思想和感受。”他对那些作为形象本身来叙述故事的“身体”兴味索然，这种身体，一直以来却都是西方雕塑所研究和摹写的。“我更喜欢把身体看作是一种场所，对，是场所而不是事物本身，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是发生转换的场所。”葛姆雷说。

当他第一次面对在作品中出现的、完全等同于自己形廓和大小的“身体”时，是否有过突然被震惊的瞬间？葛姆雷说，这种震惊倒没有发生在他和“自己”面对面的时候，反而是有那么几次，当他独自离开工作室的时候，突然被吓到：“天哪！有人在这儿吗？”这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他本来应该对工作室中的作品习以为常了才对，但原因是在葛姆雷看来，他其实并不拥有自己的身体。

“人们有时候会质疑：这个人这么喜欢复制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个自大狂，或者法西斯？实际上并不是。我只是简单地想把身体作为验证普遍存在的具身现象的个例。我使用自己的身体，是因为我觉得现实就如此：它不是一具被理想化了的身体，它就是我的身体，一点也不特殊。”

1997年，他的大型公共艺术项目《视界》轰动伦敦。以画廊为中心，在方圆一英里范围内，他将31个按照自己身体原型大小制作的“葛姆雷”安放于泰晤士河两岸的20多个公共场所。我比较好奇为什么是31这个数字。他说其实就是你所看到的，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不过他又扭头补充道：“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可能就是在数字命理学里有个观点，把‘3-1-4-4’看作是平衡的四个元素。”2006年，“葛姆雷”矩阵扩充到了100个，被安放在意大利南部卡坦扎罗的罗马遗址附近，覆盖了8.5公顷的场地。

“当我和你对话的时候，你正在分享我的经验。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引人参与的目的：艺术从来不是某种专业行为，而是渴望共享体验的欲望。我之所以想把身体重新带回来，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权力来使用，是因为我想让身体成为情感产生以及情感共享的场所。艺术中的情感已经随着概念主义和极简主义的流行而迷失，所以我召回身体，也是在渴望重新接通情感。”说到兴奋的地方，葛姆雷将他高大的身躯蜷进沙发，双手枕在脑后，开始快速整理思路。他的关键词很容易就被人捕捉到：身体、空间、质疑、内化、平衡……当然，还有印度，那个他在21岁后独自停留过三年的东方，影响了他其后的艺术观念。■

“我关注所在，甚过所见”

——专访英国艺术家安东尼·葛姆雷

文 / 曾焱 实习记者 / 王紫祎 王琪

艺术不是放任欲望，而是重获平衡。

三联生活周刊：装置作品《Host》被译为《屯蒙》，在《易经》中是“屯卦”和“蒙卦”的并称，大意为天地万物之始生。你真的理解它在《易经》中的含义吗？

葛姆雷（Antony Gormley）：为此我们讨论了大概两个月。“Host”这个词在西方文化中很特殊，指代、含义都很多重。和当初想给作品“field”找到合适的译法一样——最后译成了《土地》，尽管并不准确——这次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词足够表达“Host”的内涵。我17岁的时候就接触到《易经》了，我认为《Host》很适合用这样一种具自然力的语言来表达。某种程度上，水、火、空气、泥土，这些概念是我们内在生命的物质观照，对我来说也就是最好的语言，可以说它很诗意，但是又很准确。我以为在表达人类情感时，没有比用你目之所及的自然界的语言更好的方式了。

三联生活周刊：1991年你就创作了《屯蒙》。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作品概念？你个人当时处在什么状态下？

葛姆雷：我不确定是不是1991年做的。但记得第一次展出是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想法则出现在完成第一件《土地》（1989）作品之后。《土地》试图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新平衡我们和土地的关系：现代性可以说是工业化带来的，而这种工业化一直以来却把农民甚而捕猎者对土地的态度排除在外。对我来说，一切艺术旨在实现精神的再平衡。做《土地》的时候，我想质疑艺术家作为个体存在的现代观念，所以我用了很多人来共同完成一件作品（注：2003年在广州，艺术家曾动员300名村民做了近20万个黏土泥人），并且真的是以土为料，用火烧制。做《屯蒙》的时候，我在想另一个问题：生命

出现之前的原生世界是什么样？《圣经》里，我们有自己的神话起源《创世记》；在《创世记》里，世界是陆地出现之前的无垠的海洋。所以我把“屯蒙”作为一个特定之地，去思考水、陆地以及生命的可能性。和《土地》不一样，《屯蒙》不曾被破坏、被固化、被定型，所以它在形式上，除了建筑物的框架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结构。

为了在22年后重新展示这件作品，常青画廊进行了空间重建。我认为这是目前为止最清晰的一次展示。作品有三个门框，每一个每一次都只能站一个人。站在门框上，你就是站在一个被构建的世界的边缘。当内在和外在发生倒置，你就正好位于代表内外边界的门槛上。这件作品邀请观众来重新平衡心和物的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在TED的一次演讲中，你提到儿时总被母亲约束在小屋子里，并因此默想出无限空间的经历。你后来在作品中对门框、房间等意象反复涉及，探讨人和空间两者关系，和这种经验有关吗？

葛姆雷：我们能想到和感知到的一切，都由各自经历形成。我想，早年被母亲强制在下午独处于小房间的经历，使我最初也最直接地感受到，人在身体受限的情况下，内心却具有可无限延伸的想象力的“矛盾”体验。

作品《屯蒙》里，门框可以视作身体的“框架”，让你意识到身体的限制，但是你的目光又被邀请通过“框架”看向外部：在一层空间，看见的是整个展厅空空如也；在另一层空间，你又像是在俯瞰一片风景，看到地平线，看到身体所限之外的事物。我说创作“南宋山水画”，也是试图呈现这样一种场景：在高山之上看见云的形成。但并不是对自然的再现。的确这是一件用了5万升海水和100吨泥土的大型“水墨画”，但对我最重要的，它是实实在在的材料，而不是什么幻想，不是技术的产物。这是把我们不能也不该控制自然的事实试图内化到建筑之中的姿态。在嘈杂的当下，我需要这样一种内化的姿态。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几年前你去过云南，想在那

里寻找地方做一件大型公共艺术作品。为什么放弃了计划？

葛姆雷：我第一次去云南大概是2004或者2005年。当时确实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在“香格里拉”做雕塑，所以我就去了趟丽江。我花了一周的时间四处游逛，和当地纳西人聊天，但最后我还是决定什么都不做了，因为没有想做的理由。如果我真要完成一件作品，我希望的是和当地人一起来实现，但在那里我发现，人们想要我作品的动机可能来自政府，或者游客，却不是当地人。

三联生活周刊：1971年去印度的那段经历被认为深刻地影响了你的创作。“披头士”也去过印度。那大概是当时英国年轻人最感时髦的事吧？

葛姆雷：“披头士”比我去得早，大概是在1965年。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听过一首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的歌，《Within You Without You》，是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那张专辑里。唱片封面很有意思，是各种人穿着五颜六色的制服。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用印度西塔琴（Sitar）演奏的音乐。因为以上种种，我一心想要去印度。第一次是在1969年，进大学后的第一个长假，去待了大概几个月。毕业之后我又立刻动身，路上大概花了一年，之后在印度待了两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和佛教徒相处。我师从葛印卡，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当时他教我内观静坐（Vipassana），即全神贯注于身体感知。后来又跟卡卢仁波切学过，他是苏纳达的格鲁派“黄帽”仁波切，住在喜马拉雅大吉岭南部的一座寺院里。

去印度当然不是我开风气，但是我停留的时间可能比有些人要长一点，不过我也有朋友至今还留在那里。说到时髦，当年和我一起跟卡卢仁波切学习的大概有12人，超过一半的人来自欧美，剩下的是印度人或西藏人。他能同时教这么多学生也是挺令人惊讶的……我觉得其实佛教对人的强烈吸引并不完全关乎宗教信仰，不关乎它可以对着一个全能的神明祈祷，而是因为那种建立在亲历之上的天性。因此，在我这里，“正念”（mindfulness）也就是最重要的艺术理念——我所热爱的艺术应该成为我存放“正念”的工具。艺术不是放任欲望，而是重获平衡。

三联生活周刊：在去印度前，你还经历了一个对于欧洲来说相当特殊的年份：1968，和社会思潮、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那年你正好18岁，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也影响到后来的创作吗？

葛姆雷：1968～1969年，英国既发生过反对“越

战”与核武器的大规模示威，也有了针对移民政策的第一次游行，这些我全部参与过。当时我们是真正想要社会听到年轻人的声音，不仅仅为了摧毁旧秩序，也是为了进入到创造未来的社会结构中。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正在剑桥学习人类学、考古学和艺术史，我们占领了剑桥的行政楼，要求董事会里设学生代表，还要求招收女生——剑桥其实有两所女子院校，但都独立于其他院校之外，我们觉得在现代体制下这是不正确的。

现在的人谈起60年代，总是说中产阶级或特权子弟如何放纵自我、游手好闲，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自己从小就被父母严格要求言行，包括如何安排时间在内的一切事情都会受到极其苛刻的规训。这也合乎情理，毕竟父母们都在战争期间背负过巨大压力。60年代的人在思考很多问题，比如，重建世界之后的真正价值到底是什么？处在后殖民主义思潮和多元文化世界中的我们应该了解，西方传统和天主教并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模式，人类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在我看来尤其重要的是，60年代实际上既开拓也平衡了各种诉求，成为一种严肃的反主流文化的起点：什么是资本主义？它的利益诉求何在？物质主义是衡量价值与进步的唯一标准吗？

我的大部分学生时代都过着集体生活，从印度回来之后也一样。直到现在我仍对共同合作的创造性的生活非常感兴趣。比如目前的工作室，就是一个将合作性、集体性和创造性相叠加的样态，即便它是存在于高度发达的奢华的资本市场中。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过，贾科梅蒂也是对你产生影响的人。我很好奇，对于当代雕塑艺术，有没有一种虽未命名但实际存在的“贾科梅蒂主义”？就好像达达主义、立体主义。

葛姆雷：我觉得不存在，因为贾科梅蒂是不可复制的。我把贾科梅蒂看作最后一个懂得如何对待身体的重要艺术家。我也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在和他进行对话。

贾科梅蒂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呈现一种现实的图景，换种说法，就是呈现一种存在于空间中的物体，以及我们在空间中与物体之间的关系、与距离的关系。他的雕塑和画作都努力让物体的空间能够在某种张力下共存，这是关于视觉的现实，也是关于他记录自己观察行为背后的直接经验的尝试。我个人对贾科梅蒂的回应是：他给了我们观察人与人之间的空间的方法，而我想去记录活在表象背面的感觉。我关注所在，甚过所见。我更感兴趣的是找到一种途径，去感知贾科梅蒂所说的“对现实的追求”。■



(Stephen White 摄)

1



(Allard Bovenberg 摄)

2

安东尼·葛姆雷作品：**1. 《房间》(2014)**

外部：8毫米光面处理不锈钢
 内部：20毫米烟熏(130毫米泡沫和胶合隔离板)
 1060厘米 × 650厘米 × 790厘米
 永久装置，伦敦博蒙特酒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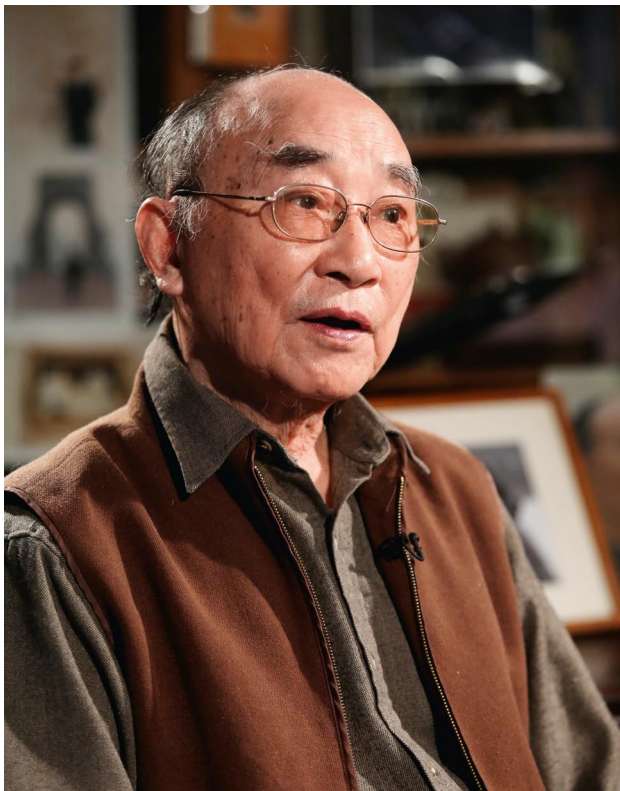
2. 《暴露》(2010)

镀锌钢
 第六件弗莱福兰风景作品
 永久装置，荷兰莱利斯塔德
 25.64米 × 13.25米 × 18.47米，阿姆斯特丹

贺友直：“我就是画连环画的”

文 / 吴洪亮

老先生 2013 年寄给晚辈朋友的一本《儿时玩耍》，记述着他儿时的生活。他在扉页上写着：“……记事，记好事。”



（董世明摄）

贺友直

2016 年 3 月 16 日上午，北京画院美术馆在开例行的展览创意会，其中有个重要内容就是今年下半年将第二次举办贺友直先生的展览，重点展出贺先生刚刚捐赠的数十件作品。对此大家都很兴奋，不仅因为北京画院收藏这批贺老的作品非常难得，更期待和老爷子再次相聚，一起喝花雕，听他讲笑话。不想，贺友直竟然于当晚 20 时 30 分骤然离世，享年 94 岁。

老先生在生前曾说自己要“老得慢一点，走得快

一点”。他做到了。人生里自我的最终修炼，恰恰是对于生活的态度。贺老给出了他的答案。

贺友直是浙江镇海县人，1922 年生于上海，1937 年抗战爆发那年他小学毕业。这是他的最高学历，也因此他常说：“老汉我的资格很老！1937 届。”1949 年，贺老开始创作连环画，1963 年他创作的《山乡巨变》获第一届全国连环画评奖绘画一等奖，一举成名。之后他创作的《白光》、《十五贯》、《朝阳沟》等成为中国连环画的经典作品。“文革”后，他也赶上了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连环画的黄金时代。1981 年，贺友直在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建议下，被聘为央美新成立的连年系（连环画、年画系）的特聘教授，一干就是 6 年。之后，他回到上海直至去世。贺老也当过官儿，曾担任过中国美协连环画艺委会的主任、上海美协的副主席等诸多职务，但老爷子没有官样子，始终是位我行我素、有态度、有个性的艺术家。

如果能用什么字来概括贺先生，恐怕就是一个“小”字。他个子不高，是个动作敏捷、开口即是满堂彩的小老头儿。这并不是对老先生的不敬，因为他为人爽利，可以和各年龄段的人打成一片，“小老头儿”算是个爱称吧。这么一位“大腕”，他住的房子真叫“小”！一共只有 30 平方米，老人戏称叫“一室四厅”。来客人了就是客厅，摆下餐桌就是餐厅，饭桌上铺块画布就是工作室，帷布一拉就成了卧室。这其中的所谓工作室大约只有 9 平方米。他在上海巨鹿路的房子住了 40 多年，包括在这里创作了著名的《山乡巨变》。他的好友、学者、艺术家谢春彦曾写过一首打油诗，第一句就是：“《山乡巨变》房未变，四十年来守一间。”2010 年，国际博协大会在上海举办时，我和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湘波在会议间隙去看他，走上石库门窄窄的楼梯，看到贺夫人在走廊兼厨房中正忙着，当时脑子里跳出两个字：“优雅”。老爷子坐在画案的一头，身后是各类作品和他收集的资料。因为那张大大的画案，使整个房间显得很饱满，他坐在那里像在指挥作战的将军，自信而自在。画案的另一头有一对单人沙发，我和陈馆长个头儿都不高，但坐下来时，膝盖几乎顶到了案子。那一刻的感触是何为“容膝”之地。老先生很开心，天南地北聊得不亦乐乎。坐着、听着、看着，我眼前的一切非常不真实，脑中蹦出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那句：“倚南窗以

寄傲，审容膝之易安。”陶渊明虽是隐于乡野，但还是有许多心思的，而贺老居于上海之魔都闹市，竟有如此的安然，实在是个奇葩。“容膝之安，一肉之味。”他踏踏实实在享受着仿佛大隐隐于市，实则小民的快乐生活。小菜恰恰，老酒喝喝。

说到小酒，对老爷子是件大事，每日必备。他曾刻过一枚闲章，叫“天地一壶宽”。贺老喝的是江南的黄酒，“他一天喝掉一瓶，一年就是365瓶。当然这个数字还是保守的，如果不受限制的，贺老一餐就能喝掉一瓶”。这是贺老的女儿贺小珠多次提到的，甚至称之为“老爸的生命口服液”。记得2009年，他在北京画院做展览时，院长王明明最认真嘱咐的就是去买最地道的好黄酒！这在北京就不是件容易事了。最后总算找来两坛陈年的“金雕”。那一日，贺老算是喝美了。

关于贺友直，最重要的一个“小”字要留给他的艺术。他一生只创作连环画，俗称“小人书”。谢春彦总结：“他的画和他的人一样，浑身都是戏，处处都是戏。”“戏”，人是核心、故事是结构，生动是关键。贺老对自己艺术的总结叫“四小”：小孩子、小动物、小动作、小道具。在他的作品中，注意对气氛的烘托，注意细节的价值，对此这“四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9年在北京画院美术馆的那次展览上，在重点作品旁边都备了一个放大镜，便于观众细细读来。而在北京画院美术馆的展览中，也只有展齐白石的工笔草虫，才有这样的待遇。更关键的是作品本身的细节能经得

起这样的看，也才敢这样做。

贺友直当年在中央美院当过教授，教学生和画画不同，要把自己的体会表达清楚。在教学中，他也不回避自己遇到的问题，以及自己的艺术选择。他说：“我至今之所以转不到‘国画’上去的缘故，是因为尚未得到这个触发。”没有找到，就不做。他甚至对外公布：“我只会画连环画。……我就是画连环画的，我对中国画不想沾一点边，中国画没有一点修养那就要画，让我画中国画对着白纸一张，人笨脱了，画什么？”贺老不想“滥竽充数”，他对自己有认识，有坚持。贺友直是个“聪明绝顶”的智慧老头，这或许也是他自己的艺术策略，但能漠视画中国画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这不是说说漂亮话能做到的。

贺友直喜欢说：“我们宁波人有句话叫‘卧宽不如心宽’，做人就要心宽。”那是对自己的生活与名利，对于他钟爱的连环画，他是耿耿于怀的。他亲历连环画的辉煌，也眼看着它的没落。在上海的一次开幕式上，贺友直发言时竟然老泪纵横，我站在他身旁，都不知如何抚慰老人那一刻的悲痛。记得溥心畲去世时，大家说他是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笔”。张大千去世时，这“最后一笔”又给了张大千。如今，贺友直走了，不想说他是中国连环画的“最后一笔”，一个时代的结束。因为，他的精神、他的艺术会延续，只可能会变了个“包装”，老人家真的不必忧伤。当所有的背景阐释、政治解读皆烟消云散时，那小小的连环画，自会说话。■



贺友直的忆旧连环画《儿时玩耍》之雪地写字、嘟嘟马、跳绳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配乐师迈克·吉亚奇诺

吉亚奇诺的疯狂城与美好世界

文 / 黑麦

《疯狂动物城》的配乐师迈克·吉亚奇诺似乎有一颗童心。

吉亚奇诺 (Michael Giacchino) 出生在美国的新泽西，他的父母是意大利移民，小时候，吉亚奇诺总是待在自家的地下室里尝试制作简单的定格动画，他将音乐和画片拼贴起来，制作令自己满意的“卡通电影”，多年后，他终于在高中老师的引荐下，来到了纽约视觉学院，那是他第一次了解到有关电影技术

的专业，他惊奇地感叹道：“竟然还有这样的学校。”

视觉学院的学习对于年轻的吉亚奇诺来说是一种崭新的体验，他似乎从未在那些真正的设备面前感受到创作的自由，也开始意识到了电影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他也由此感受到了自己似乎真正成为电影的一部分。在实习期间，他得到了一份环球影视 (Universal Pictures) 的工作机会，6 个月的艰辛及不成正比的报酬让很多人离开了岗位，而吉亚奇诺的努力工作感动了工作室的成员。1990 年，23 岁的吉亚奇诺完成了影视制作的学习，开始转入朱利亚音乐学院 (The Juilliard School) 学习音乐。



《疯狂动物城》剧照

吉亚奇诺的音乐生涯是从游戏开始的，他最早接手的工作是为世嘉五代经典游戏《夜行神龙》和迪斯尼的游戏《狮子王》配乐，之后，他又开始为梦工厂1997年的经典电影《侏罗纪公园》的游戏进行音乐制作工作，他似乎有一颗游戏之心，即便是他已经成为电影人多年后，仍在坚持为游戏而工作。2005年，美剧《双面女间谍》热播并且完结后，吉亚奇诺开始为其游戏《特工风云》谱写音乐，此后他还为《使命召唤：决战时刻》(Call of Duty: Finest Hour)、《荣誉勋章之空降神兵》(Medal of Honor: Airborne)、《转折点：自由的陨落》等经典游戏制作过音乐。

真正改变吉亚奇诺事业轨迹的人是布拉德·伯德(Brad Bird)，这位来自皮克斯(Pixars)的导演把《超人总动员》(The Incredibles)这份沉重的工作交给了他，此前，导演先后找到了兰迪·托马斯·纽曼以及“007”的作曲者约翰·拜瑞(John Barry)，然而

他们似乎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早期电影风格，于是热爱卡通与游戏的吉亚奇诺成为伯德眼中的最佳人选，吉亚奇诺最终用他的童心和努力换来了第77届奥斯卡最佳配乐奖。也正是自2005年开始，吉亚奇诺似乎才真正开启了他的动画世界之门。

《飞屋环游记》是吉亚奇诺的一份感性作业，这部电影的主线浪漫，为吉亚奇诺的工作提供了一份先天的音乐土壤，故事梗概也决定了音乐的方向。在电影中，失去艾丽的卡尔已经年迈，他独自生活在那间充满记忆的老屋，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对妻子许下的诺言。在这一段落中，吉亚奇诺采用了《哈巴涅拉舞曲》，它是歌剧卡门中的经典曲目。《哈巴涅拉舞曲》曾经是黑人的部落舞曲，后来传入了西班牙，于是这种具有多符点和三连音的节奏被演绎成了一种充满活力的乐曲。它似乎传达了卡尔的坚强与沧桑；似乎也表现了他的坚持与幽默感，他常常无法忍受屋外的嘈杂，他不了解屋外世界的变化，那段音乐就像是某种精神写照，但是对于他来说，那幢房子就如同艾丽的精神世界，让他感到抚慰和安逸。

在《飞屋环游记》中，音乐为影片创造出一种特定的气氛基调。作曲家吉亚奇诺运用灵动的音色，到后来的管弦齐鸣，渲染着老卡尔实现梦想的激情时刻。在卡尔与老房子做最后告别的伤感时刻，出人意料的神奇一幕伴随着欢快雀跃的音符出现在观众面前。最先听到的是清脆的长笛的颤音，之后整个木管组的所有乐器，像单簧管、双簧管、大管、短笛等等，在不同的音区奏出和长笛一样的颤音。变化多端的乐器组伴随着振奋人心的清新旋律，就像春天里的小草，纷纷攘攘、争先恐后地钻出来，最后聚集成一个庞大的力量，于是一大团的气球出现在银幕上。竖琴大幅度的上下刮奏，助推着音乐的情绪，规模庞大的交响乐将这个神奇时刻烘托得隆重而华丽。彩色气球满载着老卡尔的梦想，升腾飞跃，远离尘嚣，开始追逐爱的梦想。

主人公卡尔在梦想之旅中结识了热爱探险的少年小罗，并且与一只有着艳丽羽毛的大鸟成为朋友。就在卡尔即将实现梦想的时刻，却遭遇了邪恶探险家蒙兹。最终卡尔受到妻子艾丽日记的启发，在10万米的高空与蒙兹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斗。在老卡尔的正义与蒙兹的邪恶战斗即将开始时，一种凝重的色彩笼罩下来，作曲家在低音部用了一种强悍力度的节奏型，预示着庞大的威胁势力。接着是小提琴很密切的三连音在高音区连续的演奏。此时，在低声部运用了大号、长号等穿透力音色极强的铜管乐组奏出不祥的长音，



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剧照

渲染出正反之间冲突的艰难和战斗的不易。在影片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恢弘激昂的管弦乐章拉开了声势浩大的战斗序幕。规模宏大的管弦齐奏将跌宕起伏的战斗表现得淋漓尽致，呈现出一场 10 万米高空的视听奇观。这些感人的画面也成就了那首被观众所喜爱的《婚姻生活》(Married Life)，由此可见，吉亚奇诺的音乐是柔美而哀情的，它极为单一，反复使用的旋律如同一个人的固执。曲末，音乐消失在小提琴的弹拨之下，微小的齐奏声如同胡桃夹子的某些片落，而作者似乎并不想让这个不真实的浪漫故事过快消失，于是，他选择了让音乐如同八音盒一般，减弱消逝。

《美食总动员》(一译《料理鼠王》)的故事发生在巴黎街区，电影讲述了一个从来不会做饭的年轻人误打误撞来到一家餐厅打工，他在一只名叫雷米的小老鼠的帮助下，做出一餐让尖刻的食评家都无法抗拒的美味。为了烘托出电影的温暖情景，吉亚奇诺谱写了大量的钢琴片段穿插在故事中，其中的多数段落还运用了欧洲的传统爵士乐风格，使整个影片带有一种“法国的叙述方式”。

为了使角色充满鲜明的性格，吉亚奇诺使用了不同的乐器来描写他们，例如：聪明的雷米和温柔的小提琴演奏，乐观的大米和轻巧欢乐的爵士小号，优柔的小林和带有符点的钢琴伴奏，即便是史老板这样的负面角色，吉亚奇诺也毫不吝惜地将美妙的弦乐送给他，或许也是在表示自己对美好食物的某种尊敬。冷漠的食评家埃戈出现时，吉亚奇诺使用了低沉的弦乐和大号，用以表现他尖刻且不屑一顾的评论态度，然而，他亦善用小号做出转变，来诠释人物的多样性格，

吉亚奇诺认为管乐是最接近人声的乐器，它们的声音直接且富有情感。

《美食总动员》的主题曲如同悠扬的巴扬琴，充满节奏与旋律，就像是在描绘一个餐厅忙碌的场景，它的曲调亦像是在表现一位厨师在菜品端上餐桌时的满足感。《乡村炖菜》(Ratatouille) 是这部电影的英文名称，也是雷米和男主角小林最终选择烹饪的主菜，它并非华丽的食物，却诱发了食评家以及那些来自传统美食之乡的高级厨师回想起温暖的过往，当柯博落笔时，一种久处都市间的酸楚流于心中，他似乎很容易忘记那个真实的自己，忘记自己的过往，忘记自己想成为的自己，而成为他人，直至他在片尾，坐拥那道乡村炖菜。每个人都能烹饪 (Anyone can cook) 是这部电影的主旨，即便是全法国最尖刻的美食评论家也会写道：评论家的工作貌似很轻松，我们冒的风险小却位高权重，人们必须奉上自己和作品供我们评论，我们以负面评论见称，因为读写皆饶趣味，可是，评论家必须面对一个难堪的事实：以价值而言，被评论家批评为平庸之物的同时，我们的评论也许比它更为平庸，有时候评论家真的得冒险去发现并且捍卫新的事物，这个世界对待新秀、新的创作非常苛刻，但新人及新作很需要朋友。

在《美食总动员》电影上映后不久，诺瑟姆 (Mark Northam) 和帕克 (Joohyun Park) 两位钢琴家用钢琴重新演绎了吉亚奇诺的作品，他们从某种角度简单真切地还原了作曲家的欧洲调子，以至于不少人在他的作品电影《人猿星球》、《星际迷航》甚至是美剧《迷失》(Lost) 中，都能听到一丝尼诺·罗塔 (Nino Rota) 式的意大利“配乐法”。

《疯狂动物城》是吉亚奇诺的最新作品，它的故事脚本更加美国化，如同它的音乐主线，吉亚奇诺在创作时，不只使用了惊心动魄的管弦乐，也试图在这一作品中表现出质朴的乡村之音。对于一位意大利裔的作曲家来说，这似乎并非难事，如同莫里康内等意大利作曲家总会在“必要”的桥段插入歌剧式的氛围音乐一般。电影《疯狂动物城》讲述了乡村与城市，种族、阶层甚至宗教之间的对立，作为一个臆想化的都市，吉亚奇诺最终将这个乌托邦式的卡通世界赋予了他生活的城市纽约一般的特性，在恢弘、冷漠、现代中夹杂着微不足道的、发光的英雄主义精神。☑

(本文引用了闫飞的《电影音乐的艺术功能》，参考了 Todd Martens 在《洛杉矶时报》上的影评文章，实习生糊糊对此文亦有贡献)

阅读之美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荣获

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最高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中国“百强报刊”

中国期刊协会颁发——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



绘画：阿梗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另一层色彩的《太阳的后裔》

文 / 张月寒

继《来自星星的你》之后，又来了一部现象级韩剧。



韩剧《太阳的后裔》剧照

爱奇艺花每集 23 万美元天价引进的韩剧《太阳的后裔》，不仅创造了收视热潮、让宋仲基成为另一男神偶像，让国内视频网站的“付费模式”更加成熟、剧中主角同款商品在同名商城疯狂热卖，也让人意识到，韩剧从 2013 年另辟蹊径的“外星人路线”之后，又找到了一片新的领域。

“讲述特种部队的剧集，于韩剧里是鲜有的题材。”韩国翰林大学言论情报学系博士候选人、著有《韩疯》和《心韩》的钟乐伟告诉本刊。他曾经留学韩国并在那里工作，对于那里的文化、社会现象，有一番自己的见解。

不得不说，《太阳的后裔》从第一集开始，韩剧中国一贯的纯爱浪漫元素就轻易抓住了观众的心。军人、正义，第一次约会就不得不赶赴任务现场在楼顶被直升机接走的戏剧感，既留下了无比悬念，又满足了女人内心的“英雄情结”。

这部剧延续了韩剧一贯“看似平凡但实则包含亮点”的台词风格。第二集中，男主角有这样一段独白：“我是军人……今天，我刚刚失去了三位战友。他们和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工作，是因为，这样的工作总得有人去做。我和我的家人，姜医生（女主角）和姜医生的家人……

我相信我这样做，是为了守护，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自由和安全。”

“这样的工作总得有人去做”这句话在剧中不止出现一次，也揭示了这部电视剧所隐含的一种更深层的目的。《太阳的后裔》有向中国示好的元素。事实上这部电视剧从策划阶段开始就以中韩两国同时开播作为目标，充分表达了韩方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太阳的后裔》为符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审再播的规定，颠覆以往韩剧拍摄模式，采取“先拍后播”模式，以留出时间供广电总局审查。第四集，柳时镇参加战友的葬礼，阵亡的两个战士，一个盖的是中国国旗，一个是英国，并且镜头给五星红旗和阵亡的中国战士遗像一个特写镜头。

一直以来半岛地区的紧张局势，使韩国一直有向国际社会展示军事实力、吸引国内民众积极参军的需求。在《太阳的后裔》中，韩国军队反应迅速、武器先进、军纪严整、军人荣誉感强。在剧中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中，韩国军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他国军人。在地震那一集中，出现了一个艰难的“苏菲的选择”：发电厂的韩国班长和当地工人一同被压在废墟下，由于承重的

关系，救其中一个则另一个必死，这时就需要宋慧乔扮演的姜暮烟医生根据现场救援原则，救出生存率较高的那个人。

“拍摄《太阳的后裔》的韩国 KBS 电视台是韩国三大无线电视台之一，历史最悠久，也是一家公共媒体，社长由政府人员任命，收入也是来自政府和所委任的电视机许可证服务费。作为公营广播，KBS 当然也受政府多方面的监管，早前也曾发生过 KBS 电视台记者发起罢工，抗议社长吉恒永受总统府指使向员工施压改变报道内容的事件。剧集方面，KBS 电视台制作的剧集也偏向保守及接近较主流大众化的口味，因而近年 KBS 的电视剧集受群众也多多是中年以上的家庭主妇为主。近来，KBS 为应对新冒起的 TVN 有线电视台于收视率上节节上升的挑战，也慢慢调整策略，希望在《太阳的后裔》中，取得一场胜仗。”钟乐伟说。

《太阳的后裔》于 2015 年 6～12 月拍摄。而在现实生活中，2015 年 9 月 28 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宣布韩国将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为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而进行的努力，向冲突地区增派兵工部队，支持当地重建工作和人道主义活动。

不过，既然是韩剧，其间的“浪漫爱情”必然还是主线。电视剧领域有一个经典桥段就是“飘纱巾/帽子”桥段。女主角的纱巾或帽子如果被风吹走，则一定是不偏不倚地滚落到男主角身边，然后对方深情地捡起，目不转睛地望着女主角……让人不由感觉仿佛这世间“大规模的气体流动现象”也专为成全一场爱情似的。《太阳的后裔》第二集也未能免俗地运用了这一桥段。但是，也许是由于宋慧乔当时穿的亚麻 T 恤和短裤、外搭 Rookie-Bud 的亚麻质地浅蓝色休闲西装外套乃至头上配的颇有中东风的灰白色纱巾，恰到好处，画面的美丽也让广大观众忽略了桥段的俗套。

《太阳的后裔》是宋仲基退伍后首部作品，相似鲜活的经验也为他在这部剧中的表现增色不少。和美国当年的电影《壮志凌云》相似，《太阳的后裔》在取得韩国国内播出第七集时收视率已超 29% 的收视热潮后，相信必然也会掀起国民更强的参军热潮。

事实上，在韩国，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这一点，剧中也经台词一再阐释。作为一个人只有 5000 多万的国家，韩国籍男性需在 19 岁时接受兵役厅体检，并在 20 至 30 岁期间根据体检等级和相关规定入伍服兵役，任何人不得违抗。这就意味着，此刻我们见到的韩国男人，只要没有严重疾病或精神障碍，都一定是、曾经是或即将成为一名军人。

然而，据钟乐伟介绍，韩国自民主化以来，90 年代军人便渐渐退出政治舞台，不再干政，社会的凝聚力不再依靠军人来维系，军人便因而失去道德高地与威权。而且，“近年韩国军队接连发生多种丑闻，除了有军人于军营中杀害其他同僚，更因为军人自杀案件，踢爆了原来军营中多年来一直存在着军人间互相欺凌并性侵犯他人的不良风气。”钟乐伟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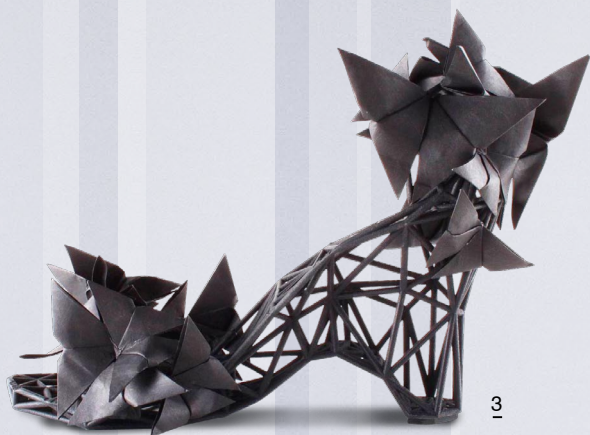
这一切似乎都可以通过《太阳的后裔》得到某种扭转。当观众看着韩国军人在剧中作战勇敢、具备超强的国际主义精神并且一点也不缺女朋友的时候，相信韩国男性也会开始觉得参军或许并不是一件那么坏的事。剧中一群兵哥哥半裸晨跑的情景更增加了这种说服力。

自查宁·塔图姆在《魔力麦克》中开启了“肌肉卖肉”模式而备受欢迎之后，这股风潮终于“西学东渐”。在《太阳的后裔》中，当一个个“穿衣显瘦、脱衣有肌”的兵哥哥在拍摄地希腊半岛晴好的阳光和土黄色建筑背景中半裸上身进行一圈圈晨跑的时候，广大女性观众不由在心底深深感谢导演和编剧。好多男性观众看完《太阳的后裔》以后，默默去健身房办了一张卡……

除去以上因素，《太阳的后裔》也保留了韩剧一贯的热卖点：造梦、洗脑、唯美意淫。写完《继承者》的金恩淑在这部剧里更是将韩剧中一贯的“白马王子情结”玩了个极致。然而，“白马王子情结”却一直是西方女权主义批判的主要观点之一，她们认为女人不应该总感觉自己需要“被拯救”，特别是不应该认为“需要被男人拯救”，因为现实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拯救”你的。然而在东方，这一观点显然并未成为主流。从《继承者》中那种很典型的白马王子“富二代”拯救贫穷纯情女模式，到《太阳的后裔》中几次男主角和直升机的结合，这些一方面是编剧娴熟地抓住了广大女性观众的心灵高潮点，二是利用女人无可救药的“英雄情结”。第一幕当男女主角刚刚相识、第一次约会告吹的情况下，宋慧乔来到屋顶，目睹着这个很有魅力的男人，登上军用直升机飞走；第二幕，当乌鲁克遭受地震灾难，宋慧乔扮演的女主角正和军队以及医务队一起救助当地伤员的时候，柳时镇带着先遣部队，再一次乘直升机从天而降。那一刻，她看他的目光已不只是升华而已，也让屏幕外的众多亚洲女性观众，泛出因生命中不可得而产生的泪光。

此外，据钟乐伟介绍，这次《太阳的后裔》受欢迎，与拍摄技术也有很大的关系。“拍《来自星星的你》，韩国电视台首次采用了 360 度 CG 计算机特技拍摄作为卖点，今次《太阳的后裔》以 4K 超高画质的 UHD 摄录机拍摄作为招徕，从画面质素角度，在韩剧历史上，是一次突破性的观剧享受。”钟乐伟说。■





1~3. 3D 打印在服装造型上的应用

4. 阿迪达斯 3D 打印跑鞋

5. “虚拟现实”正通过多媒体手段，向用户提供沉浸式的体验



选择科技，或是眷恋

文 / 杨聃

这项工作是否还能存在，取决于人们对它的眷恋有多深了。

说起改变时尚产业的新科技，除了近来一直备受关注的即时信息平台之外，就要数“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简称 V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简称 AR）技术和 3D 打印了。它们不仅零售模式和体验被改变了，就连传统的制造方式也似乎面临挑战。

正在改变的营销与体验

作为科幻小说的又一成功预言，“虚拟现实”正通过多媒体手段，向用户提供沉浸式的体验。据市场研究公司 CSS Insight 统计，截至 2015 年底，市场上仅有 250 万副 VR 头戴器与增强现实眼镜售出。

虽然 VR 离大规模普及还有一段路。但 2014 年收购了虚拟现实初创公司 Oculus Rift 的扎克伯格计划在 10 年后售出价值在 5000 万至 1 亿美元虚拟现实头戴设备。Big Sky Studios 执行总监马泰奥（Matteo Caraccia）看到了将虚拟现实设备投入营销的商机——戴上 VR 头戴器，消费者坐在家中就能获得购物体验。“他们不仅能亲眼看到要买的产品，在周围走一走，还能把产品拿起来看。”他对《时尚商业》说。

这将在根本上刷新人们对内容消费的方式，并催生新的 VR 营销体验。虚拟现实导览平台 YouVisit 的数据表明，进行虚拟现实内容浏览后，有 13.3% 的消费者会产生交易相关行为，但对未获得虚拟现实体验的消费者来说，这一比例只有 5%。

对“造梦”的时装品牌来说，VR 更加有的放矢。在迪奥与 Tommy Hilfiger 的门店里，顾客只要戴上品牌提供的头戴器就能直接穿越到已经录制好的时装秀场。“在商店里，你得不断地给顾客们送去新鲜感，而不是把衣服挂在架子上等着他们掏钱买



左：手工定制西装的制作过程之一

右：Tommy Hilfiger 的门店里，顾客只要戴上品牌提供的头戴器就能直接穿越到已经录制好的时装秀场

就好。”Tommy Hilfiger 首席执行官丹尼尔（Daniel Grieder）曾表示。

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 2016 年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上，ModiFace 演示了 ModiFace Mirror HD 新版魔镜。采用了 AR 的魔镜可以立刻看到想要改变的妆容或唇膏与眼妆的新搭配。这解决了所有化妆女性的困扰，想选出一款适合自己肤色的唇膏再也不用抱着反复擦破嘴皮的决心了。最有趣的互动部分在于，只要换个表情，就能改变脸上的某个部分，就像撅一下嘴就能换一种口红，或者扬一扬眉毛就能变换眼妆。

除了以上在门店的体验营销，一种虚拟试衣间正在修缮网购的弊端。据 Venture Beat 网站报道，Avametric 最近刚为虚拟试衣间获得一轮 1050 万美元的融资。这项技术专门针对如何才能更好地网购服装提供了解决方案。

在 Avametric 公司 CEO 布鲁姆（Ari Bloom）看来，消费者在实体店看到了自己喜欢的衣服，产生购买的可能性只有 30%，如果能去试衣间试穿的话，购买的可能性就会提高两倍。而网上购物既无法触摸衣服的品质和质感，又无法试穿。为了修缮这个弊端，

Avametric 计划将自己的技术投入服装实体店。

一旦被采用，顾客就能在被改造的试衣间里，通过传感器进行图像处理，仅在三秒钟的时间内扫描出其详细身体参数。消费者只需输入相关信息建立账户就可储存数据。当然，技术所扫描和捕捉的不是客户的图像，而是 200 个数据点。

有了这些数据，顾客以后在此品牌与 Avametric 数据库同步的网上销售平台就能轻松找到适合自己身材的衣服。布鲁姆认为，目前的网购缺乏能够和实体购物相抗衡的确定性，Avametric 技术可以为用户提供堪比真实试衣间的效果。

万能的 3D 打印技术

从珠宝首饰到手袋的提手，传统工业的模具生产仍在使用的，这些模具将会被充入塑料、玻璃、金属等各种液质材料助其成形，曾经在大批量生产中有效地降低了成本。有了 3D 打印技术之后，这种“从无到有”的戏法变得更加出神入化了。

与传统方式相比，运用 3D 打印进行的生产，无需传统模具的前期投入，制造 1 件产品与制造 1 万件



产品的成本相同，定制产品的成本也大大降低。这让很多品牌开始“虎视眈眈”，耐克正在3D打印足球运动鞋上进行创新实验，争取按照顾客脚形实现个人定制。阿迪达斯、锐步与New Balance都已经公开各自品牌的3D打印模型。

最新的饰面技术进展也意味着，3D打印能用以制造平滑、打磨后的产品表面，更符合高级商品的特性。除此之外，Under Armour也即将推出其3D打印的运动鞋。虽然该技术并不是促进销量的保证，但对于制造商来说是一种对创新模式的验证。

世界首款3D编织鞋履的殊荣被JS Shoes摘得。据美国PSFK网站报道，JS公司的联合创始人Xiaoxi Shi自从2014年就一直研发此项目。他解释道，这种3D编织机器在制作过程中，只会使用制作定额成品所需的材料，杜绝了浪费。而生产过程中，3D编织相比传统的技术，碳排放大幅减少，不但进一步提升了安全性，也大大减少了所需的人力。

被夺走的工作机会

如此一来问题来了，虚拟现实对零售业的介入会

不会减少导购的数量？3D打印技术会不会淘汰传统铸模工种的技术工人？答案是肯定的。Argodesign的设计师马克·罗尔斯顿(Mark Rolston)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设计师们，机器人来抢你的饭碗了》。在他预见的未来里，大部分工作都会被机器取代，智能软件和机器人将最终取代出租车司机，记者和医生。就连“自命不凡”的设计师也在劫难逃。

为什么要单独说说设计师？因为他们主导了潮流，让所有产品成为他们被使用的样子，让人们感知到一切既有的存在。这是一项多么复杂而又不可取代的工作啊。然而，在马克看来，将来的人工智能也能胜任这一切。

原因很简单，现代设计是基于用户的习惯来提供解决方案。分析数据和建模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信手拈来，另外庞大的网络数据，包括网站浏览记录、定位系统、选择偏好都能及时被摄入，综合制定更加个性化的设计。不仅如此，人工智能没有畏惧感，因此更容易创新。也许，将来设计师唯一能够指导人工智能的就是人类最原始的“瑕疵”。毕竟，只有人才对传统和情怀念念不忘，并对其心生敬畏。

美国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Lawrence Block)笔下的侦探马修·斯卡德曾凭借一个细节——手工衬衫，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无论是西装、领带还是衬衫，是不是手工的，从衬里可以辨别出来。现代成衣的衬里采用的是涂有热熔胶的化学无纺布，通过滚筒机把它和面料压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黏合衬”，而传统的手工做法是“缝合衬”。

手工师傅把天然亚麻布和面料缝在一起，各个接缝处用的都是隐藏针脚，如此一来“挂在”面料之后的衬里不但能使面料挺括，还能保持面料的柔软感。相比之下，黏合衬看起来也很挺括，却稍显僵硬。用老师傅的话来说，手工做出来的衣服是“随”着人的，而机器制作的东西是人“随”衣。

《奢侈态度》一书中指出，真正的手工缝合必须用亚麻布。同时天然纤维的亚麻能与羊毛达到最佳的融合，令后者柔软亲肤的特性得到体现。而化纤出身的无纺布却完全达不到这点，越是顶级的面料，无纺布衬里的减损作用越大，做出的衣服就越发没有“手工相”。

如果非要说时尚和其他行业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它掺杂了更多“人”的因素。换言之，这项工种是否还能存在，取决于人们对它的眷恋有多深了。☑

奥原希望：小个子，大能量

记者 李翊



奥原希望摘得 2016 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女单冠军

2016 年 3 月 13 日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出生于 1995 年、身高仅有 1.55 米的奥原希望苦战三局赢下中国女单选手王适娴，成为 39 年来日本首个羽毛球世界女单冠军。

坚持就有希望

对于很多羽毛球爱好者来说，奥原希望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2015 年 5 月的苏迪曼杯半决赛，日本队苦战 5 局险胜韩国队历史性地闯入决赛，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奥原希望挑战成池铉的那场女单对决。

由于首场男双日本队 0 : 2 告负，而第三场男单的主力选手桃田贤斗意外受伤只能换上久疏战阵的上田拓马，因此第二场女单已经不容有失。当身材矮小、名不见经传的奥原希望上场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以为，这会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对手是韩国著名选手成池铉，光是身高就要比奥原高 20 厘米，比赛经验也更加丰富。果然，比赛一开始，成池铉就利用场地逆风的优势，频频压制奥原希望的头顶区，以大比分赢下第一局。

谁也没有料到，第二局换到逆风场地的奥原希望逐渐找到了感觉，通过提升比赛节奏把握主动，顶住压力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决胜局中，成池铉再次开始了底线攻势，利用身高优势不停调动奥原希望，而奥原希望只能通过不惜体力的奔跑来化解攻势，多拍回合不断增加，双方的比分也交替上升。比赛耗时已经接近 1 小时了，虽然大部分时间成池铉都占据主动，但奥原希望满场飞奔不轻易放弃的打法，也让成池铉想拿下任何一分都得付出更多的体力。奥原希望那种不服输的拼劲，感动了现场所有人，大家都在为她鼓掌加油。就连场外解说的语气，也由最初的轻视转变为讶异到难以置信。交换场地后，奥原希望开始加快进攻节奏，而成池铉的体力开始出现问题，随着奥原希望打出的一波 9 : 1 的高潮，比赛也尘埃落定，奥原希望以 2 : 1 逆转战胜了成池铉，为日本队拿下关键一分。

奥原希望推特上的背景照片是群山环抱、因滑雪和温泉而出名的日本长野县大町市，那是她出生的地方。小学二年级时，受父亲和哥哥姐姐的影响，奥原希望拿起了羽毛球拍。刚打球时，她总是输给自己的哥哥姐姐，因而常常哭鼻子。除了羽毛球，奥原希望

还喜欢游泳。她说：“游泳是和时间赛跑，由时间来判断状态的好坏。而羽毛球是通过对手来判断，我更喜欢能和对手斗智斗勇的羽毛球。”

与中国专业队的培训体制不同，日本推行的是“学校—俱乐部”的培养模式。奥原希望就读的埼玉县大宫东高中体育学科在日本实力不俗，曾培养出多名优秀的足球和棒球选手。回忆起自己的高中生涯，她有些遗憾：“高中时代的生活全部奉献给了羽毛球，入学式没有参加，最后的毕业式因为脚受伤也没有参加。”2013年4月，奥原希望高中毕业，加盟尤尼西斯公司，尤尼西斯的主教练中條彪说：“当时奥原希望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2013年底，中国记者李海良曾去观摩过一次尤尼西斯俱乐部的训练。“虽然是日本国内前三水平的球队，但尤尼西斯队没有固定的训练场地，需要租借场地。训练时，球员都是自己打车或者坐公交前往。打车几分钟就到体育馆，一般队员多是拼车去训练。当时，奥原希望刚刚伤愈，看得出来球队对她很重视，很多时候都是清水文武在重杀，帮她练习防守。不一会儿，清水文武已经大汗淋漓，而奥原希望还在全神贯注等着下一个重杀。”

“自己的个子比较小，比赛中失误过多就是致命伤。练习中必须像打比赛一样一分一分认真地打好，练习的时候也会很紧张。”奥原希望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曾经也想过放弃羽毛球，像一般的女孩子那样去生活。但是，我只会打羽毛球啊！”

两年后，奥原希望世界排名只有115位，但她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进入了前10。从世青赛夺冠到左膝半月板受伤，再到复出，直至积分进入前10，只有20岁的奥原希望在羽毛球生涯中几经波折，但正如她的技术打法一样，她选择了坚持。

看奥原希望打球，难免不想起上世纪90年代羽毛球界的经典人物——印尼女单奥运冠军王莲香。

按照中国羽毛球界的观点，身高仅1.62米的王莲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打羽毛球的好材料，但是她在1992年夺得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冠军后开创了职业羽毛球历史上最为经典的“王莲香时代”，并且着实让中国羽毛球界难堪了好长时间。王莲香身材虽然不高，却具备了打羽毛球所要求的柔韧性、协调性、灵活性和速度，除了力量，她几乎什么都不缺，而且各项素质几乎都是最好的。王莲香的步伐、下肢的运动能力和防守能力是世界上最好的，甚至超过了龚智超。她的特长保证了她的四方拉吊型的打法得以长时间地

称霸羽坛。在过往的比赛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这位印尼的羽毛球皇后无论面对什么打法的选手，总是不慌不忙地迈着她那经典的如芭蕾舞步般轻盈而富有弹性的步伐，用她那同样经典并且毫无观赏价值的四方球将对手慢慢地、一拍一拍地拉死磨垮。

作为日本第一位获得世界青年羽毛球赛女单冠军的球员（2012年），奥原希望的身体条件并不好。1.55米的身高，放在中国，连省队都进不了。奥原希望清楚地知道，自己身高不高，后场进攻的威胁并不大，没有必要勉强地去进攻。所以她必须要通过更多的奔跑，在拉吊防守中消耗对方的体力，寻找机会。步法、体力是她的制胜法宝。除此以外，奥原希望还有一手漂亮的网前技术，在苏迪曼杯半决赛中就通过高质量网前小球回放迫使对手失误。而这些都需要通过大量刻苦的训练才能够达成。

近年来羽坛出现了许多“天才少女”，无论是泰国的因达农、西班牙的马琳还是印度的辛德胡，和她们相比，奥原希望的身体条件完全处于下风，甚至连日本的队友山口茜都比她更加强壮。但奥原希望却成为最近一年中排名上升最快的球员，可以想象在平时的训练中她付出的努力。2014年在夺得自己首个超级赛冠军后，奥原希望曾表示：“小茜（山口茜）的打球意识比我好，但是我不服输，总是非常努力地练习，并且我对自己的韧性很有信心。我和小茜在出国比赛时，经常都住同一个房间。不仅是技术，大家也会讨论球场上的意志力等话题。”

有一个小细节，或许能看出奥原希望对羽毛球有多么热爱。她是当今羽坛最爱鞠躬的女单选手。奥原希望的教练平山优曾评价她：“赛场上，每球必争；赛场下，温和谦卑。”无论比赛胜负，奥原希望在每局比赛结束后，她都会给观众鞠一个躬。2015年超级系列赛总决赛夺冠后，奥原希望先是一边擦泪，一边给观众鞠了两个15度的躬。下场与教练佐藤翔击掌相庆后，笑中带泪的奥原又是一个接近90度的鞠躬。

赛后，奥原希望解释了落泪的原因：“这些年，我一直想赢得这项冠军。最终获胜时，我想到了自己因为受伤很长时间内不能打比赛，所以当时我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熟悉日本文化的人都知道日本人以爱鞠躬而出名。奥原希望的鞠躬主要是表达自己的谢意。当天比赛后，她先用日语，之后又用英语向每个支持她的人表达了感谢。奥原希望的鞠躬大多是15度，通常是表达轻微的感谢。而这次90度的鞠躬在日本

文化中带有郑重感谢的含义。

2016年3月13日的全英羽毛球赛女单决赛，奥原希望面对的是意图第三次卫冕的中国女单王适娴。关键的决胜局，王适娴因为拖延时间遭遇红牌判罚，意外的判罚使王适娴的心理受到很大的影响，尽管她仍然将比分扳成19：19，但随后连丢两分，以19：21落败。当天正好度过21岁生日的奥原希望成为1977年汤木博惠之后，首位赢得全英公开赛女单冠军的日本选手。

谈及这几年日本羽毛球的进步，曾在日本青年队和国家队执教过的原国手辜家明认为，首先是日本建立了一个专门的训练中心——东京味之素国家训练中心。以往日本国家队每年只在大赛前进行集训，并且没有固定的训练基地，需要另外租训练场地。现在，国家队几乎有半年的时间在一起练习，剩下的时间去世界各地比赛。其次，日本羽协以及日本奥委会对国家队的拨款也不少。奥运会后，很多国家都在压缩经费，出国参赛的人数在减少。而现在日本队出去比赛都是一二十人的规模。

女单开启战国时代

“2016年奥运会女单将呈现列强争霸的格局，中国女单没有优势。”带领泰国羽毛球天才少女拉查诺在2013年成为最年轻女单世界冠军的原中国国家队陪练谢芝华说，“其实不是中国水平下降，而是中国的女单没有进步。”谢芝华点出现有中国女单的窘境，正如现任中国国家队女单主教练陈金所说的：“以前大家看到我们都会感到害怕，这样我们在心理上占优势，然而现在大家都处在同一级别，他们不畏惧我们，并且敢于向我们发起冲击。”

最早突破中国女单垄断的是泰国的拉查诺，2013年，19岁的她在广州羽毛球世界锦标赛上赢得女单世界冠军，打破了中国对世锦赛女单冠军长达14年的垄断，也让其他国家的羽球圈内人士看到希望，翌年就出现了另一位天才少女——西班牙的马琳。

马琳1993年6月15日出生于西班牙西南部城市维尔瓦，她的父母原本想送她学习弗拉明戈舞，结果她喜欢上了羽毛球。14岁进入国家队训练中心后，凶狠的进攻和充沛的体能成为马琳的两大优势。2014年，在从未赢得超级系列赛冠军的情况下，她先后击败王仪涵、戴资颖和李雪芮等名将，成为首位摘取世界锦标赛金牌的西班牙人。2015年8月，马琳成为继中国

名将韩爱平、叶钊颖和谢杏芳之后第四位完成世锦赛卫冕的女单选手。截至2015年11月5日，马琳排名世界第一。

而在此之前，排名世界第一的是印度球员内瓦尔。2005年，15岁的内瓦尔首次登上正式比赛赛场，便夺得了德里卫星赛的冠军。2006年菲律宾公开赛上，内瓦尔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位女子四星级羽毛球赛事冠军。2010年，内瓦尔夺得英联邦运动会女单冠军后，迅速成为印度最当红的明星之一，再加上她外貌清秀，印度羽坛第一次出现偶像崇拜，这大大促进了羽毛球在印度的普及。2012伦敦奥运会，内瓦尔获得女单铜牌，人气暴涨，成了印度的全民偶像，她也因此签下了一笔三年740万美元的大单，成为印度体育界除板球选手外身价最高的运动员，被称为“印度李娜”。印度羽毛球队不仅胜在年轻，更胜在中国式训练体系的成形，现印度羽毛球队主教练戈比昌德就曾师从中国羽球名帅、现浙江羽毛球队总教练王小明。在印度羽毛球界看来，用中国的方法加上印度的天赋，战胜中国队早已不是梦想。

放眼世界羽坛，国羽的强劲对手不下10人。除马琳、内瓦尔和奥原希望外，还有印度的辛德胡、韩国一姐成池铉、中华台北的戴资颖、印尼的琳达温妮、泰国拉查诺和彭妮以及日本新秀山口茜和三谷美菜津。

反观中国女单三大主力李雪芮、王适娴和王仪涵都存在一定问题：李雪芮上赛季屡屡输球，直到年底才强势复苏；王适娴进攻不够犀利，害怕牛皮糖一样的球员；王仪涵虽然进攻坚决，但打法单调，缺少变化，失误相对较多。

“中国女单多年来的强势一直被其他队伍研究透彻，再加上当发现被其他队伍追上时，中国才快步改变，但是这都太慢了。”谢芝华说，“还有一样是球员的信心问题，当球员都被研究透彻之后，中国女单又没有任何特点，就会越打越没有信心。”

谢芝华表示，以前任何国家女单只要和中国任何一位女单球员交手，中国胜率占有90%，但自从拉查诺打破中国女单局面之后，局面改变成为50比50。“这可以从2013年过后，所有女单球员出场对上中国球员时展现的信心与气势看出，相反地，也可以察觉到中国球员，尤其是女单信心的不足。所以在一个50比50的情况下，只要外国球员临场发挥更好时，就会出现中国球员常被打下来的情况。”

中国队总教练李永波也承认：“我们的女单的打法已经落后。”

摩天大楼如何防风？

文 / 薛巍

大楼越高、越细，它的顶部越有可能晃动。《纽约时报》去年的一篇文章说：“在微风的日子，一个1000英尺（约305米）高的大楼可能会晃动几英寸。对于每年大概会遇到一次时速50英里（约80公里）的风，大楼会晃动大约半英尺（约15厘米）。如果是50年一遇的时速100英里（约161公里）的风，大楼可能会晃动多达2英尺（约61厘米）。”

在纽芬兰纪念大学的海事研究所，有一个模仿轮船在波浪较大的海面航行的装置，它能让人体验到摩天大楼在风中的晃动。在接待建筑发展商时，模拟器中会摆放一些家具，包括沙发、吊灯和装满水的葡萄酒杯。墙上投射的画面不是大海，而是城市风光。当顾客坐下或者靠在厨房的柜子边站立时，操作人员打开开关，让他们体验大楼的摇晃幅度。

美国城市规划师凯特·阿舍尔在《高度：摩天大楼剖析》一书中说，工程师会有意使大楼能够摆动，以便减轻大风造成的压力。如果大楼的顶部不能摆动，各种结构性部件可能会因为风的压力而受损。在地震多发区，甚至大楼的地基也能略微晃动，这样才不会像绝对稳定时受到那么大的压力。钢梁的连接处可以在天气或风速变化时拉长或者收缩，以便楼顶轻微地晃动。

对于大楼在风中会摆动多大的幅度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计算公式，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量：大楼高度的五百分之一。超过这个数值，并不是说大楼就会晃动或者倒塌，而是楼里的人会开始感觉有点想吐，所以一些摩天大楼的发展商会在楼顶安装巨型的减振阻尼器。

调谐质量阻尼器由钢铁或混凝土制成，重量在300吨到800吨之间，一般会占据约1000平方英尺的空间，要用钢索吊住。它像一个巨型的吸能装置，使遭到大风吹拂的大楼复位。阻尼器能够把大楼摇晃的加速度（以千分之一G计算）降低一半。阻尼器并不是政府法规要求的，它主要是为了提高舒适性。而且相对来说，阻尼器并不算昂贵，大约500万美元，而顶层公寓就能卖1亿美元。

即将开业的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总高度632米，地上有127层，在遭遇强风时它的摆动幅度

能达到1米，所以大厦在接近顶端处安装了1000吨重的减振阻尼器。1000吨是什么概念呢？《纽约时报》的文章做过换算：一头非洲象大约重8吨，一辆M4坦克大约重33吨，一头鲸大约重40吨，一架波音787大约重130吨，800吨相当于100头非洲象、24辆坦克、20头鲸或者6架波音787客机的重量。

另外，摩天大楼附近的风很大，这是下沉气流效应引起的。如果大楼的侧面完全是方形的，当空气撞到大楼后无处可去，就会往上、往下推。向下的气流会提高街道上的风速。如果好几个大楼挨着，还会形成风道，空气在通过狭窄空间时被压缩，导致风速加大。这是文丘里（Venturi）效应的一种形式，它是用18世纪意大利科学家文丘里（1746～1822）的名字来命名的。

建筑史史蒂夫·约翰逊说，这些都不是新问题，古希腊和罗马人就认识到了风对大楼产生的效应，只不过他们没有盖巨大的摩天大楼。100多年前，纽约居民就抱怨福莱提荣大厦的立面造成的大风。由于下沉气流效应主要发生于方形大楼附近，改变大楼立面的角度就能减轻这种效应，在英国肯特郡海边度假胜地惠茨特布尔，一些街道被设计得跟常见的风向成45度，迎风面就没那么宽了。☑



又是一年三月狂

文 / 张斌



2月4日，奥巴马在白宫接见NBA金州勇士队球员，现场获赠44号球衣

奥巴马，是位成功的总统吗？这可以有不同版本的答案，但至少预测NCAA大学生篮球冠军方面可谓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也许将迎来连续第七年的“大跌眼镜”。失败者？可能是太苛责了，毕竟在入主白宫的第一年——2009年，总统先生还是选对了冠军——北卡。已经是第八年了，奥巴马都会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ESPN邀约，在那个小板子上，贴上自己的冠军所选。

2010和2011年，总统先生执著看好堪萨斯大学。今年，即将辞别白宫，总统再度将冠军希望又押在了这支有“松鸦鹰”绰号的球队。总统愿意陪着全国民众一起融入“三月狂”早是传统，没人在意总统是否成功，因为难度实在是超级无限，有一种说法，NCAA“三月疯狂”63场比赛结果的排列组合可能性居然有100亿亿，听起来让人窒息。奥巴马挺有娱乐精神，他在ESPN的话筒前说：“我可以有成功的开始，为什么就不能再拥有个成功的结局呢？”他还不忘很周到地补上一句，希望自己的预测不要给“松鸦鹰”带来任何的压力，选择他们不过是为了开心而已。

没有亲身体验过“三月疯狂”，但总能看到很多数据来证明美国全社会的共振效应。比如，“三月疯狂”将统治办公室话题，所有雇主都要心甘情愿接受员工

热情和创造力下降的事实，预计5100万雇员将会在工作场景里开心地小赌怡情一番，自然首先侵蚀掉的是有效工作时间，最保守的估计，以全美平均每小时工资25.35美元计算，每拿出一小时玩儿一下相关的博彩游戏，雇主就会隐形损失13亿美元，而上班时时间钻研对阵、偷看比赛的比比皆是，那40亿美元都不在话下的。其实，这也没啥，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了，劳工组织也劝说雇主，顺应人心比什么都重要。美国博彩协会对此也持亢奋的态度，预计4000万人将针对“三月疯狂”最复杂的赛程演进下超过7000万注，每注至少29美元，多好的买卖。

NCAA特别贴心，为了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比赛直播和赛事精华，与媒体合作伙伴搭建了12个直播平台，去年创造了8000万个流媒体播出契机，消费了1800万小时比赛传播，办公室里的“三月疯狂”会因此更加生机盎然。电视转播在去年创造22年来新纪录，每场比赛平均观众数达到1130万，决赛达到2830万人，为18年来最高点。201个品牌在“三月疯狂”的电视播出中总共投入超过10亿美元的广告费，显露出对于古老传统的坚强信心。社交媒体自然也异常繁盛，Facebook针对“三月疯狂”喷发出3.5亿条相关表述，比2014年足足提升43%之多。

将承办最终四强赛的肯塔基如今已经提前被狂飙裹挟，赛事将为这座城市带来3亿美元的直接经济贡献，各行各业如沐春风。全民疯狂便是最大的关注和商机，华尔街的才俊们自然会找到自己的玩法，彭博社老大布隆伯格从去年开始创办了“疯狂竞猜”活动，盛邀42位财经界社会名流公开参与竞猜，每人出资1万美元，最终所有资金和回报通通捐给慈善组织。去年竞猜的赢家是高盛的首席执行官科恩，今年他乘兴再来。这些日常操控世界经济的大佬们公布出的预测答案还是很诱人的，选择与自己的教育背景和生长环境紧密关联，“松鸦鹰”是第一大热门，密西根大学和北卡拥趸也不少。

我们少有某种自家体育的“疯狂”，但并不妨碍全民一乐。今夏欧洲杯51场比赛，各位名流“疯狂”一把，慈善一下，猜猜冠军，测测胜负，欢乐一夏，我看可以的。☑

从叙利亚到朝鲜半岛

文 / 宋晓军

3月17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发了一篇题为《五角大楼再次尝试训练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新闻。看到这则新闻中奥巴马已授权再次启动去年9月终止了的培训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计划后,我马上想到了最近被媒体不断炒作的美国可能会借军事演习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传说。要说清楚这两者之间的联系,首先需要了解一个概念——政权更迭战争。

在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小布什明确表示了美国今后将奉行通过先发制人的战争对一些所谓“邪恶国家”进行政权更迭的政策。从这个角度看,“政权更迭战争”是描述军事行动政治目的的一个专用术语。奥巴马上任前后,尽管他对小布什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颇有微词,甚至在2013年8月做出了不对阿萨德政权实施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决定,但他对“政权更迭”这一目标似乎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一点,从他一再做出培训叙反政府武装人员的决定上看(第一次培训5400名人员,花费5亿美元,用时3年。最近启动的培训计划并没有提及培训人数),就可以得出结论。很显然,奥巴马做出决定前,一定汲取了伊拉克和利比亚战争的教训。简单说就是:成功的“斩首式”军事打击只是决定政权更

迭战争结局的序幕,它仅为下一步完成政权更迭的一系列行动创造了前提条件,而何时创造这个“前提条件”,还取决于之后一系列行动是否准备充分。这可能就是奥巴马一再做出培训叙反政府武装人员计划的真正原因。

接下来再说朝鲜。尽管近来媒体(特别是韩国媒体)一再炒作美、韩联军对朝鲜具有的巨大军事优势,包括不断历数美军最近派往朝鲜半岛各类先进武器平台的性能,但这些都还属于军事性的范畴,而所谓“政权更迭战争”恰恰具有政治性明显高于军事性的特征。它的政治性并不完全取决于武器装备的技术优势,更取决于争取当事国内多数民众的积极行动。有关这一点,涉及朝鲜的信息都是一些散碎的传言,显然不能与叙利亚教派泾渭分明的状况相比。其实之前美国很多专家、学者就“政权更迭战争”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他们在总结了之前几次“政权更迭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推翻一个政府并用另外一个新政府取而代之的两个步骤中,第二个步骤的难度明显要远高于第一个步骤。正是这样,才促进奥巴马调整政策不断在叙利亚内部寻找可建立新的稳定政权的力量。而对于朝鲜,奥巴马政府在尚未找到合适的政策突破口时,只能采取了既不调整外交政策也不制定新军事打击计划的“战略忍耐”。事实上,这也正是朝鲜半岛不断上演“核试验VS军事演习”老套路的一个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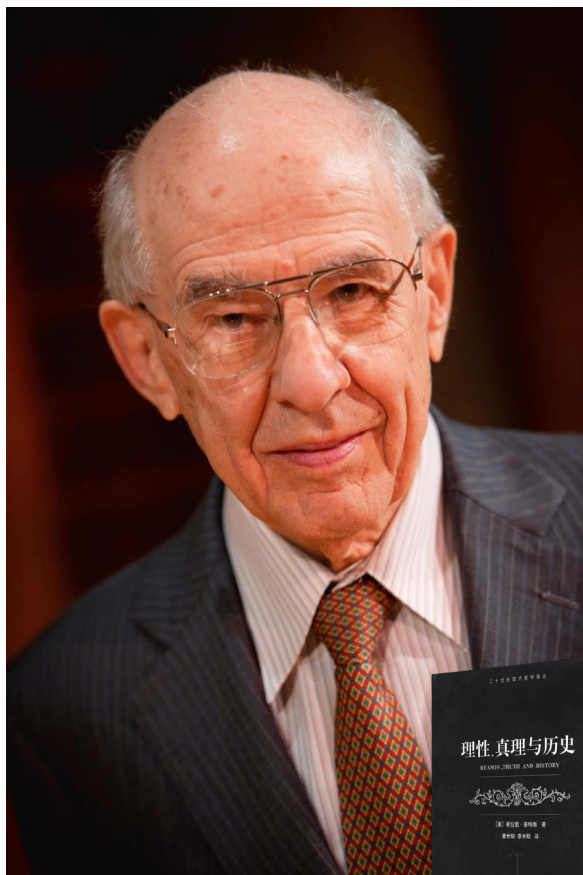
最后我想说的是,自2002年小布什政府针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和朝鲜五国确立了所谓的“政权更迭”外交政策目标以来,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美国军方,一直在实践中寻找一种与外交政策相配套的战略,并且不断针对原政权尚存的叙利亚、伊朗和朝鲜三国进行各种作战模拟,以测算出部队结构、武器装备、作战模式和相应预算支出的最佳组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期间俄罗斯和中国都对美国的“政权更迭战争”目标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俄罗斯甚至在叙利亚动用了有限的军事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看,未来美国军方是否减少对“政权更迭战争”的资源投入转而针对传统大国进行军力调整的资源投入,应该是一个媒体的关注点。■



3月12日,韩美在韩国浦项举行联合登陆作战演习

心灵、意义和现实

主笔 / 薛巍



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和他的著作
《理性、真理与历史》

钵中之脑

听闻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去世，许多人以各种方式纪念他。有人说：“应该在海滩或者沙子上画一个普特南的图像。但那是对他的描绘，还是一个无意义的痕迹？”这源自普特南写过的一段话：“沙地上爬着一只蚂蚁。爬着爬着，蚂蚁在沙地上画出一条线来。纯粹出于偶然，这线条弯弯曲曲，最后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幅丘吉尔漫画。这蚂蚁画了一幅丘吉尔的像没有？”

普特南借此要说明的是，语言的意义是外在的，符号、词语没有内在的东西赋予它们内容。一只蚂蚁在沙子上乱跑留下的痕迹可能会组成一句话，但它不是任何东西的表征。符号的内容源于一个复杂的信息、比喻的网络，以及完全外在于我们的精神状态的历史。如果外在论是对的，那么从原则上说科学无法充分地解释语言。你可以彻底地解读一个人的大脑，但仍无法理解它们的意思。无论怎么分解，意义都不在我们的头脑里。

普特南在哈佛的同事玛莎·努斯鲍姆说：“普特南是最懂物理学的哲学家，但他也明白，把哲学还原为物理学是毁灭性的：哲学是一个人文学科。”普特南1965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学哲学系，一直坚定地调和科学的以及人文、常识的观点。他的著作中有许多生动的思想实验。1999年，《黑客帝国》上映，其主要情节是，一名年轻的网络黑客发现现实世界实际上是由一个名为“矩阵”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控制的。这个设定可能是受到了普特南1981年在《理性、真理和历史》一书中设计的“钵中之脑”思想实验启发：一个人被一位邪恶的科学家做了一个手术，他的大脑被截下来放入一个营养钵，神经末梢同一台计算机相连接，这台计算机使这个大脑的主人具有一切如常的幻觉。再放大一下，所有人类的大脑都在营养钵中，或许并没有邪恶的科学家，或许宇宙恰好就是一台自动机，管理一只充满大脑和神经系统的营养钵。幸好，普特南指出，这种假设虽然不违反物理定律，但它不可能是真实的：如果我们能够考虑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它就不是真的。

3月13日，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因癌症去世，享年89岁。他被誉为20世纪英美哲学界的杰出人物，对哲学中的许多讨论如心与身、事实和价值的关系做出过重大贡献。

2013年，美国学者马尔科姆·尼克尔森发表在《展望》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普特南不像罗素等哲学家那样出名，而他应该如此。“跟大部分哲学家不同，普特南走的不是缓慢、沉重的路线。他的风格更超然、更全景。他的步子很大，经常把论证压缩成几句话，而不是一整章。这种方式缺乏微观细节，但他用把握宏大图景的能力做了弥补。这种进路会显得天真或傲慢，除非处理得非常灵巧。罗素在他的《哲学问题》中做得很好，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杰出的逻辑学家，而且那些被减少到很短段落的论证他已经思考了几十年。类似地，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一书也很宏大、广泛。普特南也有这种本领，他是在世哲学家家里为数不多的罗素、詹姆士类型的人。”

事实与价值

普特南关注的问题非常广泛。玛莎·努斯鲍姆说：“普特南在他高产的职业生涯中，详尽地阐述、创造性地解释了极其宽广的哲学领域中的核心问题。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再也没有像他那样在各个领域做出创造性、基础性贡献的哲学家了——逻辑学、数学哲学、科学哲学、形而上学、心灵哲学、伦理学、政治思想、经济哲学和文学哲学。普特南还至少增添了两个亚里士多德未曾从事过的领域，即语言哲学和宗教哲学。在所有这些领域，他跟亚里士多德一样有着一种深入的关切：不可以把人类生活中混乱的问题加以扭曲，以符合一个过于简单的理论的要求。”

在哲学界，普特南以习惯于改变立场著称。在搞笑的《哲学词典》中，他的词条是这样说的：“希拉里：一位杰出哲学家的学术生涯中一个短暂但重要的阶段。‘哦，那是我三四个希拉里以前的观点。’”尼克尔森对此表示赞许：“经常改变立场不仅展示了他的自信心，还展现了他视野广阔的品格。他能够退一步审视某个特定的立场，注意到它跟更宏大的形而上学、语言哲学不一致。”

对于为何经常改变立场，1992年普特南在接受《哈佛哲学评论》杂志采访时解释说：“我发现有两种做法有助于我得出新的想法：一是自我批判，批判我以前出版的东西，二是读大哲学家的著作。关于第一点，我总是对我以前写的一些东西感觉不满意，我会找出

那些东西，想出我为何感到不满意，如何解决，这通常会确定我下一部著作的议程。但这种前进方式也会造成循环，我发现读康德、亚里士多德、维特根斯坦、杜威、威廉·詹姆士、哈贝马斯或我哈佛同事的著作总是能开启新的可能性。随着我变得更聪明，康德、亚里士多德等人也都变得更聪明了。至于工作习惯，我喜欢散步。我要走好多英里才能写出一篇论文，而且我更喜欢在户外写。对我来说，哲学是一种健康的生活！”

在2012年出版的《科学时代的哲学》一书中，普特南思考了科学和哲学这两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之间的关系。科学的立场努力用独立于心灵的、定律一类的术语来解释事物。它通常被称为描述性立场，说的是事情是怎样。另一种是道德立场，努力用依赖于心灵的、带价值色彩的术语来解释事物，它通常被称作规范性立场，说的是事情应该怎样。

过去一个世纪里，这两个立场一直被认为是相互排斥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者采纳的就是这一思路。他们想把所有思想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统治之后出现了反弹，科学和规范性立场之间的截然区分站不住脚了。普特南认为，我们无法清楚地把事实从价值判断中区分出来。

现代一个被广为接受的信念就是，客观事实和主观的意见与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事实如“地球上的重力加速度是9.8米/秒的二次方”，价值判断如“舒伯特的音乐比贾斯汀·比伯的好”。我们认为，事实是所有理性的人都会赞同的，而价值判断不是能够用理性和论证证明的。普特南认为，事实和价值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一位科学家说由于重力等因素，月亮围着太阳转。另一位科学家赞同同样的观察，但认为在重力背后其实是看不到的外星人在使用牵引光束来移动宇宙中的物体。再多的观察也解决不了这一冲突。他们赞同所有的观察和测量结果，只是后一个理论更加复杂，而大部分人认为理论越简单越好。如果你问为什么某一个理论更好，我们往往会诉诸非事实的因素。我们可能会说，假设了更多实体的理论不如简单的理论，这是引证简单性的价值。我们可能会说，外星人理论跟许多其他判断相矛盾，这是在引证融贯性的价值。总之，不管我们要确立的是什么事实，它们都会跟我们所持的价值观有关联。■

唯利是图又肩负使命的出版人

文 / 黄夏



英国作家杰里米·刘易斯和他的著作
《特立独行的企鹅——艾伦·莱恩与他的时代》

今天的人们可能已经很难想象，揣一本书放进蒙塔古·波顿运动衫口袋、自行车篓或旅行者背囊中，乃是一种时尚潮流。但在20世纪30～60年代，这却是英国年轻人最拉风、最酷炫的形象之一。而打造这一形象的，正是企鹅出版社创始人艾伦·莱恩（1902～1970）。英国作家、出版人杰里米·刘易斯所著《特立独行的企鹅——艾伦·莱恩与他的时代》忠实记录了艾伦·莱恩的个人创业史及其折射的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大凡为出版人作传，作者难免会掉入替传主镀上一层文化先锋、为言论自由呐喊之类的金箔。但刘易斯绝无这番甜腻腻的用意，对同为出版人的他来说，做出版与做其他生意一样，在商言商乃是应有之义。唯利是图并不可耻，反倒是用文化来给自己贴金显得既矫情又缺乏自信。因而，在刘易斯笔下，艾伦·莱恩的唯利是图与文化使命竟看起来那么浑然天成。是的，莱恩勇敢地出版了未删节的《尤利西斯》（1936）

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60），与审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若没有商机，他会以身试法吗？同样，在上世纪50年代，随着电视娱乐和美国文化的流行，包括企鹅在内的英国出版市场开始萎缩。为应对危机，莱恩不惜放低身段，打算出版那些“我们认为可以卖得很好，但却不希望人们将它们同我们的出版社联系在一起的书”。不久，出现了一大拨只面向非洲而不是欧美市场的色情小说，企鹅在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成功实现了以垃圾补贴经典的目标。

这些看起来是不是很投机呢？是的，成功的商人必须要有一点投机的头脑，否则，你就无法因应商业活动中的意外事故。但是，若把投机当成一切，那你永远只是一个厮混于出版界赚零花钱的小角色。刘易斯指出，莱恩的不凡之处，就在于他的时代嗅觉和政经意识，让他敏锐地意识到廉价平装书所蕴含的巨大商机。

廉价平装书并非莱恩独创。早在1848年，W.H. 史密斯创办的铁路连锁书摊就已经开始印制和销售六便士一本的平装书。19世纪90年代中叶，W.T. 斯特德出版的一便士诗集和一便士小说先后推向市场。1901年以后，柯林斯口袋丛书、尼尔森经典丛书和J.M. 登特的人人文丛也纷纷面世。但这些书系要么选题低俗，要么制作粗劣，要么印数有限，而从未在英国文化界引起太大反响。

莱恩的六便士平装书则定位于经典品质和定价低廉，通过海量的印数来达到薄利多销的目的。为此，他首先需要解决出版界的一大瓶颈：书籍的品质决定了受众的分层。所谓品质，既指书籍的选题，也指设计与印装质量。关于选题，出版界历来认为高端图书对应高端知识阶层，既然该阶层人数少而又相对有钱，那么这类图书理应走高定价低印数的路子；反之，低定价高印数的图书一般来说只适合“低智商”阶层阅读，因为“大部分人是愚蠢的，只对能让他们逃避现实的娱乐感兴趣”。

对此莱恩反驳说：“一个缺乏金钱的人未必缺乏知识素养。人们需要优质图书，如果这些图书以便宜的价格用一种直接而聪明的方式展示在他们面前的

话，他们会心甘情愿甚至非常迫切地去购买……如果舆论自由有其意义，如果知识应为每个人获取，那么图书就理应大规模印制，这是非常重要的。”

莱恩有此认识，与他对英国 20 世纪 20 年代末经济危机以来的市场观察是分不开的。其时，与高价图书滞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廉价图书不仅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反而因各地图书俱乐部的大量涌现而增势强劲，这些俱乐部凭借其巨大的会员人数可源源不断地从书商那里获得优惠折扣。报纸则为争取订户而以优惠券方式提供免费图书，同时为作者提供分成。

而从更大的背景来看，大萧条结束后英国经济逐渐向好，1938 年工人的平均工资比 1931 年高出 30%，周平均工作时间则从 55 小时减少到 45 小时。人们手头的钱宽裕了，用来休闲的时间也增多了，中产阶级的文化和生活品位开始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另一方面，电影院、无线电和六便士商店等现代化设施大面积普及，“对其主顾不做任何区分”，一种民主的气氛在社会上弥漫开来。人们不再认为只有有钱人或者文化修养高的人才读得懂诗歌和思想类著作，而工人阶级只配读漫画和低俗小说。

在此条件下，企鹅图书选题之经典与定价低廉之间的矛盾便被化解了——有一大批至少具备中等文化水准，以及尚不具备但追求这种水准的消费群体。那么，廉价图书为降低成本，必然要用低劣的材质和工艺印制而成吗？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曾这样写道：“一种廉价的文学，和那些充斥火车站书架的廉价俗丽的小说一样，品质丑陋卑贱，就好像很多为中产阶级生产设计的东西一样，它们也似乎是为了那些生活水平低下的人设计的。”

因为设计低劣所以文学也跟着掉价，这是阿诺德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未能突破的迷思之一。但另一方面，它也彰显出那些为保卫文学至高地位而焦虑的人们的现实心结。莱恩“唯利是图”的一面则恰好表现在他根本无意破除阿诺德的迷思，而是为迎合人们的需要下大工夫包装图书——经典的东西值得拥有经典的设计。

于是，从企鹅 1936 年成立之日起便有一大批能工巧匠参与打造这个品牌：爱德华·扬、汉斯·施姆勒、杰曼诺·费西蒂、戴维·皮尔森……而莱恩 1947 年起用的瑞士设计师让·切奇尔德堪称出版设计界的教父，我们今天看到的企鹅标志就是他八易其稿而最

终定型的。从封面模板、字体字号，到线条油墨、排版印刷，切奇尔德“将那些曾经用在精装本上的印刷经验和注意力用在平装本上”，赋予企鹅图书的版式和印刷无与伦比的优雅品质。同时，他还树立了英国书籍设计的行规，坚持“所有的书籍设计师都应该为印刷商设计出详细的版式说明”。他的《企鹅排版规则》日后更被无数出版商和设计师奉为按图索骥和变革超越绕不过去的对象。

如此，莱恩便实现了他创办企鹅的初衷：让人们能以一包香烟的价格买一本高品质的图书。这样的图书，“当牧师来喝茶时，你用不着把它塞到坐垫下面，你更愿意将它放在桌子上以显示你是怎样的人”。而现实则远远超过莱恩当年的设想，政治上倾向费边主义的企鹅在走进千家万户乃至机关军营的同时，也培养了整整两代热爱思考的读者和公民。“二战”期间，企鹅就已在他们的头脑中植下福利国家的种子，他们热情地探讨如何建立一个“以勇气、真理、自由和爱为基础的新秩序”之类的问题，以至于温斯顿·丘吉尔大喊“必须尽快尽可能地结束这种事，让相关人员去做有意义的工作”。丘吉尔后来输掉了大选，《大众观察》对此评论说：“企鹅的读者投票给工党的可能性要比那些不是企鹅读者的人高五倍。”

如今，随着出版业利润日益被电视、网络、智能手机等新媒体分食，企鹅当然已不复当年独步天下的气势。但正如我一个出版社的朋友所言，“夕阳产业”的说法说了十几年了，但他们都还在，书也仍在出，只是多了或换了别的出版渠道和载体罢了。或许《特立独行的企鹅》予人最大的启示就是，就算不能像莱恩那样引领乃至创造时代，但出版人只要保有对时代精神的敏锐嗅觉和坚定把握，这个行业便仍能提供广阔的舞台，成就“既唯利是图又肩负使命”的各路豪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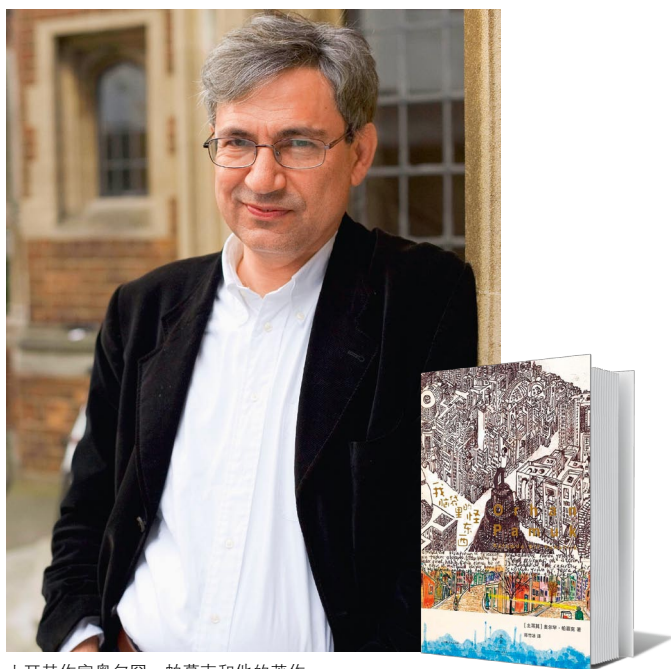
（《特立独行的企鹅——艾伦·莱恩与他的时代》，[英]杰里米·刘易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

出版人只要保有对时代精神的敏锐嗅觉和坚定把握，这个行业便仍能提供广阔的舞台，成就“既唯利是图又肩负使命”的各路豪杰。

帕慕克和他“脑袋里的怪东西”

记者 孙若茜

奥尔罕·帕慕克 20 岁出头的时候，他的朋友就曾经对他说：“奥尔罕，你的脑袋真怪。”一些年后，当他读到华兹华斯的诗《序曲》，里面一句“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时，对自己说：“有一天，我要写一个小说，题目就叫这个。”如今，这本书真的被他写了出来。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和他的著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虽然在人们的印象中，华兹华斯是热爱自然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但帕慕克恰恰把他的话用在了城市：“身处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可能感到孤独，但是让城市成为城市的东西，也恰恰是这种能够在人群中隐藏自己头脑里的怪念头的可能。”显然，书名不仅寓意人物的想象，也指那座主人公不停行走其间的城市——伊斯坦布尔。

是的，帕慕克又在写伊斯坦布尔了。和《我的名字叫红》里面 16 世纪的伊斯坦布尔不同，《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把时间轴定在了这座城市的 1968 到 2012 年。

作者也不再写和自己更贴近的中产阶级，而是去写一个街头小贩——麦夫鲁特·卡拉塔什，几乎从 1970 年开始，他就在伊斯坦布尔街上卖钵扎。通过他的眼睛，帕慕克在笔下展现了土耳其 40 年间的社会变迁，相比他过去比较个人化的视角，这一次作家对伊斯坦布尔的审视和记录应是更加全面、更加真实。

麦夫鲁特是典型的底层阶级，这也许会让你想起以往读过的狄更斯——那种书写小人物种种奇遇的故事。帕慕克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自己对狄更斯的喜爱，喜爱他的语言和幽默，但这种喜爱有限且克制，他不喜欢狄更斯的煽情故事，“有的时候，他让角色喋喋不休，非黑即白，显得滑稽”。因此，在这本书里，虽然帕慕克的确特意设置了一些狄更斯式的人物，但它并不是一个煽情故事。“创造一个表面化的或煽情的催泪角色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这儿这个小伙子和你我一样非常正常，还贫穷潦倒。我可能一直在悄悄地对自己说——别管他，你会发现他有意思。”有意思的平常人，这大概就是帕慕克花了 6 年时间试图在书中塑造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格，所想要麦夫鲁特成为的样子。

你也可以说麦夫鲁特是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主角，或托尔斯泰式的主角，或普鲁斯特那样的角色。当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里，你不会看到作家谈论食物，甚至根本看不到食物。而麦夫鲁特，却是以卖酸奶、冰淇淋、鸡肉饭，最重要的是靠卖钵扎为生。帕慕克说，如果自己来将写作者区分成两种，那么，将不会分成煽情的和戏剧性的，有趣的和严肃的，而是：津津有味地谈论食物的作者，以及不提食物的作者，他自己是前者。

为什么说卖钵扎是最重要的呢？奥斯曼时期的土耳其人很喜欢这种轻发酵的含酒精饮料，因为它让喝点啤酒合法化了——这东西稍带酒精，人们却从不去想里面有酒精。因此，它是某种象征。在帕慕克小时候，穷人穿着农民一样的衣服，在街上叫着：“钵扎！”他就和祖母、家人一起，像他书里写的那样，在楼上的窗边喊着——“上来，上来！”

“就像我在书里说的，在我小时候，钵扎是一种很浪漫的饮料。我们喜欢它不是因为味道，更多是为了那种仪式。40 年后，我为这本书做研究时，知道了钵扎小贩也明白大多数顾客都不是为了味道来买，而是为了

那种仪式，为了接触到某种传统的、属于过去美好的奥斯曼时期的东西。”帕慕克自己解释说，“这部小说的核心有各种小讨论，关于身份、归属、延续、过去的事物、保存过去的道德义务、民族身份是否来自宗教。我对这些东西很着迷，在我的其他小说里也有探讨。我觉得用戏剧性的手法来写这种稍带酒精的饮料再合适不过了，我和读者用浪漫的视角一起探索过去的奥斯曼时期，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快速、繁荣的经济和忙乱的都市生活中的个人主义。”

除了承担起太多象征意义的钵扎，帕慕克还用城市里那些随着时间的更迭而慢慢改变的，各种不起眼的生活细节，饮食习惯、谈话方式，甚至人们在街上行走的样子，构建出城市生活时空的主体，串联起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现代性到来和改变。“一部小说，在我看来，给我一个理由，让我去把我想写的日常生活里的小事情搞确切、收集起来、再组合。小说和博物馆一样，都给我们一个理由，去保存城市的细节、色彩、味道、社会关系、仪式、广告、气味、混乱的多彩和随之而来的感受。”帕慕克说，“我不是说这些是伊斯坦布尔最重要的特质和细节，主人公麦夫鲁特带我们经历无数的细节，也许都会被忘记，但我觉得要把这些保存下来、写下来。”

然而，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帕慕克自身的生活都远离麦夫鲁特以及组成其生活的各种细节。作为一名中产阶级，甚至是上层中产阶级，他虽然小时候就见过伊斯坦布尔的那些简陋房子组成的贫民区，但也只是远远地见过。换句话说，他并不在自己所书写的那种文化之中。因此，6年的时间，作家大部分将其用在和街头小贩交谈，和他们做朋友。“技巧是你先吃点什么，然后开始对话，如果对方愿意聊，你就告诉他你是谁。”他们告诉他一直以来自己是做什么的，怎么在街上做饭，怎么建自家的房子，怎么不被警察抓住，用什么小把戏骗人等等。

于是，帕慕克慢慢了解到五六十年代里，这些人是怎样在非法圈下的政府地皮上用自己的双手给自己盖房子，伊斯坦布尔是怎样发展的，它的人口是怎样从100万增长到1500万，这些人又是怎样从乡下贫穷的村庄迁来，他们和本地人的关系是怎样的，本地帮派或本地持枪组织怎样帮了他们，等等。

当帕慕克拥有越来越多的一手素材，他就越发希望将它们一个个地用第一人称的人物真实鲜活地展现出来。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觉得只写一部像斯坦贝克或左拉那样的小说还不够。虽然我年纪越来越大，但在我心里，一个年轻的后现代主义者却在崛起。他在说，奥尔罕，你记下的声音，和你聊过的声音，你喜欢的声音，请你也展现出来吧。所以我决定做个小实验，这也

许是个坏习惯。”

他所说的小实验是这本书中格外突出的叙述特点——除了在书中用老式的第三人称视角讲述麦夫鲁特的故事之外，作家在写作里混入了第一人称，让那些叙述的声音直接发出。这有点像在《我的名字叫红》中，作者让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开口讲述故事。不同的叙述者可能会发出一些相互矛盾的声音，从而创造一个空间。“我庆幸我的后现代主义心还没有死。它在小说里行得通，也不混乱。你明白谁在说话，也明白这个人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而展开叙述的。”

即便书中的声音众多，对于书中最主要的角色麦夫鲁特，帕慕克从来不以“主角”来称呼。他说，“主角”这个词最早来自古典伦理，讲的都是伟大的勇士或历史上的传奇人物，而麦夫鲁特，虽然参与自己所在的社会，但并不创造历史，因此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角”。麦夫鲁特没有强烈的政治观点，也从不介入政治和道德，他有激进的自由主义左翼朋友，甚至有社会主义者朋友，他也有激进的、热衷政治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朋友。但正因为没有政治观点，让他可以轻易地在这些圈子之间、在伊斯坦布尔的其他有意思的地方之间走自己的路。

虽然任何人的一生都难免和政治、历史交错——麦夫鲁特生活的背景之中，当然，很多只是在他的电视里，霍梅尼领导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全民公决通过《1982年宪法》、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柏林墙倒塌、库尔德工人党和土耳其军队冲突、正义与发展党赢得议会选举、“阿拉伯之春”突尼斯革命……这些事件在上演，于是，书中构成一种类似史诗叙事般的气象。

一年又一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跟随麦夫鲁特上高中、服兵役、结婚，追踪他在街角的步伐，在这个小人物的日常里，看到城市里那些繁荣、快速、忙乱是如何到来，看到老的建筑被拆，新的高楼平地起，看到他走完40年后，那些当年的新建筑又被拆毁，和麦夫鲁特一起感到丢失了身份认同，丢失了回忆。“麦夫鲁特现在恍然大悟了，40年来自己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事实：夜晚游走在城市的街道，让麦夫鲁特觉得畅游在自己脑海里。因此当他和墙壁、广告、影子，还有黑暗中无法看到的稀奇古怪的东西交谈时，就仿佛是和自己在交谈。”

帕慕克说：“这里的道德困境是，人们需要新的建筑、新的邻居、新的舒适感，而与此同时，想要保留下一些旧质感则显得格外困难。我在本书的最后其实也点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那一刻我的想法和麦夫鲁特很接近。”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帕慕克一样，与麦夫鲁特很接近。■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

李娜 编辑整理 吕正惠 校订 定价：48.00元

一个日据时期的“台湾日本人”如何明白自己是中国人，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为何是坚定的两岸统一派？请读难得的精神履历：暗夜行路，矢志不渝。

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

杨渡 著 定价：46.00元

一段台湾农民家族五代人艰难奋斗的故事，一部台湾从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演进史。呈现了台湾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寻常农村生民的困顿与艰辛；以及一百年来，台湾人从殖民地到现代化的过程中，心灵的流浪漂泊。



往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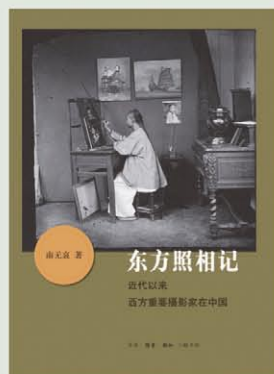
张宗子 著 定价38.00元

往书记，顾名思义，是对过往之书的回忆。古乐府有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书无新旧之分，凡是投缘的，都是好书。这里说“往”，好比对人。所谓故，含有对在时间中流逝之事物的珍重惋惜之意。

东方照相记：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

南无哀 著 定价：59.00元

深入探究从1844年中国引入摄影术至上世纪80年代初，十四位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的影像活动。勾勒出西方人拍摄的中国照片中潜伏的“东方学影像链条”及其演变，揭示影像背后隐藏的社会历史内涵。



城市的故事

【英】约翰·里德 著 郝笑丛 译 定价：44.00元

从“第一个城市”加泰上丘到斯德哥尔摩的理想城市规划，作者选取了世界上有特殊样本意义的城市，从生态学的视角展开叙述——它们如何生长，兴盛、衰亡并自我重建，以及它们与周边乡村的寄生关系。

千利休：无言的前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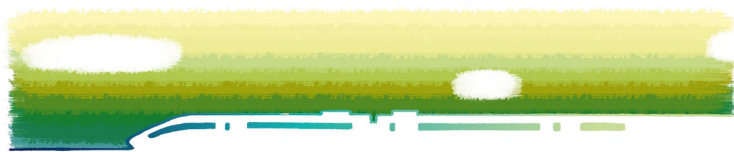
【日】赤濑川原平 著 郑民钦 译 定价：39.00元

作者怀着不可思议的热情搜寻无用之物，却与四百年前开创茶道的大宗师千利休不期而遇。于是绕开茶道史的繁文缛节，走进茶道发生之初的鲜活现场。小到极致的茶室，原来也是以小见大的思想运动的实验室。



列车驶过华北平原

文 / 朱艺先（郑州） 图 / 陈曦



当G90迅速驶入郑新黄河大桥的时候，我耳机里随机播放的歌曲正好轮到了弗兰克·辛纳屈那首经典的《My Way》。透过窗户看着阴天里黄得不得了的黄河，又听着这样一首歌曲，我竟一不小心同时生成了澎湃和悲壮这两种情绪。好在这段黄河的河道并不宽广，而列车的速度又实在太快，还没等辛纳屈唱几句，眼前就早已是黄河北岸成片的绿色田野，而那种少见的情绪自然也被我迅速地甩在了身后，取而代之的是满心欢喜的惊叹。

这是我大学本科期间最后一次从郑州出发到北京去，大学四年间，像这样两个城市之间的来来回回主要发生在寒暑假的开头与结尾。对我而言，回家的一路上往往是掉以轻心的，面对着即将又要被过于熟悉的环境所包围的现实，在列车上我就已经开始逐渐失去探索陌生事物的动力。而郑州与北京之间这片总是一马平川、鲜有变化的华北平原，在回程的途中更是很难真正吸引到我的注意，所以，我对列车窗外这片土地的了解，主要建立在去北京的路上。尤其是寒假开学的路上，初春的华北平原正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看起来相当心旷神怡。

现在回想起来，“大一”“大二”的时候还太无忧无虑，窗外的景象也只当是单纯的美景随便看看，甚至还孤陋寡闻地产生过为什么天气还未回暖农作物就已经绿得这么喜人的疑问。真正把我打动了的，还是“大三”寒假结束后的那次经历。当时我正没出息地在出国与考研这两条路上摇摆不定，虽然更倾向于前者，但毕竟并未做出最终的决定，所以心里不免还是有些焦虑。我坐在列车上，正想着开学后需要做哪些准备，越过黄河后窗外突然就闯入了一大片生机盎然的绿，一眼根本望不到边。几株还未长出叶子的大树零散地立着，金属的电塔看上去就像是巨人不久前摆放在原野上似的。田间地头的农民有的在弯腰除

草，有的在浇水，有的双手叉腰望着远方。看着这视线丝毫不受遮掩的景象，我顿时觉得这才是最本初的生活、这才是人类得以延续至今的原因。而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我也突然前所未有地想要跳出去置身于绿野之中，想要随着万物一起缓慢地生长，而不是在20出头就必须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决定。

当然，决定终究还是得做，而现在早已做出决定的我再看窗外的这片华北平原，内心依然会觉得感动。这次去北京我乘坐的还是G90，它从郑州东站出发，在华北平原上奔驰的途中只在石家庄停靠一次，短短两个半小时就能承载着十来个车厢的乘客顺利抵达目的地。列车开动的时候，作为一个具备部分强迫症特征、又带有点近乎病态仪式感的人，我本想这一路上可以这样度过：不看杂志，不翻书，不看视频，不打盹——老老实实完完整整认真真地饱览并记住这大学四年最后一次开学的旅途风光。然而由于前一天晚上实在没有休息好，我最终还是事与愿违，仅仅做到了前三条，最后一条不到一个小时就彻底沦陷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G90早已经马不停蹄地掠过了大片的华北平原。不过我倒没觉得有什么遗憾，反而感觉一觉之后脑袋清醒了许多，心情似乎也更明朗了些。车窗外依然是一片白蒙蒙的阴天，好像列车并没有移动多远似的，但是望着远山朦胧而敦实的轮廓，望着逐渐密集的高高低低的楼房，我就知道北京肯定不远了。我又看了一眼手表，已经十一点十几分了，北京果然不远了。四年来，高铁向来准时，到11点半的时候，它准能稳当地停在北京西站的某个站台旁边。☑

| 本栏目投稿邮箱 MENSULA@SINA.COM |